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何厚铎家族传



## 导 言

### 平步青云的澳门之星·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 ——何厚铨家族身世揭秘

世纪之交到来之际，历经近五百年飘泊离散的“游子”——澳门将飞越沧桑，扬帆归航，返回祖国母亲一往情深的怀抱。

于是，万众的企盼逐日增温，世人的眼光不约而同竞相聚焦于澳门地，并开始瞩目一颗才华横溢、平步青云的“澳门星辰”——何厚铨。

一贯作风为“少说多做”、低调回应传媒的“贵家公子”何厚铨，只因了今日政坛大趋势和昔日命运的“身不由己”，脱颖而出为万众瞩目的热门人物。

他想“低调”，以示自己与普通人无别，而事实却是天然有别，他是名门之后，是声望显赫的传奇人物何贤的宠儿，是澳门人尽皆知，妇孺谙熟的何氏家族“五公子”，是1955年在其家族事业兴旺发达、父亲驰骋濠江时“含着金钥匙出世”的人。

或许，相当多的青年一族会对他羡慕不已，因他的父亲曾被民间传颂称作“澳门王”，澳葡政府也曾因他父亲为澳门作过突出贡献而授予其“荣誉市民”勋章，并以“何贤”的名字命名街道。他置身的“何氏家族”虽不是澳门最富有的家族，但却是最有政治地位和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爱国家族……

然而，他还是他，他仍与任何一个普通之人无别无差。那便是他的自食其力和奋斗拼搏，于是他拼出了自己的“传奇”：

年仅13岁，他便离家出洋，留学异国；

年仅28岁，他便被家族危运“赶鸭上架”地登上战车，重整起一桩桩棘手难承的父业；

年仅31岁，他便急流勇进，在社会广阔的大舞台参政议政，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而今，“四十不惑”年富力强的何厚铨，已平步青云置身于澳门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之高位。无疑，1999年谁主濠江？在世人竞猜争测的热门话题中，低调、务实、拼搏、风华正茂的新一代政坛明星何厚铨，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何厚铨，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现任澳门立法会副主席，澳门银行公会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同善堂值理会副主席，澳门镜湖慈善会副主席。

他曾任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澳门基本法协进会理事长，在回归祖国前的五百多天中，他担当着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的重任。

当然，作为何氏家业的继承管理者，掌门人，他又是一个银行家，身担着澳门大丰银行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重担……

一连串举足轻重的职位和头衔，似乎高不可攀。奇怪的是，这却实实在在地全都落在一个四十出头的壮年人身上！

冷静、精明而又随和、谦厚的秉性，使不断向人生高境攀登求索、执着挺进的何厚铨，淡定从容地勇挑重担，潇洒起程，且信心十足地“加油赶

路”……

尽管，人们总习惯将何厚铨和他功德无量的父亲扯在一起，但他从来不把“父荫”当成护身符和炫耀品。然而，也正因如此，何厚铨重现了他父亲至今仍为澳门各阶层人士深深怀念的当年光彩。

由此，这个年轻有为之人，立志以他的生命、以他对澳门社会、对未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崭新世纪的辉煌大业所作的积极贡献而永载史册。

无论怎样，何氏家族依然是个了不起的家族，何厚铨的父亲依然是个青山一般的人物。在漫长的风雨岁月中，何贤一家见证了历史，记录了历史，其本身的浮沉也是一部历史。让我们追本溯源，摊开何氏宗族古旧熏黄的老照片儿，把壶讲古。让长长的夜话，从头说起吧……

## 第一章

### 禺山宝地 何氏家源岳溪乡

飞鹅岭下，岳潭渡畔的岳溪乡，如今的应塘大街四巷三号——一个无人居住的独门独院，关掩着世纪初叶的斑驳沧桑……

何氏祖院的幽僻天井里，那块嵌壁的“天官赐福”牌下依旧香火常燃；烟雾绕着屋内故人的旧照，仿似一个隽永的传说……

何氏家族的长流血脉里，深深凝注着一团深情至今，那就是难能化解的恋乡怀旧的情结。

因而，秉烛夜话，必得追根溯源；记忆的碎片，也就先从养育了何厚铎祖辈的那块土地——番禺去攫取吧。

番禺自秦汉以来就是有名的通都大邑，毫不闭塞，在粤人眼里，它是珠江巨龙吐出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个多世纪以来，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给了番禺人种种的磨砺和考验。

不到番禺走一走，很难领悟“风水宝地”此一语蕴含的深意。它实在像颗“明珠”，嵌在珠江出海口西侧这片广袤的冲积平原上，大河小涌，水网密布，眨闪着熠熠银泽；鱼塘周围的坦基上，栽满蔗、蕉、柑、橙；塘中放养的各类鱼儿活蹦乱跳，水面上成群的鹅鸭嘎嘎嘻闹……物产丰饶、水土肥美的番禺，究竟养育了多少风流人物？

番禺的先贤，贡献卓越，影响深远。就以文学艺术方面来说，诗有杨孚、李德、赵介、黎遂球、屈大均、张维屏，词有李昂英、潘飞声、叶衍兰等，都声名远播；书法有天然、吴道容、叶恭绰；学术有陈澧、刘彬华、黄乔松；音乐有何柳堂、冼星海，驰誉国内外；教育有何剑吴、许崇清。特别是英雄壮烈之士，有邓世昌、朱执信等，才华横溢，大义凛然……对番禺人来说，这一长串名声显赫之人是他们的骄傲，用他们的话说，凡是为家乡吟过一首好诗，添过一彩笔，流过一滴血的乡贤，我们都应该永远记住他。

难怪，何厚铎和他的家眷至今习俗未改，岁岁春节过年回乡祭祖，平素闲暇也常返故里。时人况且眷念乡土，衣锦游子孰能长辞不归？此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

凡名流群芳，统统被番禺人尊称为“乡先生”。近几十年以至今时还活跃于国内外文坛艺苑，享有盛名的乡先生，更不乏人。摄影家石少华，国画大师赵少昂、关良、周千秋、靳微天、靳永年，文艺活动家靳羽西，书法家李天马、麦华三，作家黄庆云，舞蹈家陈爱莲，粤剧家文觉非、黄少梅，名导演谢添，以及名导演黄佐临和名教授商承祚等等……他们的名字都曾及时且无疏漏地被珍挂在“禺山兰桂”的长青树上，昭示着一份份乡土的荣耀。

不错。家乡事，家乡人，家乡水，家乡月，会引起人们无限的情思。“番禺”二字，连同水乡的鱼虾，蕉风和稻浪，总会勾起乡人对童年生活斑驳的回忆。就连出生在海外的乡人后裔，他们也要从父母祖爷祖奶的嘴里，品尝回味不尽的乡情。故乡禺山，养育了一代代贤能的“乡人”，也滋养了何氏家族的情愫血脉。1993年，时仅38岁的何厚铎和他的母亲陈琼、伯父何添以及故去的父亲何贤，一同被纳入了“番禺市荣誉市民”的光荣册——仅从这一点，便足可印证海外成长的何厚铎，的确秉承了他那爱国先父的乡土情结。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番禺大大小小的乡人，提及一个“澳门贵公子”

何厚铎时丝毫不感到陌生，而且长辈都叫他“铎仔”，同辈都喊他“铎哥”。

“番禺”对何厚铎而言，距离并非十万八千里远，含义也不是履历表上古板的“籍贯”条录，那实实在在是他为之灌注了一份纯朴乡情的故乡热土——不强调这一点，似乎有悖于回溯何氏家风。

现在，可以把话头收拢，言归正传述说何家往事了。

何厚铎生父何贤的家乡，正是在今番禺市石楼镇岳溪乡应塘村。

应塘村距市桥镇 17 公里，建村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该村子三面环绕着飞鹅岭、唐梅岗、大松岗三座山丘，站在村边的一口池塘“白沙湖”旁，呼之有回应，故名曰“应塘”。古往至今，应塘村百姓们始终虔信，他们的村子正对仰飞鹅岭的鹅头，风水好极了。作为如山的佐证，就是出了何家兄弟两个在港澳工商界呼风唤雨的杰出人物。

据说，南粤民间盛传“珠三角”有四大风水宝地。此“四大”乃是番禺的石楼镇；沙湾镇；顺德的大良镇；磐江镇。而石楼镇荣居了四大风水宝地之首，可见岳溪乡的应塘村民们并非自说自话，却是拥有“底气”的。

且不管应塘人们的“风水”之说是否在理，在汽车轮子尚未普及的焦黄岁月里，水路交通无疑是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而番禺密布星罗的水网，则大大方便了番禺人的对外交往，加上丰富的物产资源，使那时的番禺人也就早有出外做生意的传统了。

何贤尚未出世，他的祖父便已外出经商，到了何贤的父亲何澄溪这辈，何家虽不能算富商巨贾，但在经济不发达的旧中国农村里，也堪称为一个殷实的小康人家了。

何澄溪青壮之年，曾先后在番禺、顺德等地开设丝绸、海味、火柴、粮油、草帽等民生小买卖，在应塘有七八十亩田地和两个果园，在广州也置下了几处房产。后期，又经营起航运，拥有鸿运、合益等几艘花尾渡，开设往来于澳门、湛江、江门三地的客货运。

何澄溪先后娶有邓氏、梁氏两位夫人。且在同一年中，先后喜得二子：何添（香港银行界知名人士，何厚铎伯父）为梁氏所生；何贤（何厚铎生父）为邓氏所生。这是一段佳话，后文详述。

此处要说何澄溪公待人一向和蔼可亲，热心社会福利，关心乡亲们。他老人家于 1954 年 10 月 14 日病逝于澳门，临终前还曾立下遗嘱以三分之二家产眷顾族中的贫苦亲戚。他的平生为人言行对何贤影响很深。

而座落在飞鹅岭下、岳潭渡畔、岳溪乡中应塘村的何澄溪故居，说起来蛮有意思的。先是那狭小巷口的门边，钉了一个很城市化的门牌叫“应塘大街”，深蓝底色上写着雪白字迹的那种十足现代化的街市户牌。

祖居的“大门”，也就是“应塘大街四巷三号”铁牌旁的一个小院门，和它贴身的幽长窄巷与高阔灰砖瓦房相比，院门似乎显得格外狭长与神秘。

寻访何氏祖居那天，村委书记梁汉田带着我们熟悉地穿过村道小巷，到了何家巷口的一个小杂货铺前，请坐在门口剥着豆子的一个老阿婆前去祖居为我们开门。

老阿婆微微点头，二话没说，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把铺口的买卖筐篮利索地拾掇好，便锁起自家的铺门，而后踩着小脚碎步儿，晃啷着别在腰间的一串大铜钥匙，径直入巷，默然无声地打开了那扇紧闭的黑漆小门……

何氏祖居院内，只有一个四方形小小的天井，一个灶屋储藏间，一排三间隔断的大屋；大屋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间的正厅稍宽，两侧是长方形

厢房，或许屋高的缘故，厢房显得格外窄长，并且没有窗户。

要说这祖居，该是荒凉冷寂半个世纪了吧。何澄溪早年常在外乡奔波，曾久驻广州十二甫长兴里。后来到了1938年秋冬，在日本帝国的飞机频繁轰炸中，澄溪公才重回乡下这祖居避乱，最终，他的人生足印还是漂去了澳门岛，并谢世在澳门。眼下这清冷简朴的旧居，是何氏乡人于1985年初按先前式样整修的。那时何贤已在1983年谢世，因此这重修祖屋的举动，更明确表达了何氏家族怀念两代贤人的心愿。

正厅里的家私陈设，简单得近乎朴素，一套待客桌椅和一个陈物柜都铺着蒙尘的塑料布，待客人来参观寻访，憨朴的村委书记和管家阿婆才将尘布掀启，招呼大家随意歇坐，如同在他们村中任何一家歇坐，丝毫没见煞有介事的防范。只是我们呆上片刻，就深深地体察到这空旷的祖屋旧院，还是明显透着一抹斑驳的荒凉……

当然，浓浓地弥漫着怀旧色彩的，便是正厅灰砖墙壁上并排悬挂的三张黑白泛棕的旧影：何澄溪公与他的两位夫人邓氏和梁氏，都端呈着静肃的仪态和慈祥的目光，为祖屋的空间烘托了一丝入世的感怀情调，也由此而平添了故居的神秘，使之与周围的村里人家，拉开了现实的距离，成为历史的定格与缩影。

何氏祖院的幽僻天井里，正中对屋的院墙上有一块嵌凿的精致的“当天”（神牌），上写“天官赐福”四个竖列的遒劲大字。据村长说，这“当天”之牌位本村家家户户都设有，只不过穷人家往往贴纸糊的“当天”牌在门板或院墙；再好些的就弄个木板的“当天”牌钉起来拜。像何家这种用灰砖雕凿的“当天”牌，算是有钱人家，摆设得体面了，要是再遇个富得流油的人家，是否会营造一个金的银的“当天”牌？看来也完全有此可能。

无论怎样，人们亲眼见得，何氏家族祖屋壁嵌的“当天”牌，确实结实悠久，耐得风雨侵蚀的。在棱角凸凹的缝隙中，隐着一些淡淡的苍苔，但恰因了这淡点之苔痕，才好似为一枚沧桑的石头印章，润填了些许斑驳的色彩——“天官赐福”这句祈愿的俗语，倒显得格外脱俗，且濡染了文墨的古香似的。

拜“当天”牌，即是百姓烧香祈祷“上天保佑”的意思，“天官赐福”的字眼，流露了何氏祖宗求“天上赐福”的虔诚。

岂止先人呢？我已发觉，那块嵌壁的神牌下依旧香火常燃；那沿墙的地面，也遗落着厚厚的香灰。

看管祖屋的老阿婆说，何家这些年里，做了许多造福乡亲的善事，所以返乡成了常事，也就不时地回祖屋来拜拜，过年么，更要祭祖拜天祈愿的。

说到底，何氏家人足踪漂得再远，何氏的后辈们再怎样百般出息，大业有成，恐怕他们都依然会象地道的禺山乡人一样，深深眷顾和依恋祖辈发祥的福地吧。

老阿婆与我们轻言细语那当儿，顺势弯腰给墙跟地上的香炉里添燃了一柱香。

烟雾缓缓扶摇升腾，弥散在冷寂的祖居天井小院，又缓缓飘进正厅，轻柔缠绕着屋内故人的旧照……

那情景，仿似一个隽永的传说。

## 第二章 双雄降世 伯仲添贤酿美谈

1908年，对何澄溪来说，真正算得上是个“发”年。他的两位夫人，同年仅隔数月，先后诞下双雄贵子：居长的叫何添，幼的叫何贤……

自童年伊始，这伯仲兄弟一添一贤，便预示着何澄溪“如虎添翼”般的大吉大利。

1908年，对应塘村的何澄溪来说，真正算得上是个“发”年。他的两位夫人，同年仅隔数月，先后诞下双雄。

居长的叫何相添，为二夫人梁氏所生；幼的叫何相贤，为大夫人邓氏所生。何相贤就是何厚铎的生父何贤。

何贤于1908年12月1日生于广州十二甫长兴里的一间大屋里。在他之前三个月，同父异母的兄长何添已经降生。对何氏家族来说，这一添一贤便预示着何澄溪家族“如虎添翼”般的大吉大利。

这是一个为当今世人难以理解，而在当年却十分和睦的小康人家。何贤与哥哥何添生性懂事，相亲相爱，从不争执打架。而更可贵的是，他们两位年轻的妈妈，更是满心欢喜地拉扯着两个孩子，对待他们不分彼此，一样视同己出。

家中并非像大户富豪那样伸手要什么便有什么。而事实上，五六岁的兄弟俩就得帮助家里的妈妈们干点活儿了。除草呀，喂鸡呀，有时还得到溪边，或是再远一点地跑到濒临珠江的地方，去捡些螺蛳。

累了，兄弟俩就会坐在溪边玩耍。偶尔，望着不远处那片黑压压的石砺岗，还有那古老衰颓的莲花塔，小哥儿俩也会静静地发上一阵呆……

何贤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尽管他仅比哥哥何添小三个多月，却好似小了哥哥许多，性情也比哥哥稚嫩和调皮。

有一个笑话，直到今天，仍成为应塘村老人们树下乘凉时的谈资：何贤和何添呀，两人出世时间只差几个月，孩提时个头儿自然长得差不多高。兄弟俩回乡下住后，乡亲们见他俩天真活泼，非常可爱，有一次便拉着他们的手问：“你们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调皮的小何贤赶忙给何添打了个眼色，说：“哥哥，别告诉他！”

在场的人听了都笑破了肚皮。

直到今天，大名鼎鼎、功德无量的何贤先生早已作古了，而他穿“开裆裤”时的天真故事还在应塘村人中间流传着，美谈一般津津乐道着，这也是老人们给时下穿“开裆裤”小孩们讲的“古”。

村前碧绿的水塘，村后葱翠的唐梅岗，村头参天的古榕、傲岸的红棉，还有村尾阔挺的芭蕉、婆娑作响风姿摇曳的竹林……从容又安详地沐浴着大自然的恩泽。当然，那时的村子里还有不少光着屁股上窜下爬摘果子吃的孩子，以及瘦骨嶙峋满脸皱纹的穷苦农夫。

到入学的年龄了。小哥儿俩七岁时，家里让他们到附近颜家巷的一家私塾念书。

塾师叫潘伯强。和大多数私塾先生一样，穿长衫马褂，刚刚剪去辫子没多久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

小何贤觉得，先生拿着书本领弟子们唱读时，越过书本扫向课室的目光格外犀利，这威严的扫视，往往使调皮的他欲搞小动作却又不敢轻举妄动，

真够压抑的。特别是先生教桌上放着的那把木制戒尺，小何贤不止一次尝过它的滋味儿，手心过了几天还隐隐作疼呢。

私塾的学习对小何贤来说，是刻板枯燥的。读的是《三字经》、《大学》、《孟子》一类的书，天天读，天天背诵，天天习字，就这样初步掌握了文化知识。

小何贤最怕先生对对子。当他把视线投向窗外，欣赏偶尔飞过的一只小蜻蜓或一只花蝴蝶时，老先生便会突然出个对子让他去对，害得何贤如堕五里雾中，抓耳挠腮不知如何对答。

而哥哥何添，不论是背书对对，都能应付自如，有时还令先生拍案叫好。

小何贤呢，还不喜欢写字。正襟危坐，屏住呼吸一笔一划临贴，令生性好动的他感到着实困难。他的字写得远远不如哥哥何添好，何添的字常受先生的称赞。

然而，大凡好动调皮的孩子，脑子没有不好使唤的。

何贤聪慧之极，他记忆力过人。

在读私塾期间，每天放学后，何贤就到父亲的店铺帮忙，尽管他当时年纪还小，却对经营业萌生了兴趣，也学到了一点商家小本事。

他喜欢坐在柜台后的高凳上，噼哩啪啦地拨弄着算盘珠子，俨然一个大掌柜的派头。

他还喜欢学着店员的模样，拖腔拉调地招呼客人，用零零碎碎听来的知识和信息，向顾客卖力地作着介绍。

何澄溪公看着小儿子稚气可掬的样子，在一旁会心地微笑，这不，儿子可以继承他们何家善于经商的传统了。

何家虽不是书香世家，但何澄溪教子极严，对孩子的教育并不姑息。

在经商的闲暇，他也常常摇头晃脑地教儿子们背诵诸子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或者是《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就这样，何贤从小就从老爸那里接受了一番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启蒙。

何澄溪不是学究，也不在乎附庸风雅。他教孩子们背诸子格言，明显带有生意人注重实效的特点。他只教日后有益于孩子安身立命的格言，并且每教一条，就要求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付诸于实践。

有一回，村里来了个卖货郎，货担子上全是小孩子们喜欢的小商品，吃的玩儿的应有尽有。小何贤同其他孩子们一道，眼花缭乱地流着馋水儿围着货挑子转悠个没完。

遗憾的是，他这个月的零用钱已经花光了。

卖货郎把货郎鼓摇得叮当乱响，极富吸引力地高声吆喝叫卖，诱惑着围观的孩子把兜底都翻出。买了货的孩子高擎着小玩艺儿或零食，撒着欢地挤出人群欢呼而去。

小何贤呢，眼睛吧嗒吧嗒眨着，实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只好硬着头皮回家伸手问老爸要钱。

出乎意料，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小何贤的要求。但附加了一个条件：何贤必须自己从下个月的零用钱中扣除“债款”。

小何贤的心都快给那货郎鼓咚咚作响的声音勾出魂儿来了，还有什么不答应的，于是他不住点头答应了。

第二个月，何澄溪照例给孩子们派发零用钱。



小何贤也跟往常一样拿到自己应得的一份。

可是，从父亲那里出来，小何贤却将手头的几个钱翻来倒去地看，心里正为是否把上月超支的钱还给老爸而发愁呢。照上个月允诺，“债”是还清了，可这个月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呀！

想来想去，舍不得。

还是决定父亲不发话质询，就不主动还。小何贤抿抿嘴巴，拿定了主意，心中释然。

何澄溪一连几天都没说什么，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

而何贤更是小孩子心情，玩着玩着，干脆很快就把这事丢到脑瓜儿后了。

到了月中的一天，何澄溪公把孩子们叫到书房，给他们讲起了诸子格言。这次讲的就是孔老夫子的训诫：“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叫孩子们跟着读了几遍后，何澄溪发挥开来说，圣人的这个训诫，对我们做生意的人家尤其重要，也最奏效。不讲信用，没有信誉，最终就会成为奸商，人家再也不会信你的！

讲到此处，何澄溪盯着小何贤看了好一阵子。

这一盯，把何贤盯醒了，老爸要“秋后算帐”的，他心知肚明。于是，只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不敢看父亲的眼。

从父亲房里退出来，小何贤赶忙溜回到自己房里，拿出应扣的零用钱回身跑去还给父亲，作了一回“君子之交”。

那个时代，读书人看不起生意人，同样，生意人也不卖读书人的帐，认为书呆子们充其量也只会夸夸其谈。

因此，何澄溪倒并不大在意何贤兄弟俩在私塾里读得怎样，他认为读书的目的主要是能写会算，便于日后做生意。

况且，那时清王朝已被推翻，读书取功名走仕途已不大可能。用生意人功利的眼光看来，整天一味讲什么破题、承题、起讲、入手之类，实在是用处不大。

因而，何澄溪平素并不怎么查问儿子们的功课，倒是常给他们灌输些经商之道。

一天，何澄溪教何贤弟兄俩打算盘。

教给他们珠算口诀后，何老先生便将小哥儿俩关进一个房间里，规定他们何时背熟何时出来。

到晚上掌灯吃饭时了，小何贤拍门要求出来。

父亲问他口诀背熟了没有，他笑不答腔，小嘴一张，却是别出心裁地将口诀从后往上背诵给父亲听。

轻易不夸奖小儿子的父亲，这下忍不住连声喝起彩来。

何添呢，见弟弟受到父亲称赞，自己背熟了也不肯出来，愣是在房里又闷了三天，直到能跟何贤一样倒背如流才肯罢休……

### 第三章 少子离乡 起步闯荡穗兴祥

十三岁时，何贤眼看着日渐萧索的农村家境，苦苦向大人请求辍学离家：“让我到外面去闯一闯吧！”

小小的穗兴祥里，先向赵公元帅的牌位行礼，一拜财神；接着向老板行礼，二拜师父；最后向其他伙计行礼，三拜师兄。

礼毕，何贤就算正式当上这里的伙计了。

两小无猜的弟兄两人，仅读了三年私塾，家境便开始紧促，何贤不想读书了。他帮父亲干活，且干得越来越熟手。

十三岁时，何贤眼看着日渐萧条的农村，还有困难的家境，他便向父母表示不读书了，苦苦地请求大人准许他辍学，离家去干活，好让哥哥多读些书。他想到广阔的天地，闯一条创业的路子，尝试独立谋生。

“让我到外面去闯一闯吧！”小何贤叫叫喊喊。

母亲们经不起小儿子的要求，无奈说：“好吧，你出外不同在家，要生性做人啊！”话音未落，两位妈妈，已不觉珠泪满腮……

而父亲何澄溪，眼见当时农村的经济每况愈下，衰落不景，自己所经营的油粮小商店充其量只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想想儿子的未来，也就点头同意了。

1921年，南国春早，小儿先飞了，他只有13岁，是今天孩子上初一的年龄……

这天，何贤起了个大清早。或者说，他压根儿一夜没睡着。

母亲连忙给他卷起棉被和一张龙须席，几件换洗衣衫。

哥哥也快手快脚地把那几本连环画塞进弟弟的行囊。

于是，何贤挑着行李担，两个母亲和哥哥何添伴随着，默默无言地来到石楼岳潭乡的码头……

母亲们，柔肠寸断，落泪涟涟。

哥哥何添，感到身边朝夕相伴的弟弟突然要远行，一脸的失落，拉着宝贝弟弟的手一阵阵发呆。

唯独何贤，兴奋不已，毫无伤悲之色，感到好像突然添了翅膀，冲动着一种将要振翅高飞的喜悦。

少小离乡，少年气盛。何贤血气里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儿。

这情景，大概是一种中国式的东方情怀吧。娘舍不得儿，却又扯不住儿的襟；望子成龙心切，却又禁受着阵阵的疼……

半个世纪以后，何贤回忆起当年离家的情景，眼里依然闪着骄傲的泪光。

他是传统的中国家庭教育出来的弄潮儿，既懂得“男子汉，上跪天地，下跪父母”；也深知“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

所以他带着童龄稚气，义无傍徨，昂头前行，走向生活。

广州沙基，即今天的六二三路，有一间规模不大叫穗兴祥的上海粮庄，零售油、粮、花生等。

何贤的父亲常常去那里买花生榨油，因此与穗兴祥的老板相熟。从前父亲去进货时，不时地也带上何贤，小何贤的醒目与勤快，也颇得穗兴祥老板的好感。

当时广州的商家，有让自家子侄去别人店铺做伙计以资见习的习惯，还

有“孩子由别人管教更听话”的信条。何澄溪见穗兴祥老板喜欢何贤，遂提出过日后让何贤去那儿当伙计的想法，对方听了二话没说，一口应承下来。

而现在，何贤出外闯荡，自然顺理成章地来到穗兴祥里做杂工。

按老规矩，入店做伙计要行拜师礼。何澄溪择好吉日，带上礼物同何贤一道拜了师。

小小穗兴祥里，先向赵公元帅的牌位行礼，一拜财神；接着向老板行礼，二拜师父；最后向其他伙计行礼，三拜师兄。

礼毕，何贤就算正式当上穗兴祥的伙计了。

店里人叫他阿贤。

阿贤生得敦厚朴实，一副硬身板。尽管在店里年龄最小，可做起事来不分大小，都勤力勤为，所以店里上上下下，大家都喜欢他，也最爱与他打交道。

但何贤生性倔犟，吃软不吃硬。

倘若你好声好气地：“阿贤，麻烦你给我买包美的香烟吧？”话音未落，他便咚咚地跑出去，一会儿功夫就匆匆赶回，连烟带找回的四五个铜板一一奉呈到你手上。

如果你吆喝他替你跑腿卖命，天经地义的模样，他呢，就会装聋作哑，不卖你的帐。

做小伙计是店里最辛苦的差事。

每天天蒙蒙亮，何贤就必须起床，烧灶煮饭，然后给老板一家和师兄们打洗脸水，再将店铺打扫一次。他做妥了这一切后，别人才开始起床。幸好父亲黎明即起的家训帮了他大忙，现在他每天都能准时起床，不会因贪睡误了活计。

何贤为人聪明、诚实，经过他手的钱，不曾差错一分半厘。

一有空，他就留心店里的上海老板和顾客之间是怎样买卖的。他羡慕上海人经商的办法，留心着老板的一买一卖。一个算盘，你减一子，他增一珠，彼此不做声，原来是在讨价还价了。

看的多了，久而久之，就觉察出老板经营成功的秘诀：掌握市场情况、货真价实、讲究信用。上海人经商的经验，对何贤后来事业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而当时的老板，也看得起何贤，店里许多交易活动都交给他去办。

何贤对市道情况，倒也关心起来，有时，还能看准市价的浮沉呢。在他15岁的时候，已成为老板信赖的得力助手了。

何贤渐渐发觉从家里带出的衣服，不是短了，就是窄了。

冬春夏秋，一轮又一轮转过。原来他已在穗兴祥干了多年，个子长高了，生意经也学到不少，脑瓜儿开窍了。

穗兴祥有个老主顾，是店老板的一个老朋友，他在顺德县陈村开了间“福源”店，也是经营油粮生意的。此人经常要来广州买货，又要处理店里的事务，实在忙不过来。而且，他的生意还似乎越做越红火。

“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给我掌管店铺可就太省心了！”这位老主顾整日里想着。

他常来穗兴祥店中，不光与老板要好，有时还约何贤到茶楼饮茶。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他觉得何贤为人诚实且聪明能干，遂想拉何贤来陈村帮自己。

有一天，他请何贤吃饭，干脆吐露了自己的心思：重金邀请何贤到陈村的福源店里当掌柜。

何贤认为这是自己闯世界的发展机会，酒杯一碰，就算签订了口头协议书。

可这位老主顾并不那么轻松。他看上了何贤，可对老朋友店主来说，又无异于挖了人家的墙角！思前想后，他硬着头皮去找穗兴祥的老板商量，并一个劲地表明：“要知道，我请阿贤去当掌柜，可不是做后生啊，人往高处攀嘛！”

穗兴祥的老板着实舍不得让贤，但也觉得不该委屈了阿贤，便咬着牙答应了，心里却怪疼的。

何贤做起掌柜来了。

那一年他不过十六岁，却已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粤（广州）、港、佛（山）、陈（村）、龙（石龙）是当年广东的五大埠头，生意十分兴旺，为支离破碎的旧中国装点了门面。

福源店也是经营粮油买卖的，何贤具备这方面经验，因此完全胜任掌柜一职。他深入了解市场上的行情，该买就买，该放就放，运用自如，很快便使福源的生意兴旺起来了。

他还不满足门市生意，于是走南闯北，经常奔波于五大埠头与港澳之间，不仅做成了大宗贸易，还使他眼界大开，逐渐结交了一批商界朋友。

然而，陈村虽然是个小市镇，却盗贼如毛。“大天二”（土匪）各霸一方，他们是贼又是兵，商人经常受到他们敲诈勒索，甚至还有有的遭到毒打。

何贤觉得此地不适宜自己施展商业才能。

他感到寄人篱下，不如另起炉灶，独创一方码头，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于是，他决意要走，离开陈村，返回南方最大的城市也是自己的出生地——广州。

尽管当时广州有着浓厚的殖民色彩，但它很早就对外开放，是中国与世界各地通商贸易的口岸，在那里经商将是大有作为的

何贤，扬帆出海，水涨船高；

他，已不是池中物了；

他在奋力挺进遨游，胆越来越大，煞不住车，也收不了缰绳了；

他唯有向前；

他已经一步步地起飞了，只想飞得更高更远——

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在等待着他。

## 第四章 金融新星 脱颖崛起西荣巷

接过父亲的“血本”，何贤逐渐在十三行中赢得了第一桶金。

买空卖空，炒卖黄金的风险的确很大。如果不是何贤天赋胆识、勤恳诚实，极可能舟覆人亡。“鸿记”老板何贤，很快扬名西荣巷，不仅赚了大钱，还“赚”到两个生死之交，三人合股创办“汇隆”，同舟共济……

回到广州以后，何贤一门心思就想着开间银号。

这令他的父亲何澄溪心生顾虑，不无担忧。

何澄溪劝告阿贤说，商家自古有句话叫“不熟不做”呀！粮油店的各种生意你都熟门熟路了，进货出货伸手抓把米，就能分出品种优劣，鼻子皱皱稍一闻闻，就能分辨花生油纯不纯，你放着好好的粮油生意不做，偏要拾“偏门”？

何贤却说，眼下时局动荡不稳，各种纸币的价码也容易波动，只要看得准，拿的稳，胆大心细，就一定能赚到大钱。

父亲无言了。自己曾一向教儿子披荆斩棘闯天下的，闯天下就得冒风险，现在怎好扯后腿呢？

何澄溪一咬牙，叫人拿来两百银元交到儿子手上说：“这是给你独立做生意的本钱，你掂量着用，蚀光可就没有了，我们不是大户人家，亏不起的。”

何贤接过父亲的“血本”时，沉甸甸的，不是金砖却饱含着父亲的希冀。无论怎样，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主意操纵自己的命运了，他不是后生不是掌柜，如今可是一名“自雇自”的老板了！

百感交集中带着年轻有为的骄傲，他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给父亲争光的……

可是，在广州要做金融买卖，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因为金融界情况十分复杂，既有帝国主义者的铁腕操纵，又有大小军阀从中兴风作浪，蛊惑市场。尤其是军阀割据的中国社会，内战频频不断，战火烽烟严重影响着金融市场。每一次军事冲突，在广州都会直接牵引着金融指数的波动。

干这一行，暴起暴跌乃兵家之常事。一夜之间，有人倾家荡产，血本无归，连命都可能搭进去；当然，也有人突然暴富，发万贯家财。而当时广州的金融界与军政界混为一体，这对没有显赫家族背景，又过于年轻的何贤来说，跻身金融界确是举步维艰的。

30年代初的广州市十三行金融业十分活跃。这里钱庄林立，店铺门面装修堂皇，炒买炒卖黄金外币的人群摩肩接踵，吸引了无数投资者和冒险家。

而何贤，用父亲给的本钱，凭他一身忠厚的形象，一双锐利的眼光，一种极具说服力的口才，加入到这个极富传奇性的行业中来。

他的眼睛瞄准的是十三行、西荣巷一带的“黄金宝地”，其实就是个黄金外币炒买炒卖的自由市场。然而，这在旧时代却是合法的经营。炒家全凭一个“信”字，也就无须具备多大的资本。何贤心知肚明，所谓炒，不过买空卖空，和赌博没什么区别。

于是，他便在这里挂起个“鸿记”的招牌，一个无字银号，却得以施展拳脚，开办“炒市”活动了。

十三行作为洋货行，始建于17世纪末。尽管其唯一拥有与外商打交道的商业特权的历史期早已过去，且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这一带的房屋几乎

被烧尽成灰；但由于它曾经拥有过昔日的繁华辉煌，客商们已获悉这个劫后复苏，仍是商业繁盛的地方，于是便又出现了清代番禺大诗人屈大均描述“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诗句。

到 20 世纪 20 年代，十三行仍是广州银号集中地，而银号的老板们组织的银业公会就设在西荣巷。

初入行的“鸿记”老板何贤，并没有什么铺位，他仅靠双腿奔走于浆栏路内的西荣巷银业公会和茶楼酒肆之间，观察行情，充当银业经纪角色。

当时银业公会内，设有银业公布所和交易所，是广州最大的金融贸易市场，也就是个买空卖空的大赌场。

公会给每个银号派发两张入场证，因场内每日上下午开市两次，所以，有入场证方可进场交易。

公会内的交易所，则是颇具规范的纸币和证券交易所。

各银号实质上是纸币和证券交易的经纪行，接受客户的委托做纸币和有价证券的买卖。做这种买卖，银号一般不需要太多资本。

每日晨起开市前，西荣巷附近各间茶楼已是人头涌涌，相互低声议价，或高声讨论，人们先进行着紧张的“热身”活动。

而进到银业公会内交易时，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双方都不用讲太多话，而以伸指为暗号。倘若不是圈中人，是难以看出他们讨价还价之内情的。

经过讨价还价，双方同意后就成交，而成交定出的汇率数字叫做“汇水”。

在成交双方中还有所谓“好友”和“淡友”之分。所谓“好友”就是指港币或黄金起价；而“淡友”则是指港币或黄金跌价。

获准在会场内交易的，都是些有信誉或有份量的经纪银号。

那么，担任“鸿记”老板的何贤，表现如何呢？

早上，何贤在茶楼上或钱庄那里接受炒家的委托，做黄金小买卖。

比如炒家甲委托他：“312(港币)给我入黄(金)20两，315以上就放。”

乙某又托他：“……”

何贤呢，将这些一一登记好，就到西荣巷那个人山人海的市場来了。只要按炒家的吩咐，一经买入，马上就写个纸条送给甲某或乙某，如若放了(即卖出了)，也同样以纸条为凭。

傍晚收市，赚了多少，或亏了多少，何贤就跟炒家一一交待清楚，从不拖拉。

当时正是军阀割据的时候，割据各方和中央政权都发行自己的纸币。一有风吹草动的，各类纸币的比价便会发生大幅度波动。

聪明机敏的何贤稳扎稳打，把握时机，或“睇好”，或“睇淡”，或入或放，决不盲从，且常常有独到的见解，为炒家充当高参，出谋策划，结果大获其利。因此何贤得到许多炒家的赏识和信赖，他很快就在这金融圈里出了名，且名声越来越大。

何贤有三条“秘诀”：一是深入了解金融行情，观察时局变幻；二是善于动脑子，区分真假行情，分析金融价格涨落的可能性，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三是勤跑腿儿，勤于联络同行，在各个茶楼的“炒友”中来往穿梭，尽快把信息告知炒家们，并为他们出谋献策，使尽全身解数，颇有肝胆相照的坦诚。

如此一来，何贤的熟络市道和独特见解，使许多炒家从中得益。所以何贤深得人心，他得的回佣也就日渐丰厚起来，“回佣”可以升值为可观的经

纪“回扣”了。

做黄金买卖的人，最易结交当时的军政要人，绿林好汉，所以，何贤的朋友可谓遍及广州了。

这些朋友，有些甚至可成为生死之交。就在那个时期，何贤结交了最为知己的两位朋友，他们就是何善衡与马子登。

他们三人都年纪轻轻，爱好相同，且都从事同一职业，可谓志同道合。

他们“炒市面”个个都有个名的，也个个都来个“记”绰。何贤叫“鸿记”，何善衡叫“双记”，马子登就叫“科记”。其实所谓“记”，不过都是独自一个“光杆儿司令”而已。

后来，何善衡干脆提议，“我们不如大家拍档，搞间银号！”银号，实则是私营的银行。

1929年，三位年轻人将各自的本钱凑到一块，集资一万元，在广州的上九路开办了一间汇隆银号。以此为阵地，在金融界中大展拳脚。

股东以何善衡为主，何贤被推为银号的经理。那一年他正值19岁的“黄金时代”。

自那以后，三位年轻人同舟共济，成了生死之交的好友。

不用多说，汇隆是能够大展鸿图的。三人的命运系在了一起，直至后来这三位都成了金融巨子，腰缠万贯，而何贤更是一颗闪烁光芒的新星。

合股经营银号，可以说使何贤崭露头角，充分表现了他做生意的天赋。

何贤不象现在的华尔街金融巨子们，读过哈佛大学的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之类，一套套理论武装着头脑。

何贤靠的是直觉和经验。

十三行附近的几家茶楼，都是银号老板和经纪人聚会的场所。有时，年纪大的老板们还会向年轻人摆摆龙门阵，讲述自己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或走麦城的传奇……

每逢这些时候，何贤从不马虎，他总是认真听，用心记。茶楼成了他学做金融生意的课堂。

1936年的一天清早，何贤照例来到茶楼，刚坐下品茶听着别人闲聊时，忽听说最近有人搜集“兑换券”，说这种纸币行情看涨。

何贤听了，心里“咯噔”一动。

那兑换券呢，是国民革命军东征，从福建返回广东后，孙中山命令当时广东省银行行长程天斗发行的。当时，广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是现兑的。

也就是说，兑换券不是由“广银”预先贮备准备金而发行，而是由老百姓拿银元到银行现兑现发，兑换多少发行多少。实际上，这种纸币的准备金为百分之百，由于它较银元方便携带和使用，发行后商民乐于使用。

后来，这种纸币因为陈炯明叛变而停止兑换，因而当时人称该银纸又为“陈炯明银纸”。

再后，陈退出广州，重占广东无望，人们便对这种纸币失去了信心。

1924年，孙中山曾命当时的省长廖仲恺组织纸币委员会，宣布维持兑换券之使用，并回笼一部分。但不久刘震寰、杨希闵叛变，使孙中山维持这种兑换券的计划又落空了。

到了1936年，这种纸币人们甚至已用它来生火，或小孩子们当花纸玩了。

现在，却是这样一种形同废纸的纸币，还有人收购，且价值反倒一个劲

看涨！“里面一定有蹊跷”，何贤一边听别人闲谈一边琢磨。

他没有发表宏论。早茶饮毕，一个计划已在脑中构思成形。

这一天里，他没象往日那样直奔西荣巷，而是找人了解收购兑换券的内幕。

果不其然，这次炒风是由一些贪官污吏刮起的。

何贤当即请人以三十元买一万元兑换券的低价，买进了几十万元兑换券。

几天后，由于贪官污吏及广州商会一些人的推波助澜，兑换券行情猛涨，涨至一万元卖一千多元！

接着，香港工商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记者专访，称广州商会向市政府申请维持两种停兑的纸币（其中一种就是兑换券）。这个报道给了人一种假象，似乎政府真的要采取措施维持这种纸币。

于是，香港也刮起了兑换券的炒风，不少人还用长途电话在广州、澳门两地联系收购这种纸币。

何贤就抓住这次机会，把手上的兑换券抛出去，挣了一大笔钱。

可笑的是，制造这次炒风的人，竟为自己设的圈套所迷惑，抓住这种纸币不肯放手。

不久，日本人在北海闹事，局势急剧恶化，不难想见，“兑换券”市价猛跌，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们偷鸡不成，连老本都蚀尽了。

何贤晚年一再感慨说，他做生意“量力而行，见好就收”，从不贪多，能赚就行。

“我没摸水瘾！没积聚瘾！没银纸争夺瘾！”

“贤哥”这“三没”，令他朋友遍天下。

“如果我要挣，我最多机会！不过我真是没有银瘾，做人，过得去就得啦！求其有得食有得住就得啦！我七十二岁，从来没见过有人带钱入棺材的！”这是何贤晚年向别人解释他处世经营之道的一番真言。

正是这种见好即收的性情，使年轻的何贤在广州金融市场大风大浪中“宰相撑船”，闯出一条路，建立起事业的基石。

当年的广州城，拥资一二万元的钱庄，就有八十多间，争斗十分之激烈。

可由于“汇隆”的两何一马善于经营，因此他们的银号业务一帆风顺地进展着。

1939年广州沦陷前夕，何贤、何善衡、马子登三人到了香港，继续从事金融买卖活动。

后来他们又转到澳门，逐步成了金融界的名人。

马子登病逝后，何贤和何善衡合作经营大丰银行，直至80年代。

两何在长期的默契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何贤逝世时，何善衡作为他的生死之交，与柯正平、许家屯、王光英、马万祺、汤秉达、郑巩、薛寿生一道，为何贤扶柩，可见他俩的感情之笃厚……

都道“商人重利轻别离”——

可这两何，虽然是大商人，却用一生的岁月，“经营”着一份大情谊；他们的大生意亏过，可大情谊，却始终满盈无损，终生受益……



## 第五章 乱世迁徙 香港好梦做不长

可爱的广州，1938年10月沦陷了。

昔日盛景不再。何贤象孤独的家鸽，飞到了香港，在沙街重操旧业。然而好梦不长，1941年冬，香港也沦陷了。何贤被迫再度迁徙，去到澳门——他事先早有铺垫的那块土地，站稳了脚跟。

这一章节，在何贤的人生岁月里，只不过是匆匆翻过的一页。

1937年，芦沟桥枪声骤响，惊醒了国人——“七·七”事变爆发了！

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侵华战争，铁蹄践踏过中国的大片河山，隆隆的炮火辗过了华北、华东，紧逼华南地区，日本人的魔爪开始伸向中国南方各城市了。

大片国土均已沦陷，广州，是保不住了。

广州沦陷前夕，何贤和何善衡、马子登三人曾到过香港，却见那里国际性垄断集团居多，经济不景气，一样是危机四伏。要在那里重新起步拓展一番天地，可不是仅凭冒险的勇气就能实现的。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留作“后路”，那就是澳门……

可爱的广州，1938年10月沦陷了。

灾难终于临头了。

无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频繁的轰炸声中，何贤只得离开这座都市。

在西荣巷，他的生意做得挺顺手，所以早两年虽然好友何善衡、马子登还有兄长何添等相继转到香港发展，约他同去发展，他都迟迟没有答应。

但现在，西荣巷银业公会内的交易所，已没有多少生意可做了，人迹稀稀廖廖，一派荒凉景象。

每天走在十三行街市上，见到的都是各家银号搬家的狼狈景象，到处人心惶惶，像世界末日快到来一样；附近的茶楼，也没有了银号老板、经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金融行情……

昔日盛景不再，物转星移，人事皆非。

何贤像孤独的家鸽，终于一咬牙一跺脚，决定走了。

临走前，何贤回到十二甫长兴里的旧居看了看。那间他度过童年的大屋，门窗紧闭，一把大锁封住了一切……

父亲已回了乡下。

前天，何贤将父亲留下看家的使女阿梅也都打发回番禺去了。

何贤，是何家最后一个离开广州的……

到了香港。

然而，香港也不是安乐窝。

何善衡等力邀何贤加盟到“恒生”来，但何贤不想吃现成的羹，他要自己走出一盘属于自己的棋局。

恰好香港也有一条“西荣巷”，这就是沙街，那里的货币和证券交易也十分活跃。于是，何贤重操旧业，继续做货币买卖。

那时香港与内地联系密切，人们之间往来也很方便，因此，内地的桂纸，中央停兑钞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公债等，在香港的买卖量都很大。

至于港币，在广州金融市场它就是交易量最大的货币。

何贤轻车熟路，生意不错。可他始终觉得自己还是根底浅薄，做金融炒

买炒卖危险性大，说到底，香港也不是个久留之地呀。

果不出所料，香港好，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941年冬，香港也沦陷了。

何贤被迫再度搬迁，到澳门——他事前早有铺垫的那块土地，站稳了自己的脚跟。

## 第六章 立足濠江 栖居无意成定所

1941年12月，何贤一家随着大批难民一道，登上旧港澳码头，来到澳门。

这被称作战时天堂的澳门岛，有如一个斑驳陆离的万花筒，放射着各种各样的诱惑，而苍生中的“浮萍”们，就在浪花的掀卷与暗潮的涌动间随遇而安。

1941年12月的一天，何贤一家随着大批难民一道，登上旧港澳码头，抵达澳门。

难民们一登岸立刻四散开去找寻栖身之处，何贤因预先租了屋，并不急于赶路。

他已不是第一次来澳门，在广州、香港做生意，澳门也是他常来的地方。但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竟会在这里安家。

环顾四周，何贤不禁怅然若失……此际的澳门，偏处一隅，地小人少，原地的居民多半以一些手工制造业来维持生计，制神香火柴、搓炮、晒凉果、腌咸鱼，到处是“手信”杂食小店……这些逾百年历史的古老行当和手工制造业，就哺育了这个小小“边城”的人们，是否太落寞了些？何贤心存疑惑，这里毕竟不如广州、香港等繁华都市，能为自己提供一个在生意上施展拳脚的大舞台吗？

此时的何贤，还没有“天眼”大开的预见，他几乎没有办法设想将来，他更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自己的事业竟从现在起，便和澳门联系在一起……

那么，40年代初的澳门，究竟是怎样一番背景呢？

很有必要通过多个角度，说一说当年的澳门，以便于感知何贤人生转折期的特定生存环境。

由于受到战争的波及，澳门市民内心惊恐万分，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一位著名学者马沙度教授描述当时的变化：“我那时才二十岁，刚从神学院毕业，马上就遭逢战争。我记得在战争未爆发前，关闸和拱北的大闸都是长年大开的，经常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澳门的市民都喜欢到湾仔游玩、野餐或狩猎，甚至有部分葡萄牙人直接到华界开设店铺和经营一些贸易生意。但是，一切都随战争的降临而结束了。澳门，这个紧连接着中国大陆的弹丸之地转眼间便挤满了从内地离乡别井逃亡而来的难民，一时间，人口剧增，情况令人咋舌。”

不错，澳门的确是个弹丸之地。随着广州、香港的先后沦陷，大批逃离战火的人们涌到这个只有十五平方公里的半岛避难，使这里的人口急剧膨胀，从1938年的二十四万人到1942年骤增至三十万人，而在日战前，澳门本土只有十几万居民。

作为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处在宗教国的特殊地位，竟成为整个东亚唯一未被战火波及的地方，它成了许多离乡背井的人们战时的“天堂”。

“澳门政府一方面尽量安抚民众，令市民保持冷静，一方面采取和平时期的措施，既不采取总动员令，也不下达戒严令，并将后备兵团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数量。

“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澳门的卫戍兵力皆没有超过一千人。”

——上述两段话摘自葡文史述《中立区的炮火》其中的一章。这是葡人

对澳门的记忆，令我最感惊奇的是那个“一千人”卫戍兵的数字！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这个“不设防”的天堂半岛，真的是“无战事”么？恐怕事实远非那么简单。

那年头，当欧战尚未爆发之前，澳门其实已经蒙受了军事威胁。

在澳门本土人的记忆里，那是一段“战时的日子”。

所谓“战时的日子”，是指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太平洋战争开始，至1945年9月战争结束的那一段日子。

澳门资深文化人黄德鸿先生回忆说，在这段日子里，这里没有响过一枪，没有任何人死于枪炮之下，但饥饿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每一个市民。没有米粮的供应，特别对那些贫民，家中既无积蓄，又无恒产，一旦因战事断绝生计，就只好坐而待毙。“而这种死亡，是比诸死于炮火之下更为无奈更悲惨。死于枪炮，只是瞬间甚或毫无准备；但丧于饥饿，则是一种很难忍受的折磨”——至今他花甲之年回顾往事，真叫恍如隔世。因为那段日子里，他不但曾经忍饥挨饿，并且家庭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变故，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中落”、“没落”。“这种变故非是出自本身，而是受到来自外部的战乱而致的猝然变化，所以更感怆然……”

其实，这种“中落”、“没落”的处境，不正是当年何贤的家族，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家境衰颓变迁的命运轨迹么？

看来澳门当年，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那种“世外桃源”。

再切换一种视角，看看上海学人费成康在《澳门四百年》中的一段记述：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迅速攻占广州等地。广州、新会、中山、台山、番禺、南海等地的难民再次涌入，使澳门人口增至二十五万左右，达到空前的密度。此时，广州等口岸都受到战火的破坏、影响，广东的进出口贸易渐渐集中到澳门等少数几个港口。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地的货物，包括澳门居民生活必需的粮食，便源源不断地运入澳门，并通过澳门输入中国内地。内地的货物和澳门地区的产品，也络绎不绝地自澳门启运，送往海外地区。澳门对外贸易的总额得到成倍增长，贸易的兴旺及20余万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刺激了当地工业、渔业、城市建筑业、交通运输等各业的发展，还使教育、卫生等事业得到相应的发展……各行各业的兴旺发展，给来澳的难民们提供很多就业的机会，使他们得以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当广东沿海地区在日寇铁蹄下呻吟时，澳门却获得戏剧性的发展。

史学者的记录里有一句话，即“澳门却获得戏剧性的发展”，这就是“天堂”的含义。

据葡文史记载，当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旅港的葡侨率先带头走难，三百一十一名男人、四百七十二位女士和四百二十名小孩携带简单的行李迁徙到澳门。他们算是第一批从香港逃难来澳的人，时间是战争爆发前四个月。第二批则是在香港沦陷之后，一千四百名葡侨分两批，先后在翌年1月6日及7日由日本船载送到澳门，而本地政府则负责支付九千元作为租这两程船的费用。

另一方面，数以万计的香港华人亦蜂涌而至，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来到这块战争中的福地——澳门。

何贤的足踪，应当就夹杂在这一群中。

不过，与何贤命运相仿的还有一传奇人物，此人物便是时下澳门娱乐的“大哥大”，政坛上亦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何鸿燊。

并且与何贤更相仿佛的，那时这位何先生也还是一个年青小伙子，他亲身来澳不仅是为避战祸，同时也为谋发展，开创一番事业。

何鸿燊生于望族，祖籍源自印支半岛，家境富裕，但战火令家业荡然。年轻的何鸿燊矢志振兴家族，因此效法当时的冒险家从事中间贸易。由于业务上的特殊需要，他经常远行出海，所以少不了会遇上凶险场面。

这时的澳门，已然改变了以贸易而求利的性质，它变成了一个纸醉金迷、荒淫堕落的吃、喝、嫖、赌的“自由世界”。在中国内地战火纷飞之时，澳门的经济，也全靠这些特种行业的发展而维持着。当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澳门走向这一步绝不是偶然的，只不过到了40年代，它的“特色”更加突出……

其实，辛亥革命之后，澳门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进出口贸易数量便极少，正如葡政府经济局长罗保在澳门年鉴序文所写的：“现当不景气时期，澳门市场不能称为繁荣，且发现困难之类甚多，商业又停止不前……澳门商业之活动依目前情形而论，其力甚薄弱，必须凭借邻近市场方能获取需要，所以澳门市场，事实上实为邻近市场之附庸，而贸易之平衡，近日相差远矣。”话是这么说，可相反的，一些特种行业如赌博、毒品、娼妓等活动却十分活跃。

于是，澳葡也就索性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专门经营一些特种行业，以增加收入，维持澳门的生存和发展。

这样顺延下来，到了乱世，更加汇聚起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道不尽的世态，说不尽的物情，令世人眼里的澳门真是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了。

避乱来岛的难民中，有身无分文者，也不乏腰缠万贯的富豪，因而澳门的赌博、鸦片、娼妓各业更加活跃兴旺；商场、旅店、酒楼也更加林立成群。在中国内地抗日烽火熊熊燃烧之时，这里却融合着吃喝嫖赌，莺歌燕舞的流香腻水，也就不足为怪了。

1941年3月，富商霍芝庭的儿子、广东银行董事长霍宝材及其表弟吴伟庭兴建的“国际酒店”开业了。酒店共九层，有餐厅、酒吧、舞厅、酒家、旅店等等。其中从事赌博、吸毒、卖淫的人，已经由华人和葡人为主变成了由世界各地的人员组成。嫖客可以与任何人赌博，也可以和任何国家的女人做爱。一上楼梯，你就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前提只有一条——只要你手中拥有足够的金钱。

那年月，他们曾在广告中自豪地标榜：“选艳丽之舞女，奏著名之音乐，有华贵之设陈，配耀眼之灯光，鬢影衣香，令人如入众香国。”

游戏场的广告是：“有幽雅的桌球室，有新颖的博彩场，随之游戏，兴味弥增，大可有乐不思蜀之慨。”

天台茶室的广告是：“精制各式美点，炮制上汤面食，茶香酒暖可以大快朵颐”……

正是如此，人为地制造了澳门的虚假繁荣，使战时的“孤岛天堂”成为一口诱人堕落的大陷阱。

但当战争逐步深入后，“天堂”也难逃乱世灾劫。

人口增多、交通断绝、物资住房紧张、物价昂贵、粮油米荒，令市民们苦不堪言……

总之，一切的一切，何贤定居下来的澳门岛，有如一个斑驳陆离的万花筒，眩目刺眼地放射着各种各样的诱惑，苍生中的“浮萍”们，就在浪花的

掀卷与暗潮的涌动间随遇而安.....

## 第七章 战时天堂 施展拳脚大舞台

何贤决意迁徙，是看到了澳门的独特之处。在这块土地上，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冒险刺激的气味。没有刀光剑影，却比见血见肉的厮杀更为撼动人心，醒人耳目。

看着数不清的华资银行争相创立，何贤心如潮涌，干劲倍增，连揣在衣兜里的手心儿，也渗出了热汗……

他企盼从头再来。

当时，何贤决意迁徙，是看到了澳门的独特之处的。

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三大赌城，美国占去了其中两座：东岸的大西洋城和西岸的拉斯维加斯。

还有另一座，就是中国珠江口岸的边城半岛“东方赌国”澳门。

澳门这块四百多年前就被葡萄牙人占领之地，似乎天生就是一块赌博圣地。

在这块土地上，连空气都弥漫着惊险刺激的味道。没有刀光剑影，却比见血见肉的厮杀更为撼动人心，醒人耳目。

可以说，赌博造就了一个澳门，也弹出了澳门的神秘音调。

它时时令人听到命运的叩门声。

一些嗜赌之人，将其视为真正的男子汉的游戏战场，举手投注之瞬间，某个穷小子就可进入到百万富翁的行列，而某个大富豪亦可以在眨巴眼的功夫里，一文不名。

所有的奋斗，步步为营又好似踩在半空，因一切生存的常规法则在此氛围都遭遇着不屑与蔑视。人们要赌出后半辈子的福贱、悲欢与衰荣——赌的就是机遇、勇气和身家性命。

因而何贤知道，许多人向往澳门，往往是冲着一个字去的，那就是“赌”。

何贤也旁观着，赌博业造就了澳门的顶级巨富，他们中可称之为“赌王”的有：傅老榕、叶汉以及日后的何鸿燊，三个大名鼎鼎的赌王，在澳门这块土地上，龙争虎斗，演出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悲喜剧，且各自领衔主演了一代风骚。

而何贤呢？

他的人生信条不是赌，更确切地说，是搏，是拼，是创，是闯。

但他汲取了赌业的“营养”，那和他的志趣无疑是相投的，即创业便需勇于冒险，喜欢刺激，承受面对艰巨事业给自己带来的惊心动魄的考验，并通过自己的才能和意志力去战胜这种挑战……

乱世出英雄。就是那样一个年月里，出了“一代赌圣”傅老榕。

而叶汉受聘于傅老榕，担任新开业的“泰兴娱乐总公司”骰宝部主任，拿着700元的月薪，满怀感激，踌躇满志。

而那时的何鸿燊呢，则与何贤境况差不多，也是到了陌生的澳门，开始新的生活。

何鸿燊进入到“联昌公司”工作。

“联昌公司”是当时澳门最大的公司之一，中国、葡萄牙、日本各占三分之一股权。

在公司里代表葡国政府的，是澳门经济局的罗保博士；日本方面就是力

邀何鸿燊加入公司的日本商人斋藤先生；而中方负责人，就是当今香港政界女强人、立法局议员、自由党负责人之一的周梁淑怡的父亲梁基浩先生。

战争打乱了正常的市场供应秩序，造成大量商品紧缺，物价上涨。有经济眼光的集团和个人，就乘此良机攫取高额利润，发战争财。

“联昌公司”经营的就是这种“二战”时期的特殊生意，它的主要业务，就是以货易货，用机器零件及船只交换各种粮油，以供应澳门拥塞的近三十万居民。

当时由于水陆不通，澳门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粮油在几天内可涨价几倍，显然，“联昌公司”因此大赚特赚。

而何鸿燊也从“联昌”起步，走进发家致富的大门。

有一个疑点，恐怕许多人和我一样，弄不明为何当时的澳门，能得以成为东南亚区域的国际避难所呢？

一种史料记述，原来，在南美葡萄牙的殖民地，当时住着数十万日本侨民。据说葡萄牙当局曾警告日本：“如果你们侵占澳门，我们就制裁日本侨民。”因此日寇缩回了屠刀，怕的是一旦出兵占领澳门，葡萄牙可能会以牙还牙，反将十万日本侨民当作报复的牺牲品。

另有一种说法是日本要为自己留下一个中间地带，便于回旋。

还有一种推断是，他们陈兵拱北，已扼住澳门咽喉，澳门就在他们的掌心，因而侵入不侵入都没什么两样。

如此种种推测，两国政府便经过秘密接触，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葡国保证南美日侨的安全，日本则保证澳门中立。

于是才使得大批的中国人和香港居民一时间纷纷逃奔澳门。

据说那时已完全沦陷的香港很惨。日军正实行着血腥的统治，所有的港府官员，全部被关进集中营，不少市民逃回乡下避难。

而留守在香港的平民，则被逼为苦力，替日本人修船筑路。

这么一对比，何鸿燊十分庆幸自己能逃离苦海，到澳门找到一条生路。

生路是生路，却也并不那么轻而易举地“生”。

何鸿燊成为“联昌”的合伙人后，公司就给他安排一个重任：负责押船。所谓“押船”，就是把载满货物的电动船押送到海上，与贸易伙伴在海上交易。

押船，是“联昌”最重要的一份工作，但也是绝对危险的工作。

当时，澳门还没有海浪预报，船工出海全凭经验和感觉，出海后不幸碰上台风，那就可能船覆人亡。

天灾难免，更可怕的还有人祸。

那时中港澳之间的海面上，日本海军和海盗横行，杀人劫财事件时有发生，有不少生意人就死在日本军人和海盗的乱枪乱刀之下。

在这里简略勾勒一下傅老榕、叶汉和何鸿燊的乱世踪迹，意在横向地，拉开一张时代人物的画面，使读者更明晰地把握和领略何贤所处的时代背景。

何贤呢？他应该从哪里起步呢？

他正以自己锐利的眼光在观察，以自己独特的思维在分析、斟酌……

他亲眼目睹了平民百姓生活的拮据和物资匮乏的无奈，也更强烈地感受到另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有相当不少的人们在夜夜笙歌、醉生梦死着，他们经常彻夜欢腾，歌舞达旦，与困苦中的人们形成强烈对比。



一切都仿佛看到了，又好似没看到。因何贤所关注的，自然是他的“老本行”。

说实在的，没有哪种现象，比得上澳门金融业的盛极一时，更能给何贤增添信心和勇气。

看着数不清的华资银行，争相林立于新马路、营地大街和十月初五街一带，很令何贤心如潮涌，干劲倍增，连揣在衣兜里的手心儿，也渗出了热汗……毕竟是12月的冬日，濠江水也是冷的。

他恍觉这里就是当年广州的十三行西荣巷，可很快又发觉不是，完全不是。

这儿，分明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战火中的孤岛天堂。

是命运，把他神不知鬼不觉又仿佛顺理成章地推到这里来的。

如果他是条鱼，循着希冀游到此地，不是已找到了激活他生存命脉的水源了么？

倘若他没能来到这里，或许日后，澳门的许多页历史要重新改写……

而此时此刻，何贤正伫立在彼情彼景的澳门历史岁月中，一门心思施展拳脚，热切盼望着“从头再来”。

## 第八章 助马万祺 大丰银号任司理

何贤来到澳门的第二年，认识了马万祺。

马万祺与傅老榕合股经营的大丰银号，是澳门原有的老银号，颇具规模。可马万祺于驰骋商场之时不幸患了肺病，为尽快找到一个得力助手分担重任，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何贤到大丰银号，任司理职务。

澳门之金融业，在一派声色犬马中，兴旺地发展着。

由于世界大战的影响，物价波动很大，各种货币汇价起跌无常，经常在一天之内，便大起大跌，风云莫测。

何贤呢，最善于分析金融行情。世道越险，越能见出他的智慧本色。

何贤来澳门的第二年，认识了马万祺。时下担任着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澳门特区筹委会前草委主委等商政要职的马万祺。

当时，马万祺与傅老榕合股经营的大丰银号，是澳门仅有的几家老字号银号之一，颇具金融规模。由傅老榕任董事长，马万祺任总经理。

而马万祺，是一位向往进步的青年，当时在澳门已然小有名气了。

可惜不幸，正当他策马横枪驰骋商场的时候，却患上了肺病。

于是，他必须要尽快找到一个得力的助手，在他卧病的时候能够部分代替他工作。

马万祺十分欣赏何贤从事货币和有价证券买卖的天赋才干，认识了何贤后，便毫不犹豫地推荐他到大丰银号，任司理职务。

在广州的“鸿记”和“汇隆”银号混迹闯荡了几年，“小试牛刀”的何贤小有名气，却并没有挣到多少大钱。

但是真金不怕火炼，是金子终能发出光来。何贤在一年年勤劳的跑腿与实践，日渐学得精乖了，且见多识广，积累了相当的金融常识与买卖经验，具备了游刃有余的职业素质。

所以何贤转到澳门当上大丰银号司理后，他变得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事事干起来得心应手。在变幻无常的金融大战中，他常常能先人一步，把握时机，果敢决断，或进或出都比别人棋高一着，技高一筹。

很快，何贤就在澳门金融界崭露头角了，被人们誉为“能人”，以至葡人经营的大西洋银行，也聘请他为华人业务部经理了。

凭他的声誉，凭他的四海交游，大丰银号日渐成为澳门的头号阿哥。

贤哥，已成为澳门叱咤风云的人物了。

几年以后，澳门发生了一宗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者是大丰银号的头号老板傅老榕。

于是何贤四处斡旋，救了傅老榕一命。此事对何贤在大丰银号的发展，直至他当上大丰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都关系极大。这是后话。

总之，自何贤顶替病中的马万祺肩负大丰司理使命，加盟大丰，便在澳门打开了局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接着他又经营工商业，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办了许多企业，促进着澳门的繁荣和安定。

这里须强调的只是，马万祺当年，曾于不经意中助了何贤在澳门事业发展的一臂之力。

## 第九章 九死一生 偷运港纸为澳门

葡人经营的大西洋银行，聘他为华人业务部经理，并借助何贤的聪明和才干，为货币紧缺的金融市场打开一扇“天窗”：增印澳门币。

可是，印澳门币要偷渡香港去运银币纸……关键时刻，何贤仗仗江湖朋友们，挺身接过这桩棘手的事。结果他成功了。

前章刚刚提及，连葡人经营的大西洋银行，也聘请何贤为华人业务部经理了。

统制着澳门半岛不可一世的葡萄牙人，竟也企望借助何贤的精明和才干，以解决澳门金融方面一筹莫展的困难和问题，足可见何贤当时在金融界已是名声大振了。

那时澳门市面流通的货币主要都是港币，此外还有广东银毫和大西洋银行发行的澳门币。

后者货币的数量十分有限，而港币却自香港沦陷后价值大跃，渐渐失去了作用；广东银毫又从澳门大量流出，因此市面的货币流通量变得严重紧缺。

这不仅影响了澳门工商业务的发展，也影响着居民生活呢！

怎样解决它？这是何贤兼任大西洋银行华人业务部经理后碰到的第一道棘手难题。

何贤在想，港币的价值已不可能恢复稳定，因为在日寇统治下，港币即使在香港本地也不能允许直接流通，何况在澳门呢？

再看看广东银毫呢，早已不再制造了，现存流通的也在不断流失，银毫无疑只会越来越少，不会增多的。

想来想去，那么唯一的出路只有增发澳门币了。

而澳门币如果还象过去那样由葡国供应，看来也比较困难，只能在本澳自印。

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何贤把他的想法和详细意见向大西洋银行负责人陈述，并且建议他们向澳门当局争取获准印发澳门币的权利。

大西洋银行董事会，对何贤有理有据的分析和建议非常欣赏，毕竟，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啊！

经过一番努力，大西洋银行取得了增印澳门币的权利。

印澳门币要用银币纸的。

可是，澳门根本没有这种纸张供应，只有去到香港才能找到。

而香港，人人也知道，自 1941 年 12 月 25 日沦陷以后，日寇早已封锁了海面。

只有靠偷渡。

偷渡是非常危险的。碰上日本鬼子的巡逻艇，恐怕别说运货，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呀！

谁到香港购买银币纸？又是一个大难题，谁也不愿和不敢承担。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关键时刻，到底是何贤，挺身而出接过这桩棘手的事。

何贤平日里积德成性，仗义疏财，慷慨豪爽，结交得江湖上一些两肋插刀的朋友，愿意为他卖命效劳，在所不辞。

何贤很快就物色了几位江湖朋友偷渡香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香港偷运了一大批银币纸送返澳门……

于是崭新的澳门币，“沙沙沙”日夜不停地印刷，一捆捆崭新的澳门币由大西洋银行发行出去……

增加澳门币发行量后，马上有了成效，不仅解决了流通货币量不足的窘境，对稳定澳门市场，便利居民生活，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是何贤为澳门金融界立下的汗马功劳。

从此他在澳门社会名声鹊起，地位频升。

澳门金融界一直尊崇何贤，自那时起不久，澳门银行公会改选理事会，大家一致推选他为理事长。以后澳门银行公会筹委会成立，又选举何贤任主席。

何贤已由一个区区银号司理，脱颖而出，成为澳门金融界呼风唤雨的显贵，上层社会的名流了。

## 第十章 黄金时代 不尽财源滚滚来

在高雅的“同乐俱乐部”中，有一位40年代澳门政府的经济局长叫罗保，由金融巨子钟子光引荐，何贤结识了他，并成了莫逆之交。

当年香港禁进黄金，于是香港和东南亚的黄金买主便涌到澳门收购金货了。黄金是个好买卖，但经营者一定要取得专利权……“专利”的尚方宝剑在罗保手中，他与何贤、钟子光合资开了“和安黄金公司”。

从此，十多年的“黄金岁月”里，何贤财源滚滚，生意如日中天。

何贤在澳门经营的工商企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除了他待人以诚，急人所急，且经营大丰银号拥有显著成绩等诸多缘由外，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一条，就是和葡国人关系极好，因此能够在战乱之年，得以成就大事。

在澳门，各行各业都有联谊性质的商会沙龙俱乐部。

这些俱乐部的表层活动当然无外乎是喝喝咖啡，听歌跳舞等娱乐，但其深层意义却是结交朋友，寻求合作伙伴，彼此洽谈生意，相互提供机遇等。

因此，各个行业中之俱乐部都有着不同的规模和档次，大抵分成一般员工的，高级职员的，富商巨贾的，社会名流的……和现今的酒会啦聚约啦名仕沙龙啦一类的玩艺儿差不多，这也叫物以类聚吧。

当时金融界有一个最高层次的俱乐部，设在平安戏院三楼，谓之“同乐俱乐部”。进出这个俱乐部的人，都是些澳门金融界的巨子，或是澳督府有关部门的官员。

当时何贤还只是银号的中级职员，他是不敢涉足这个俱乐部的。

可现在他的身份地位不同了，自然身价也倍增，他容光焕发，常常西装革履随着他的铁哥——金融巨子钟子光，一同出入同乐俱乐部。

在俱乐部里，何贤大开眼界。所有的人没一个他不认识的，因为那些全是头面人物公众要人嘛。

但这些人，并不都认识何贤。

没什么可怯的，一回生，二回熟嘛。

这群人中，有一位40年代澳门当局政府的经济局长名叫罗保。

此人当的是葡萄牙政府的官，说的是葡萄牙语，一举手，一投足，一耸肩，一微笑，全是洋人的派头。但有意思的是他却地地道道是中国人，且出生于广东的赤溪县，因父母早逝，他成了孤儿。后来便由一个葡萄牙人抚养长大，所以入了葡国籍。

罗保是个幸运儿。他受过高等教育，精通葡文，又能说中国话，在澳门这个由葡萄牙政府统治，可华人又占了总人口96%的地方，便自然受重视，成为两面都通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使他掌握着澳门经济的大权。

罗保自己在澳门也有产业。在众多名流望门中，他是个无甚背景，却既掌实权，又拥有经济实力的特殊人物，人们都很尊重他。

一天，罗保走进同乐俱乐部，钟子光见到他立即起身打招呼，跟罗保握手寒暄。紧接下来，钟子光就招呼坐在身旁的何贤，把何贤介绍给罗保认识。

罗保一听说这眼前的陌生绅士是何贤，便对何贤说：“久仰久仰！你就是何贤，我们非常感谢你帮我们解决了印银纸的难题。”

“小意思，况且也不是我一个人出的力。”何贤谦逊地说，“我很愿意为大众做点事。”

“很好！好极了！”罗保打量了一下这个身材魁梧、诚实忠厚的汉子，赶忙对何贤说：“以后，恐怕会有更多的事情要请教于你，请你多多指教，多多帮忙噢！”

何贤没有料到，这位素昧平生的政府要员，对自己初见一面便流露坦诚，这么信任自己，也很受感染，随之对罗保坦率地说：“别见生，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只管吩咐，我一定为您效劳。”

打这时起，何贤跟罗保经常见面，两人混熟了，那谈话的内容也越来越广，金融界的、工商业的、社会方面的，几乎无所不谈，而且谈得越来越投契，他们之间建立了信任。有些事情不方便由澳督府出面干涉处理的，罗保就开始委托何贤以调停者、中间人或居民代表的身份出面解决。

何贤也不辱使命。凡是对澳门居民有益的事情，对稳定澳门经济和社会有利的事情，他都尽心尽力完成，并且做得妥妥贴贴，天衣无缝。

有一件事情，使澳门政府、罗保和澳门居民都为之感动的……

那是1943年春节前夕，由于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珍珠港，接着占领了东南亚和香港，使澳门成了四面楚歌的孤岛。日军以岛上陆、海军特务机关内讷的借口封锁了澳门。

原先日寇占领香山拱北关，已切断了澳门通往大陆的联系，如今连通往香港的海上交通也被封锁了，分明是想把澳门逼成一个死港，活活将人闷死啊！粮食、副食品和御寒衣物等居民不可缺少的物资都运不进来，加上时值隆冬，居民们饥寒交迫，饿死的，冻死的，不计其数，每天早上街头都有几具尸骸，谁见了也心惊悚目，悲凉欲绝。澳门，一天之内菜价增加20倍；大米，谁也弄不清涨了多少倍。近40万居民眼看就要断炊了！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何贤等人冒死到香山县购粮，去拱北跟日本侵略军打交道，要求他们准许运粮过关；又与海南岛有关方面联系，组织澳门失业的人到海南做劳工，这样才挽救了一部分劳苦贫民，才使澳门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平息了动荡局面中的混乱和恐慌。

何贤回忆说，“原本是澳门政府派罗保同他们交涉的，可那些日本仔不听，一味拒绝申诉。那时我们商会一班人，高可宁、傅老榕、梁厚源同我四个就去试着找他们啦！”

去到日本军处，他们见到的是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

他见到何贤一行人马，劈头先问：“是不是西洋政府叫你们来的？”

“事实上是澳门政府叫我们去的”，何贤忆道，“高可宁就直肠直肚，想全盘兜底。但我一看，似乎有的话不对日军的胃口，由于日本仔的面色看上去好似很不喜欢澳门政府的。于是我就拦住高可宁并给他使眼色不叫他兜底，并执意告知日军根本不是西洋政府叫我们来的。”

哪知这个陆军特务机关长一听说何贤一行人不是澳门政府派来的代表，当即就宽容了态度，还招呼他们说：“请坐”，说罢居然又叫人斟茶了！

“那一来我赶忙就打蛇随棍上，对他说现在澳门居民实在太苦，一切生活都没了法子，所以叫我们来求求你们通容放手，让我们留得一线生机，他日必当报答……”徐徐烟雾中，何贤深深叹了口气。

几番艰苦的唇舌之后，何贤凭他一片爱民的苦心，使几十万居民的生活重又获得了生机。

何贤的这一义举，使澳门政府增加了对他的信任，也使罗保对他更加赏识不已。

一次，在“同乐俱乐部”聚会时，罗保对何贤和钟子光说：“现在香港禁止黄金进口，香港和东南亚的黄金买主都涌到澳门收购了。经营黄金是个好买卖……”

没等罗保说完，何贤和钟子光高兴得同时喊叫起来：“好嘢！这是个发财的大好机会！”

原来他们都早已想到这一着，真叫“英雄所见略同”。

经过几次商量，他们三人合资开了一间“和安”黄金公司，并通过罗保取得经营黄金的专利权。

所谓专利，就是只由一家经营，谁要购买黄金都只能向和安公司进货，包括澳门本岛金铺的零售商。

何贤本来就是金融舞台上拳打脚踢的出色演员，现在有了“专利”这把尚方宝剑，更可以放开手脚尽情发挥，演出有声有色的精彩好戏了。

他派出他的得力干将分头到非洲等地购买黄金，解决黄金的货源。

他利用罗保的威望，聘请西探部探员，把黄金从码头护送到和安黄金公司，然后分售给各地涌来澳门的买主。

一项项工作有条不紊，效率很高，这样很快就打开了新的局面。

东南亚等地的客商纷纷来澳门购买黄金，买主们各显神通，再想方设法将其运往香港及东南亚。

而黄金一进一出的差价是相当大的，因此何贤他们获利的数目也是极为可观的。

和安黄金公司经营了十多年，先是由何贤与罗保及钟子光合资经营，后来钟子光故去，由梁昌顶上，直到香港当局准许黄金进口才停业。

所以说，这十多年间成了何贤的黄金时代，财源可谓如一江潮水，滚滚而来，为他日后的经营，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苦尽甘来的何贤，回首当初，恍如隔世……

那些走过来的足迹，已显得如此遥远。

想想，再想想，自从结束学徒生活起，父亲澄溪公给了15岁的贤儿一笔本钱，让他独自去闯荡江湖；

16岁的何贤当上了“鸿记”老板，经营开西荣巷里的金银纸币生意，只不过大钱么，都是人家赚的；

19岁那年，何贤又与志同道合的何善衡、马子登合股在广州上九路开设汇隆银号，当时他是决心在金融市场一展拳脚，创基立业的。

战火乱世，他来到澳门，从大丰银行到大西洋银行再到现在的黄金公司……

次次赴汤蹈火，奔的都是金。

他为什么在七十二行中，偏偏选中金融这一行呢？风风雨雨、跌跌荡荡的“这一行”？

说起来却有一点离奇，人呢，有时还真不能不信“天意”。

小时候，何贤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到一个很荒凉无人迹的地方，他漫无目的地在那里走啊走啊，找不到家的方向……

突然，他发现脚下有一个洞穴，里面堆满了一块块黄澄澄光灿灿的金砖，他觉得惊异无比。

于是，便趴在地上把那些金砖一块块地捧出来，尽情地赏玩摆弄，象抱着一大堆炫目耀眼的玩具——他在荒野上，垒起了一座金屋……

梦境当然是玄虚的，但从此他觉得自己人生的遭遇，似乎总与黄金有缘。30年代的报纸，都辟有“行情”的专栏。

也不知哪儿来的领悟力，令何贤从小就特别喜欢看金融信息。

对瞬息万变的金银货币起落升沉，他甚感兴趣乃至到了迷恋的程度。虽然价码指数商机行情都事不关己，他却非常投入地“参与”其中，常常独个儿在那里估量预测。

说也奇怪的是，许多时候，还都给他猜对了。

或许是孩子气十足的那种天然意识，还有潜意识在大脑累积的作用，逐渐启蒙了何贤的智慧？

现在，他成功了。

他拥有了大把的黄金。

虽然不象他小时候做的那个梦一样的美妙，任由他捧起一块块黄澄澄的金砖垒成一座金碧辉煌的荒野金屋，那般神奇壮观，但在“和安”公司经营黄金的十多年间，却已然使何贤成为大富豪——昔日朦胧的黄金梦，果真变成了人间现实……

我们再回头看看何贤所任司理的大丰银行。也正因为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使何贤在大丰银号由司理升为经理。

再细履一下大丰银行。

大丰银行，是澳门最具代表性的私营商业银行，也是后来何氏家族企业的代表。

40年代初期，在何贤呕心沥血的经营下，大丰银号业绩卓著，成为澳门银号翘楚。

40年代后期，又进一步发展了金业部和银业部，扩展为“大丰金银号”。其后，业务再扩展，划分为大丰金铺和大丰银号。

五六十年代，因政府未有银行法例，故而大丰银号虽无银行行名，但已经经营银行之业务。其业务范围广泛，并向多元化发展。除经营存款、放款、按揭、汇兑、找换及银行的其它一切业务外，并设有金饰部、钟表部，兼发行礼券等。

直至1970年，澳门政府颁布银行法，接受银号申请注册为银行。大丰银号率先行动，于1971年10月23日正式注册为大丰银行。当时注册资本为500万澳门元，主要由何贤集团投资，已故赌王傅德荫家族也有参与。

几年内，大丰业务发展很快，至1976年初，吸储存款额已逾亿元，仅次于南通银行而列之第二位。

1982年，大丰吸储存款额达9.28亿元，成了澳门实力雄厚银行之一。

说回本章话题，我们知道，何贤除了在经济上和罗保合作之外，还乐意与葡国人交朋友，与许多葡国人的关系都很好。

所以，每一位新澳督到任，都和何贤交上了朋友。

葡国人明白，在澳门四十多万居民中，华人占了96%，而葡国人仅占3%，其余1%为其他国籍人口。

因此葡人要把澳门管好，一定要依靠华人，不得不尊敬像何贤这样的华人知名人士。

澳门居民亦十分尊敬何贤。日常遇到什么难题，都拜托何贤找澳督，而澳督碍于何贤的面子，也就答应解决一些问题。

反之，澳门出现难题，葡人拜托何贤相助时，他也会不辞劳苦，积极帮



助解决，并办了许多好事。

何贤晚年对人说：“澳门能够有今日之繁荣，实在是经过好多风险同时代性的转变啊！”

也是，后来许许多多的风险，都让何贤亲身碰上了，而且不单是碰上了，更可以说，如果不是人人敬慕的“贤哥”一次次当鲁仲连，及时把危机化解，那么澳门的历史，可能已经完全不同。

（这决非危言耸听。）

也正因如此，何贤在澳门的社会地位日益显赫，澳门人暗地里称誉他为“影子内阁总督”。

从40年代中期起，何贤在澳门便借助政治地位的提高，又以大丰银行为基础，陆续开办了许多企业，不断向多元化的经济领域拓展。

因此，该行属下很快发展有印染厂、纸厂、火柴厂、石粉厂、钟表行、地产生意、金行、酒店、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厂、石油公司等……

因而大丰集团的收入，成倍成倍地增加，成为澳门的重要经济力量。

不过，他也做了许多亏本的买卖，那都是为着稳定全澳经济，安排工人就业而经营的，后面再提。

## 第十一章 斡旋奔波 拔刀解救傅老榕

风起云涌的澳门，在 1945 年发生一宗轰动一时的傅老榕绑票案件。绑匪割下傅老榕的半只耳朵，狮子开口漫天要价。

何贤出面，与绑匪斡旋了一个多月，最终妥善解决，保全了傅老榕一命。

1953 年，祸患难绝的傅家，儿子傅荫权又被绑架。傅老榕再次求助何贤出马，解危救急。

何贤笑对人说：“帮人，就等于帮己。”

澳门，曾是万千难民逃避战火的福地，也曾是战乱之际的龙蛇混杂之地。这当中便少不了江湖恩怨、乱世情仇以及人间悲剧。

这是一宗轰动一时的巨大绑票案件。

事情发生在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时澳门的社会治安很差，险恶四伏。日寇投降后，汉奸走狗们都纷纷逃往港澳。

因为澳门政府不搜捕汉奸，更不把他们押送给中国政府处理，所以大大小小的汉奸走狗以及黑社会的人，充斥澳门，造成社会治安相当混乱。

就在这时候口，澳门“赌王”傅老榕，被人绑票了。

此案发生后，立即轰动省、港、澳，成为当时的特大新闻。

傅老榕的真名叫傅德荫，原名德用，又名伟生、广源，1894 年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西樵山下碧云村一个贫穷人家。

傅德用八岁那年，南海大旱，田地龟裂，农家几乎颗粒无收，乡里的人们被迫四出逃荒。而他的父亲傅球芝也逃荒去过东莞、常平、深圳等地打散工，一年以后，漂到香港，便开始在香港做起无师自通的五金工人。

父亲在外谋生的时日里，傅德用在家乡已经辍学。他那时对前程一筹莫展。他觉得自己若不离开西樵，决不会有何发展，而若离开西樵，又到哪里去？继续求学不可能，年龄和家庭经济状况均不允许，出外做生意又无本钱，且自己对此也没有经验。

就在这时，让傅德用喜出望外的是，在香港工作的父亲回到了南海。

德用再也不肯蜗居在家了，他一再要求父亲带他去香港谋求发展。

于是 1913 年，满身土气的傅德用随父亲来到了香港，那年他 19 岁。

香港虽是个花花世界，但对傅德用来说却充满了艰辛。他做的是杂工，收入极其微薄，但年轻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做着发财梦。

傅德用在乡下时就是个好赌之徒，到了香港这个赌博随处可见的世界，他算是“瞌睡遇着枕头，口渴遇见清泉了”。

他总是混迹于赌摊赌棚，还有那些露天赌场，穷碰运气，小试牛刀。

傅德用那时日虽然地位极其低下，也仍然和周围人打得热火朝天。大家都叫他“老用”，于是傅德用，干脆为自己更名为“傅老榕”。

还没等傅老榕开始去赌人生，生活先捉弄他了，因打架斗殴，他被投进了监狱。

在狱中关押了 10 个月，出来后傅老榕立即离开香港，开始在两广一带做生意。

趁着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内乱时机，他凭着狱中磨砺出来的胆略，乘乱大发其财。

做生意赚了钱的傅老榕仍然念念不忘赌博。当他再次到香港时，已是衣

冠楚楚随意出入高档娱乐场所了。

傅老榕嗜赌如命。

他迷恋那种刺激！他觉得在这种刺激中取胜，才算真正的大气魄，大手笔，大赢家。

于是，他看中了澳门，要到澳门去开赌场。

30年代初期，傅老榕第一次闯入澳门赌业，显得势单力薄。那时，商家卢九联合范洁明、何士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在当时广东银行行长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银行创办人李声炬的全力支持下，再次获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

面对这些财雄势大的强手，傅老榕铩羽而归，只得去到深圳，几经转折，和霍芝庭办起了一间赌场。傅老榕主宰深圳赌场后，还在不断谋求发展。

他从澳门“豪兴公司”挖墙脚挖来一个人才叶汉；又和霍芝庭联手在深圳组成“又生公司”。直至1937年春天，广东早已禁赌，可傅老榕的“又生公司”仍在张旗鼓地经营赌业，不过他虽神通广大，也开始紧张了。

恰好这一年“豪兴公司”在澳门的赌博专营合约到期，傅老榕便抓住此机，暗中和另一位财大势大的人物加紧谋划，决心一举投中澳门赌场。

这个人物便是名震省港澳的押业大王高可宁。

（高可宁1879年生于番禺石碁镇官涌村，也是何贤的同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傅老榕迅速将深圳的赌博公司转手出卖，带着巨额财富来到澳门，并于同年以180万两白银的赌税，取得了澳门赌业的专营权。

卢九等商人的“豪兴公司”招牌被摘下，取而代之的，是傅老榕和高可宁合作开办的“泰兴公司”。

叶汉此时作为傅老榕旗下的得力干将，也跟着自己的老板，颇为风光地回到了澳门。

自那以后，傅老榕便是“泰兴娱乐公司”的老总，也是德记船务贸易公司、大来轮船、十六号码头的老板。他经营的企业和商业机构遍布港澳。

何贤来澳之初，曾得到傅老榕的赏识和重用，也由于马万祺的推荐，而成了傅老榕的得力助手，被任命为大丰银号司理。

当时傅老榕是该银号最大的股东。

何贤在澳门能够立足、起飞，是与傅老榕的关心支持分不开的。

可以说，傅老榕有恩于何贤。

这样的富翁，如傅老榕，自然是绑匪们觊觎的对象。

傅老榕个子高高的，爱穿长衫，是个典型的江湖人物。

他平时喜欢吞云吐雾，且常到普济禅院的“观音堂”过其烟瘾。不料被一帮匪徒，摸透了他的生活习性。

于是就在1946年2月10日，以梁锦为首的七八名歹徒，突然闯入普济禅院祖师堂内，把正躺在烟床上的傅老榕绑走……

事情发生在10日那天晚上八点半。

那天傍晚，一辆黑色的杜奇轿车驶到位于城郊的普济禅院，在那气象恢宏的寺门外停下。

车上下来的便是傅老榕。

除了司机李苍，他没有带任何随从。

傅老榕是普济禅院的常客，也是它的一大施主，禅院上下都对他恭恭敬敬

敬。

值僧人见到来人是傅老榕，连忙入内禀报。

禅院住持闻知，亲自出来迎接，将傅老榕接到祖师堂落坐。而后一边命人沏上好茶，一边命人操办斋饭。

普济禅院和内地许多有名的寺院一样，都为三进式建筑：一进大雄宝殿，二进为长寿佛殿，三进是正殿，即观音殿。

此外，禅院内还有许多附属建筑，如藏经楼、斋堂、方大厅、祖师堂等。禅院后面，有一大花园，古木苍郁。

在如此幽静的环境里，饱餐禅院伙头僧做的罗汉斋，再吸上几口鸦片，对傅老榕来说，真是飘然欲仙似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约已是晚上八点，傅老榕茶足饭饱。“住持”命人撤去碗筷，又陪着他闲坐了一阵，便起身合十说：“贫僧还要做晚课，请施主自便吧。”

住持知道，傅老榕这时要抽鸦片烟了，识趣地准备退出。

傅老榕也知对方回避的意思，忙站起躬身还礼说：“住持请便，我坐上一会儿就走。”

待住持去后，李苍轻轻掩上了门……

主仆二人便横床直竹，抽起鸦片来。

正当傅老榕云里雾里之际——

禅房门突然“哗啦”一下被撞开。

七八条彪形大汉闯了进来。

傅老榕不愧为老江湖了。

他眼看情势不对，马上将烟枪扔向冲在最前头的绑匪，并迅即伸手去摸放在枕头边的手枪……

对方似乎早已了解了傅老榕的习惯。冲在前头的那个绑匪侧身闪过飞来的烟枪，一个猛扑，压住傅老榕伸到枕头边的手。

傅老榕虽已抓到枪，但却无法将手抽出。几乎同时，几支冰冷的枪管象乌黑一团的深洞，瞬间便顶住他的脑袋。

司机李苍，那时也兼任着傅老榕的保镖。他倒是拔枪在手，正与两个绑匪对峙，只可惜他见傅老榕已被制服，实在无法动弹，只好无奈地将枪扔下……

傅老榕见武的不成，只得换种斯文，强撑笑脸说：“大佬，有话慢慢讲，我这里有些钱，各位先拿去饮茶，日后老榕我还有孝敬。”

他一边说一边用余下的一只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

绑匪对这点子钱显然不屑一顾，斜着眼并不搭腔。

一名绑匪还把傅老榕手中的钱打落，将他反手绑上，并将床上的枕巾扯起，揉作一团，塞到傅老榕嘴中。

几名绑匪架起傅老榕和李苍就向外疾走。

出了普济禅院，傅老榕和李苍被强行塞进傅老榕的轿车。

为首的绑匪坐在驾驶座上，“呜”的一声，飞车旋风般逃离禅院，刹那间无影无踪……

约到了晚上九点左右，傅家的电话铃骤响，似有不详的预兆。

傅老榕的大公子傅荫权接了电话。

电话里，是普济禅院的竟真大师。

荫权从语气中可以听出，这位深悟佛理，一向从容不迫淡定自如的高僧

师傅，今日却很有些把持不住。只听他用急促颤抖的语气说：“傅施主可能遭绑架了！他歇息的祖师堂里一片狼藉，敝寺院内的电话线也被割断了！请小施主马上与警方联系吧，我们这里也已向警方报警！”

傅荫权听到这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浑身冰凉……

傅府举家大乱，慌作一团。由于平时傅老榕在家里说一不二，家中大事小事全由他作主。现在他一遭绑架，傅家便失去了主心骨，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不久家人便接到匪徒电话，索要赎票 900 万元才肯放人。

这个大数目更弄得傅老榕家人六神无主。

正在忙乱中，傅荫权想起该找何贤呀！

“对呀，找何贤！找何贤！”主意一出，家人一致赞同。

于是赶忙打电话到何家。

但何贤的家人却说何贤给别人请去吃饭，不在家中，也不知他到哪里吃饭。

得知傅老榕被绑，何家也帮忙四处打电话找何贤。

何贤终于接到了电话，听完也暗吃了一惊，但他镇定若常，找了个借口告辞，立即火速赶往傅老榕家里。

何贤赶到傅家时，已是晚上十点。

警方也派人赶到傅家了解情况。

何贤听完傅荫权讲述案发的情况后，经过一番的思索和分析，认为作案者很可能是新来澳门的黑道人物，主张一不要报警，二不可回价太高，只能给个 50 万元赎金，还得采取边谈判、边讨价还价的办法，以摸清这批匪徒是何方神圣。

于是何贤对警员说：“估计对方意在谋财，并非一定要害傅老板的命。这件事请警方暂且不要插手，否则激怒了匪徒，使之‘撕票’反更糟糕。请两位警察大佬先回，有情况我们即和你们联系。我料定，绑匪今晚一定会打电话来讲数，到时候我们再见机行事。”

听何贤这么一番话，大家都觉得在理。无论如何，权衡利害得失，也只好先走这步棋了。

两位警员见傅家都同意何贤的见解，也就起身告辞，回差馆复命去了。

到了深夜十一点多。

傅家的电话果然“叮铃铃”地响了。

一直焦灼地坐在电话旁守候的何贤和傅荫权同时伸手去取话筒。

何贤用眼色示意傅荫权。荫权缩住手，何贤镇定自若地咳了一声，把话筒紧紧贴在耳圈……

何贤刚“喂”了一声，话筒里即刻传来一个凶神恶煞的声音：“叫傅荫权来听电话！”

何贤道：“我是大丰的司理何贤，有什么事情跟我讲好了。”

对方说：“听着，傅老榕现在落在我们手心里！想捡回他一条命，交 900 万赎金。”

何贤问：“我们怎么知道傅老榕就在你们手上？”

对方并不搭话。

话筒里却传出一阵殴打声，接着便听到傅老榕呻吟痛骂的声音。

傅老榕的声音很大，连在一旁的傅荫权都听到了。

荫权哭着抢过何贤手中的电话大叫：“不要打我父亲！我们给钱！”

“快点准备赎金吧！”对方冷笑了一声。

何贤接过电话说：“一时间我们找不到这么多现金。这样吧，明天你打电话到南楼俱乐部，我在那里答复你。”

绑匪没有再说话，“砰”的将电话挂断了。

见何贤放下电话，傅家人都围了上来。他们已经方寸大乱，都希望尽快答应绑匪的要求，救回亲人的性命。

但900万的现金，一时难以凑足啊！

何贤安慰道：“绑匪无非是求财，暂时是不敢下毒手难为傅老板的。不用太担心，狮子大开口，岂能由他们说了算！我现在去找人查查绑匪的底细，然后再作打算。阿权，明天下午你到南楼俱乐部等我。”

从傅家告辞出门，何贤就来到黑沙环附近的木屋区。

已是午夜时分，木屋区黑灯瞎火，连一点光亮都没有。

何贤仅凭微弱的星光，深一脚浅一脚地辨认着门牌。

突然，一个黑影从一巷口朝何贤扑来。

何贤扭身闪开，迅速拔出防身的小手枪，背贴路边的木屋定睛一看，原来是个醉汉。

虚惊一场，那家伙却并未理会何贤，跌跌撞撞哼哼唧唧地走了。何贤则吓出一身的冷汗……

找了约莫个把小时，何贤终于停在一间低矮的木屋前敲了敲门。

里面有人迷迷糊糊地问道：“谁？”

“是我，何贤。”何贤低声回道。

紧接着一阵窸窣的响动，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一个年轻小伙子举着一盏煤油灯在何贤的脸上照了照，面露惊讶地：“贤哥！真的是你！这么晚来出什么事啦？”

何贤忙关上门：“阿汉，我找你有急事，进屋再谈。”

阿汉忙招呼何贤进到屋里坐下，欲去烧水倒茶。

何贤扯住他说：“别忙了，时间紧呢，我有急事求你办！”

阿汉一听脱口道：“贤哥吩咐，我一定效劳！”

何贤把傅老榕遭绑的事匆匆讲述了一遍。

这个叫阿汉的小伙子，先前是一名搬运工。因欠下高利贷者的钱无法归还，在金碧娱乐场附近给人追杀，恰遇何贤从此路过，上前阻止。追杀的人中有认出何贤的，便只好咬咬牙说：“给贤哥一个面子，算你今日好彩！”遂放过阿汉，一帮人扬长而去。

阿汉见自己捡回一条命，忙在何贤面前跪下，连连拜谢何贤的救命之恩。

何贤扶起阿汉，问清缘由。

原来阿汉因赌博输了钱，欠下人家的债。

何贤便对阿汉正言道：“大赌伤身，更何况借贵利，以后千万不可干这些蠢事啊！”

阿汉叹口气说：“我一家只靠我一个人做工糊口最近刚刚又失了业，我想来赌场一搏，碰碰大运，哪知一碰便倒霉，又不甘心呢，谁知越输越多，命都快搭进了！”

何贤听罢，掏了些钱给阿汉说：“你先拿去还债，明天你到大丰来找我，我给你介绍一份工。”

次日，何贤毫不失言，很快介绍阿汉去一个码头给人看管仓库。阿汉有救了。

从此，这阿汉知恩图报，对何贤感恩不尽。他在码头上混迹，自然认识不少江湖好汉，何贤有事要他办，他总是竭尽全力，在所不辞……

何贤讲完傅老榕被绑架的经过后，对阿汉说：“你去给我查一查，看到底是什么人干的，是老手还是新出道的？这对以后讲数很有帮助。”

从阿汉家出来，何贤又去找了几个熟人，让他们也去探听情况。

奔波了一夜的何贤，回到家时，天已蒙蒙亮了……

何贤迷糊着睡下没多久，阿汉就来了。

他告诉何贤，去找了好几帮黑道上的朋友问过，看来这是新出道的人干的。

何贤叫阿汉继续追查，然后，就去南楼俱乐部。

傅荫权心急，早已等候在南楼俱乐部。

中午十二点刚过，绑匪就来电话了。

何贤告知对方，900万数目太大，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给30万。

原来，何贤听阿汉说对方是新手时，就定下赎金最高不超过这数目。

绑匪见还价压得这么低，当然不肯答应，双方你来我往，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未谈妥。

何贤忽然道：“细佬，新出来捞，唔好胃口太大，要留番条后路嘅。”

对方显然没料到何贤会出此言，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新出来捞？”

何贤在这边却偷偷地一笑。

本来呢，阿汉虽然禀报说绑票者不是老手，但何贤对此并无十分把握，所以他突然试一试对方，不料这一试对方竟露了馅。

何贤道：“傅老板何等人，白道黑道都给他面子。不是初出道的，谁会跟他过不去？”

对方犹犹豫豫地说：“我们并不敢为难傅老板，只不过想找几个本钱。如果傅家有困难，给100万也行。”

何贤听出绑匪有点松口了。他不动声色，继续坚持着：“这样吧，傅家只应允出30万，既然你们新出道要本钱，我自作主张，加20万，50万！一口价。”

对方听了，很久没有出声，沉默许久才最后道：“我们要商量一下，过几天再给电话你。”说完，“啪”地放下电话。

何贤与傅荫权天天中午到南楼俱乐部等绑匪的电话，与他们讲数，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

不管匪徒如何漫天要价，何贤坚持只给50万元。但匪徒也不示弱，声言要对傅老榕行凶。傅荫权为急于救出父亲，冲动起来，想向匪徒动武。

何贤说服了荫权。因为若然绑匪发现风吹草动，将危及傅老榕生命。

于是继续坚持着与匪徒磨牙，赎金从900万磨到600万元，匪徒喜怒无常，一会要这样转眼间又改变主张。何贤忍着心头怒气，与之相持。

讲价艰难，几乎陷入僵局……

何贤与澳门黑道白道的人素有交情，很快查到了匪徒藏“参”的地点，匪徒的人数，匪首是何许人。

澳门警厅也查出收藏傅老榕的地点在“荷兰园”一带，便打算在月黑风高之夜，武力上阵施以救人。

但何贤认为，如果用武力“踢窠”（进攻匪穴），绑匪有枪在手，一旦狗急跳墙乱咬人，傅老榕必死无疑。

所以，何贤立即通知澳督，讲明利害，请澳督制止警厅行动，继续与绑匪进行周旋。

就这样，断断续续讲了一个多月，绑匪终于同意交 50 万元放人。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交付赎金。

一天，何贤与傅荫权照例如常，在南楼俱乐部等电话。

阿汉匆匆来找何贤，悄悄禀告他挖到的新消息。

这个阿汉本事也真不小，他不但查出绑匪一伙的身份，连绑匪藏“参”的新地址也给他找了出来。

原来，这宗绑案是来自香山县的一伙歹徒勾结在傅老榕中央酒店的李秉枢、梁锦、甘明等人干的。

他们把傅老榕囚在贾伯乐街 76 号 2 楼……

傅荫权听到此消息，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年轻莽撞，没有与何贤商量，当晚就知会警方，并带上父亲的一班马仔前去救人。

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藏“参”处已人去楼空。

何贤第二天早上才得知此事，连拍大腿叫着，说傅荫权把事情搞上火头了！怕是要坏事，要坏大事了……

再说傅老榕这边，也遭受了一番折磨，但他也真是个“守财奴”，宁可死也不愿意财产拱手交给这伙强盗。

所以匪徒们没少折腾他。许多时候把他绑在船上，有时又把他藏在隐蔽的屋内，警方闻风而动的时候，他更是连连跟着不断“转移”，欲活不得，欲死更难……

匪首一次次敲着傅老榕的头，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将你囚起来，因为你现在有钱了，我们需要钱。”

傅老榕咬着牙说：“你们不会得逞的，我一定要想办法……”

“死到临头还嘴硬！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你要据实答复。这很重要，真实的情况愈多，你活命的机会就愈大。”匪徒打断傅老榕，强问他的口供。

“谁能万无一失地带钱出来赎你？”匪徒问。

“不知道。”傅老榕摇头。

“马上跟你的家人联系，让他们带钱赎你回去！”

傅老榕慢慢地说：“这个问题使我无从回话，因为钱是我家的。我死也不会让他们给你们这些混蛋的。”

“你妈个×！那你就等死吧！”

傅老榕知道这是一伙亡命之徒，他们杀他这种无帮无派、单独行走的人自然更不会有丝毫犹豫。

但他还是不肯服输。

果然不出预料，一天两个凶神恶煞的打手恶声恶气地说：“你家人要报复，我们便要你一只右耳，好去找你家人要钱，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说罢，一把明亮的刀伸了过去……

傅老榕一声惨叫就晕了过去……

等他醒过来时，感到右耳一阵火辣地生疼，右耳没有了……



这是一间雾气冲天的小屋子。

周遭没有人，也没有动静。……

就在何贤拍腿大怨傅荫权莽撞的当天中午，有人便给傅荫权送来一封信。

打开一看，原来是血淋淋的半只耳朵，信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不交出900万，下次送回人头。”

傅家的家人一看，当即有几个哭喊着晕了过去……

接下去几天里，何贤和傅家再也接不到绑匪的任何消息。

大家都忧心如焚。

这天中午，何贤照例到南楼俱乐部等候电话，又白等了一个下午。

晚饭后，何贤在家里闷坐。忽然粤剧演员新马师曾来访，问何贤为何闷闷不乐，何贤深叹一口气……

何贤在港澳粤剧界中有许多朋友，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何贤都以各种方式帮助过他们。

新马师曾是其中之一，所以何贤与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

何贤见问，也不相瞒了，他一口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新马师曾。

新马师曾听完后，想了想说：“我有个朋友，叫李权，他是挺进第三纵队司令袁带的亲信，人称‘过河卒’，意为样样事都行得通。如果请他出面打点，保证傅老板平安回来。”

何贤正无计可施，马上同意了。

经新马师曾约请，何贤在中央酒店请李权吃饭，并送厚礼。

谁知李权也很够义气，把礼物一推，拍着胸脯说：“贤哥有事吩咐，李某定当效劳，何需提什么酬谢不酬谢呢！”

何贤最喜欢这种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的脾气，激动地举起酒杯，说道：“我何贤虚长几岁，李兄如不嫌弃，我们结拜为兄弟，如何？”

李权虽第一次与何贤谋面，但何贤仗义疏财之名早已听闻，他很敬佩何贤的为人。

现在听何贤如此一说，连声赞同，哪有不允之理。

至于新马师曾，早把何贤当兄长看待的，更不在话下。

这李权，果然不负“过河卒”之名，不几天就来告诉何贤，已和绑匪讲好数，约何贤在香港新亚酒店交钱，收钱放人。

原来，对方也不想把事情做绝，只是气不过傅荫权报警，带人抢上门来，才割下傅老榕的右耳朵。

现在李权找上门来，正好做个顺水人情。

在约定的那天，何贤只身去到香港，和一个绑匪在新亚酒店开房，等傅家传来放人的消息。

晚上七点左右，傅荫权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已平安回家。

何贤遂将50万元交给守候在一旁的那名绑匪。

双方成交后，傅老榕历经磨难终获得释放。他临离开贼窝时，顺手拿一个闹钟返家，作为纪念。事后，他经常对人说，这个钟是全世界最昂贵的了。

至此，轰动一时的傅老榕绑架案，在何贤的斡旋下妥善解决了。

那些绑匪并没有得到便宜，事后全给警方缉拿归案。

这宗绑票案，在1954年破获，匪首李秉枢、梁锦、甘明和幕后人李某先后落网，各判入狱18年零8个月，还赔偿给傅老榕100万元的损失费。

这件事，使傅老榕进一步了解了何贤的才干，从此更加信任和器重何贤。

“贤哥”大智若愚，一脸忠厚地告诉人们：“帮人，就等于帮己。没错，我的话没错。”

1953年5月5日上午，祸患难绝的傅家，又发生了傅老榕的儿子傅荫权被绑架事件。

绑匪是黑道上的李某，此人嫖、赌、吃、喝四样齐备。

他因常到傅老榕的“泰兴娱乐公司”赌博，失手输了几万元，很不甘心，声言要把赌输的钱从傅老榕身上拿回来。

于是他纠集几个手下，把傅荫权绑架了。

开始，李某在电话向傅老榕索要500万元赎金，傅老榕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又找何贤来帮忙。

李某风闻何贤亲自出马，就主动给何贤去电话，提出一切由何贤作主。

结果，由何贤出面，以傅老榕付给李某20万元现款赎回儿子了事。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那是怎样一个乱世啊！在那样的乱世里，何贤帮过多少人，做过多少事，就不得而知了。

即使在今天这“举手之劳便可为他人撑块绿荫”的和平年代里，又能找出多少个“贤哥”呢？

——何况那是艰难时世里……

## 第十二章 叱咤风云 平生力挽五大险

澳门历史上发生的五大事件，均由何贤挺身而出，一一摆平。替人排忧解难替人除祸——他成了“三T公司”的独家老板，至今尚无人相仿。

那时候还没有“三T公司”的称谓，人们只管他叫“澳门王”。

但何贤坚决否认，他对黄霑说：“澳门王，绝对不是我！”

何贤在澳门被誉为“华人澳督”或“影子内阁”，决不是虚言妄语。

因为澳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澳门政府无法解决时，往往“点将”求助何贤。而每一次，何贤均是积极参与并把事情办妥。

翻阅我手头寻觅到的所有采访记录和方方面面的资料史述，仔细理过一遍，何贤平生，曾经力挽五次对澳门社会民生影响很大的风险。

何贤晚年曾对采访他的黄霑说，澳门有过四次大风险，用他的话说：“抗战时代两次，之后又有过两次。”

那是何贤本人的记忆。

所谓“抗战时代”那两次——

在本书的第十章里谈及过。

就是1943年春节前夕，日本特务机关林立的澳门，因其陆、海军特务机关内哄而趁机封锁澳门的那一次。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日本侵略军原本没有得到最高当局封锁澳门的命令，而只是想将事件嫁祸于澳门“西洋政府”；而那个特务头子又听何贤说他们一行仅代表澳门的居民，为了便于下台，免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所以他便推出一个特殊人物——在日特机关工作的汉奸黄公杰作为代表，或者叫“替罪羊”吧，让黄某与何贤们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不久日本陆军就解除了对澳门的封锁。

偏偏第二次，又是同这个黄公杰有关。

只不过这一次，他不是充当替罪羊，却成了惹事的“狼”。

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这之后，这个日特机关代表黄公杰，在东亚酒店长期包了间房办公，作为日军统治澳门的代理人。

黄某虽是澳门人，但以何贤的推断“大概是为日本人当密探的人马”，所以狂放无羁。他纠集一批手下，作威作福，向居民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甚至连葡警也不放在眼中。

有一次，他的那班手下为了争先坐三轮车，殴打了澳门葡警，又掀起一场争斗风波。

“西洋警察”不甘心受日本汉奸的欺侮，立即召集荷枪实弹的葡警队，把黄某长住的东亚酒店团团包围了。

黄公杰当然不是善男信女了。他忙调动他的那帮特务，持械对葡警进行反包围。再看不敌就立即去电日本陆军队，于是日本人又运来了几车手榴弹。

双方，枪口对着枪口，大眼瞪着小眼，一场火并迫在眉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如果爆炸开来将酿成大祸啊，到头来，伤的死的，还有可怜无辜的老百姓……

当时澳门政府派经济局长罗保博士受命火速解决此事。

何贤忆述当年说：“罗保博士，当时乃是澳门权威人物，既是政府高官，又是富甲一方人士。各方各面，都很有影响力。可是偏偏那一次，澳门东亚酒店的两重围困，罗保博士出头，就无法搞掂。”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形势十分危急，乱得很。罗保乃葡国人，包围在最外层的日本特务们，一见是西洋人士，也不管你是谁，总之坚决挡住不许进入东亚酒店。所以罗保再有影响力，也是无济于事。

于是罗保只好找到何贤，劳烦“贤哥”出马！

何贤为了澳门的安全，不顾个人安危，马上赶到了东亚。

双方人马见是何贤，便都让他进入酒店。

何贤对双方头目们申明利害后，再拍拍这边，哄哄那边，好生劝说了一阵……

双方无话可辩，就都给何贤面子，也趁机赶忙下台，撤走了武装人员，平息了这场小题大作的“恶霸”风波。

又是“贤哥”出面调停，澳门居民才又免了一场枪祸。

何贤谈及当年往事，从来没有居功自傲，谈到事情经过，往往几句话带过，哼哼哈哈地讲几句“歌词大意”。

那些惊魂慑魄的历险，在他的回忆里总似乎是别人的故事，说得悠闲而又轻松……

然而，当年频频“救火”的他，  
当年脸上堆笑、手心捏汗、胸中压火的他——  
真的那样悠闲而又轻松么？

……

除了这两次外，何贤所说“之后又有过两次”的历险，是指1952年发生的拱北关闸事件，和1966年发生的“12·3事件”。

这两次历险情形，因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而本书大体沿时间线索陈述，故这两个事件在后面章节再详述。

现在，我倒要说一说何贤未强调的那“第五次”历险。

这一次按时间线索，应在“四大风险”事件的中间，时间是1949年冬天。1949年冬，蒋家王朝全面崩溃。

共产党的百万雄师过长江后不久，新中国建立，蒋介石逃到台湾。

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李及兰部队向万山群岛大撤退时，有的官兵不愿随队伍南逃，便逃离到澳门，以氹仔和路环为立足点，在公海抢劫来往商船和渔船。

此外，他们还经常在澳门抢劫、杀人，丢放炸弹，扰乱民生，危及百姓。

澳门这块方寸之地上，又多了一伙亡命之徒，仗打败了，那股子气，全撒到这里来了。

结果形势愈来愈不妙。

有一次，一天之内，他们竟在不同街道爆响了四枚炸弹！

其中有一枚就在何贤寓所附近爆炸！

当时何贤的一个老朋友也遭到歹徒袭击，但上天保佑，侥幸大难不死。

何贤心急如焚，长此以往，那还了得！

尽管澳门小岛上有七十多个天主教堂，上帝恐也保佑不了澳门。说不定，教堂也遭连连爆炸和袭击，“上帝”也得发疯，以至魂飞魄散……

求上帝，求观音，没用。

人哪，还得自己想法子保护自己，救自己。何贤为了安全，除却加强保安员的队伍外，他想出一个法子，就是以高价暗中收购流入市面的私藏武器，以免不法之徒利用这些枪械破坏社会治安。

何贤把重金收购的一批批武器弹药，由黄子雅、彭彼得等人送交澳门警方。

此举果然奏效，深得有关人士的赞许，澳门的治安也渐渐稳定了许多……

何贤除了参与解决上述五大事件外，还做了无数义举善事。

因此，当时不少澳门人称他为“澳门王”。

然而何贤，坚决否认他是“澳门王”。

黄 采访他时也提及此称谓，何贤听了忙摆手道：“这讲法不过是大家给我面子罢了！澳门王嘛，绝对不是我！”

对着何贤先生，听他讲这番话，能真实地感受到他的诚恳无欺。

这“为人而不为己”的性格，凡与何贤打过交道的人，无论相识深浅，都能够很清楚地感觉到。

### 第十三章 不惧亏蚀 收购萧条酒店业

抗战胜利后，不少人重返内地家园，或是移居香港。澳门昔日的繁荣盛景不再，人迹稀寥。各行各业都十分萧条衰颓，尤其是旅业，一落千丈。

何贤却斥巨资收购酒店，开通公交巴士，对亏本的买卖“无所谓”。

对于战后的澳门，“贤哥”象君子、赤子，更像一个患难恩爱的情郎……

前文我们提到过，何贤赚过滚滚财源，不过，他也确实做了许多亏本生意。

究其原因，那都是为着稳定澳门经济，安排工人就业而做的“慈善营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澳门居住的大陆民众，也就是那些战争岁月里跑到澳门避难的人们，现在都纷纷撤离。

不少人重返内地家园，或是移居香港。毕竟，澳门太小，已完成了它作为战时的中转站使命。

客居异乡的人，终究是要回归故里的。就在这时候，发生大陆民众和澳门居民强烈要求收回澳门的事件。

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下令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及驻军师长刘绍武等人支持民众这项要求。

1945年11月，中国军队武装封锁了澳门。

当时澳葡军警仅有一千余人和两艘炮艇。

澳门局势紧张，社会秩序大乱。

当时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每担大米涨至70元钱，猪肉每斤涨至15元（均为澳币），但工业品滞销，价格大跌。

不少工厂停工，居民纷纷离开澳门到广州、香港、南洋等地谋生。

尽管后来葡国政府派雅玛纽到广州道歉，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除武装封锁命令，可是澳门居民的外流仍然严重。

因而澳门各行各业都十分萧条。

昔日的繁喧盛景不再，街上人迹稀寥，尤其是旅业，一落千丈。酒店老板纷纷关门“歇业”，自然，又有大批工人，随着酒店业的关停，失去了饭碗。

何贤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不插手，便好似不能睡得香吃得好了。

为了稳定澳门经济和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何贤明知经营旅业亏本，却还是一意孤行，出巨资先后收购了新亚、澳门、国际三间酒店，自己经营。

别小觑这一举，无论如何，在当时“四面楚歌”的危难关头，它对发展澳门经济，无疑起了一剂“强心针”和“活血素”的作用。

还有，抗战期间，由于燃料短缺，歧关公司经营的澳门巴士停开了。

抗战胜利后，尽管燃料供应逐步得到了恢复，但由于澳门人口已大幅度减少，巴士业一直得不到恢复。

何贤认为，要发展澳门经济，首先必须发展交通业。

于是他便投资办起了澳门福利公共汽车公司，与澳门市政厅签订了合约，取得澳门市内公共交通的专利权，使澳门交通事业得以继续发展。

还有一个时期，剧场生意不景气，他也接过来承办。

而许多人也都知道，“十四哥”张瑛搞个“华侨公司”拍电影，“贤哥”

也曾在幕后出过大力。

不过这些都是亏本的生意。

这些得到何贤鼎力支持的事业，对别人的好处，远远多过对他自己。

说到此类纯粹是为了公益慈善而办的事业，何贤完全只有投入，没有“收益”。

要说有益，那即是造福社会，救济民生。

明知是亏本生意却仍要做。因为他说过：“取诸于社会，要用诸于社会。”

有一部分实业赚了钱，就应该把挣到的钱用于有益社会的方面——何贤将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作风，一点点顺理成章、不折不扣地付诸着实践。

谈到得失观，何贤直言：

“不过，我也无所谓”——每一次，他都这样笑对人说：“人，其实也没谁多么了不起。一块地，上边有水流过，一人一个孔；你的孔深，聚多点；孔小，就聚少点，其实也不外如此。”

他可以一边说还一边摊平双手在桌上比划自己的高见，而后嘴角咧开豁达的微笑：“你看通透了，就会把得失看得无所谓了。”

的确，他的话不能不令人思索一个问题：抗战八年之后，人人到香港发展，而何贤为什么会选择澳门呢？

他知乐忘返？还是难得糊涂？

抑或执迷不归？

他恋乡土，也恋异地么？

他恋热闹，也图清冷么？

“一打完仗，澳门就好冷落。如果个个都走，更加散。而且这里中国人的福利机构，亦未上轨道，镜湖医院，年年亏本，我实在不想离开！”

“何况，”何贤再记述当年往事说，依他自身的眼光看，城市景象，都会有起伏有衰荣的，不必悲观，筲箕湾都会有兴旺出头之日，那么显然没理由澳门会一直萧条下去的。何贤不是表明他真的对澳门多么多么充满希望，只是他有自己的主张，不会随波逐流，眼睛茫然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

因而，即使他那班好友，像梁昌、钟子光等都接连搬迁到香港，而他，依然决定驻守原地，留在澳门半岛。

在人生旅程的漂泊中，似要经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驿站”或“客乡”。

而何贤他，错把异乡当故乡了吗？

不，只能从中看出何贤的“衷情”。

他一辈子经商，却一辈子，都是比艺术家还艺术的“性情中人”。

对于澳门，对于广州，对于所有留驻过他拼搏血汗和奋斗足迹的地方，他都眷眷难离。

对于千疮百孔的战后之地——澳门，何贤更加悉心地呵护。

他更像一个谦谦君子，像一个敞襟赤子，更像一个“同舟共济、衰荣共勉”的患难“情郎”……

“贤哥”是澳门的情郎，与她长相厮守着。

他这种“炒冷饭”的作风，正反映出他一贯处世的厚道。

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从不乘人之危，而是给人以安全感、依赖感和信任感。

从不喜欢“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的无知和盲从。

他只喜欢小心翼翼地“拾荒”。

他最惊喜的莫过于从一张黯然失色、暗淡无光的脸颊上，看到生命的红晕和希望……

不仅看人看事，连看待城市的态度，贤哥也是如此——

以发展和肯定并充满希冀的眼光，和“她”久久地凝视共守，不会退避三舍。



## 第十四章 柯麟诊所 地下党人识何贤

当许多人都怀疑且惧怕共产党的时候，何贤便早已开始和一个地下党人——“济公”医生柯麟打上了交道……

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何贤悉心呵护着一个友人留给他的“大包袱”，就有如悉心呵护着他与柯麟之间的恒久友谊，以及在人生的奋斗中，那段定格成金的美好回忆……

如果说，葡国政府的罗保博士，对于作为商人的何贤的一生有过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对于作为社会政治活动家的何贤来说，对其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当数柯麟了。用香港人黄霑的话说，贤哥和大陆拉上关系，比后来一窝蜂“爱国”的人早得多啦。那时，中共在大部分澳门人眼中，仍然是不可接近的。

当人人都怀疑和惧怕共产党的时候，何贤便已开始和他们有交往了。

这期间，一定有人对他有过影响的。

于是，何贤直截了当地回答人们的疑问，完全不作回避：“影响我最大的，是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柯麟！”

柯麟是位老共产党员。

当年他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时，因为地下机关遭到敌人破坏，于是辗转来到香港。

1935年中秋节的前几天，中央特派员潘汉年约柯麟到自己的住处弥敦酒店见面。

（潘汉年的名字今人已不陌生。）

柯麟依照约定走进潘汉年的房间，不料却惊讶地见到自己1929年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24师工作期间认识的将军叶挺。

久违的故人重逢，不胜感慨唏嘘。

潘汉年告知柯麟，叶挺刚从国外回来，定居在澳门。

可不久前叶挺的一个儿子不幸染上白喉，却因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病死了。叶挺为此伤心不已。

考虑到叶挺需要有一个地下党员经常与他保持联系，并鼓舞他重新参加革命工作，同时还有照顾他的家庭，于是组织上建议柯麟迁居澳门担此重任。

潘汉年对柯麟说：“你在香港熟人太多，容易出事，又不能挂西医牌行医，维持生活也有困难。如果迁居去到澳门，既可以执行党委派的任务，又可以解决你自己家庭的实际问题了，一举两得。”

是个好主意，就这么决定了。

这次会面后没几天，也就是1935年中秋节，柯麟举家由香港迁往澳门。

到了澳门以后，柯麟在板樟堂前街开了一间门诊，又挂起牌来名曰“柯麟诊所”。

那时间，马万祺得了肺病，便到诊所请柯麟治病。

病治好了，两人也成了朋友。

潘汉年得知马万祺思想进步，遂要柯麟多多与马万祺联系，并通过马万祺团结澳门工商界人士。

于是，经过马万祺的介绍，何贤、崔德祺等人也结识了柯麟。

何贤与柯麟两人无论是受教育的程度抑或所从事的职业，还有各自的身

份背景，都有很大的差距。

但柯麟的侠义性情，使何贤深感钦佩。

为何这样讲呢？

因柯麟医术高明，这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澳门，他原本完全可挣到很多的钱。但柯麟对穷苦人收费总是很低廉，甚至完全免费义诊。从上层社会的绅士太太到穷困潦倒的渔民车夫，他都一视同仁，悉心诊治。

柯麟的医德，使他在澳门社会各阶层都享有很高的声望。

有一次，何贤与柯麟一道去看望一个朋友。走在路上，不断有人向柯麟问好或点头致意。

他们走到白马行街与竹园围斜巷的拐角处，突然有一个小男孩儿欢呼着向他们跑来，抱住柯麟的腿亲热地叫着“柯先生！”

柯麟面露笑容，亲切地摸着孩子的头问他到哪里去。

小男孩告诉柯麟，妈妈叫他去买粽子叶，端午节快到了，要包些粽子送给柯先生。

柯麟对小男孩说：“回去告诉你妈，你爸爸病愈没多久，刚出来拉车，要省着点钱，她的心意我领了。好不好？”

听柯麟如此一说，小男孩突然间一本正经地说起大人话来：“妈说，柯先生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我们家穷，送不起别的礼物，送些粽子表心意是一定要的，不能免的！”

说完，孩子一溜烟地跑了。跑了很远，又回过头来喊着：“柯先生再见！”

小男孩儿走后，柯麟告诉何贤，那孩子的父亲是个车夫，一年多以前得了肺病，在别的诊所花光所有积蓄也没把病治好，后来经别人介绍找到了柯麟诊所。

柯麟不收诊金，给他治好了病。

这位车夫全家对柯麟便感恩不尽。逢年过节，总要登门拜访，再穷，他们也要提上几件称心的礼物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

听了柯麟的介绍，何贤心头似乎有所触动。

他是做生意的，交际不可谓不广，逢年过节，相互应酬，礼物自然不会少。但如柯麟先生这般，收到带着真心实意的感激之情的粽子，收到一个小小孩童纯真的爱戴，他可倒真的……还没有享受过呢！何贤知道，这才是人世间最珍贵最美好最幸福的一种心灵感受。

板樟堂前街的柯麟诊所，成了何贤每天必去的地方。

每天，他都要找一个时间约柯麟聊聊天，喝喝茶。

晚年何贤曾回忆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柯麟。但他从来未向我讲过半句宣传共产党的话，我是从他做人的态度上，看出他的“进步”的！他为人的态度，实在令人敬佩。

柯麟自己开诊所，免不了要与医院打交道的。

重病人要住院，病逝者要停柩，这些诊所都无法解决，只能与医院联系。

当时，澳门只有一个镜湖医院。

镜湖医院始建于1871年。

它是澳门富商巨贾合办的一个慈善机构，以赠医施药、安置疯残、寄棺停柩为主，兼管赈济救灾、修桥补路、排解纠纷等。

柯麟在与镜湖医院打交道的过程中，曾一度动过加入镜湖的念头，因为自己开的诊所，由于经济能力等诸多因素限制，接纳的穷苦病人毕竟有限。

有一天，廖承志来到澳门。

柯麟便与廖承志谈起加入镜湖的事宜。

廖承志鼓励柯麟说：“医院小不要紧，那里缺乏人材，正好给你施展拳脚的机会啊。”

与廖承志的这次谈话，使柯麟最后下决心，成了镜湖医院的兼职医生。

镜湖医院的工作对于柯麟来说，纯粹是义务工作性质。

柯麟没有在“镜湖”收取过分文报酬。

每天一大早，柯麟便从家中动身去镜湖医院上班。

从他的住处板樟堂前街到镜湖医院所在的连胜街，这整段路的车马费还都得柯麟自己掏腰包。

柯麟上午去镜湖上班，在那里忙碌上半天，下午再返回自己的诊所应诊。

由于在诊所应诊的时间减少，柯麟的收入也相应减少了。

生活明显地露出尴尬的窘困。

妻子对他，意见也越来越大了。

这一天天蒙蒙亮，柯麟又要起床准备去镜湖医院。妻子一边给他准备早餐一边唠叨着：“少去一天也不行？昨天马经理来了电话，今天要来诊所看病呢！”

“让他改时间吧。他患的也不是什么急病，我心里有数。”柯麟一边匆匆吃早餐，一面应着妻子。

“澳门又不是只有你一家诊所，成天这样推人家，人家就非求你不可吗？人家就不会另找高明？换了是我，才懒得跟你打交道呢！”

妻子的话明显带着不悦的指责和怨气：“看看这两个月的收入，都快应付不了日常开支了！再这样下去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你自己来当家好了！”

柯麟竭力压下心中的不快，心平气和地对妻子说：“正是因为马经理这样的病人，不在我这里看病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误不了治病，我才推他的。你不知道，到医院应诊的大多是穷苦百姓，他们没有钱上私人诊所，我不去应诊，他们无处投医，耽误了治病，还会有生命危险呢！”

正说着，何贤来访了。

这“不速之客”虽说一脸忠厚，可目光还是犀利的。

一看柯麟夫妻俩的神色，何贤就知道他们又在为柯麟去镜湖医院义务应诊的事吵嘴了。

何贤立刻装出紧张的样子对柯麟说：“我妻子昨晚感风寒，想请麟哥去看看，我怕来早了打扰你们，拜托拜托！快走快走！”

说罢，何贤又转身同柯麟妻子道：“对不起了阿嫂，我拉走麟哥，改日再请你饮茶！”

说完，不等柯麟妻子答话，拉着柯麟，两人匆忙而出。

跟着何贤出了家门，柯麟一下子想起没带出诊箱，便要折回家取。

何贤笑道：“我哪里是要你去看病，不过是拉你出来，免得在家和阿嫂吵嘴么！”

柯麟感动地看着这位善解人意的朋友，叹了一口气。

沉默了一会儿，何贤忍不住问道：“柯先生，我真不明白，你到镜湖义务为大众服务，不但每月少了一大笔收入，而且搞得家里也不安宁，何苦呢？病人永远看不完的，你准备这样吃亏吃到什么时候呢？”

听何贤如此问，显然他是思索过一番，也疑惑过一阵了。

何贤真是个有心之人。

柯麟感到很高兴。

其实，他早就想和何贤谈谈，潘汉年不是交给自己一个任务，要团结澳门工商界进步人士吗！平时想展开“地下工作”，可柯麟总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切入，今天可是何贤自己开口发问了，做做他的“工作”正好顺理成章。

柯麟想了一下，缓缓地拍着何贤的宽厚肩膀，目光深远地回答道：“贤弟，人的生命有限，就算长命百岁，也终究不过是大宇宙生命的短短一瞬间啊！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生命和事业是无穷无尽，世代代代传下去的……我个人不信佛，也不信基督教，更不信天主教，虽说澳门到处都是教堂庙宇，可我的信仰和抱负，却是以个人有限的生命，去造福人民和国家，这才不枉过这短暂的一生啊！”

停了稍许，柯麟又捶着何贤的胸口道：“对了，贤弟，你也加入镜湖吧。你平时也常常济贫扶弱，但那只是帮了个别人，可加入镜湖，就可帮助了澳门广大的劳苦众生、贫民百姓。那才是功德无量啊！”

在柯麟的鼓励下，何贤于1945年加盟镜湖医院，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值理。1946至1947年被选任该会副主席。

从1950年起直到他逝世，何贤均被选任为该会主席，义务任职长达37年……

日后，柯麟与何贤、马万祺、林炳炎等澳门工商界人士，形成一个志同道合的“镜湖值理会”核心，他们诚心致力把镜湖地，办成一间正规化、现代化的综合医院。

柯麟加盟镜湖之前，澳门当局歧视这间由中国人主办的医院，且规定医院不能给患者施行手术。

从这点我深有感触的是，澳门“西洋政府”如此无能，还如此无理。

历史，常常令人感到荒唐，且百思不解。

话题继续。

一日，柯麟与往常一样，一大早到镜湖医院上班。

只见一间西医诊室外挤满了人，站在外围的人看不清里面的情况，只在那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柯麟见状，知道一定又有了危急病人。

他不由分说推开人群，挤了进去。

诊室的病床上，躺着一位搬运工人模样的病人，痛苦地抱腹呻吟，时而嗷嗷叫喊，头上挂满豆大的汗珠儿。

柯麟向值班医生询问情况。

值班医生道：“我们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动手术。病人来求诊太迟，这样子似是已穿孔，再不动手，就可能保不住命了。”

不错，柯麟一见病人，丰富的医疗经验就使他已猜中八九分了。

柯麟刚进入镜湖不久时，也遇上过同样一个病例。本来阑尾手术没什么大不了，镜湖完全有能力做，只是因为当局不准他们给病人手术，镜湖呢，也不争气，压根儿没有准备手术器械，因此，柯麟两手空空，两眼儿直瞪干着急，无法为病人做手术。

结果自然不用多问了。那个病人不久就因弥漫性腹膜炎咽气了……

对一个医生来说，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本来可以救治的病人，却因耽搁

治疗而不幸死亡啊！

事后，柯麟一方面继续向当局申请手术权，一方面也自己悄悄准备了一套手术器械。

没想到，柯麟的准备今天派上了用场，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看完病人的检验报告，柯麟对身边的护士长说：“将治疗室布置消毒，准备手术。”

听说柯麟要给病人做手术，在场的医护人员都议论纷纷。

有人表示赞同，说镜湖早就应该设立外科了，这次做出个样子给当局看看，让他们再也不敢一味胡说镜湖不够资格做手术了吧！

也有人则不无担忧地劝柯麟，说未经当局批准，施行手术属违法呀！加之镜湖连手术室都没有，闹出人命可就闯大祸了。

柯麟眼睛都没抬，平静地说：“没时间顾那么多了，我再也不能眼巴巴看着病人因得不到治疗而无辜地死在我们医院里。我不允许！”

手术做得很成功。

病人接受治疗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经过此次手术，当局不得不承认镜湖医院完全有施行手术治疗的能力，于是批准了镜湖设立手术室。

争得当局的批准后，柯麟又通过何贤，取得澳门工商界人士的支持，筹款为手术室添置了各种仪器设备。

经柯麟和镜湖医院同仁、澳门工商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镜湖医院，终于建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手术室。

这一来，不但大大提高了镜湖医院的救治水平，还使镜湖医院朝现代化、正规化的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46年2月17日，镜湖医院慈善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改值理制为董事制。

第一届董事会被选举出来。

柯麟、何贤都被选为董事。

镜湖医院实行院长负责制。经董事会主席林炳炎提名，董事会一致通过聘用柯麟为镜湖医院的首任院长。

按照当时的规定，董事选出后，还要报澳督批准。

当时有人担心柯麟难以获得澳督的通过。虽然说谁也不确定柯麟真实的共产党人的身份，但他平时待人处事的态度，人人也都看得出其与共产党“让劳苦大众翻身作主”的主张有相似之处。

林炳炎说：“如果澳督不同意，这主席我也不当了，让他们来管镜湖好了！”

何贤便主动请缨，与林炳炎一同去见澳督。

果然不出所料，澳督拿了董事会名单反反复复地看。

过了很久，他突然抬眼狡猾地冒出一句：“听说柯是共产党员？”

林炳炎说：“柯医生我们认识已久，他热心医道，从不过问政治，怎么会是共产党员？”

澳督说：“我听说他常常在自己的诊所，替那些苦力、渔民看病不收钱，不是共产党，谁会帮助那些穷苦人？嗯？”

何贤听到此处，不等澳督说完就忍不住插嘴道：“咦？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们也常常帮助那些穷苦人家，还捐钱捐物呢，难道我们也是共产党？党在

哪里我都不知。”

澳督没有正面回答何贤的质问，只是换了一副商量的口吻说：“镜湖已非同往昔了，现在人才济济，你，你，还有几十位贤达，换一个人不行吗？”

澳督在澳门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林炳炎、何贤等人平常见到澳督，从来都是彬彬有礼、毕恭毕敬的。

可这次为了镜湖，不得不开罪他了。

林炳炎一字一句地说：“董事会几十人谁都可以换，唯独柯麟不能换。”

澳督听得有点儿不对劲了，他无言以对，只在下意识的一种感觉中，发现时代变了，看看这一个个中国人，一个个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东亚病夫”，怎么头上开始长出反骨来，连说出的话也硬气许多，还带着点刺儿？！……

当然那时，是1947年以前，共产党员自然不便“表态”，都在“地下”埋着，像火种，有一分光，就发出燎原之亮儿……

不是吗？

何贤佩服柯麟，佩服得五体投地，二话没说，受他的影响，值！

“贤哥”曾道：“这个人，做事非常真。好重视他在镜湖医院的工作。他义务去医院，都不知得损失多少自己诊所的收入！”

柯麟，在1951年，由澳门回到大陆，完成他的“地下党”使命，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当院长。后来至北京工作。

这位“柯医生”，稍上年纪的澳门人，即使不认识，也对其耳熟能详。

何贤还说，“他没对我讲过什么主义，也没对我讲过共产党如何如何，不过他的为人态度，实在令我敬重。”

“同时，我亦觉得，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的。”

何贤亲近共产党人士，倾向中国的领导核心，是从心里产生自觉的认同的。

于是，由柯麟的介绍，何贤来到大陆，并和共产党开始建立起长久的关系和交往。

七八十年代，何贤许多次来到北京，还会唔过柯麟。

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何贤悉心呵护着镜湖医院，就有如悉心呵护着他与柯麟之间的恒久友谊，还有在人生岁月的奋斗中，那段定格的美好回忆……

柯麟1951年就回到内地了。

而何贤却依然任重而道远，且是“越是艰险越向前”……

镜湖医院每年支出五千万，透支部分大都由何贤及澳门各界人士支持解决。

这真是一个不小的“包袱”。

1968年，何贤还把他拥有的三处房地产及三十五间屋宇捐赠给镜湖医院。

由于何贤和澳门各界人士对镜湖的关心支持，该院后来不断得到扩展，先后增加了一千张床，增购了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使一些复杂的手术如大脑搭桥、断掌再植等都可在这里完成。

镜湖医院还进一步完善了妇产科，负担了澳门七成新生婴儿的接生工作，并附设了护士助产学校，培养了一批批医护人员。

何贤在镜湖医院慈善会任职期间，经常关心病人。

有的人无钱住院，何贤就写条子让他住进去；

有的住院病人无钱付医药费，何贤就给他们先垫上。

珠海吉大一个乡民在镜湖留医不幸死去，家属无钱缴交住院医药费，焦急万分。后来托一个叫徐东少的人，向何贤求助，何贤立即写了一张“请记弟数”的条子给了医院，如此简单，就让这位死者的家属把尸体领回去埋葬了……

许多受到何贤恩惠的人，至今还念念不忘他的功德。

他们大多活了下来，活到今天；

活得比何贤命长；

而他们的“贤哥”，澳门人的贤哥，不扣不折的“贤”哥——只活了75岁。

而人们，却永远也算不清人欠他，还有他欠人的那笔“糊涂帐”——

“请记弟数”……

贤“哥”的帐，在帐面上，却是“弟”数。

几十年来何贤兢兢业业，乐此不疲，他无疑是镜湖医院历史上贡献最大的实业家。

## 第十五章 商会换旗 拒为蒋介石喝彩

1948年5月的一天，澳门中华总商会的理事会会议上，理事陈立民和邓成龙提议大家开庆祝会，为新任职的民国“蒋总统”致庆。以何贤为代表的会员，则鼎力抗衡，反对此提议。

为吸纳进步人士马万祺加入理事会，何贤费尽周折，最终在柯平的“鬼点子”下，“挟澳督以令会长”，如愿以偿。

谈到澳门“镜湖医院”，不得不提一下，这华人的慈善机构，何贤从1946年当副主席，1950年任主席，直到去世——整整37年！

在任何慈善机构当主席，且一当37年之久，这纪录，大概世间少有吧？一个人，一个不算太“痴”的人，倘若靠慈善事业来沽名钓誉，恐怕早就达到目的，卸膊推庄了！

——何苦要熬上整整半辈子？

对何贤来说，那的确是他人生的半辈子……

性情洒脱的何贤怎么看待自己这份功业呢？

“这个机构没人争，这个档口，几十年来无人跟我争呢！”他边对人说边摘下他的银边眼镜，摇着头。没有人争的原因，谁都清楚，那可是个年年岁岁要解囊进贡的慈善机关呀！

日久天长填无底洞，这样的事，自然争取的人少。

“澳门商会也是！”何贤擦擦鼻梁，带回眼镜忆“商会”——

“我是1943年在商会任义工，然后做理事，做副会长，做主席，一样是三十几年。我看全世界都没哪个商会主席，做得我这么长。”

此话不虚。

澳门商会与镜湖慈善会一样，是与何贤一生关系极其密切的社会团体之一。

何贤在他的后半辈生涯中，一直成为声名远播的港澳地区社会活动家——很大程度上，就是凭借着澳门商会这个大舞台，来上演他那一幕幕精彩夺目、令人惊叹的人生戏剧的……

澳门商会的全称为：澳门中华总商会。

1911年以前，澳门工商界并无自己的社团。每遇商界之间，或商界与各界之间有纠纷矛盾，需要协调时，就借助镜湖医院，并请澳门各界共同议决。

随着商业的发展，华商日益增多，这种议事方式愈来愈不方便。

于是1911年华商萧瀛洲，被推举为首届会长，以同善堂为临时会所。

澳门商会1930年募款在议事亭前购置会所。“议事亭前”是澳门的闹市中心，商会设在此地一直到80年代末迁新址为止。

澳门商会从成立之日起，便与内地建立了联系，以“旅澳华商总会”的名义，得到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

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

而内地政治经济风云变幻，都会在商会的一些会议上反映出来。

比如值得忆述的历史中，对蒋介石当选所谓“总统”的立场，就是商会的一场风波，一段话题。

这，该是1948年5月的一天……

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会会议已足足开了一个上午。



偌大的会议厅里烟雾弥漫，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已经塞满了烟头。

人们不耐烦地频频拿眼睛望着壁钟，大挂钟的指针已指着下午一时，争论仍未结束，会议还不能收场。

当时，蒋介石导演的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的闹剧正在南京上演，选举“总统”的一幕已经演过，当选人自然也就是这出闹剧的“导演”了。

就是在这当儿，澳门中华总商会召开了理事会。

会议的议题本来是商会本身的日常工作问题，可将近散会时，有两个名叫陈立民和邓成龙的理事突然站起来高声提议：“蒋委员长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统，这是件大事，我们澳门一方，应该开个庆祝大会，热烈对之表示祝贺！各位以为如何？”

出席会议的人谁都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料到有人还会提此“建议”，都不约而同地一时语塞瞠目，愣在了场上……

沉默，好一阵子，会场上都是沉默。其实沉默本身已基本表明了人们的态度——

“蒋总统”是何许人也？每个人心里都有数。

抗战胜利后，千疮百孔的焦土上，本来应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着力医治战争创伤，让人民过几天安稳日子。

可是老蒋他根本没有为国家为老百姓着想！

赶走日本鬼子尚不够一年，他就悍然发动内战，和共产党打起仗了。开始便气势汹汹，向解放区步步进逼，结果终于在1947年3月占领了共产党的陕北根据地延安。

然而“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并没有象老蒋估计得那样，失去了延安便会溃散以至归于“消灭”。完全相反，他们顽强奋战，不到半年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一年后便收回了延安。

而蒋介石的军队却全线败退，从1948年起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节节失败，促使其内部发生了更大的矛盾和分裂。国民党在南方各省的地方军事力量，为保存自己在统治地区的独立性，亦单独取得美国援助，离心越来越明显了。

其实人人也不难看出，正是在这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保住南中国半壁江山，才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总统选举的闹剧。

1948年的蒋介石，与1946年已大有不同。他的专政工具不仅用来对付共产党，还用来对付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因此，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已成为法西斯专制头子，俨然是人民公敌。

因而，人们对蒋介石的当选和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已不是亲共或反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选择民主还是独裁的问题。

现在，话题转回说澳门商会。

以何贤为代表的一群商会理事们，当时也还都不了解共产党。但是凭直觉观局势，他们深知道蒋介石政权不行，快瓦解了，显然不代表社会进步的一方。因此，他们的内心是反对开什么庆祝会的。

何贤当然明白大家的心思。

然而直截了当提出反对，那就会授人以柄。所以他拐了个弯儿，第一个打破沉默说：“开一个大规模的庆祝会，要花费许多时间筹备呢，草草从事又没大效果，要开就要花大力气！可现在商会工作这么多，忙不过来呀！”

“是呀是呀！我看免了免了，算了吧。”

许多理事纷纷附和何贤的意见，会场上一片赞同声。

那时何贤虽然还不是总商会的第一把手，但由于他办了许许多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成绩出色，所以威信与日俱增，他的意见，在商会中有很大影响力。

而眼下对蒋介石当选所谓总统之态度，澳门与内地无异，其实也是两派政治力量的较量、抗衡与斗争。

何贤的主张很快占了上风，左右了会场的情绪。

那两个亲国民党的商会理事陈立民、邓成龙，眼见开庆祝会的提议难以通过，便改变了策略。

陈立民低声与邓成龙商量了一会，陈立民举手要发言，会场安静下来。

陈立民缓和地倡议：“既然有的理事担心开庆祝会会影响本会其它工作，我看是不是这样，庆祝会不开，也要给蒋总统发一封贺电，这恐怕并不会劳我们伤神动脑，亦不会花费我们很多时间吧！我们虽然身处葡属之地，但我们仍是中国人呀！民国又有了自己的大总统，我们理当要表示一下祝贺之诚欣喜之情嘛！”

陈立民这一番煽动，立即又使许多原先持反对意见的理事，也觉得他言之有理，并不过份。尤其是陈立民针对何贤等理事就开庆祝会影响到本会工作这一理由，提出了改发贺电，因此还有什么理由再持反对意见呢？

一时间，谁都不再出声，会议出现再度沉默的局面。

何贤只好转向一直没有表态的会议主席、商会会长刘柏莹。

刘柏莹望了一眼何贤，又瞟了一眼陈立民，最后只得含糊其辞地说了句：“我看没什么问题。”说罢，就宣布散会。

理事会后的一天，何贤与柯麟一道去饮早茶。

说起理事会的争论，何贤愤愤不平地诉说着：“刘柏莹说穿了已成个木头公仔，商会实际上做什么都由陈立民、邓成龙他们控制。”

柯麟想了一下说：“你何不多找几个人加入到理事会？比如马万祺，这个人开明正直，介绍他入理事会，往后再争论什么问题，也好有人帮腔。”

马万祺思想进步。

早在柯麟来澳门没多久，潘汉年指示柯麟物色一些工商界人士作为团结对象，为党的工作积蓄外围力量，柯麟就选定了马万祺。潘汉年来澳门，柯麟还专门介绍他认识马万祺。

因此，柯麟一听何贤说在商会中力量单薄，马上就想到了马万祺。

马万祺又的确与何贤、柯麟关系密切。三人合资开了一间新中行，经营烟酒生意。

如此，两个老朋友都一致建议马万祺加入商会理事会，他自然不会推卸，一口答应下来。

马万祺应允后，何贤又马上去找刘柏莹。

何贤对刘柏莹说：“现在商会理事少，有很多社会活动，大家都顾不过来，总是有力不从心之感。另外，澳门这几年来经济发展起色较快，商会的会员增多了不少。所以扩大理事会，有利于保持它广泛的代表性。”

何贤一条一条地摆理由，刘柏莹却躺在酸枝椅上，闭着双目，似睡非睡，毫无反应。

何贤讲着讲着，发觉对方并没有认真听，只好截住话头，耐着性子问：“柏哥，你的意见如何？”

刘柏莹见问，睁开眼睛，茫然地问道：“你刚才说了什么？”

何贤只好不厌其烦地将上述的理由再重复一遍。

讲完，问刘柏莹是否同意。

刘柏莹只道了声：“我和陈立民他们商量商量再说吧。”

见刘的态度如此暧昧，何贤窝了一肚子火，连招呼都没打，转身就走。

转眼功夫，1949年商会理事会换届选举的时间又到了。

何贤欲增加理事的建议始终未能得到刘柏莹的认可，便只好放弃取得刘柏莹支持的努力，改为做商会会员的工作，试图在会员大会上以多数票通过自己的建议。

人人皆知，何贤一向仗义疏财，乐于助人，谁生意有困难，或在社会上与他人结怨，找到何贤，何贤都毫不推辞。替别人排忧解难无数的何贤，颇有长者风范。

因此，在澳门各界即便是长于何贤的，也尊称他一声“贤哥”。因为有这样的人缘基础，何贤在商会会员中得到很多人的拥护。

何贤找他们将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大家众口一辞，都表示支持。

商会会员的集会，在议事亭前的商会会址举行了。

当讨论到理事会选举议题时，何贤霍地站起来发言，提出了扩大理事会的建议，并申请大会讨论。

何贤话音刚落，主持会议的刘柏莹接着发言说：“这一届理事会各位同仁为搞好商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大家都是满意的。我看这样吧，这一届理事会就不改选了！”

说罢，刘柏莹迅速调头，转向何贤说：“阿贤，就当你再帮我一次。”

何贤猝不及防，竟不知如何作答。

明明是阻挠何贤的建议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可刘柏莹这一言辞，使人听着倒像是为了力挽何贤别溜，多留一任！刘柏莹毕竟是个老辣之人。

何贤三山五岳的人都结交了不少，但他从来是个性情坦荡的忠厚之人，他怎样都没想到刘柏莹会突然跟他来这一手“软钉子”把戏！

就在何贤犹豫不知如何应付时，刘柏莹，却已将自己的建议付诸表决通过了。

散会之后，何贤气鼓鼓地一把抓住身边一位曾经应允过支持他提案的理事质问：“你今天这态度怎么忽然变了！你这是怎么回事？”

那人叫李文。因头一次见忠厚和蔼的何贤竟发这么大的火，嗫嚅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阵，见何贤仍气怒难消，只得低头解释道：“阿贤，我是答应了你的，可刘会长昨天对我讲，他的意见和你其实是一样的嘛……”不等李文说完，何贤便气恼地打断他的嗫嚅，“刘会长说刘会长讲，你长着嘴巴，怎么不会自己讲自己说！”

事情已定，知道再说也是多余的废话。

回到家中，何贤气得不吃饭便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何贤便被电话铃声惊醒了。

拿起电话，传来柯麟亲切的声音：“贤哥，起来了么？早呵，出来吧，出来饮早茶。”

何贤说：“麟哥，我没心情饮茶，昨天憋了一肚子闷气！”

不等他说完，柯麟忙岔开话题说：“我知我知，你来饮茶吧，吴医生也来，饮完茶就有办法了。”

何贤来到国际大酒店时，柯麟、吴医生、马万祺等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待何贤落座，柯麟马上说：“叫什么吃吧！我听说你昨晚没有吃饭，有什么事都得填饱肚再说嘛。”说完，柯麟就不再与何贤搭话了，只一个劲儿地帮他拣着小吃。

何贤不知柯麟为何如此轻松，故干脆放弃再谈昨日的选举会了，只低头闷闷地吃着茶点。

柯麟这边，与吴医生、马万祺漫无边际地闲聊……

聊着聊着，柯麟对吴医生说：“商会好像有二位理事曾与你的诊所挂钩，听说他们都已去世？”

吴医生说：“是啊，众所周知的事了，一个死去一年了，一个过世也快半年了嘛。”

何贤听罢放下筷子，觉得好生奇怪。他心想，死去的二位理事也都算得澳门华人圈中的头面人物，他们过世的事柯麟自然知道了。为什么在这里又忽然询问起吴医生呢？

何贤没有作声。只听得柯麟又说：“刘柏莹的商会理事名单中还有这两位故人，也真够滑稽荒唐了，他这个理事会真可以说是阳间阴间的代表都混为一谈共商大事嘛！”

噢，听柯麟这么一挖苦，何贤顿时醒悟过来，马上明白了柯麟话语之用意。

不错，刘柏莹为了避免选举，保留了上届理事会，可百密一疏，忘了其中两人已作古。

在当时，商会理事名单要报澳督批准的。把死人也算上，可说是欺骗澳督的行为。

何贤眉开眼笑、愁云顿扫地说：“麟哥，你就是有办法！我们向澳督告他刘柏莹欺君之罪，那这个理事会肯定要重选。”

说完何贤又转向吴医生说：“到时就请吴医生做个见证人。”

与柯麟他们饮完茶以后，何贤马上去市政厅找罗保。

罗保本来对商会理事的构成并无成见，现在他明晓了这当中的内情。

与何贤私交甚好的罗保，自然一口答应帮何贤据理力争。

过了不久刘柏莹便接到澳督的命令。

命令中写道：据查，商会理事会选举中有营私舞弊之嫌。为维护本澳社团活动能公正开展，着令刘柏莹、何贤重新组织选举。并将选举结果提报本督审核。

……

刘柏莹接到命令后，顿时傻了眼。

陈立民、邓成龙等人听到消息后，马上赶来找刘柏莹。

陈立民对刘柏莹说：“会长，我们的选举明明是合法的！肯定是何贤串通了那个罗保，挟天子以令诸侯。澳督不明白真相，我们可去反告他何贤串通共产党嘛！”

刘柏莹此刻正心乱如麻，听了陈立民的话，更没好气地说：“别打不了狐狸反惹得一身臊。你说人家通共产党，有何证据在手呢？”

陈立民给刘柏莹一呛，噎得说不出话来。

说到底，这商会会长，完全是一个义务劳动性的工作，并无什么报酬。

但是当了会长，不但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且那会长的衔头也就好比

是一张银行的信用担保书，做起生意都会方便许多。所以无论如何，刘柏莹还是舍不得丢掉会长这把交椅的。

刘柏莹与陈立民最不同之处，是他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反正哪棵树大，他就靠在哪棵树下乘凉。

国民党虽在当时尚统治着中国，但在澳门这块特殊之地，却百分之百是澳督说了算。

这会儿明摆着呢，何贤有澳督和政府官员撑腰，何苦要为了陈立民和邓成龙等人而与何贤对着干？

想到这里，刘柏莹打发了陈立民和邓成龙，起身找何贤去了。

何贤早就预料刘柏莹会改变立场。

想想要是换个人，你当初不仅对我怠慢无礼还使诡计作弄我，我如今自然要与你玩两招，耍弄耍弄你吧！

但何贤压根儿没有这样想。毕竟他久经江湖，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加上他天性中的豁达宽厚，今见刘柏莹亲访上门，更是什么怨气都烟消云散了。

不等刘柏莹开口，何贤便说：“柏哥，实在报歉，我并不是存心拆你的台，也不是存心与你顶。我都知那边有陈立民、邓成龙他们，你夹在中间不好做人。实际上我并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希望补选两个新人，以加强商会活动。我不是霸道的呀。”

刘柏莹见何贤如此谦逊，也说了一通自己的不是，怨气随之也消了。

而后，会员大会选举，何贤被选为副会长，马万祺也被选为理事。

日后何贤再被选为理事长和会长。

从此，澳门中华总商会，便日渐成为何贤在澳门社会的主要舞台。

## 第十六章 关闸事件 和平谈判息纷争

1952年7月15日，一场由内地与澳门边境士兵之间因误会引发的冲突中，挑起了澳门历史上有名的“关闸事件”。

那时中葡两国尚未建交。因此澳门政府委派何贤、马万祺为澳方信使，与中方谈判。何贤二人不辞辛苦，来回跋涉，终于在一个月后，澳督低下高贵的头致歉，“关闸事件”得到和平解决。

本书前面第十二章中谈到，何贤平生历经了五大风险，在五次大的历史事件中，为澳门平息事端起了很大作用。

而现在我们主要追述那“第三次”风险：

那是1952年发生在粤澳边界间的枪战纠纷，后来人们将这次纠纷命名为“关闸事件”。

我们也在前面不止一次地提到“关闸”，但没有详述。

先来说清楚“关闸”是怎么回事。

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就是有名的关闸。

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即1574年。

那时的关闸，高和宽均有一丈余，象我国内地许多古迹城楼一样，楼前悬一匾额，上书“孚感镇德”四个字样。

城楼正中处开一大门，上有“关闸门”碑石一方。关闸两边，分别建有兵营，也立有围杆。

这座古关闸，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所以，那时的关闸每月只开放六次，为的仅是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却用6张封条封闭着。

直到1849年，关闸始终是中国四大海关之一。

1849年3月13日，葡萄牙人头目亚马勤逐走了管理海关的中国官员，并砍倒围杆，毁了关闸。这次事件，使中国在近代史上又蒙受了一次屈辱。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吧。

过了一百年后，仍旧在关闸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葡中双方暴力冲突的事件，只不过结局大相径庭。

毕竟，历史不是简单的轮回重复啊。

这百年后的关闸事件，已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充分体现出挺起腰杆的中国人在外事纷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泱泱大国风范，与百年前在此烙烫下的屈辱痕迹，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感慨万千。

何贤事后对人回忆说，那对的澳门关闸，双方都设有哨兵；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华界，大家都各有四五个哨兵。

在澳门西洋兵里，有个黑人兵，而咱们解放军这边，也有个年轻的小战士。

1952年7月15日，这只不过是澳门边防线上很平常的一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名战士在关闸放哨，见到对方的葡兵有一个竟是黑人。

那时的边防战士哪里象现在的拱北海关人员那么见多识广呢！战士们很少见外国人，而对黑人大兵更是好奇，所以一个战士禁不住用手指点比划了

一番，又对黑人士兵露出笑意。

倒霉的就是这一笑。对方误会了，以为我们的战士有意取笑，不由分说便端枪发起怒来。

黑人士兵怒骂连连，我方士兵也黑起脸，双方语言不通，却都能从对方的脸上读出愤怒和不友好。

“砰砰砰”！突然间不由分说，葡兵们一梭子弹飞了过来，来势迅猛。

我兵立刻做出反应，向他们投去个手榴弹，以示警告。

不料，对方火气升级了，又接连发出十多枚炮弹。一时间炮声隆隆，炮弹落在我方前线的民房上，几间民房眨眼间毁掉了。

炮火很快就结束了，空气顿时凝固住一般，紧张的边防局势，震撼着澳门人的心……

关闸立刻关闭起来，双方的人员都不得进出。

可闭了关，澳门即刻变成死城，那粮食、水和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问题。

一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啦。

澳督觉到事情的严重了，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马上给南光公司打电话。

谁知对方回复说，他们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

澳督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深夜，罗保找到了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方法。

马万祺便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

就在澳门方面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接头时，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的会议室里，华南分局也在紧张地开会商讨对策。

会上大家情绪都很激动，有人主张，干脆调一个师的部队去，造成大兵压境的形势，向澳门政府示威；也有的主张索性封锁边境，不运粮食、副食品过去，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

主持会议的人，是当时任华南分局书记的叶剑英。

叶剑英一直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

与会者议论了好一会儿，忽然才发觉书记始终不表态，于是便不约而同停了下来，把目光都集中在叶剑英身上。

叶剑英从容不迫地问道：“还有谁要发言吗？”他的目光在与会者脸上扫了一遍，见没有人表态，才慢慢地说道：“新中国成立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心，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一次是澳葡方面先开枪挑衅，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惩治措施，也在我们的情理之中。”

叶剑英顿了顿，微微一笑又接着说下去：“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葡萄牙是一个已经衰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与那些至今仍到处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毕竟有区别。

毛主席说过，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而且，澳门的居民说到底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受害的还不就是我们

的同胞么！总之，我们对关闸事件的处理，应当把握从宽的原则。”他把话题打住，拿眼睛望了一下大家，还好，紧张的气氛已经明显缓和下来。

叶剑英端起茶呷了一口，继续说道：“我看，这事件只是个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

讲到此处，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与会者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这次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但是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叫他们委托两位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好了。”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谈判。

我方提出三条谈判的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损失。

会后，统战部长饶彰风即刻将这些决定通知黄施民、曹若茗。

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就搭乘花尾渡到了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又由石岐坐吉普车奔赴拱北关闸，就住在海关大楼上。

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却比他们早一天已赶回澳门。此时知道黄施民和曹若茗已到，便再次驱车来到拱北。

三人经协商后，由柯正平通知澳督府罗保派人来谈判。

罗保接此讯后，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除了马万祺，就是何贤了。

何贤接到罗保的电话时，正准备上床入睡。

关闸发生的事件，昨天他已知道全部经过，也听马万祺说过被罗保请去咨询的事，所以，他现在只须听听政府一方，到底持何种态度，以便把握谈判的准则。

罗保在电话中谈了澳督的意见：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何贤一听，忍不住叫起来：“喂，大佬，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还叫我们怎么谈？”

罗保也知此事难以这样搪塞过去，只好对何贤说：“贤哥，我也不能作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哪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的了，不是吗？”

何贤耳根子软，禁不住罗保三说两说，不好意思再计较，便只好答应去试试。

临了又加上一句：“我何贤面子再大，也要看帮得是否有理。没有道理，就没了面子，丑人我真不想做！”

第二天一早，何贤会同马万祺一道，到了拱北关闸。

在海关谈判没费多少功夫，不用猜，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会谈还没有深入进行，何贤二人便像个“皮球”，给人家“踢”回来了。

当天下午，何贤和马万祺，只得又往回赶。

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八点多钟。

何贤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挂电话转述了中方的态度和要求。何贤直率地告知罗保：“你我是老朋友，无谓说客气话兜来转去嘅。我多跑几次腿没问题，但政府仍是这种态度，跑一百次也没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



连美国人都不买帐，何况你们葡国人？”

罗保在那边电话里对何贤言语的冒犯并不生气。

罗保只道：“贤哥，你先休息一下，我去向总督转述中方的意见，回来再给你打电话，明天说不定还得劳你们再跑一趟。”说罢，罗保挂上了电话。

何贤这边刚把饭碗撂下，那边罗保的电话又响起来了。

可惜罗保依旧没有送来好消息。

澳督史伯泰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两条都不答应。

罗保在那边也猜出何贤为难的神态，再求助的好话还未讲出口，何贤就说：“我是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的份上，才答应再去的。你也不用多提我们，倒是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才好解决。”

在拱北，黄施民等人也在与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

会上气氛仍不轻松，对立情绪也没有化解。尽管如此黄施民仍然对大家说：“何贤、马万祺两位先生，是爱国人士，他们实际上只是充当信使的角色。无论怎样结局，他们都为关闸事件的妥善解决出了很大力。因此，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要热情对待他们。”

接着，中方人员又商量了明天谈判的对策，确定了耐心谈判与坚持原则两条方针。

次日何贤与马万祺转述澳督的意见，事态当然不可能出现突破性进展。

何贤再说尽宽厚解人的话，也越来越心疲和沮丧。

黄施民为了安慰、鼓励他们，诚恳地对何贤和马万祺说道：“何先生，马先生，你们两位辛辛苦苦跑来跑去，我们十分感谢。你们是在为澳门居民出力，也是为祖国出力，以后希望一直能这样成为我们和澳门的桥梁……现在还请你们转告澳门方面，如果他们真有诚意继续谈下去，就要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靠拖是不行的。”

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迅速打电话给罗保，要求亲自见见澳督。

罗保联系后回电话说，澳督同意接见他们。

在澳督府，何贤转述了中方的意见，而后便自己发挥“说客”的作用说道：“其实，中方已作了相当的让步。他们若要困住澳门，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的事。真的搞僵走到这一步田地，人家再提出什么要求你们都只得乖乖答应，那时更无面子，不是吗？在江湖上有了纠纷，往往也是一人让一步，何况是国家间出了这样的乱子，您得持坦诚态度。只有您的态度缓和了，我看，这才能解决目前的困难。”

澳督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

最后他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

何贤、马万祺只好起身告辞。

第二天早上，罗保打来电话，说澳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

何贤、马万祺比任何一次都轻松释然地又起程前往拱北关闸。

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一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大陆做传达，不多不少都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唯有两头讲好啦！”

何贤还记得，当时关闸那条路面上，因事件紧张，解放军都把路掘烂了

以便布防。

因此何贤二人每日里要来回回在这样的烂泥路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关闸前去交涉。

“可好周总理在广州，他以格外宽容的态度，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周总理没得顶（说）！”何贤追忆当时的情景，对周恩来总理肃然起敬，并真心实意地说：“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主要负责长官，以国家为重，全不为意气，不论大小事，绝无私心的，仅此一人！”

……

这一天，谈判终于成功了。

澳门当局正式向中方递交道歉书。

中方在边界处设置了一张木制的小方桌，中方边防部队负责人站在桌旁我方一侧。

到预定时间，澳门当局代表罗保，和他的翻译彭彼得向这边走来。

罗保站在小方桌前，双手递过道歉书。

中方边防部队负责人接过道歉书后说：“澳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主张在适当的时候，由中葡两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中方希望澳门稳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因此，我们不愿意看到类似冲突事件再次发生。澳督先生能审时度势，承认错误，对这次关闸事件表示道歉，我们对此也表示欢迎。”

说完，边防部队负责人主动伸手与罗保握手。

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和平地得到解决。

谈判的终见成效，使何贤感到非常欣慰。虽说他和马万祺辛辛苦苦跑了许多天，费了无数口舌，心口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来回扑腾个不休，但毕竟为澳门做了件好事，平息了纷争，避免了灾难，使澳门居民们能够安居乐业不受连累。

关闸事件的解决，对何贤的一生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此之前，何贤在澳门民间有崇高的威望，而关闸事件之后，他在官方也有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澳双方都把何贤看作是最合适的中间人。

正因为如此，何贤与澳门政府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起来。

此后的 1956 年，澳门缺水，澳门当局便派何贤到中山协商，想在中山县前山镇引竹园水库的水供应居民，这一举又成功了。

再如 1958 年澳门与中山县合建银坑水库，也是由何贤出面玉成此事，使澳门的用水问题，从那时起得到彻底解决。

由此可见，何贤对澳门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 第十七章 突破封锁运存“围禁”解国难

50年代初叶，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严密封锁，企图将新生之中国，扼杀在襁褓之中。

尤其是美国，在其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对我国实施物资封锁，对各种战争物资的封锁亦更加苛严……

“两航起义”后，一批物资在偷运回内地的途中遭遇风险，是何贤鼎力相帮，才使一船珍贵的器材安然回穗。

回首当年，从建国初期起，何贤便为祖国为人民确实实地，办了许多件有口皆碑的好事。

他从未充当过一哄而上、人云亦云的时髦角色，然而，他却像一束星光，一炉炭火，在一段段特殊的历史岁月中，发挥、释放着自己爱国爱民的朴素良知与智慧能量。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了广州。

消息传到澳门后，以何贤为首的澳门中华总商会及各界进步人士，就在11月20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在1950年10月1日，澳门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何贤向三千澳门民众发表演说。

大会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表示致敬与祝贺；并表示衷心地拥护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

那时中国并未与葡国建立外交关系，可一周年国庆日里，却见到全澳门五星红旗猎猎飘动，恐怕那也是葡国统治澳门近四百年中少有的“中国风景”吧！

新中国成立不久，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严密的封锁，企图将新生之中国扼杀在襁褓之中。

尤其是美国，在其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对我国实施物资封锁，对各种战争物资的封锁也就更加苛严了。

但是，在港澳同胞和海外爱国华侨的支持下，各种禁运物资还是通过各种途径运进大陆。

而这一困难时期，何贤更是千方百计，为祖国运进了不少急需的物资，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封锁政策。

在此之前，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员工在香港起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何贤也曾鼎力相助过。

那是1949年8、9月间，两航起义正在秘密进行，设在澳门的中航“通讯课”员工积极准备行动。

原来该课，因受港英法令所限，无法进入香港，于是便从上海辗转迁至广东汕头、台南，后来又迁往澳门。

“通讯课”在澳门的员工共有六十多人，起义之事已然筹备就绪，只是通讯设备器材，需要中共地下党组织协助运出澳门。

时间紧迫，中共有关部门于是派地下党员柯麟通过何贤，把设备器材转到何贤的仓库寄存再等候运回祖国大陆。

可是接着情势更加危急。

在1950年1月，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妄图冻结中航公司在澳门的

财产。

形势急不可待，我中央政府再派任泊生专程赴澳门，通过柯麟找到何贤，请他协助将放在仓库的全部器材，总计 2477 箱，用四艘木船及时抢运回广州，避免了重大损失。

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那些设备器材是能解燃眉之急的宝物啊。

50 年代初，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

辽阔的珠江口外水面，夜幕低垂。

在朦胧的月影中，一艘木制的小机动货船，正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向珠江内的伶仃洋水域驶去……

船舱里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船老大，约摸五十来岁；一个商人模样的，也是中年人了。

他们两个都心弦紧绷，神色紧张地瞪着眼睛环视四周，注目着随时可能出现的“麻烦”。

商人男子不时地低声催促船老大：“你就不能够再开快点？”

船老大小心地驾驶着货船，缄默不答话。

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他们两人都清楚，这艘机动货船早已开到它的极限速度，只不过因为这船货装的是“违禁”物品，所以两人心里都十分焦灼，恨不能快点，再快点！人急不死，那船货却随时可能有“生命”之危呀！

是走私水货？还是毒品买卖呀？

错！这艘木船上装的，就是“两航起义”后留在香港的那部分物资。

怪不得船上的人如此紧张地捏着手心之汗。

“老大，灯光！”

商人模样那男人惊慌地叫起来。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船老大也看到远处有一条光柱在夜色中划来晃去……

“不好，遇到鬼了！水警巡逻艇！”船老大咬咬牙说。

水警巡逻艇马力大、速度快，一旦给它看见了追踪起来，可以说除了潜水鱼雷，水面上的船只，没有逃脱得掉的。

“看样子，没法，只好改变方向，先去澳门再说！”船老大的经验颇丰，且还沉稳不慌。

商人男子却在犹豫着：“到了澳门还是要想办法运出，那不多一层危险，多一层麻烦？”

但就在他们说话之间，水警船又逼近了。

这会儿，船老大根本不等对方表态了，他索性自行把船舵一摆，改变航向，朝着澳门方向驶去……

很快，水警船发现了木船，探照灯强烈的光柱刺得船舱里两个人的眼睛都有些睁不开。

不过他们暗自庆幸的是，幸好货船改变了航向。

因为这会儿他们马上就要驶入澳门附近的中方水域，而港英水警船则是不敢擅入的。后面穷追不舍的港英水警船大概也醒悟过来了，故马上通过船上的扩音器，命令木船停住接受检查。

船老大一边拼命加大马力一边说：“傻佬才会停船受检呀！有本事你追过来。”

木船驶入了中方水域。

不远处，也有了探照灯光和发动机的马达声，中方的一艘巡逻艇也向这边直开过来。

追赶着木船的港英水警船，见状停在原地不动了。

船老大一转舵，又变了一下航向，似驶向公海又似驶向澳门。

可惜，不知何故，中方巡逻艇却并不理会这艘木船，而是朝那水警船开去。

双方巡逻艇，隔着一段距离在对峙着。

水警船上的指挥官，立即将情况报告总部。

而此时，香港当局已得到更加确切的情报，即那木船上装的是“两航起义”留在香港的器材。

于是香港方面马上派人与澳门警方联系。

同时，国民党驻澳门的特务机关也得到了风声，即刻派出特工人员寻找这艘装有仪器的木船。

再说回这木船。

见港英水警船没再追过来，船老大赶紧抓住时机，绕着澳门转悠了一圈，然后在新码头附近停泊。

这里相类似的木船很多。要是有人来寻查，也得大费一番精力来辨认。

船刚抵岸，商人男子便立即跳上一只小艇，朝岸边划去。

上岸后，他发现岸上有许多渔民打扮的人在岸边走动。

但从这些人紧张地搜寻什么东西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他们显然不是水上居住的渔民。

商人模样的男子见此状更加不敢耽搁，他匆匆忙忙找到一家饭店，在那里给南光公司的柯正平挂电话。

当时澳门的电话也还落后呢，要人工交换。

挂了半晌，好不容易才要通了南光公司，可值班员却说柯正平到广州去了，不在公司。

放下电话，商人男子已急出了满头大汗。

情况危急万分！不知是国民党特务，还是港英当局的特务，或许两者都有呢！那么多“渔民”在码头上搜索，还是很快就会找到装有器材的船的！

情急之中，这商人突然想到工委负责人对他说过，一旦有紧急情况在澳门需要求助，可以找何贤。

商人赶快从衣袋中翻出了何府的电话号码，给何贤挂电话。

通了，接电话的正是何贤。

“何先生，我从香港来，是柯先生的朋友，有紧急的事情请何先生帮忙。”

何贤一听是柯正平的朋友，马上热情地问：“什么事这么急？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尽力帮忙。”

对方却道：“电话里讲不便！不知何先生能否到新码头来一趟？我在新码头附近的顺发餐馆等你。”

何贤十分爽快，毫不推卸：“行。你贵姓？”

“我姓张。”

何贤挂上电话，立即起身赴约。

顺发餐馆里，张生的第二支烟还未吸完，何贤的汽车就到了。

从那身着唐装，剪平头，一副宽厚豪爽的样子，张生便可断定车上下来的人是何贤了。

何贤见一个陌生男子迎上，主动招呼说：“是张生吗？你好！我就是何贤。”

张生把何贤拉到一边坐下，低声说：“我有一船两航起义的器材，要运回大陆，在珠江口被香港水警追到这里。刚才打电话到南光公司找柯正平，却说他去了广州开会。因为情况十万火急，现在不但港英方面，台湾方面的人也在找这船器材，所以才这么冒昧深夜打搅何先生！”

何贤立刻摆手：“不用客套，我马上给你去想办法。”

说罢，何贤拉起姓张的商人上了自己的汽车。

回到家中，何贤招呼张生稍坐片刻，自己便马上给某轮船公司的负责人黄德挂电话。

“阿德，有一船货要马上运返大陆，你快快安排一艘船。”

黄德听了，在电话中为难地：“贤哥，我们的货船都开了出去，码头上一艘也没有啊！”

何贤想了想说：“今晚不是有一班去江门的客船吗？把票退了，编个理由说船不能开，用客船载货。”

黄德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便忧心忡忡地说：“什么？这样做不但得罪了乘客，也影响公司声誉噢！”

何贤执意说：“这批货太重要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补些钱给乘客，安排他们乘搭明天的船吧！还有，你的客船不能直接开去装货，以免引起人家注意。找些小艇，把货分批运上客船。我即刻和货主来找你，你在那边等着！”

午夜时分，隐匿在码头木船上的那些器材，全部转移到了客船上，驶离了澳门。

这回，在附近水域监视的香港水警见是客船，并没太注意，就放行过去了。

客船驶入东莞附近水域，船上的人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突然，前方出现一条探照灯柱，一艘中方的海关巡逻艇向客船驶来。

巡逻艇发出的信号是要停船检查。

张生想，运的是大陆需要的货，检查就检查！

巡逻艇靠过来后，跳上来几名海关官员。

张生赶忙上去向他们解释，说这艘船运的是两航起义的器材，因在珠江口附近水域被港英水警追查，才被迫躲到澳门换了这艘客船装载。

由于事先没有听到什么通知，所以海关官员仍对此将信将疑，不能放心。但听说船运的是两航起义物资，他们礼貌地说：“对不起，请跟我们回广州海关，我们会打电话与有关部门联系。”

听他们如此一说，张生不禁苦笑：“这不等于将我们扣了起来，还是不信呢！”

不过到了安全地带，他怎样都没有那么担惊受怕了。反正客船的货都是运往广州，就跟着一路“回家”吧。

客船被缉查艇“押解”到广州西堤海关时，已到了凌晨四点钟。

海关官员将张生和黄德等人引到一个会客室里，让他们先在那里休息。

等候到早晨六点半左右，终于走进来几位官员。

而其中一位被介绍是副关长。他热情地握着张生和黄德的手说：“我们已与港澳工委取得了联系，十分感谢你们冒了风险将器材运回大陆。辛苦了

一夜，现在请随我去爱群大厦，请两位先生先去吃点东西吧！”

事情终于有了如愿的结果。

而那个幕后的英雄何贤呢？恐怕也在隔岸提心吊胆，一夜未能安眠吧？

何贤的“爱国”，不仅仅在口头上拥护新中国，而是在一次次的行动中，默默无怨地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人做了大量的好事。

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对我国又禁运紧俏物资的最艰难的建国初期，祖国大陆很需要汽油、棉纱、橡胶等军用货物，而又是何贤，一次次联络霍英东，通过各条渠道争购到这类物资，再想法从澳门源源不断地运入内地，帮忙解决祖国的困难……

劳苦功高的何贤，在 1954 年 12 月，光荣地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期间，他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与何贤交情很深的国家领导人有叶剑英、廖承志等。

而他最佩服的中共领导人是总理周恩来。

他不仅评说周恩来“绝无私心，仅此一人”，而且更进一步地感叹道：“他也不是一朝一夕这个样。我由 50 年代同他见面，一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他都是这个样。每次我返内地，到北京去，他知晓我到，必找我倾心谈吐，他永远都是这个样，平易近人。”

## 第十八章 仗义疏才扶危济贫乐善举

五六十年代贫民百姓失业频频、举步维艰，何贤捐钱给同善堂，为的是给饥饿民众源源不断地施粥放粮。

贫穷遇天灾，青洲棚户区三次大小火灾，数回迁居动荡，都靠“贤哥”出面，慷慨解囊……

——因为何贤心中一本明账：“要将七成盈利用诸社会”。

中国有句古话曰：“苟富贵，勿相忘”。

然而，有许多当年的知己伙伴，都深深体会到的反而是：“大家在一起能患难，却不能共富贵。”

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时，尽管中国人都加强了竞争意识，拼搏意识，却不懂得生意场或人生路上更需要建树的乃“共营”精神，宽容互助态度。

传统意识中最恶劣的小人是嫌贫爱富、恃强凌弱之辈，是那些“见富贵而生谄容，遇贫穷而作骄态”的嘴脸。

渺渺茫茫人世間，人心都在冷漠麻木和日益匆忙中历经了沧桑，那么，又有几个豪门贵族或富甲一方的商贾，能为劳苦大众着想，急他们所急呢？

就是出身低微贫寒之士一旦横财到手，也常常会摇身一变而为阔人脸色，更何况富贵之家呢？

可是，何贤大可算作例外之人，他的义行善举常令人惊讶，有时大方到他的家人也深感意外……

也许是父亲何澄溪的家训，深深烙上了他幼小的心灵；也许是天赋的同情心和善良感，令他愿意为别人忙碌操劳，连父母起名字都给他叫“相贤”（后来才省去相字）。

或许也因他年少时当过学徒、伙计，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艰难生活，所以他一辈子都同情这些人，从不鄙视他们。

他永远忘不了当年父亲要他背诵的朱子格言：“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常加温恤。”

于是何贤在事业有成后，便身体力行，扶危济贫，为穷苦人们排难解忧。此非一日高兴，偶然为之，而是长期如此，一辈子不失赤子之心。

“凡事都得将心比心。站在人家的位置替人家想想，自己过得，人家也过得。”

就是凭着这样做人的准则，他无法旁观穷苦人之遭遇，而总是及时对他们伸出援助这手，急人之急，救人之危，济人之困。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澳门没有受到日寇铁蹄的直接践踏，所以一度成了逃难者们的避风港，也曾出现过短短数年泡沫般的繁荣鼎盛。

而自从日本鬼子投降后，富商们也纷纷撤退，资金从澳门不断外流，本地经济日渐萎缩了。萧条不景气的行业纷纷倒闭，裁员的裁员，失业的失业，丢了饭碗的平民愈来愈多。

到50年代初期，许多失业工人和贫民百姓揭不开锅，饥饿每天都威胁着穷人的性命。

历史，最容易使人误解的，就是澳门在战乱时是孤岛天堂，战后却落得个萧条不景气局面。



如果这样推断，岂不是以为日本鬼子营造了澳门当年的繁荣景象么？

其实，“天堂”永远是富人的天堂，对老百姓而言，每一段灾难时期，他们都是受难者。

澳门百姓忘不了战乱时的饥饿，如同他们自己形容的：“试想象一下每天两餐都用腐乳来充饥便可理解什么是饥饿了！当时的米粮实际上是优先发放给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老百姓是领不到白米的。直至今时，我们一嗅到腐乳的气味便会马上反胃！”

而葡人文神父（文德泉老人）也曾这样描述战时澳门“天堂”中的人间惨剧：“日军士兵来澳门享受生活，在国际酒店吃喝玩乐，左拥右抱年青女子，大醉如泥的日军在路边呕吐，而有饥饿的中国人立刻拾起呕吐物放进嘴里。”

这不正是最典型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么！那年头的澳门祸不单行，在饥荒的同时又遇上瘟疫。因居民饥不择食，数以千计的人便死于瘟疫，那期间霍乱蔓延，平均每周要夺去七十多条生命……

战时饥饿的感觉，令澳门贫民记忆犹新，而接下来这 50 年代因本地经济萧条带来的饥荒，却是需要穷人富人一同携手相助熬过去的。因为无论怎样，这块土地急待重整，经济需要一段时期方能复苏，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自己的困难，总要自己的人一起出力解决。

不错，何贤在富商中带头关心民众，并千方百计救助他们。

当时何贤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的理事长，又是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这都是办慈善事业的基础啊！

尤其不能小看镜湖医院的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年还曾在这里义务做过医生呢！

现在我们还要谈到一处慈善地，也跟何贤结下不解之缘……

澳门庇山耶街，有一间具九十多年历史的同善堂。

何贤虽然没有担任该堂的具体职务，但这里历年举办善事他都积极参与，事实上同善堂一直得到着何贤的鼎力支持。

何贤为了穷苦人带头解囊，领衔募捐，因而同善堂的全体同仁从未把何贤看作“外人”，后来索性就将他视为本社会团体的领袖。

从 1950 年起，同善堂开展的赠医、赠药、施粥、施衣等赈济活动中，都得到何贤捐助。而其中一次为贫民施粥的活动中，何贤一次就送来 2.3 万元，当时受惠的贫民多达数千人。

到 1953 年 6 月，持续两年施粥后，善款经费已告罄，同善堂的人去拜谒何贤。

何贤听后二话没说，叫他们再施粥两个月，经费全部由他负责，而后，又捐了 6 千元给同善堂继续施粥。

1956 年 9 月 24 日，何贤给澳门穷苦人派发米券，一天就发了四十多万斤米。

为了解决贫民的饥饿问题，这期间何贤常常将别人送给他的礼金和宴会款转给同善堂，作为救济基金备用。

1952 年 9 月 3 日，澳门各界人士准备宴请何贤和马万祺，以慰劳他们为社会公益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何贤得悉后，立即高兴地同马万祺商量：“办这样一次宴会，耗费不少，出席的人又不在乎吃一餐，倒不如将这笔钱拿去救济贫民。”

马万祺一听，觉得此主张实用得多，于是连连赞同说：“好主意！好主意！”

两人立刻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澳门各界人士，建议将宴款移送同善堂施粥给贫民。

到了宴会之日，“庆桌”上却只有一杯清茶。面对人们的抱憾，何贤和马万祺却感到这“清茶之招待”，令他们两人都无限欣慰……

到了这年冬天，何贤的新居落成了。

于是致函各位亲友，前来小聚庆贺。

最终，他从简办席，却将欢宴亲友的部分筵席金、贺金以及个人再捐款凑整5万元，赠予同善堂。

在何贤就任华人代表，和其父亲澄溪老人逝世三周的纪念日时，他又致函各界好朋友们：“凡欲送礼者，请致送镜湖慈善礼券。”

闹了半天，他是借花献佛，难怪“大言不惭”呢！

结果令何贤甚感欣慰：镜湖医院慈善会收到港币22.4万元！

何贤，好大的面子。

“镜湖”按照何贤的意见，拿这笔礼金扩建了急诊室、医生宿舍、药仓、制药室、饭堂等，还余下9万多元作慈善经费。

如此一来，他们既改善了镜湖医院的硬件设备，又改变了慈善会经济上长期出现赤字的状况。

从澳门日报的一个小栏目“澳门说图”中，我查索到记载当年澄溪公“举殡行列”的一帧旧照，才知晓何贤是为纪念其父逝“三周”而非“三周年”，且确实为了镜湖收纳“善款”。

报载何澄溪于1954年10月14日去世；而11月3日，在何澄溪“三虞”之辰（即是三星期），在何氏家族竹仔室私邸举行家奠，致祭者络绎不绝。

报载又言，11月7日，澳门各界团体在镜湖医院礼堂，举行澳门各界公祭大会。而香港各界公祭大会，亦于11月14日在嘉路连山孔圣堂举行。

由此可知，香港是何贤兄长何添先生主持的“月奠祭”，何贤这边，在澳门是“三虞奠祭”。

何贤就把公奠设在镜湖，难怪他让送礼者都致送镜湖慈善礼券呢！

从中我们足可见何贤用心的良苦。

那张旧图的文字最后告诉人们：“11月25日未旬陞座派米济贫，发出米票三万多张，共十二万八千斤。”

显而易见，这就是那镜湖“余下9万多元”慈善经费的用场了。

一句话，确是何贤借父亲“三虞之奠”，为贫苦百姓们“挣得”的一大笔款——人们仰慕何氏父子而捐出的“善款”。……

澳门有许多高楼大厦，气派豪华壮观，可惜那都是富商阔佬们住的。

大多数贫民百姓，住的却是低矮狭窄的木屋或铁皮屋，我们内地人称这类住宅群落叫“棚户区”。

“棚户区”内的街道坎坷坑洼，街灯不明，屋里没有自来水，公用的水喉也不多，说白了就是贫民窟。

然而，就是这些贫民窟，有时也保不住。

1950年夏天，澳葡政府工务局认为青洲的木屋七糟八烂，影响市容，下令拆迁，让人们一律搬到指定的地方重建家园。

可他们竟忘了，这里住的多是贫民，哪里有能力重新盖房子呢！

再说，政府划定兴建的地区，每间房子的面积也只能是6平方米或4平方米，特别是房屋左右距离仅0.6米，屋脊间相距也才可隔开0.6米，万一失火，极易蔓延，简直无法扑救啊。

因此，居民们纷纷致函总商会，要求总商会为他们申诉，请求政府准许缓拆。

作为理事长的何贤听到民众的呼声后，深表同情，觉得应当替他们奔走呼吁。

随即，何贤便偕同商会理事陈直生、叶子如、还有陈毅生，到了工务局找局长毕士达。

毕士达见来者是何贤，不能马虎敷衍，只得亲自带领官员会同何贤一行，到青洲实地了解。

他们一到青洲木屋区，居民们就派出代表来向“贵人们”陈述迁建的困难，和新规划区街道太狭窄，房屋之间距离太密，以及自来水龙头不够，保留水厕仍为必需等等。

毕士达与何贤们又访问了几户木屋贫民，见到他们的屋中大都四壁萧然，穷困不堪……

何贤见毕士达愕然，于是说：“你总算眼见为实吧？似这番模样，他们填肚子都困难，哪里有钱建新屋呢？”

毕士达也很同情地点头，于是他当场答应木屋居民的请求，将拆迁办法改为：

一、对于旧有木屋居民，如果有能力搬迁者可搬迁；如无能力搬迁，则准予暂居。

二、关于木屋划分之街道过狭及左右前后距离太近，则调整为街道宽丈余、房屋左右距离四尺多。

三、新区原有之水厕准许暂时保留不填，以备居民贮水之用。

何贤见新建区没有淡水供应，还指示自来水公司给新街装两条水管，以解决居民食水问题。

青洲百姓们都流着泪，感谢商会和工务局能体恤民艰，对于何贤为他们奔走请命，更加感激得叩首涕零……

贫穷最怕遇天灾。

穷苦人家平日里糊口度日都不易，一旦遇到灾害，其生活就更加凄惨，苦不堪言。

“哪壶不开提哪壶”。

青洲穷，就怕说青洲。

偏偏就是青洲，1950年夏天刚愁完迁居的事，没过几天安宁日，12月中旬，就发生了第一场火灾。

又是何贤，带头捐款3000港币赈灾；其后又担任救灾委员会主任委员，带领三大侨团代表，去谒见市行政局长兼公共慈善救济总会主席施乐德，共同商定救灾办法，帮助青洲灾民度过劫难……

而到了1955年1月10日，正是冬天。

本就拥挤不堪的青洲区不幸再失大火。这可真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时值隆冬，天高物燥，北风呼啸，别不信，澳门的冬天，冷起来也能冻死穷人的。

火凭风势，风助火威。

何况，那青洲之地向来缺水。

风灭小火，风助大火——熊熊烈焰一下子就蔓延开来，万条火舌似欲将一座座木屋连根吞噬……

等到人们将大火扑灭，就更傻眼了：

四百多间木屋已烧成灰烬。

有如噩梦般，一觉醒来，一场火过去，连何贤为他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青洲平民小学，也都不成样子了……

那时快到年关了。二千多贫民一下子雪上加霜，变成无家可归的难民，饥寒交迫，其苦况可想而知。

何贤流泪了。事发当天他就率领总商会、工联、同善堂和镜湖慈善会四大社团的人们赶到青洲现场了解民情，并且发放救济款，尽全力帮助解决难民们充饥、御寒和临时住宿等急需解决的困难。

第二天，澳门社会各界成立“澳门各界救济青洲火灾灾民筹募委员会”。谁来领导这筹委会呢？

“贤哥！”

大家毫不犹豫，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出这个令他们倍觉力量的名字。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人们如此心齐地喊“贤哥”，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几十年中，澳门碰到什么灾难，几乎次次，都是他挺身而出，要么做“挡箭牌”，要么“堵枪眼”，要么当“粘合剂”，要么充“润滑油”……

“贤哥”无帮无派，他任的职尽是民间社会活动团体之慈善性义职，论钱财他也越来越不能算“富豪”了——因为，再有钱的富豪，也知道人生有限，不掉进钱眼里挖空心思赚钱，哪辈子发得天文数字之大财？况且，即便成了富豪，更知道所谓的慈善业是个“无底洞”，所以有分有寸，做到适可而止。

有谁能像何贤这样，做“一辈子”大好人，做“一辈子”大好事呢？

再早些在1954年10月初，氹仔光远爆竹厂爆炸，死伤有四十多人，也是何贤和崔德祺等，代表四大社团前去慰问和发放救济金，抚恤受害者及其家属们。

现在，青洲这场大火，比1950年那次损失更惨重，救灾任务当然更艰巨。

何贤却依然如故，“头顶肩打两手推”，他只是感到他人有难，尽全力救助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何贤没有推让领导筹委会的工作。

他一上任，就向报界发表讲话，呼吁各界人士慷慨解囊，共襄义举。

何贤凡是做善事，从来有一“特长”：他不但乐于担任领导，亲力亲为，而且总是带头解囊，其数目也常常是最多的。

这回为着“让数千灾民重获居所”的宏愿，何贤第一个以自己 and 先父何澄溪的名义，捐建新铁皮屋55间。

接着何贤又率领银业公会全体理监事沿门劝捐。

在何贤以身作则的影响下，此次募捐工作成效斐然。

到了当年1月23日，大火近半个月后，即农历12月28日，何贤主持召开筹募委员会会议，决定即日起给每户灾民发放度岁钱10元，每日两餐粮食。

2月2日，即农历初八，何贤又主持召开筹募委员会。

那时募捐的铁皮屋已经足够分配，于是会议决定一周后灾民们都搬进新

屋时，每户再发放 20 元，作为入伙之用。余下的钱，就用来重建平民小学……

至此，何贤领导的救灾筹募委员会，将青洲大火造成的困难全部解决。

要知道，在当时的年月，一场大火之后，能使数千灾民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都有住所，都有饭吃，都能开始新生活……是多么不易的事啊！

后来的日子里，澳门还发生过好多次天灾。

1957 年 9 月 24 日，台风横扫澳门，菜农损失惨重；

1964 年 3 月 26 日，台山牧场街火灾，30 多间木屋被烧毁；

1976 年 1 月 20 日，青洲石仔塘处又发生一次大火，烧毁木屋百余间……

每次救灾工作，都是由何贤出面组织，发动募捐，同政府协商，解决善后事宜。

1962 年夏天，澳门政府决定将青草街上的 35 间旧屋拍卖。

这些房屋一向都是租给居民居住的，其中有不少已住了几代人，一旦拍卖掉，那就意味着要搬迁或流离失所。

因为将来有钱的新业主们肯定要拆除重建，即使不拆建，也必然转手加租。

这下，居民们都人心惶惶，焦灼万分。特别是那些无甚积蓄、囊空如洗的贫民户，深恐举家流落街头……

居民们为利益所迫，聚头商议对策，可是人心还是难聚，乱成一锅粥。

这当口儿，有人主张联合起来到澳督府请愿去；

有人无心吵闹，赶紧去找地方盖木屋；

有人准备投亲靠友；

有人心存侥幸地等待拍卖结果，想看看谁是新业主而后再作最无奈的安排。

这当中，有些穷困潦倒的人家，觉得无路可走，怀着一丝生之希冀还是去找何贤，希望何贤出面说服澳督，收回成命。

何贤感到此次拍卖，非同小可，几十户人家差不多几百口子人要受到牵连。

如果让他们流落街头，对社会又会造成不小的动荡。

可是又一想，澳督既已决定拍卖，收回成命是绝无可能，而且此次不拍卖，说不准夜长梦多，过上一段时日恐怕又可能旧议重提，住户心不定，住不稳呢……

怎么办？

谁能料到，何贤左思右想，最后竟想出一个“没办法”的办法：掏钱全部买下它！

如此一来房产权转移了，就主动了。

于是何贤去谒见澳督，说他愿意拿 20 余万元出来，把这 35 间房屋全部买下，然后将这批房屋捐给镜湖医院和同善堂。

澳督见是何贤买，而且是买了捐赠给镜湖和同善堂做善事的，反正拍卖就是卖，卖给何贤不也是卖？

澳督便一口答应了。

他同意取消政府计划的拍卖这批屋宇，准予何氏购买后捐赠镜湖和同善堂。

这样，原来的老住户们全部不用搬迁，可以安居乐业，再不提心吊胆地度日了。

人们万份感激大恩人“贤哥”。

这年的10月25日，何贤出面，正式把青草街的旧房买下，并通知老住户不用搬房，不加房租，使二百多户居民不用做流浪的噩梦了，人们那个欢喜劲儿呀，不是用几句话能够表达的。

青草街第五条街的居民代表们向何贤赠送纪念品，表示他们无限感谢之情。

当年的大众记者采访何贤，问他为何要采取这样牺牲自己的措施。

“贤哥”说：“这样做既可使二百多老房客继续安居度日，又可以增加镜湖和同善堂的经费，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何贤对待穷人，对待灾民，可不是那种摆摆“甫士”（样子）的蜻蜓点水——“意思意思”，何贤的人情味儿，浓得似“烈酒”，而不是淡淡的关怀和体恤。

为何如此比喻？

我看过一则澳门百姓的忆述，说当年石仔堆发生大火后，何贤不辞劳苦慰问灾民。当听到灾民们反映没有烟抽时，他居然立即叫人买烟送来分给灾民！

这样的“救灾”实在体贴入微，也实在令人无法不为“贤哥”的真性情所动容……

何贤还时常周济穷人，作他们“丢本亦无息”的债主。

他借给别人的钱，除大数目外，从不追讨。

有些人借到“贤哥”的钱，写回借据，他随即撕掉道：“你好好地去生活，我就算帮到你了。”

有的人来给何贤还款，顺带索要借据，他又说：“对不起，我从不留别人的借据。你反正要不到了，还是把款拿回去吧，咱们两清。”

何贤为何待人如此恩重如山，为何对公益慈善事业情有独钟呢？

他做善事，救贫民，从不吝惜精力，更不吝啬金钱。

何贤的信念始终融于生命：“我经营企业，取诸社会，要用于社会。从社会赚来的钱财，我要将其中的七成用于社会。”

而何贤的近身保镖黄子雅说：“贤哥把七成盈利用于社会这话，一点也不假。”

而我的最深感受是，何贤是地道传统的中国人。他经商，却不乏中华民族的好传统。

正如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吟唱：“呜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

何贤先生故去得太早。

否则我们应问问他平日读不读杜甫的诗词……

其实，这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善举，与杜甫之理想殊途同归。

## 第十九章 华人代表为民请命解忧难

被称为大企业家、银行家的何贤，50年代初被澳督直接委任为“咨询会”的华人委员。

老百姓们叫他“华人代表”。

“华人代表”在新马路大丰银行二楼，设立了“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办事处”……

“贤哥”又多了一个衔头——“华人代表”，这只能意味着他更加努力地为人民奔走呼号，争取利益。

被称为大企业家、银行家的何贤，50年代初被澳督委任为咨询会的华人委员。

据《澳门组织章程》和《咨询会章程》之规定，咨询会是澳督的咨询机构，其工作附属于澳督，协助澳督执行立法及实施任务。

与立法会基本相同，咨询会委员也是由三部分组成：地方行政团体选出两人，道德、文化及福利机构选出一人，经济利益社团选出两人，这些人称为选任委员。

掌管民政厅的政务司、检察长、财政厅长称官职委员。

另外还有若干名委员由澳督直接任命，叫委任委员。

何贤作为澳门的知名人士，是澳督任命的几名知名委员之一。

与立法会不同的是，咨询会不仅隶属于总督，总督还直接出任咨询会主席。

咨询会的职权，是对澳督送交的一切有关政府事务及本地区行政事项发表意见。

有几方面之事项，按规定澳督必须听取咨询会的意见：

1. 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法律建议书；
2. 总督颁布的法律草案；
3. 执行本地区现行法律和法令的实施条例；
4. 繁荣本地区经济的一般性计划草案；
5. 制定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及财政发展的一般性路线（总纲）；
6. 决定对某人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

咨询会由澳督召开。如果没有多数委员出席，不得举行。

咨询会会议是非公开性的。

但政务司、保安司及由澳督按每次会议的需要而指定的公务员，可以列席会议。这些人无表决权，只可对所讨论的事项作出解释。

与立法会一样，咨询会席位的分配，按澳门人的习惯说法，大体上是“三三制”：即三分之一是葡人，三分之一是华人，三分之一是官方人士。

这些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他们互相制约，保持基本稳定与平衡。

何贤，作为咨询会中的华人委员，时刻不忘为自己的同胞，特别是为那些无权无势的下层同胞争取利益，维护他们的权益。

何贤出任咨询委员会不久，便有一家葡人开的公司发生了劳资纠纷。

事情的起因是，葡人老板见生意不好，于是决定压减工人的工资。消息一传出，公司大乱，在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

工人们经商议，决定派七名工人去和葡人老板谈判。

当时澳门并无劳工法，工人们敢对老板的决定表示异议，在这个葡人开的公司里，可算破天荒地头一遭。

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的葡人老板，对站在他面前的七名工人代表注视了很久，还像作梦一般，不相信这是事实。

装什么洋相呢！无非是看不起华人罢了。

其实，在他自己的国土上，劳资纠纷是再普遍不过的事。

但澳门是谁家国土？是中国，却又是他国的殖民地。

这些殖民地工人，怎么敢向宗主国的老板挑战示威？

可这葡人老板与几位工人代表相持了不一会儿，就明白自己太低估这些“干活儿的”了。

工人代表们明确正告老板，如果他一意孤行要减压工人的工资，那么他们也有办法使老板遭受同样的损失。

谈了一个多小时后，结果是葡人老板妥协。

他微笑耸肩，无奈似地答应不减压工人的工资。

等这些代表们走后，葡人老板悻悻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

他恨恨地想，这次虽然不能减工资，却也不能让工人就这样便宜！他一定要想法子杀一儆百。

否则，以后他还能支使得动他们么？

果然没过几天，葡人老板找了个借口，把那七名工人代表解雇了。

工人们反复找老板申辩都不见效，只好去向澳葡市政当局反映。

何贤得知此事内幕，便在一次澳督召开的咨询会上发言。

他说：“我们生意人都懂得一个道理，叫做过得人家，又要过得自己。如果好处一味自己得，生意是做不成的。澳督大人管理澳门，如果只考虑葡人的利益，忽视了华人的利益，澳门很多事情更难办好……”

接着，何贤话锋一转：“现在华人劳工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如果再减压，他们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能满足，还怎样干活？华人劳工不干活，那葡人的利益又如何实现？”

一番话，说得在座的葡籍咨询委员都不断点头。

澳督亦面带肯定的神态。

不过话又说回来，澳门，毕竟是个实施自由经济的地方。

澳葡当局施加的影响，并不能使那个公司的葡人老板收敛。

老板坚持着：“解雇这七个工人，是因为公司生意不好，发不出工资。”

但舆论的压力，又使他只是答应如果再录用工人，一定优先考虑录用这七个工人。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

好不容易把这几个“刺猬头”请出了公司，还会把他们召回来吗？

而且，葡人老板并未遵守他的诺言。

过了一些时日，工人们发现新来了几个工人，而被解雇的七名工人代表无一人被招回呀！这个骗子老板！

于是，气愤的工人们约齐去找老板论理。

老板诡辩说，他只答应优先考虑，并没有说一定要招回！

他又说道，他确实优先“考虑”了那七名被解雇的工人，只是因他们确实不适合做这些工种。下次有适合他们的活，一定会把他们召回。



老板的话，无人相信了。

可怎样才能说服他重新雇用那七名工人代表呢？

七个代表本是由大家推举出，替全公司的工人去谈判说理的。如今却遭到老板的报复，多不公平。

工人们觉得于心不安，一致认为有责任帮他们把丢失的那份工讨回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不少点子，可没有一个点子，是人人都觉可行的。

最后有人说：“去请商会的贤哥吧。记得那年我们青洲木屋区要给当局拆除，眼见全家就要露宿街头了，后来就是贤哥出头说服当局，缓拆木屋区，使我们免受了流浪之苦。”

此人一倡议，大家齐声叫好。

又有个人说：“是呀，恶霸黄飞在青洲木屋区搞得神憎鬼厌，也是贤哥出面，坚决督着当局给严办惩治的！”

还有个说：“当局去年征了青洲一大片菜地，贤哥又出面让当局另外拨菜地给那些菜农，才救了那批菜农，要不菜农们也失业了！”

何贤在商会办公室里，接见了工人代表。

听罢大家的诉说，何贤道：“原先我在咨询会发的一通议论，都不顶事？这次看来我要去找他谈一谈。”

工人代表见何贤慨然应允，非常高兴地走了。

过了几天，何贤当真去找那葡人老板“算帐”了。

葡人老板见来者是何贤，还一头雾水，不明其来意呢。

但他知何贤是澳门华人商界首脑人物，又是澳督委任的咨询委员，态度不敢怠慢。

于是，他连忙客气地请何贤到会客厅里就坐。

依照中国人的习惯，奉茶完，葡人老板忙问何贤有何贵干。

何贤将来意直言不讳地告诉葡人老板，且诚恳地对他说：

“论理，贵公司的事，外人是不应插手的。可是工人们找到商会，找到我本人，我也就不能袖手旁观，来做个调解工作。”

葡人老板没料到，何贤竟是为工人这件事而来的。

他有些尴尬，脑子里不住地思前想后，急谋对策。

何贤见对方一时语塞，径直说下去：“我们是同道作老板的。照我的经验，你对工人好，他们肯认真负责地干活，我们作老板的才有钱赚。对工人好呢，不但是体现在工钱方面，最重要还得赢得人心。否则，他们耍些小花招儿，吃亏的还是老板。”

葡人老板根本听不进何贤这番劝说。

见何贤刚一停顿，他便立刻插话说：“何先生所言极是，我一定认真考虑。”

说罢，葡人老板起身，显然是要送客。

何贤见状，只好告辞出门。

葡人老板一直没让七名工人代表复工，结果工人们便横下一条心，罢工以示最强烈的抗议。

葡人老板恼羞成怒，却又无可奈何。

双方正僵持不下着。

何贤闻讯，又再次上门调解。

葡人老板这次见到何贤，不禁流露出求助的神色。

何贤佯装毫不察觉，只对葡人老板说：

“我愿意去和你的工人谈谈，让他们恢复工作。生意好了，自然有添人手的必要嘛，是不是？”

葡人老板十分感激何贤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

何贤没说一定要收回七名被解雇的工人，却只道生意好了要添人手，颇给葡人老板面子了。

葡人老板心里自是十分感激：“多谢何先生相助，本公司是准备再增加人手，只是这段时间事情多，一下照顾不过来。”

何贤笑笑点头：“好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训，叫‘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你身为老板，做事决策有时向下属们妥协，并不一定会折损威严。可是一旦食言无信，说话不算数，三番两次出尔反尔，那就在下属面前失威了。”

葡人老板脑门儿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希望老板你下次不要食言了。”

何贤握握葡人老板的手说。

葡人老板只得“鸡啄米”式地连连点头应允：“一定！一定！”

何贤后来说服了工人们恢复正常的工作。

一场劳资纠纷，终于妥善解决。

身兼澳门“华人代表”的何贤，从不鄙视下层劳苦群众，而是诚心和居民们交朋友，关心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和矛盾纠纷。

为了能方便地倾听民众的意见和申诉，何贤在新马路大丰银行的二楼，设立了“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办事处”。

有如接待“上访者”那般，何贤立下制度约束自己，订立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钟接见澳门居民百姓。

尽管他天天都很忙，但除却有特别的事情外，他一定在办事处办公，接见居民，直到接待完来访者才去午膳。

有时客人实在太多，而午膳的时间过去了，何贤便在附近的餐厅办事处进快餐小食，餐后又继续接待居民。

何贤的时间观念很强，任何约会都不迟到。

他办事精力充沛，尤其在晚上，许多大事，都由他约三两知己谈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研究讨论。而翌晨，他会和所有的打卡族一样，依时去到公司办事处办公。

何贤在接待居民上访时，事必躬亲，人人的话题都细心听，有的让秘中详细记录，有的还录了音。

凡是居民提出的问题，只要他力所能及，他决不拖延，办不了的事，他也耐心向人家解释原因。

有许多事不属于他的处理范围，他就向澳督举谏，抑或向政府部门反映，并且一定争取到满意的答复或结论，而后将这些答复意见一一告诉来访者。

倘若澳门政府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何贤就会凭他的智慧、经验据理力争，直到达到预期愿望才肯罢休。

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何贤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不仅费了神，费了口舌，费了时间，还往往得搭上他的“面子”。

因何贤处世的态度，深得省、港、澳以至国内外朋友的称赞，所以“有头有面”，也是他做事有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0年何贤为老百姓办了一系列大好事。

因而澳门居民说：“贤哥是真正的华人代表。”

不错，何贤不代表共产党，亦不代表国民党；不代表富人，亦不代表洋鬼子；他是真正的“华人代表”。

而“华人”，更多意义上，代表了穷困的“老百姓”。

## 第二十章 遇刺临危 宽宏海量释前嫌

1966年，港方于复活节前曾接到情报：复活节之夜某黑社会集团将在赛狗场逸园内行刺一人……澳警紧急行动，却扑了个空。

一个月之后的5月8日，何贤等六人于狗场停车处突遭袭击，幸免于难——何贤受轻伤，右脚取出手榴弹碎片三块……

后有传闻抓到之歹徒被何贤宽容释放，且还贴钱帮他“回头洗手”做生意……

人尽皆知，香港和海外许多城市都有“赛马”，而且也知道九七回归祖国怀抱后，香港的赛马照跑。

“赛狗”，却未必人人知晓。

其实，赛狗在澳门，大约和赛马在香港的地位大同小异。

香港每天的报纸上都有整版的“马经”，而且每家报纸都靠刊登马经来吸引读者。

而在澳门每天的报纸上，整版刊出的是“狗经”。

“狗经”同样可以招来读者踊跃购报。

可见跑狗（或称赛狗），是澳门非常流行的一种赌博活动，比回力球和赛马车都风行得多。

赛狗这种活动最早起源于英美。

看到人家的跑狗场获得可观的利润，于是上海的大亨们纷纷效仿。

1928年上海开了两家跑狗场：明园跑狗场于5月26日开张；7月底，申园跑狗场又隆重开张。

再不久，规模宏大的逸园跑狗场后来居上。

可惜好景不长。1933年，上海的公共租界在报章舆论压力下明令禁止赛狗，明园和申园抛出股票后宣布停办，只有逸园一直维持到1941年底日本人扔炸弹了才停止营生。

而以博彩业为经济支柱的澳门，跑狗活动始于30年代。

1932年，一些华侨和美国人建议在澳门组织一个“澳门赛狗会”，当时由富商范洁朋承办，他投资50万港元组织了“澳门赛狗会”。

莲峰山下的赛狗场开幕那日，仪式还很隆重，主办者特意从美国请来了一支女子乐队，好不热闹。

然而开办之初由于设备不完善，场面颇为冷落。

不到一年，跑狗场便改由电灯公司总经理、英商嘉理仁接办了。嘉理仁聘请华商王文琪主理，刻意改善狗场环境，在场内广植花木，并扩大宣传，使业务蒸蒸日上。全盛时期还须加开日场，平均每场收入五千多元，实属不菲。

嘉氏接办一年之后，因跑狗会不愿再补本购狗，而致赛事日淡，连着又转由商人毕侣俭接办。

毕氏虽然仍以跑狗业为主，但为了招来更多顾客，还增设了粤剧、电影、杂技、露天舞场以及各种博彩性有奖游戏摊档，改名为“跑狗娱乐场”。

然而，那时候进跑狗场，不是一般人所能消费得起，毕氏仅仅经营了三年多，又宣告停业了。

1940年，澳门政府将这个赛狗场收回，改成了运动场。

一晃二十多年，没有人提过赛狗的事。

直到 1961 年，印尼华侨郑君豹，向澳门政府提出恢复赛狗，得到了当局的批准。

于是在同年的 8 月，郑君豹与澳葡政府签订了专营赛狗的合约，并将莲峰球场看台拆卸准备兴建赛狗场。

原来的赛狗场按约租给赛狗专营公司使用。

9 月 26 日，澳门跑狗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同时得到澳门政府的认可。1962 年，澳门赛狗的专营权曾两次转让，最后得到的是澳门逸园赛狗有限公司。原因是郑氏后来资金不足，工程时建时停，进展很慢，眼看搞不下去，便将赛狗专营合约转让给澳门赛狗有限公司，由该公司程伯庵为代表签署承办专营合约。

程氏却更糟糕，事实上接而未办。所以至 1963 年又将这项专营权转让给何贤牵头组织起来的逸园赛狗有限公司。

何贤向来都不愿插手赌博性质的行业。

但赛狗场既然开了头，半途而废未免浪费，因此联合何柏、许以忠、闻祖舜等商界朋友，成立了一个澳门逸园赛狗公司，建起了一个“格力赛狗场”，自任董事长。

1963 年 2 月，该公司董事长何贤，与澳门政府在转让合约上签字。同年 9 月 28 日开幕，澳门逸园赛狗有限公司举办了第一场赛狗。

从此赛狗在澳门东山再起，生意倒也兴旺，并且兴旺至今。

所谓跑狗，其实也是一种“高尚赌博”。

开赛前，练狗师分别牵着穿上编有号码的不同颜色背心的参赛狗，在看台前走一个来回，让观众预测并购买预测狗的号码彩票进行投注，投注完毕，即鸣钟开赛。

狗圈门一开，一组格力狗即犹如离弦之箭，去狂追一个围绕着椭圆型跑道旁铁轨上高速滑行的机械诱饵（电兔）。

最先到达终点为胜。

赌注可以押在一只狗或一组狗身上。当地报纸每天刊出的“狗经”，就是赌客们下注时的主要参考资料。

虽然是狗，但却关系着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所以每只都不同凡响。

且不说澳门这数百上千只格力狗都是从国外（主要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光看它们那些名字，就能猜出无论是庄家还是赌家，对它们抱着多大的期望——

什么锦上添花、潮洲战将、港澳之星、加州彩华、天马行空、风虎云龙、万夫莫敌等等……

还有的是三个字：一定中、大家赢、金中金、星光虹、必利来、独裁者、金运来等等……

总而言之，一句话，尽取幸运之意。

但既是赛注，就总有输赢，不可能给每个人都带来幸运。

逸园赛狗场设在一个叫筷子基的地方。

赛狗场的外型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里面有跑道和看台，还有大型电子屏，照明设施极好，和运动场差不多。

赛狗场看台下面有一个大厅，厅里设有许多售票窗口，赌客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购得彩票。

坐在赛狗场的看台上，可以把场内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澳门赛狗场的跑道并不长，跑一圈不过二十几秒，可这短短的二十几秒又使多少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因为输赢的结果就在这一瞬间。

然而，娱乐业兴盛的澳门在五十年代，并不是和平宁静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方政治力量的矛盾和斗争潜藏暗伏着。

澳门不时可以闻到火药气味，匪徒屡屡使用爆炸手段，破坏澳门治安，进行爆炸仓库、戏院、轮渡、旅店、知名人士住宅等活动。而且匪徒还把澳门作为基地，对大陆进行破坏活动。

这些活动，包含着丑恶的阴谋，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威胁着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些时日里，何贤晚间已经甚少去看赛狗了。

但还是防不胜防。

谁也没有料到，令人发指的暴行，会在何贤开办的狗场发生，且恰恰就针对着“好好先生”何贤本人……

1966年5月8日晚，葡国大西洋银行总裁马沙度，在爱都酒店厅举行酒会，宴请澳门各大社团领袖。

何贤作为贵宾，出席了酒会。

马沙度酒酣兴浓之际，向何贤提出要到逸园去看赛狗，何贤当然表示欢迎。

席终，何贤便陪同马沙度驱车到格力赛狗场去。同车前往的除他的夫人陈琼外，还有陈文光夫人周瑞珍、何景沂夫人黄佩贤、陈毅生夫人梁德琼。

车到逸园后停泊在司警处值勤室侧的停车场。

何贤一行人便下车进场，坐在会员台上，陪马沙度观赏赛狗。

马沙度兴致很高，买了几个号码。何贤也凑热闹买了4和6两个号码。

狗赛到凌晨12点多才结束。

何贤买的两个号码都中了，贴身保镖黄子雅便去替他收款。

这功夫儿是深夜凌晨12时30分。何贤已带着夫人陈琼和三位名流太太径直到了停车场。

何贤的汽车停放在靠近墙边处，车头正对会员台大门。

何贤原准备在左边开车门让女士们进车厢，但因近墙边处停放有几辆轻骑不便，于是转而走到右边开车门的时候，突见一个小东西用报纸包着，迅速朝他滚来。

何贤蓦地看见这包东西，心中顿感不妙，便下意识地准备提起右脚将它踢开，却听见纸包内发出滋滋的响声。

炸弹！他突然猛醒！

但说时迟，那时快，那包东西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滚到距离何贤仅数寸的地面上，只见白光一闪，轰的一声爆炸了。

碎片横飞……

何贤登时受震倒在地上，但还算命大，他只伤了右脚。

夫人陈琼在他身后，幸未受伤。

而其他三位太太，即在场的周瑞珍、黄佩贤、梁德琼女士，以及一位赛狗场葡籍稽查约瑟·马尾喇，一位香港来客陈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

“何贤遇刺”，顷刻成为港澳的特大新闻。

此事件发生后，哄动整个澳门街头巷尾，所有居民都表现出焦灼与关注，

人们对歹徒公然在公众场所内斗胆抛掷爆炸品，企图伤害人身安全之非法行为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愤慨，并对歹徒此暴行的动机至多推测，莫衷一是。因此事若矛头对的是何贤，就太出乎人们意料了。

事发当夜，除何贤负伤被送镜湖医院急救外，其余五名伤者均被送上山顶医院救治。

何贤的伤势以右脚较重。入院后送入 X 光室，在透视镜后观测，发现有三块手榴弹碎片藏在肌肉中，遂为他施手术，将碎片取出，包扎伤口。

医生将何贤额头上被玻璃碎片擦伤的伤口敷药后，他即于当夜凌晨四点，由亲人朋友们陪同一道返回得胜马路二十八号的别墅休息。

何贤险遭暗算，澳门政府认为是个重大事件，连夜展开了侦查暴徒的工作。

那些日子的港澳报纸，都用一整版一整版的消息连日追踪报道何贤病情的恢复、各方人士对他的关心慰问，以及警方破案的进展。

有人怀疑，为何手榴弹在何氏等人的脚底下相距至近的地方爆炸，而伤者仅多脚部受伤，上身胸腹部均可安然无恙呢？

据有关专家解释说，手榴弹这种东西，它爆炸时的破片是在地面向四方由下而上地散射开来，恰似一个锅形的样子，所以距离手榴弹落点约七、八英尺处，那么受伤的部位就会在身上了。

何贤等四人的伤处在脚部，道理就在此。

而狗场稽查约瑟，爆炸时站在较远处的售票台处，所以伤处便在额部。

由于手榴弹在何贤座驾右车门前的地面爆炸，所以右前车门被碎片射至密如蜂巢，大约有二十多个小孔，而震力之大，爆炸时气浪之强，把车玻璃都震至粉碎。右后边轮胎，也遭弹片射裂。

在爆炸时，宋玉生大律师的太太正坐在何贤车右边不远处的 M11—188 敞篷跑车内，登时把她吓得花容失色，幸无受伤，而宋大律师及卸任法官庇理立亦站在附近谈话，也幸告无恙。

不管怎么说，这次事件令澳门人很为何贤担忧。

许多澳门居民都按捺不住对何贤身体状况的关心，纷纷前去探望。为免兴师动众，何贤办事处于九日中午发出了一则书面消息：

“本澳立法委员会委员、华人代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昨凌晨在狗场爆炸案发生时略受微伤，当晨入镜湖医院治疗，经施手术在足部取去碎片后即返私邸休息。昨日前往私邸向何氏慰问者甚众，澳督罗必信派出副官贾理度代表致意，此外各机关首长、各社团代表、各中西友好纷至慰问，港方友好亦函电纷驰。何氏健康甚好，精神颇佳，但遵医嘱休养，对各友好的热情慰问深表谢意。”

澳门中华总商会、同善堂、镜湖慈善会三大社团代表——马万祺、崔德祺、刘衡仲等二十多人，于事发当天下午三时半前往慰问何贤。

何贤在别墅中与三大社团代表们握手致谢，精神甚佳。

当马万祺和崔德祺等转达三社团和各界人士对他的关怀和慰问后，何贤即就此次被炸事件发表了意见。

何贤肯定地说：“我自问一向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且与人无仇怨，这次事件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

他又说：“我是不怕任何人恐吓的，虽然用炸弹炸我，但我不怕，我今年 58 岁了，人总是要死的，能为同胞服务，为爱国事业尽力是值得的。”

最终，何贤更加坚定地申明己态：“我绝不灰心，将尽自己一切力量为同胞服务！”

这番话，一定会使得“亲者快、仇者痛”吧！

商会理事长何贤被匪徒暗杀未遂，已影响到澳门工商业的稳定及每个人之安危。

商会便于5月9日下午两点，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大家一致指出何氏在澳十多年，为澳门工商界与各界同胞解决了不少困难，对社会福利亦贡献甚大，这次匪徒目无法纪，在大庭广众之下施行暗杀的卑鄙手段，澳门政府当局应负责任。

马万祺先慨言：“何理事长被暗杀事件非常严重，此事并非经济问题，何氏十多年来不只对澳门工商业做了很多工作，对文教体育及社会福利亦做了很多工作，并且是澳门政府立法委员。前晚被炸，幸免被害。匪徒谋杀何氏，是有目的的，不独危害何氏个人生命安全，对澳门工商业、治安，对每个居民的人身安全亦有严重威胁。”

崔德祺说：“此事件发生在军警林立的公众场所，匪徒目无法纪，为所欲为，穷凶极恶。1955年6月17日晚，本人亦遭到一次匪徒袭击。澳门小小地区，匪徒明目张胆，非系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安定问题！”

会议当即决定委派马万祺、崔德祺、崔乐其三位代表前往谒晤澳督，请求迅速缉凶。

当日下午6时，马万祺一行三人前往澳督府谒晤澳督罗必信，澳督又通知警察厅长傅基利到场，一同接见。

马万祺等一再重申商会的态度，向澳督说：“今日代表工商界、澳门同胞，为了何贤先生被暗算事件见澳督。……代表们要求澳门政府积极采取措施，迅速缉拿凶手归案。同时，澳门治安当局绝对不容许破坏分子为非作歹，假如继续如此，对澳门工商业及治安影响至大，而对政府亦有不良影响。”

澳督答复，称当局极为重视此案，接纳各代表之意见，并当场令警察厅长尽一切力量缉凶……

如此，各代表才与澳督握别。

澳门政府，确实是重视此案的。

内幕消息曾于报刊披露，在本案未发生之前，澳门警方已于那年复活节接到香港警方消息，说有人将在复活节之夜在狗场内行刺一个人，但此人是谁，却未获悉。

澳警接获了这个惊人消息后，当晚曾下令全体警员候以待命并于当晚加派警员到赛狗场守卫，严密监视场内可疑人物的活动，并保护赛狗场之主人及观众安全。

由于复活节期内，赛狗场一连跑三晚狗，因此警方一连三晚均加派警员在场内维持治安。

那几晚港客到的人很多，场内人头涌涌，警方加派警员在场工作，而且那三晚所派出的除武装人员外，“便装”也不少，一般人很难辨认。

但是经过三晚的森严戒备，跑狗场秩序井然，并无任何事件发生，而警方前所接获的讯息，也没有说明企图行刺之目标是何人，企图行刺原因何在及准备用什么武器行刺。

因此，警方经过三晚戒备后，没有事情发生，故对此消息之可信度发生了怀疑。



于是，每晚再赛狗时，不再下令加派警员到场工作了。

然而，距复活节整整一个月（复活节第一晚跑狗是4月8日），竟有人在狗场使用手榴弹企图暗杀何贤！

这证实了香港警方传送的消息无讹，只不过，日期推后了一个月而已。

可能当时匪徒鉴于狗场内警方戒备森严，或他们的“目标”没有到场，故没有下手。

自何贤出事后第二天，有人在现场附近拾得美式手榴弹的破碎弹壳，上有英文字刻着“MADE IN U·S·A”（美国制造）。

凭此弹壳，可以证实此枚手榴弹是美国制造的。

由于此事件涉及政治暗杀，所以侦查此案的责任拨归了治安警察厅政治部。

除悬赏缉凶外，警方先后传讯过20多人，其中四名嫌疑人拘留多日，但是却没有确实证据控告他们与此案有关。

从5月8日凌晨2点开始，所有从澳门出境的旅客都要登记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此外，还派出大批便衣警员到旅店查讯住客。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传闻，说是何贤的私人情报组已经查出作案的歹徒。

这歹徒是受一个国民党海外行动组收买指使，才干出这勾当的。据说黄子雅还派出护卫把这个歹徒抓了起来，押去见何贤。

何贤问他：“你跟我无仇无怨，为什么要害我？”

“我没办法，混不下去了，他们给了我一笔钱。”

“你只是为了钱？”何贤将那人从头到脚扫视了一眼。

那家伙耷拉着脑袋，等待大难临头。

可出乎意料，何贤没有骂他，更没有打他，只是说：“细佬（小弟），此事不关你的事，你也是受人指使，以后不要再染手。”

过了好一会儿，何贤从袋中抽出几千元港币递给这个企图杀害自己的歹徒，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命他道：“你即刻离开澳门，到别的地方去做些小生意，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种害人的事！”

这只是个传闻，人抓没抓，便没有新闻史料详载。

但日后，曾经有人当面问过何贤，企图证实这传闻的真伪。

何贤不置可否。

他只淡淡地说道：“事情已经过去，不必追究了。”

传闻还说，何贤宽大为怀的举动，把那个歹徒感动得痛哭流涕。

当歹徒走出大门口时，何贤又把他叫回来，继续说：“你以后遇上什么困难，就来找我吧！”

那人深受感动，果然痛改前非。

以后他知道有人要暗算何贤，就赶忙主动报告情报组。

有时候，还有人不甘失败，继续策划谋害何贤，他便主动要求参加，暗地里却是保护何贤，使何贤数次又都化险为夷。

这些事，个中细节难以印证，但这传闻的所有情形，都是完全符合何贤宽宏大量的性格，符合何贤一向为人处世的态度和作风的。

古人云，这叫“善有善报”。

我们更相信，何贤是“心底无私天地宽”，所以方能“宽宏海量释前嫌”。

## 第二十一章 杀身之祸 化险为夷四道关

何贤曾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澳门政府下令撤销台湾国民党当局设在澳门的领事馆。

所以台湾当局对何贤恨之入骨，并密谋下令杀害他。贴身保镖黄子雅为何贤两肋插刀，誓死相护，两人结下患难兄弟之情。

何贤遇四次杀身之祸，又都化险为夷过了阎王爷的关——他是个传奇的命。

从前章的话题引下来，我们在触目惊心中，也真的难免心生沉重，心生疑惑，心生不平——为何贤打抱不平……

何贤在澳门办了那样多大大小小的好事，而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五湖四海、三山五岳的人们，与他的关系都好；何贤自己也常说他没有仇家，黑白两道的人都给他几分面子。

而事实，十多年的事实，证明了何贤的话丝毫不掺假，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如此种种，为什么还是有人要刻意暗算他呢？

原因就是何贤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何贤，除了始终不渝的爱国言行，他还曾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澳门政府下令撤销台湾国民党当局设在澳门的领事馆。

可以想见，台湾当局对何贤非常憎恨，密谋下令杀害他。

正如何贤所说：“我本人确实没有敌人，但因热心办公众事，有时也会间接得罪人，几乎招来杀身之祸。”

何贤为了澳门社会和他本人的安全，在1955年组织了一个私人情报组。

它的任务是专门负责搜集有关危害澳门社会治安，或危及个人人身安全的情报。

这个情报小组，人少精干，干得很有成绩，并为维护澳门治安立下了不小功劳。

小组的负责人就是何贤的贴身保镖黄子雅。

黄子雅是斗门县白蕉乡人（原属中山县人），自小在澳门读书。

黄子雅文化程度较高，对中国书法颇有研究，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吟诗作对呢。

据说，他读书时就爱好玩手枪，放暑假时常回乡间练瞄准。

高中毕业后，黄子雅到了叔父黄森那里当中队长。

1949年8月，他积极支持进步的叔父黄森，在斗门率队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

而那时，他们可是珠江三角洲最早起义的部队之一。

再后来，黄森和黄子雅把部队带到了斗门龙西。

这一举，大大增强了中山游击部队的武装力量。

在1949年10月16日，黄森起义部队和其他游击部队一起解放了斗门。

当时，国民党保警师两个连持械逃走，黄子雅便乘胜勇追穷寇，带队追到南门冲口，把他们包围起来，迫使他们无退路，为解放斗门立下了赫赫战功。

不久，黄森部队奉命和其他游击队一起挺进五桂山区。

在五桂山区，经过整编又参加了解放中山县石岐的军事行动。

但在此之后，共产党由于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对黄森部队没有处理好，亦没有公正合理地对待他们。

一个心结死死解不开，以致黄森请长假到了澳门。

再不久，黄子雅也到了澳门，被何贤聘请做护卫。

由于黄子雅为人有正义感，生活作风正派，而遇事又机智勇敢，使得何贤数次遇险都得以化险为夷。尽职尽责、有勇有谋的黄子雅，得到何贤的信赖和重用。何贤视子雅为亲兄弟，两人感情之深厚，自不用说。

何贤与国民党特务的较量中，大抵可说遇到过四次风险，小磨小难则远不止四次。

50年代初期，何贤的私人情报组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派了一姓颜的特务到香港。

这位姓颜的特务是个胖子。他受命策划一个枪杀何贤的阴谋。

何贤情报组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进行了反跟踪活动，并拍下颜某的尊容做好了防范。

因此，国民党特务两次要杀害何贤，都没能得逞。

有一次，何贤应邀参加香港友人儿子的婚宴，地点在九龙的龙琼酒楼。

散席后，何贤夫妇打算搭夜船返回澳门。

然而当何贤他们坐的小汽车快到达港澳码头时，黄子雅突然发现码头附近有可疑人物在活动……

仔细看清楚，不错，那可疑人正是颜某。

黄子雅立即告诉何贤，并一再嘱咐何贤切勿慌张，镇定对待。

这时小汽车继续向前驶去……

黄子雅一面拔出手枪，一面密切监视着肥佬颜的行动。

糟糕！肥佬颜已越来越接近小车！

黄子雅迅即指挥急停车。车子骤停。

黄子雅急令一名护卫员，扶着何夫人下车搭船，以扰乱敌特视线。

肥佬颜见何贤的小汽车骤然停下，也害怕被人发觉，便急忙闪身躲在骑楼柱后。

肥佬颜偷偷监视着这边的动静，见何夫人已落地，只待等候那在劫难逃的何贤一下车，便立刻毫不迟疑，“动手干掉他”。

但是敌人的美梦做得太早了。

机警的黄子雅，当即自作主张，不让何贤下车，而是指挥司机迅速调头，开足马力，飞驰而去……

肥佬颜黑暗中急得跺脚骂娘。

这件事可算何贤一次惊险的杀身之祸。有黄子雅的保护，巧妙避开了。

还有一次，何贤仍在香港，又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算。

那时候，香港海底隧道还没通车。

何贤的小汽车正停驻在码头，排队等候过渡。

保镖黄子雅，默默无言，却是眼观六路，耳听着周围……

突然黄子雅心头暗自一惊——

他锐利的眼睛从排在何贤小车前面的一部货车中，“搜”出掩藏着的一枝枪管！

“猎物”逃不过黄子雅的眼睛。

黄子雅清楚地看到了那掩藏在货车中的枪管，正向何贤乘坐的小车缓缓地移动……

而当时何贤正用打火机点燃含在嘴边的香烟，毫无觉察。

黄子雅见情况如此危急，二话来不及说，当即用手推倒何贤，让他躺倒车中，以自己的身体作掩护，并赶忙命司机调头，将小汽车飞快开走。

国民党特务还是白忙乎了一阵“小动作”，根本来不及放枪，只能眼睁睁看着何贤乘坐的小车，又一次逃离了险境。

事后调查证实，这两起蓄意谋杀事件的罪魁祸首，均为国民党特务颜某。

为了惩罚凶手，黄子雅怒气冲天地嚷着要“干掉”颜某人。

何贤却道：“我本人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那又何苦把他干掉呢！”

结果，还是没让黄子雅主动下手，干掉顽敌。

由此可知，何贤的长处，有时恰是他的短处；

他心太软，也太易相信敌人的“良心”；

他以为问心无愧，便尽所能以善待人。

他大概从未仔细地算计过，世上有些东西，原本就是一山不能坐二虎；就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

忆述当年，黄子雅对人慨言：“老实讲，在那个时候，贤哥在港澳对付一个于己不利的人，不管用明用暗的手段，都是唾手可得的。但贤哥不许自己人干这种事，可见其为人之光明磊落！”

然而，现实斗争的严峻局势和社会背景，就是残酷较量着的“看不见的战线”。

何贤认为自己没有敌人，对特务的行凶，一再忍让，一再宽容善待，一再清高不予理会。

然而敌人并不就此放过他，且更加穷凶极恶、变本加厉地继续对他进行骚扰、恫吓和杀害……

我们前章详述的 1966 年逸园的那场爆炸大案，就是何贤险遭的第三次生命危难。

这一次也巧，黄子雅刚好不在何贤身边，替他去收中彩款了，但是想一想，即使黄保镖紧贴何贤身边，灾难就可幸免吗？

可也不一定了。

因为敌人投的是手榴弹，一旦黄子雅及时发现，何贤躲避不及，也会伤着的。

难怪何贤这第三次遇险，是真真尝到了苦头，却也真真警醒了。

所以他在马万祺等老朋友面前才会慨然落泪，才会又愤又痛，才会态度更加决绝鲜明，不怕敌人的威胁恫吓，亮出与国家与民众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

何贤以大义压过大善，他终于在此次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政治暗杀事件中，表达了对敌人阴谋活动的抨击与痛斥。

如果说，逸园爆炸那回是何贤遇到的第三次杀身之祸，那么第四次则是在宴会桌上。

有一回，何贤在酒楼设宴八十多席，请澳督品春茗。

席中，侍卫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人企图在席间搞破坏，并要趁此取何贤的命。

为了不影响宴会的气氛，黄子雅没有告诉何贤，只是布置好护卫，自己

站在何贤身侧。

阴谋破坏宴会的歹徒，见接到恫吓的宴会主客都镇定异常，跟没事人似的，反而心底发虚，不敢动手。

还有一次，也是何贤正在参加一个宴会。

突然何贤本人接到一个同乡会的电话，说台湾派了两个杀手，打扮成古董商人，以上门给何贤送画为借口，乘机下手杀害。

何贤听完电话后，表现十分镇定。

回到宴会席上，他不露声色地暗中吩咐黄子雅派人去调查线索，弄清那两人的行踪。

结果情报组把两个冒名顶替住在酒店的特务，严密监视起来，逼使他们不敢动手，实在无奈才溜回了台湾……

澳门报刊经常报道何贤的言行举措，也因为何贤做的许多事情都与社会热点密不可分。

而 60 年代的报刊，也都敏感地觉出何贤的处境有危险，日子过得并不太平。

特别是狗场爆炸案发生后，更有不少报刊回述说：“有消息称：最近何贤的随从人员警戒较严，且经常携带一个公事皮包，据说皮包内装有手提轻机枪。对于这件事的传说颇堪寻味。”

的确是颇堪寻味。

澳门也是法治之地，可骇人听闻的事越演越烈，是无足为怪的了。

因那里虽是块“自由地”，但你若“自由地”选择政治立场，也可能且极有可能落入敌对势力同样“自由地”为你设下的圈套或隐藏的杀机。

何贤平生历经的四次杀身之祸，都可以说是他的爱国之举或正义言行所带来的惊险及生命的“代价”。

但何贤是大福之人。

他积善成荫，积德成海，老天有眼，命不该绝。

要在这样的人身上使阴谋诡计，太不该为，也太不易为。因打架需要有对手，而何贤，生性不与任何人对抗。他的善缘太多，你奈何他不得……

## 第二十二章 打捞沉粮 饥荒岁月慰穷乡

何贤一贯爱国，他也始终爱乡。

文革前，400万是个了不得的数目，而何贤，除却这些，究竟还捐赠了多少钱财物资建设家乡？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1959年秋天，是经济困难的饥荒岁月。然而居然有一段时日里，番禺的城乡百姓们，却吃到了“何贤小麦”做的饼，现在回味起来仍觉得好香好香……

有些远行离家的游子，会带走故乡的一把土，一掬水或一片叶，聊以慰藉日后岁月里刻骨铭心的乡愁。

故乡的叶子，夹在记忆的书本里，早就风干了，褪色了……

然而游子依然情衷道：

“这是全世界最美的一片；  
最珍贵，最可宝贵的一片；  
而又是使人伤心，最使人流泪的一片：  
薄薄的，干干的，浅灰黄色的槐树叶。”

……

故乡，对何贤来说，是最难解的情结，最复杂的心绪，最难以割舍的眷顾。

何贤，对于生他养他的家乡是很难忘怀的。

何贤一贯爱国，他也始终爱乡。

爱国和爱乡，对于远行的游子往往联在一起，或者干脆说是一码事。

或许是何澄溪老先生带出的家风吧，他们愈在外发达富裕，愈怀念贫困的家乡。

何贤缅怀昔日的家园，却难以认同眼前的一切——家乡太落后了。

他想着如何帮助故乡改变落后的面貌，以尽自己的孝心……

早在抗战胜利初期，何贤和家人回乡去看过。他看到岳溪小学课室太少，孩子们上课挤在一起，何贤便和爸爸、哥哥捐建了两间课室；看见贲南中学的校舍不够宽敞，何贤即刻又捐了5万元给他们扩建校舍，还到香港买了一套《二十四史》赠给学校。

看见从大龙到岳溪的道路坑坑洼洼，很难走，何贤便拿了2万港元给乡人修筑公路……

新中国成立后，何贤很快在澳门脱颖而出，他第一个在澳门倡议并主持了澳门国庆大会，并且致电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

虽然那时港澳同胞不仅对中共、对新中国不熟悉，而且因谣言泛滥成灾，绝大部分传媒极力造谣中伤，把中国共产党人描绘成共产共妻，杀人不眨眼，毫无情义的恶魔，所以不少人心存戒备，望而生畏，象对“苍蝇”样唯恐避之不及。

可何贤不一样。

他力排众议，主动靠拢新中国，并通过柯麟的关系，很快便和新中国中央领导人有了交往。

倘若这个时候，家乡的父老兄弟敞开怀抱欢迎游子的归来；

倘若这个时候，番禺县、石楼区或岳溪乡的领导能够主动同何贤联系，

他肯定会乐意支持家乡，为家乡建设出力的。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没有“假如”，自然亦无“倘若”……

家乡的人们，解放后忙的不是搞建设，搞生产，发家致富奔小康——（这是中国农民差不多要再等上半个世纪才能步入的生存正轨）和全中国所有的人们一样，当时忙于搞“阶级斗争”，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分田分地，还得呈报等级成份，显然“左”得可以。

而最不幸的是岳溪这个穷乡，竟找不出一户地主，要说生活最好最富有的就数何贤家了。

于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土改”一开始乡里就把他家定为“工商业兼地主”，没收了何贤家的田地，没收了他们的果园，最后连祖屋也没收了……

如此一来，何贤家族就被列为乡里的专政对象，被视为敌人。

经历过这等遭遇，换了许多人都想不通，亦难免会产生对立情绪甚至仇恨心理，不是吗？

何贤到底是不一般。他没有想太复杂，只是认为农民的生活确实太苦了。耕者没田耕也确实不合理，分田分地很应该。

所以土改开始不久，何贤就写信回石楼区公所和岳溪乡农会，表示拥护人民政府的决定。

那时，有地主的乡村，农民们都分到了退租退押的“经济果实”。而岳溪乡没地主，无租可退，无果实可分，村里土改工作组为了提高贫农的斗争积极性，同农会商量致信何贤，要何家退租。

何贤接到信后即刻汇回相当于10万斤谷子的巨款，分给乡里农民。

土改结束后，何贤知道复查时乡里已将他家的成份改正为“华侨工商业”，不是“地主”，不算成敌对阶级了，他更心怀释然，毫无芥蒂。

有人告诉他，说一个从前受过何贤周济的农民，土改时竟跳出来怂恿贫农到何氏家院抄家搬浮财……言下之意，即是说这家伙“食碗面反碗底”，忘恩负义，叫何贤往后千万不要再理睬他。

何贤听了却哈哈大笑，对告状的人说：“我知我知，随他怎样好了。在那种情势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奇怪呢？还计较这些做什么，都是乡里人。”

的确，何贤根本不计较土改时乡人的所作所为。

待风暴过后，他一样热爱家乡，关心桑梓。

1955年冬天，何贤在澳门应政府之邀回国观光。

那该是12月23日，何贤欣喜骄傲地离开澳门，途经广州赶赴北京……

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接见了她。

在一次宴会上，何贤风光之极：他被安排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归国不久的科学家钱学森同桌。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关心港澳同胞，并亲切地鼓励他多回内地参观，多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

何贤和其他共和国的宾客们，在北京愉快地度过1956年元旦之后，又被安排去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参观，这次行程长达一个多月。

这是何贤第一次赴首都北京，第一次见到新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他第一次受到最高规格和最热情的接待。

并且，何贤还是第一次接触到新中国的崭新面貌，他高兴得如同徜徉母亲怀抱中的“孩子”……

在 1956 年 3 月 11 日由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工联、镜湖慈善会和同善堂等四社团举行的大会上，何贤向澳门同胞们报告了他回国观光的全部经过。

何贤盛赞祖国进步很快，告诉人们到处都是日新月异、快马加鞭的新景象，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他还告知人们共产党的干部热情能干，人民政府真正是为人民大众利益着想的。

何贤希望港澳同胞也关心祖国的建设，鼓励大家一有机会就应为自己的国家报效出力。

那一刻，澳门各界人士都怀着惊奇的心情聆听着何贤的新鲜见闻。他们听何贤演说早已不止一次两次，但这一次，人们好似第一次见到何贤如此地欢欣雀跃，兴奋不已……

正是怀着这种兴奋愉悦的心情，何贤在结束观光旅程准备经广州回澳门时，特地叫广州的管家，通知家乡岳溪的干部们到广州小聚会谈。

想一想，那该是“土改”结束后，何贤第一次同家乡的干部们接触呢。

岳溪乡的干部们接到何贤的通知，自然是异常欣喜。岳溪乡党支部书记陈顺开、副书记陈细耀、乡长冯耀一行，即刻跟随曾替何贤管理渡船的退休工人初伯，到广州人民大厦七楼去见何贤。

这一行人中，许多都没见过何贤。

也自然，他们都以为这个名声显赫的大富豪，架子肯定摆得不小，因而都有些惴惴不安。

不料，初见何贤令乡人暗吃一惊，他们个个都估计错了！

这位大富豪不但衣着随便，人也相当随和，见到他们后满脸笑容连声说道：“请坐！请坐！我们是乡里乡亲，不必拘束，更不要客气。”

等大家安神坐定后，何贤才继续说：

“请你们来这里，是想同大家见见面，吃顿饭，谈谈家乡的情况。”

乡干部们见何贤如此平易近人，一下子就把先前的猜疑、隔阂都迅速消除了。

他们将岳溪乡的生产状况向何贤作了详实的汇报。

当时岳溪已成立了两个初级合作社。

但是因遭逢 50 年一遇的大旱情，咸潮上涌，水稻收成大减，乡亲们生活非常艰难。

何贤听后开门见山地问：“眼下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主要是开耕费用没着落”。

“需要多少钱？”何贤比乡人还务实。

“两万元左右……”

何贤随即点头，叮嘱坐在他旁边的秘书韩松说：“等回去澳门，即汇两万元给他们。”

女支书陈顺开汇报时，谈到乡里计划办一个信用社，以帮助那些农民“困难户”。

何贤听了表示很赞赏，并插话道：“好！是要注意关心帮助贫苦的农民解决实际困难。但一定要有借有还，否则很难办下去噢。”

陈顺开连忙补充道：“是的，我们也想到了这一点，并已订下个章程。”

“嗯”。何贤点了点头问：“办个信用社要多少钱呢？”

“3000 元就行了。”



“好！就拿3000元回去，抓实抓紧办起来吧！”

从此，何贤同家乡的联系更密切，对家乡的建设也更关心了。

为了改变家乡干旱的面貌，何贤出资在家乡建了一座“澄溪抽水站”，乡人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

为了支援乡里实现农业现代化，1958年何贤赠送岳溪乡3台卡车和2台福特森拖拉机；

为发展渔业生产，他捐赠了一大批捕鱼工具和5艘机帆船；

为提高乡民的健康水平，他捐款建了一座医疗站和一个体育场，后医疗站扩建成“澄溪医院”。

为活跃家乡父老的文化娱乐，何贤还捐赠了1台电影放映机。

继而他又捐赠2万元支持家乡发展生猪饲养……

在那段时间里，何贤对家乡建设的支援，还是零敲碎打的，且多局限在岳溪乡。

原因是当时他对县里的领导如何看待他，尚不清楚，所以他长时期不愿回乡。

郑德——如今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他于1984年卸任公务，可谓久经沧桑，饱尝春秋……

而他的记忆力却惊人地好，他向我们讲述了许多何贤当年的往事……

我们随乡人的习惯，把郑德老人称作“德叔”。

德叔1960年以前是搞工业的，并在番禺工业部任副部长。

1957年德叔从工业部被组织上借调出来，专门负责统战工作，具体就是加强与何贤等港澳人士的联系。

为何借调德叔呢？

因他也是从澳门回来的。德叔在国外出生，后来随家里人定居在澳门。

德叔是10岁回到澳门读书的。小学没毕业，抗日战争时期就随家人回到广东；16岁返故乡，他在自己的家乡中山又读了几年书。

我们把话题转回1958年，该是德叔已从工业部借调到统战部工作的时候。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对何氏家族拥有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1958年初春，何贤因事到达广州。

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接待了何贤。

他们吃饭时谈起祖国的形势，接着便说到家乡的建设现状。

黄施民建议何贤回家乡番禺看看，并且诚挚地说“番禺县的领导一定会热烈欢迎你，热情地接待你！”

这番话，使他想起了自己早已过世的母亲邓氏。

邓氏葬在岳溪乡应塘村后面的大松岗。

何贤已经快十年没回去祭扫了……

于是他爽快地回答黄施民说：“好吧，待清明节我回乡扫墓，就顺便参观参观吧。”

1958年4月的一天，何贤回到家乡。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回到故乡番禺县。

县里的领导们果然对何贤很尊重。县委书记郭信民、县长黎春华亲自出来迎接他，并且委派了前面提及的归侨干部郑德先生专门负责接待他。

郑德陪着何贤，回到岳溪乡应塘村去看望众乡亲……

乡亲们将何贤归故里视为村子里的盛事，都举家出门，涌向村头……

全村的大人小孩跟随何贤一行，上到大松岗邓氏的墓前拜祭。

而后郑德又陪同何贤等人到石楼镇参观，在区公所用午餐。

当晚，县人民政府设筵招待了他，县里的主要领导干部们都同他见了面。饭后，当地政府又专门为何贤举行了一个县、区、乡干部座谈会，何贤与大家谈得非常热闹，直至深夜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早在 1947 年，何贤就和哥哥何添一起捐资扩建了岳溪学校。

而此次回乡，他捐资兴建的岳溪抽水站也已经竣工，有人建议命名为“澄溪抽水站”，居然也被乡里接受了。

这小事看上去天经地义，对何贤却是鼓舞甚大，因为他从这些小事中得到一种证实，那就是乡亲们对他们何氏家族已经没有任何歧视。

而何贤天生就是一个孝儿。他的父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纪念，他感到无限欣慰，也就更加眷念家乡了。

所以从这次回乡之后，何贤对家乡建设的资助，就不只限于岳溪了。

番禺县的重大建设项目需要何贤支持，他必慷慨解囊；有时政府没有向他提出请求，他闻讯也会主动予以捐助。

仅是 1958 年至 1959 年两年中，何贤就给县里送回了大小汽车 75 辆，汽车引擎 10 多台，汽车零配件 40 大箱，拖拉机 12 台，大型发电机（连动力）6 套，以及柴油、汽油、机油等约 2000 桶（每桶 2 百公斤）。

此外，还捐赠了大型拖船一艘，平床、刨床、钻床共 10 台，拖拉机 7 台，以及药品、农药、菜种等一大批，约值人民币 400 万元。

番禺兴办造船厂时，他又捐资 6 万元；

创办华侨中学时，他再赞助了 3 万元。

至于“大跃进”后，内地出现连续三年大饥荒的困难岁月里，何贤为支援家乡恢复生产，为帮助众多乡亲度过难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予财力物力上的资助——因次数太多，究竟他一共拿出了多少钱？连何贤自己也记不清了……

1960 年，郑德先生被调到统战部当部长，那时他与港澳人士接触最多，也最知道何贤的爱乡所为。

从德叔提供给我们真实材料中，还可搜出 70 年代以前的一些数据：

1964 年，岳溪乡遇到了天灾，何贤那时即向家乡捐赠了一批日本化肥；

1969 年，他又给家乡捐赠“么利士”汽车 2 台，“啤阔”汽车 3 台；

1960 至 1962 年的三年间，何贤以外币存款的方式，为番禺县进口化肥 2000 吨……

要知道，这都是文革前的捐赠数字。

文革前，400 万是个了不得的数字，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也没有今日之开明。

何贤那时为国为乡倾囊倾力，也未必人人都赞同。

他有时还会心存余悸，但无论怎样，他还是执意做了，以一言一行，做了很多造福桑梓的好事。

现今的岳溪乡应塘村委书记梁汉田，对我讲述了 1959 年，发生在经济困难岁月里的一段传奇故事……

1959 年，在梁汉田的记忆里，家乡很穷，很多人还是没饭吃。直至文革

岁月，乡亲们还是吃蕃薯，吃萝卜，吃芭蕉芯和芭蕉头，吃那些从稻谷中拣出来的糠做成的糠饼……

然而居然有一段日子里，他们吃到了“何贤小麦”做成的饼，那凭着“麦饼证”领到的“何贤饼”，现在回味起来仍觉得好香好香……

哪儿来的“何贤牌”麦饼呢？

说来，好有传奇色彩呢……

番禺稍稍上点年纪的人们，无论干部抑或乡民，几乎人人难忘这件事——

1959年秋天，当时香港一面粉厂在澳洲购进了小麦2000吨，准备运回香港加工成面粉。

天有不测风云，这艘装满小麦的货船在途中不幸触礁，全部小麦就沉落在太平洋公海上……

因那个香港工厂已购买了保险，所以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保险商负责赔偿。

保险商想尽量减少些损失，便想将对批小麦进行拍卖。

拍卖底价，约为原价的五分之一。

而实际上受水浸的小麦不过才20%，将这批小麦作粮食或饲料可是太便宜不过了！

所以政府拟将这批沉船小麦购入，以解决农民粮食及饲料的匮乏。但是这批货能否批准进口，还是未知数。

何贤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慨然应允缴付全部款，并向有关部门领导请示，请求批准将小麦报关进口。

何贤又掏钱雇船，将太平洋公海中沉落的小麦全部打捞起来，并在一星期内及时运返故乡。

当时按照何贤的建议，拨给番禺县五百吨小麦，其余送往顺德、南海等地区……据梁汉田书记所忆：那时岳溪村民和顺德村民按人头计，每人分得小麦50斤。

这批小麦在当年经济困难、粮食短缺之时，实在是有如杨枝甘露啊！

若不是何贤鼎力相助，出钱出力，还实在不易得到呢！

历史的记忆中，番禺人不能遗忘：

“那次何贤把小麦运回家乡，很多人都受惠于他！”

“当时我记得，那小麦是救命救灾的粮！人人都知道谁给送的救命粮，我们都称何贤真是大好人！”

而如今，在市侨办工作的“文人雅士番禺通”梁谋先生，也更为清晰地向我回述起当时的情景：

“记得1959年9月1日，我刚刚到了市桥（番禺城）工作。那时马路街道很窄，道路两边却全是小麦！全是何贤捞回故乡的沉海小麦呀……那的确是十分特殊，也是让人无法忘记的一段情景……不光是农民吃到这小麦，我们干部也能吃到。困难年月里，这批小麦很管用，记得我们这些人每月可以买12个麦饼。”

梁先生所忆的麦饼，大概也就是所谓“何贤牌麦饼”吧。

由此可见，“很多人都受惠于他”确实不假——乡下人城里人，那年月曾经拥有过一段共同的“饼济”，一段共同的甘苦咀嚼……

现在看上去，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然而，何贤的漫漫回忆里，它却是最真实、最感人、最难以抹去的“被海水浸湿”的怀旧篇章。

## 第二十三章 文革浩劫 忧愤焦心夜无眠

文革岁月，何贤好似“吊篮植物”活在半空，他的心灵第一次遭遇信念的迷失而“找不着方向”……

心灵黯淡的岁月里，澳门又枪声大作，政府枪口对准老百姓，由此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12·3”惨案，也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居民“反迫害”斗争……

有一首怀乡诗叫《吊篮植物》。

诗中有一段表述了游子对故乡十分复杂的情绪：

“你的枯槁能为你说什么呢

你委实不想说什么了吧

在这样的气温下

反正离乡背井了这么久

说什么也不好……”

何贤先生不是诗人。

而我记得，倘若他在文革岁月里读到这几句诗，定会心生同感，或许还会怆然泪下的吧……

何贤爱乡爱民，从来没记过哪笔“账”。

仿佛他平日里喜好接济或借钱给那些穷苦人，却从未想到要他们感恩报答一样……他给家乡的笔笔捐助，也从不希冀有任何补偿。

何贤，他只不过出于一颗质朴的赤子之心，见到家乡贫瘠寒伧，见到乡亲生活困苦，便觉得自己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这是他对故乡的一点真情厚意。

他没把自己当成“乡客”，况且，他受到过国家最高层领导人的关怀与厚嘱，他更觉得自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一切爱国言行都成了罪过。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接待过他的县委、县府领导人说成是“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把接待过他的政府干部，说成是“丧失立场”。

把他父亲名字命名的“澄溪抽水站”、“澄溪医院”、“澄溪体育场”等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

当然，何贤远在澳门，他没有直接受到大字报的批判，没有挨“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斗争和拳打脚踢。

但这一切事实，他都听到了，听得心痛不已。尤其是听到接待过他的干部们受了不少苦，而他在番禺的亲属也屡受牵连，他非常懊恼愤闷，茶饭不思，夜夜难眠……

回述这段历史，我们广大的中国民众并不陌生，且知道这种心灵的磨难，岂止非何贤家族在承受。

只不过由于“隔岸观火”，令何贤百思而不解，心伤又无助，倒是最最真实的。

何贤，和许多的中国人一样，忍受着一个时代赋予他们的最深重的心灵苦难……

他的情绪从来没有这么低落过。

和1956年那个亢奋欣喜的北京之行相比，他的心从天上跌到了幽幽深谷

里……

自从内地开展起铺天盖地的“文化大革命”后，开头他还单纯地望文生义，以为是文化界出了什么大问题，需要搞一场运动来解决，他估计风暴再猛，也会很快过去的吧。

哪知，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了。

因为，简直不能相信的是——连他的好朋友、那些共产党里最优秀的人才：廖承志、柯平、饶彰风他们都接二连三被打倒了！

何贤的心，如沉落大海，只不过这一沉，无人替他打捞晾晒，无人能予他往日的温暖与关怀……

在何贤以往并不平坦的生活阅历中，也曾遇到过许多不如人意的事，如银行挤提，与某个公司做生意亏蚀失败，但那都是经济上的事非，只要弄清原因，采取相应对策，捱一阵子总能雨过天晴，柳暗花明……

哪怕与国民党特务几次周旋，他几次遭杀身之险，都没有低过头、服过输。因为他胸怀磊落和，便无所畏惧，傲然行世，做自己乐意做且有能力做的一切义行……

可如今碰到的问题却牵扯到了信念，

他平素所崇拜的人，据说只不过是“泥半团”。

怎么会？他何贤，是通过这些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也是通过这些人一步步打开人生新章，同新中国政府有了共识和接触的。可现在，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坏人”，被撵下了政治舞台，被时代口号所鄙夷乃至唾骂……

何贤感到惶惑，空虚，沮丧。

最刺心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咬噬着他的灵魂……

而心灵的无着无落，令他体尝到人生最难捱的寂寞，最深刻的孤独。

然而无独有偶。

文革时代，内地火药味儿正浓，可何贤所在的澳门也不得清静。

他还未来得及深思，澳门又添一大乱……

文革时期，大陆乱了套。黑的白的，仿佛一夜间都颠倒过来似的……

那是一个失去理智的乱世，这乱，又仿佛象愁云雾霭一样开始蔓延，终于延到澳门去……

当然，澳门的这次动乱与内地的文革运动并无直接关联，我只是意在比喻，它在何贤已消沉不振的愤懑中，无疑凭添了一层更浓厚的阴影。

而多年以后，何贤向人讲述这段日子的经历，恰好印证了我的猜测。

1966年的澳门，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情的起因，用何贤的话说：“本来只是好小一桩事，起因只不过是芝麻绿豆大。”

1966年11月，澳门氹仔居民自筹经费，修建工人街坊学校，以解决子女入学问题。工人学校修葺门面，筑起了排栅，也粉饰了围墙，却忽视了对政府做个人情这形式上的简单事。

澳门当局也就找茬儿寻事。认为工人们未经办理建筑报批手续，便横加阻挠，强迫他们停工，并下令工人们立即将刚建起的校门和围墙拆掉。

当时如果有何贤这等人士及早知情出面，同澳葡当局论理，说说情，补办个手续，事情也就简单了。

可氹仔工会（也叫工联）一下子就与当局对峙起来，事情便恶化了。

11月15日，葡警气势汹汹来拆墙，工人们即上前阻拦，双方大动干戈，

大打出手。

结果，自然是枪杆子硬过“铁拳头”；葡警打伤了一批工人，后又将居民派出的六名工会代表拘捕。

那阵子新澳督还未到任，澳门由市政厅长代督。而陆军司令把人关起来，一个都不肯放出。

澳葡当局还扬言，要将六位代表移送司法处法办。

氹仔工联找到崔德祺出面保人。

崔德祺找葡澳当局交涉，答应送人情补手续费，只不过要求，先将这六人保释。

那个陆军司令态度十分强硬，就是不肯放人，并说：“即使这些人保释后仍然要罚款。”

工人们一听跳起来，群情激昂，在全澳门举行罢工罢市，并成立了行动小组，以对抗澳葡当局。

事情已发展到绝然对立的白热化，倘若澳门政府能稍为收敛其嚣张气焰，作出理智的让步，事情也不难平缓过渡。

然而当工人们集合起来到总督府表示抗议时，澳葡当局更是变本加厉，出动一队警察殴打抗议的群众，将四五人打成重伤，事态由此更加扩大到不可收拾。

警方继续捕人，连到现场采访的《澳门日报》记者也被他们抓走了。

11月18日，氹仔居民向澳门政府提出了严惩制造流血事件的肇事人等五项要求。

工联理事长梁培来找何贤商量，希望何贤能代工人们出面，召开全澳各界同胞代表开会，声讨澳门当局抓人打人的暴行。

何贤也觉得澳葡当局欺人太甚，他没有理由推辞，应该为同胞说话，尽管他心里也滴着“血”。

何贤深夜造访柯正平。

跟柯正平交换过意见后，何贤便决定站出来支持工人同澳葡当局抗争。

11月22日，何贤主持召开了澳门各界同胞代表大会。各界代表在会上——历数澳葡当局制造氹仔事件，迫害工人及镇压中国同胞的行径。

翌日，澳门所有报纸摘登了这些声讨发言。

11月25日下午4点，新澳督嘉乐庇到任。

他来得可真不是时候。

澳门市政厅举行欢迎仪式，通知何贤出席。

作为立法委员的何贤，每逢历届澳督履新，他必然热烈欢迎，并且亲自上门拜访。

唯独这一次，他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冷淡。

何贤说：“澳门政府同澳门民众对立，氹仔血案不处理，我不参加！”

直到11月28日，嘉乐庇上任的第三天，何贤才带着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到澳督府见嘉乐庇。

此次来者不善，“华人宾客”们不是拜访新澳督，而是向他投诉的。嘉乐庇心怀不悦，却摆出绅士的架势，跟他们打哈哈，扯东道西，就是回避关键的话题。

何贤早没了往日的情致，更没有同澳督周旋，开门见山就慷慨陈词，严正指出当局警方制造氹仔血案以及处理过程的蛮横态度。

嘉乐庇面对澳门华人的头面人物，不敢恼怒，只换了一种语气扯皮道：“当时处理氹仔学校围墙争端一事是有不妥之处，殴打工人一事也有待我们慢慢调查后再作处理。”

官方的扯皮嘴脸暴露无遗。

他的话说得似乎中肯，其实只是虚与委蛇，“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事后并没有真正着手处理此事，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措施和行动。

澳门各界民众忍无可忍，再次怒发濠江。

1966年12月3日，当许许多多澳门的中国师生集结起来，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到澳督府前提出抗议示威时，血腥事件再次爆发。并且这一次，酿成巨大的骇人听闻的惨案……

当时学生们要澳督出来回答问题，群情激愤，而且中国同胞一路上不断地参加进来，使得示威的阵容愈来愈壮大。

中国人的口号声、呼喊声和抗议声此起彼伏，响彻云天。

澳督自然躲起来不敢出来，但他们却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来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

这一来无异于火上浇油，更加激起师生民众的愤怒！

人们赤手空拳地与葡警展开了搏斗……

示威的群众乱成一团。搏斗中，有的口吐鲜血倒下，有的捂着胸口眼脸仇恨地扭曲着，有的仍在呐喊，振臂向前，也有的毫无畏缩，径直迎着枪口倒下去……

还有的在挣扎和拼命抵抗中，被强行抓走……

澳督府前，血流如注。

“撤退！救人！”领先者们一声令下，人们马上投入了抢运伤员的工作；澳督府前，很快归于死样的沉寂，只留下一滩滩血渍。

而空气也仿佛窒息，凝固了血腥的气流……

可再看镜湖医院这边，却像一锅煎烫的滚粥——

受伤者的痛苦呻吟；

死难者家属们撕心裂肺般的哀嚎痛哭。

仅仅是瞬间之隔，人间又酿大祸，一切都是人为的事件。

中国人的生命，又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任洋人的兽心随着蹂躏，发配到地狱和无际的黑暗中去……

而大多死难者，都是青年学生，他们，刚刚还是那样英姿勃发，热血涌涌。

现在，却横卧在医院中……

澳门陷入了血色的恐怖。

当澳督府响起罪恶的枪声时，何贤，正在大丰银行开会。

他一接到这个惊人的消息，立刻宣布散会，叫人通知司机，马上开车赶赴镜湖医院……

何贤向医院领导提出“尽一切努力抢救伤员”的要求，并同他们一起紧张部署抢救工作。

他巡视过所有伤员，而后，慰问了死者的家属。

何贤的心绪，没有什么文字可以准确表达：愤、恨、伤、痛、哀？

都仿佛不准确。

或许，用心“僵”，来形容他彼时彼刻的情绪，似乎更贴近真实吧？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极大的可能，即是何贤当时心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无从想象。

他做的一切工作都出于本能的反应，因为这些死伤的人们太无辜了！

“十二月三日，当澳门的中国师生前往总督府抗议时，澳门政府又出动了警察进行镇压，紧接着，实施戒严，加派武装军警，枪杀中国居民。在此次不幸事件中，共打死八人，打伤二百一十二人，逮捕六十二人。”

此段文字载于 1966 年 12 月 19 日澳门《大众报》。

而这，就是发生在澳门历史上的“12·3”惨案。

“中国同胞的鲜血不会白流！”

“血债要用血来偿！”

浸在血泊中的澳门，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滚烫的岩浆在地下奔涌，一旦喷出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何贤从医院回到家，想起箭在弦上的紧张局势，随时可能一触即发，而如果再让手无寸铁的群众拿血肉同子弹抗衡，那损失无疑还会更惨重。

冲突，再大的冲突，在何贤的经验看来，还是通过谈判才能解决。

但当时澳门居民正沉浸在悲愤之中，而且受到“文革”运动的影响，工人大众正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誓死同葡澳资本主义斗争到底”；这种激动的情绪最易被挑动起来，引火上房，烧个天下大乱。

实在是非常危险哪。

当晚，何贤联名澳门社团各界，特地发表了广播讲话。

他告诉居民：“现在事件正在协议中，请大家安定情绪。”

第二天，何贤又发表谈话，正告澳门政府。他说：“今天中国人之团结是不可侮的，澳葡当局应负起此次事件的全部责任。”

澳葡当局屠杀中国居民，这个严重的暴力事件当天就汇报到北京。

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处长，于 1966 年 12 月 9 日奉命发表声明，向澳葡当局的法西斯血腥暴行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谴责澳葡当局在“11·15”事件和“12·3”惨案中对市民的镇压。

同时向澳葡当局提出了四项条件：

一、立即无条件接受澳门氹仔地区中国居民在 11 月 18 日提出的五项要求；

二、立即无条件接受澳门中华学生联合会在 12 月 5 日提出的五项要求；

三、立即向中国居民赔礼、道歉，并严惩主要肇事者：陆军司令施维纳、警察厅长傅基利、警察厅副厅长颜民、代理海岛行政局长晏德地等；

四、切实保证今后决不允许蒋匪特务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并把 1963 年 6 月澳门葡萄牙当局侵入中国水域抢走的七名蒋匪特务立即交还中国政府处理。

这四项条件都是十分庄严和凌厉的，是令澳葡当局很难吞咽的。

接着，12 月 10 日，澳门各界同胞举行抗议大会，也向澳葡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这六项要求更具体：

1. 立即严惩出动警察杀害中国居民的罪魁祸首施维纳等人；

2. 立即撤销戒严，保障澳门华人的的人身安全；

3. 立即赔偿损失，为死者开追悼会；

4. 立即公布伤亡者名单；

5. 立即实现氹仔办校要求；

6. 立即向澳门有关华人组织签字认罪，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就在澳门各界和葡人进行斗争的同时，国内同胞也纷纷表示支持，各地人民纷纷集会示威，抗议葡澳当局政府的法西斯行为。

12月11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又以《严厉警告葡萄牙当局》为题，发表有关这次事件的评论员文章。

愤怒之极的澳门民众，又将澳葡侵略的象征、曾于1849年带领葡兵袭击中国关闸并杀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军曹咪士基的铜像拉倒，以表示澳门华人对澳葡侵略扩张的反抗。

不难想见，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澳门发生的这场暴力事件，完全有可能升温为民族矛盾，并演变为殖民地人民反帝反侵略的斗争。

澳葡政府慑于舆论，迫不得已于12月12日，口头上接受了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提出的四项要求。

但他们的“接受”只是停留在嘴巴上，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而是一直采取拖延狡赖的手法，企图蒙骗过关。

直至1966年12月19日，广东省人委外事处再次通知澳督嘉乐庇，限他于72小时内派出代表并携带实现四项条件的具体方案，前往拱北同广东省人委外事处的代表会谈。

澳葡当局被逼进“死胡同”毫无退路的情况下，才派出由政府秘书长波治和立契官宋玉生组成的代表团，在商会理事崔乐其陪同下，前往拱北地区参加会谈。

与此同时，澳门各界同胞也推举出他们的代表组成一个13人小组参加谈判。

何贤是这个组的头头，他们观点一致，又齐心。

在反反复复的谈判过程中，澳葡政府代表常常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推卸罪责，妄图赖帐。

何贤等“民众代表”就针锋相对，用一系列真凭实据加以驳斥抨击，把澳葡的代表们“将”得无处躲藏，噎得喘不过气……

然而“洋抵赖”们非常狡猾，躲不过的事实，今日承认了，明天又反悔，而且处处节外生枝，咬文嚼字，耍弄言语措词的游戏，以拖延解决实质问题的时间。

那期间，澳督发表了几项公告，宣布解除这次事件主要肇事者的职务，包括陆军司令、警察厅长、副厅长和代理海岛行政局长等。

但是在《澳门政府对中国居民各界代表所提出抗议书的答复》中，即一改再改，并指责是中国居民引起了这场“骚乱”。

在谈判交涉中，他们有些词句的中文本改了，而葡文本却坚持不肯修改，其中光是为“认罪”二字，就争吵了好多天。

因此，何贤等代表们往来拱北十多次，谈了40天，中葡文本的文字仍旧无法统一，无法达成共识。

于是澳门的中国居民代表一百多人又举行会议，决定从1967年1月25日起对澳葡当局采取三项制裁措施：

1. 不纳税款；
2. 不出售一切东西给澳葡当局机构及其官员；
3. 市内一切服务性行业一律抵制葡籍官员。……

直到 1967 年 1 月 27 日，事情有了突破性进展。

这一天，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发表强硬声明，指责澳葡在会谈中玩弄阴谋诡计；警告他们必须立即对广东外事处的四项条件和澳门同胞的六项要求作出明确的答复，“否则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这下，澳葡当局才真正紧张起来，派出立法会副主席左次治代替宋玉生参加会谈。

到 1 月 28 日上午，澳葡当局才彻底认罪，接受了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的四项条件和澳门同胞的六项要求，并将认罪书的中文本和葡文本内容完全统一起来，达成协议。

1967 年 1 月 29 日，澳督嘉乐庇亲自前往澳门中华总商会三楼礼堂，在何贤等十三名代表面前，签署了对澳门同胞的认罪书。

之后，以秘书长波治为首的“澳门政府代表团”即前赴拱北，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代表，呈交由嘉乐庇签署的对四项条件的实施条款书。

澳葡政府的认罪书基本上承担了制造惨案的全部责任；

澳葡政府如实禀报了“11·15”和“12·3”两次暴力惨案的死伤和逮捕中国居民的数字；

澳葡政府承认这是主要肇事者的责任，并宣布已将其一伙人撤职查办；并先后依法撤销四名当局官员的一切职务，已将施维纳为首的四人驱逐出澳门，着令他们回葡国听候审判治罪。

而接下来，澳门政府向此次事件中的死难者家属、受伤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种损失的受害者，以及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认罪、赔礼，并表示深切的歉意；

“政府”决定接受中国居民代表提出的六项要求，并即付诸实施；

“政府”决定承担死难者的全部丧葬费和抚恤费；承担受伤者的全部医药费；赔偿由此事引起的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损失。

——所有上述赔偿费用核实共计葡币 205.8424 万元；

由澳门政府以现金支付，恳请澳门各界中国居民指定的机构代为分送。

澳门政府还宣告当即撤销戒严令；

全部释放在此次事件中的被捕者，并撤销其有关档案；

对氹仔事件中被捕的中国居民的无理判决及有关档案，亦予以撤销；

承认氹仔中国民众改建校舍的正当要求，补办手续后，该项工程即进行；

澳门政府接受《澳门日报》关于记者在采访中被逮捕的抗议，保证今后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

澳门政府再一次对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表示歉意，切实保证中国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维护其正当权益；

除此外，再次切实保证今后决不允许蒋匪组织在澳门地区进行任何活动。

——这就是澳葡政府认罪书条款的全部内容。

“12·3”血案的发生，是澳葡当局毫无自知之明，对中国政府和澳门的中国居民做了错误的估计而造成的。

他们还想用旧的一套殖民统治策略，继续在中国人头上滥施暴虐，当然会得到头破血流的惩罚。

最终的结局，自然是澳门之中国同胞的胜利。

人们把 1 月 29 日定为澳门同胞反迫害斗争的胜利日。

这天天刚亮出“鱼肚白”，全澳门千家万户便都悬挂起五星红旗；当嘉乐庇在何贤等“十三人小组”面前签署了认罪书后，全澳门家家燃放爆竹，以示庆贺。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撼着整个澳门半岛，延续了数十分钟，人们似要透过这炮竹的鼎沸喧声，来释放压抑已久的哀痛和愤恨……

工联理事长梁培，主持召开了澳门各界同胞代表大会，何贤以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的身份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这次全澳同胞反迫害斗争，时间达两个多月。在两个多月中，一方面是澳葡拖延，另一方面是全澳爱国同胞坚持斗争。今天我们取得了第一步胜利，但今后我们不能松懈斗志。在澳葡当局签字后，仍要其彻底履行诺言，这中间还是要斗争的。”

时隔十几年后，何贤与人谈及这次事件，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总理。

他说：“那一次，好在周总理全力支持，否则都很难搞。因为那阵，虽然是文化大革命中，但周总理仍然有权。他研究过，认为可以解决就解决，一点都没下命令让澳门乱上添乱。”

“那时候我们日日开会，熬到天光大亮，侥幸终于搞掂（好）！”

何贤这句淡淡的“侥幸终于搞掂（好）”，说来似轻描淡写，其实是个中危机，有不足为外人所知晓的惊险和难言之苦衷。

那些日子的事，即使用“危在旦夕”来形容，也是毫不夸张的。

中国人在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亦赢得了民族尊严的提升；

但我们亦为此付出了相当惨痛的生命代价。

“12·3”惨案算是有了公正的说法，合理的了结。

两个多月以来，为了这个事件，何贤的心情非常不好，悲愤、忧伤、焦灼、不安，使他常常无法安定情绪。

今天虽然在同澳葡政府的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无论如何，在整个事件过程里，中国同胞死伤太惨重了！

何贤总觉得这个事件是不应该发生，更不致弄到这种境地的。

他感到很累。

他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累……

“12·3”事件的愁云惨雾，在文革的岁月里，多少冲淡了何贤个人心灵遭际的悲欢与冷暖；

作为一个富有正义良知和社会使命感的中国人，何贤尽心尽力扮演了澳门历史赋予他的那个角色。

## 第二十四章 港兴停航 仗义加盟为众生

1968年6月28日，澳门港兴船务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亏蚀，宣告停航。这意味着澳门对港客运交通的“血脉滞阻”，因而严重影响民生，人们日夜期盼复航。

何贤手间稍有周转，便将一笔款主动借给港兴解“燃眉之急”，不料港兴老板执意要何贤入股港兴以谋长久之计……

眼看着港兴码头售票处前滞留的焦急百姓，“贤哥”横下一条心：“帮人帮到底”……

1968年6月28日，澳门各大报章均登出一条新闻——港兴船务公司属下的八艘汽垫船和三艘客轮停航。

不了解澳门地理情形的人，不会注意到这样一条新闻告示，对澳门的居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澳门三面环海，可它没有自己的机场和深水港。

因此，对外交通上它几乎全凭香港这个中转站“舒筋活血”。

而港兴船务公司的客轮和飞翔船，则是往返香港与澳门之间的重要交通工具，它们一停船，便意味着澳门对外客运交通大部分中断停滞。那时，内地尚未对外开放，经拱北至广州中转，再到香港，路程曲折、耗费时间不算，单说入关出关那些手续也是麻烦太多，太不方便！

客轮宣布停航后，新码头附近港兴船务公司客运售票处门口，每天都挤着一大堆急于离开澳门的人。

等票的人们天不亮便在售票处门口排队，心中期望着奇迹出现重又开航……

无奈，停航的告示还是“我自岿然不动”地贴在那儿，急得人们干瞪眼，束手无策。

在这群人当中，有个姓冯的客商。

冯先生此行过香港去，要和一个客户谈笔大买卖。

因为近来一段时日，他的公司老是不景气，现在好不容易拉到一笔生意，对方约去香港面谈，一旦去不成，对他的公司可就是一个沉重打击呢！

冯先生从码头回到写字楼，立即挂电话给香港的客户，告知这里因船舶停航，一时间难以过去香港。

对方明了冯先生十分看重这笔买卖，便带着大有乘人之危的味道回答说：“我明天去欧洲，一个月后回来，到时我们还可再谈。不过，如果冯生一个月后仍不能在香港露面，我便只好另外找人喽。”

冯先生挂上电话，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心里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固然，他可以提早转道广州到香港等候，但没把握到香港要等多久，这里的生意谁来料理呢？

再说，如果等那个客户回来后约时间，也不一定能依时应约，那客户实在刁钻不好相处，知道你赶着他，他便往往提前一天才约你，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左思右想，越想越急，冯先生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只是一门心思盼着港兴快点复航。

又过了几天，冯先生和几位商界朋友在茶楼饮茶，谈到港兴的停航，人

人也都忧心忡忡。

有人说，港兴是因财政上的原因停航，资金周转不灵，若是没有一个大户加入，恐怕短期内难以复航；

而另一位说，港兴亏损已非今日始，这个“泥坑”谁愿抬脚踩下去？指望大户加入，难啊！

听他如此一番话，大家刚起兴的心又象上了岸的鱼，没扑腾两下子，便又打蔫儿不作声了。

大家都感到无望极了，心情沉重如铅。

忽然，又有一个人终于打破了沉默说：“只有一个人可以挽救这个局面……”

“谁？”大家都焦急地等着答案。

“贤哥。”

那人提高嗓音说出这个名字，便接下补充道：“各位都还记得澳门制水吧？”

此言一出，众人纷纷点头：“对呀！对呀！救危解困之事，唯贤哥方能出血出力的。”

大家都记忆犹新，当年澳门缺水，就是何贤一马当先予以解决的。

如何之原委呢？

澳门是个半岛，面向海洋，没有大山，无水塘储水，且水井很少，水质不佳，其食水向来要从中山的前山（现属珠海市）运来，所以澳门从1932年就创办了六和自来水有限公司。

该公司1935年8月1日与澳门市政厅签订了专营合约，期限为60年。

而过去澳门自来水厂供水系统没有滤水和配水部分，又缺乏淡水资源，所以除在青洲河抽汲河水外，其它地方都是抽汲海里咸水。

虽然珠江口的近海水域的水不是太咸，但毕竟不能饮用。而青洲河水量很小，到了50年代初，六和自来水公司供水陷入“巧妇难为无米炊”之窘境。

所以1958年至1968年的10年间，澳门当局曾四次宣布制水，累计达457天，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

1968年，自来水公司董事会改组，何贤挺身而出自愿担任董事长。

谁都知道，像自来水这一类城市公用事业，是很难赚大钱的，仅可以说造福市民百姓吧。

因此何贤上任后锐意经营，利用他与内地的关系，多次到广州和珠海，与省政府和珠海县政府商谈彻底解决澳门用水的问题，取得中国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经协商，澳门自来水公司先后在中山县（珠海）的仙洞、银坑建两座容量为300万立方米的水库，于1960年3月8日建成，每日向澳门输水7千至1万立方，初步解决了澳门水荒……

念及此事，茶桌上的人们都纷纷主张请何贤出来收拾港兴的停业局面。

可是派谁去当说客呢？

有人一指说，该是冯先生去最好，因冯先生与贤哥有老交情。

冯先生一听连连摆手道：“什么老交情！贤哥与我原本素不相识，那次我有难，托人求到贤哥，贤哥够仁义，二话没说就帮了我。那救命之恩，我还没报呢！”

人们忙道：“不管怎样，你与贤哥打过交道，去找他还是最合适啊！”

冯先生还有点犹豫：“上次求了人，大恩未报得，这次又去求人，真有点不好意思。”

众人中有一位却说：“冯先生可不该这么想。港兴停航受影响的人又不只是你冯先生一人，澳门百姓都因停航影响生计呢？你又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澳门百姓去请贤哥帮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也有人嘀咕：“去试试也好啊，也说不定贤哥已经考虑怎样介入港兴，解决停航困难呢！”

冯先生来到何贤的办公室，何贤正在打电话。

冯先生听见是讲筹一笔钱的事，心想贤哥生意场上的事旁人不便听，便想退出去等。

何贤见状，用手势示意他在沙发上坐下。

何贤接完电话，站起来说：“很久没见到你了，生意好吧？”

冯先生赶忙站起说：“托贤哥的恩德，生意还不错！我这次来是应一班朋友的嘱托，请贤哥再过问一下港兴的事。”

何贤笑笑说：“坐下谈，坐下谈。情况我都知，港兴停航，使澳门大众有诸多不便，我也正想帮他们一下。不过我个人力量有限，还需要其他人帮忙……你听到么？我刚才打电话筹钱，也就是为了港兴。”

冯先生听到何贤已投入精力在帮助港兴了，心里感动，嘴上却不知表达什么。他反正放心了，稍坐片刻也就辞别贤哥出了门，心情也开始明朗起来。

再说何贤这边，刚一听到港兴停航的消息时，便马上意识到它对澳门生活的影响有多大了。

依他的性情，凡对大众有助的事，没有人出面相求他都会主动出手相助。

只不过这次港兴财政有困难，却刚好赶上何贤手头亦有多项投资，一下拿不出太多流动周转的资金，所以才暂时没有表态过问港兴。

而今天，冯先生来之前，恰遇有笔钱可以从别的地方调出，所以何贤一口就答应了冯先生的请求。

何贤当日下午就约见了港兴的老板。

港兴老板见来客是贤哥，满面愁云顿时散开，他下意识地感觉到“救命星”来了。

何贤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港兴有困难，停了航，全澳门人都深感生活不便。所以我来看看有什么事可以帮到你们……”

港兴老板紧握何贤的手说：“贤哥肯帮忙，我们就有救了。不瞒你说，港兴主要是资金周转不灵。我们借了银行一笔款，最近由于经营不好，光是还息就快倾囊了，连买油和支付工人的钱都没有，不停航又奈何！再没有出路，下期的息还不上，我只好破罐破砸，宣布破产了！”

何贤说：“我手头刚好有笔钱，虽然不多，但可以解燃眉之急。这笔钱你先拿去买燃料和支人工，把船开起来再说。船耗在码头不动窝，你怎么能找到钱呢？”

港兴老板于心不安地说：“贤哥肯借资，那是再好不过了！只是我们原来借的那笔钱还没还，现在再借，债台高筑，恐怕光是利息都难以负担……”

何贤豪爽地说：“这笔钱是我个人借助你，就不计息了。钱什么时候还，待你的公司周转过来再说吧。你要答应我的是，让港兴尽快复航。”

港兴老板感动得无言以对，唯有使劲地点头应允。

第二天，澳门各报纸及港兴公司售票处的布告栏，都刊出一条消息，说港兴各条船都将于三天后复航。

消息刊出后，市民们当然欣喜万分，愁闷全解。很多要离澳的人们都“呼啦”涌去买船票。

冯先生心中那份乐呵，更是无人能及。他障碍全无，只一心等那个客户从欧洲回来，就去香港谈那笔生意了。

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三天后，手持船票的乘客们到了码头，竟“当头一棒”地又看到继续停航的通告。

通告说，由于不知复航的确切日期，请持有本公司船票的乘客现去办理退票手续。

冯先生很快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他马上拨电话禀告“贤哥”。

何贤知道情况后，又赶去见港兴老板。

这港兴老板，显然是受了刺激输不起似的，他得到何贤借的款，仍感到“治标不治本”，救得一时救不了一世，最终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他很有自知之明，也丝毫不糊涂。

他深知港兴公司经营了这么久，很需要有新的投资者加盟注血，而不单是借几笔钱就可解决问题。

于是，他耍了小小的花招儿，到了原定要复航的日子，却又借故拖延复航日期，他是希望彻底将靠山拉上“贼船”，绑实了这根救命绳索，而干脆让何贤加入港兴，与他们一道“同船共渡”。

世上竟有这等人！令人哭也不是，笑更不能。港兴老板又苦着脸对“贤哥”道：

“贤哥，虽然你大方，不用我付息，但我总要还本啊！如果有你加盟港兴，公司能得到一笔钱，又不用背上债务负担，那就解决生死问题了。贤哥，帮帮忙！我情愿让出一部分股给你！”

听他这么一说，何贤倒着实犹豫起来……

暂时把这笔钱借给港兴可以。

但是要他投资港兴，他却没有心理准备。

这简直象是遇到“打劫”的了。

何贤也没感到大惊小怪，只诚实道出：“我回去想想，才能给你准确答复。”

不错，这样的事，换了哪个老板，都得想想才有答复。

然而，想想又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呢？

为何这样说呢？

因为从港兴老板那里一出来，便经过港兴售票处，而一见到那些急于离澳又万般无奈的人们，何贤就下定决心，不给自己盘算“后路”了——帮人帮到底，帮港兴就等于帮大众。

于是，何贤同意加盟港兴。

回到办公室，何贤立即给港兴老板挂电话，宣布购入大来等三艘客轮。

8月2日，港兴复航，这一次是真的，港澳间水上交通恢复。“贤哥”，为澳门百姓又立一大功。



## 第二十五章 大丰银行 支柱撑起中天日

60年代末，至七八十年代，是何贤一生经营大业的“后高峰期”。

他经营各项产业赖以发展的牢固基石，仍是大丰银行。

“大丰支柱”撑旺了何氏家业，令何贤的事业如日中天，不断向多元化的经济领域发展。

60年代末，至七八十年代，是何贤一生经营大业的“后高峰期”。

他经营各项产业赖以发展的牢固基石，仍是大丰银行。

前面书中已有提及，即何贤从40年代初期到澳门拓展事业后，一早便参与傅老榕和马万祺经营的大丰银号，从任司理到任经理，他的业务发展很快，他天赋的金融行业才能亦得到充分的施展与发挥。

到1970年，澳门当局颁布银行法，接受银号申请注册为银行。

于是大丰领衔行动，于1971年10月23日，正式注册为大丰银行。何贤担任大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以后数年之岁月中，大丰业务进展迅速，到了1976年初，其吸储存款额已逾亿元。

到1982年，其存款额达9.28亿元，成了澳门实力雄厚的银行之一。

何贤的经营之旅中，有经济官员罗保为其亲密合作伙伴和政府靠山，而20年的澳门生涯里，何贤又为社会做过无数好事，所以他在澳门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生意也逐日兴隆。

何贤在澳门以大丰银行为主要经济支柱，而这一“支柱产业”撑旺了何氏家业，令何贤的事业如日中天，不断向多元化的经济领域发展。

何氏家族门下，迅疾发展起一系列的产业如印染厂、纸厂、火柴厂、石粉厂、钟表行、地产、大丰仓库、大丰金行等。

这些企业和实业，大多经营得法，因而大丰集团的收入，亦成倍成倍地增加，使得何氏家业一直是澳门的重要经济力量。

前些年亦提到，被澳门人们暗地称誉为“影子内阁总督”的何贤，始终关注社会福利事业并起到重要作用。从抗战后期，他便投资于福利交通业，取得了澳门市内公共交通的专利权。

为了发展澳门经济，60年代末，何贤又积极倡议建跨海大桥。

建跨海大桥，为的是把澳门同南面的氹仔和路环两岛连接起来。

这里要说明一下澳门的地理概况：

澳门位于广东境内珠江和西江三角洲的南端，其范围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总面积为23.5平方公里。

澳门半岛三面环海，境内丘陵起伏，从东北向西南依次有望厦山、东西望洋山和妈阁山；中部有大炮台山；西北有青洲山；东部有马交石山等。

半岛北面通过关闸与珠海市拱北区相连。

半岛的南面就是氹仔岛，岛上也有大小氹山和北澳山等。

氹仔岛上有著名的东亚大学（后改为澳门大学）、赛马车场、濠苑城和五星级的凯悦酒店。

氹仔岛再南面就是路环岛。

路环岛上居民较少，有全澳门最高的山峰塔塘山（海拔174米）；岛的东南部有卫星接收站和著名的风景区黑沙环，以及竹湾泳场。

而此时，何贤意欲将它们连接一体，自然得到澳门各界人士和澳葡当局的支持。

于是从1970年6月18日开始，由何贤经营的澳门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了“澳氹大桥”的建造工程。

这是颇具规模的地域工程，从中足见何贤的魄力和勇气；

当然，还有实力。

经过四年多的施工，澳氹大桥在1974年10月5日建成。

大桥全长2569.8米，宽9.2米，连同两端的引桥，长度实际达到3449.1米；

桥中间孔最高高度达35.6米，最高跨度73米。

当时，澳门舆论界认为，何贤以4332万元的廉价承接额，建设这项社会民生工程，实在是为开发氹仔、路环西岛的各项事业，起到了铺天梯的重要作用。

“铺天梯”，恰如其分。

再来看看何贤经营的“自来水”业。

到了70年代初，随着澳门人口不断增加，还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何贤于60年代建的竹仙洞、银坑水库已满足不了澳门对自来水的需要。

何贤便又一次前往珠海市商谈，得到珠海市政府的支持后，在大镜山、梅澳新建两座水库。

随之在南屏河建抽水站；

在夏湾建水压站；

又在拱北建起水厂……

这样，何氏经营的澳门自来水公司，每天可以向澳门供水5万立方（1960年时供水每日7千至1万立方），大大改善了对澳门的供水量。

从这时起，澳门居民可以说真正彻底地摆脱了“制水”之苦。

何氏经营企业，可谓拓足荒远视野广阔、眼光独到，对新兴产业都能洞察先机。

何贤的理想相当远大，这是一个企业家必须具备的品格。

何贤不仅在港澳投资工商业，而且，他拥有拓展海外新天地的愿望。

早在1952年，何贤曾经请姚观顺（曾当孙中山先生的侍卫官）代表他到葡属帝汶岛，打算在该岛规划开发垦植业。

可姚观顺却不幸患了脑溢血，在送香港医治途中逝世。

故此，垦植大业不得不中途停了下来。

但是从中人们也可以窥见，何贤经营事业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从80年代开始，我国大量向澳门地区供应石油产品。

何贤面对这个新兴行业，又迅速采取应变的经济措施，开办了大明石油公司。

开句玩笑——何贤还很能追赶时代潮流呢！

大明石油公司，代理供应澳门来往广州、珠海、中山、汕头等地车辆的汽柴油；同时还为外商、侨商、港澳商在国内投资设厂提供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用油，办理澳门出售提油票券，而在广州、珠海、中山、汕头等地指定油站供应的业务。

大明石油公司，在我国外贸公司的支持下，经销的石油产品占澳门同类商品进口总值的40%左右；

其中煤油占 74%，轻柴油占 77%，对澳门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都有促进作用。

再补充说一下赛狗场的博彩业经营。

澳门是个典型的消费城市。

其博彩业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成为澳门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70 年代以来，随着澳门工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博彩业更为兴旺，而且带动了旅游业、饮食业、商业和当押业的发展。

澳门博彩业，除了人尽皆知——以霍英东、何鸿燊、叶德利、郑裕彤四人为主要股东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外，第二大博彩景观，就数“格力赛狗场”了。

“格力赛狗场”，就是本书第二十一章中详细提及的“逸园跑狗场”，以何贤、何柏、许以忠、闻祖舜为主要股东的澳门逸园赛狗有限公司的“格力赛狗场”。

赛狗公司，按规定每年只需向政府缴纳专利税 170 万元；

而实际每年缴纳的专利税达二千多万元。

“格力”赛狗场，每逢星期三、六、日晚上举行，每晚赛狗 14 场，每晚投注额多达 150 万至 200 万元澳门币。

入场票价分公众席 2 元，会员席 5 元，包厢席（6 个座位）80 元。

无疑，赛狗也是具有赌博性质的娱乐业。

但是澳门当局允许，而且已经成为澳门一项重要的经济支撑。对澳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和兴旺，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何氏家族于澳门拓展业务，数业并举，可谓多姿多彩。

何贤是个大人物，有着大气魄，落得大手笔……

然而，也有不少商界舆论和知情人士透露，何贤在经营企业的历史中，也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他过分相信别人，且没有一套完整的监督制度，以致给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例如他在香港办的一家独资公司，因为用人不当，结果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另外，何贤还有一个较为“古怪”的特点，就是与人合股经营的企业，从来不让自己儿子插手业务。

例如他与人拍档经营的地产公司，建了一幢大楼。

他的一个儿子要求接做装修工程，但何贤却不同意！

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么？

自己的儿子都不能“受惠”于爸爸的买卖？

何贤却说这样做会损害了拍档的利益。

“贤哥”做生意，究竟守的是生意之道，还是做人之道？

究竟是经营之道，还是人际之道？

总之，他宁亏自己，不负他人。

对他人，他永远主张“和为贵”。

## 第二十六章 百年树人 儒风清骨兴教育

何贤仅读过三年私塾，在今天看来可以算作无学历者，但是他见多识广，历经沧桑，最能够体会到的，似乎是“百年树人”大业之神圣。

他热心支持教育，赞助文化，痴迷艺术。这饱尝人生甘苦的“性情中人”，秉承着中国传统的儒风清骨……

从1941年起，何贤足足为澳门服务了40年。

这期间，他不仅担任了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会长；镜湖慈善会主席；立法咨询委员及“华人代表”……他还是澳门教育会会长，多间中小学董事长，以及东亚大学（现澳门大学）校董会主席。

何贤仅读过三年私塾，在今天看来可以算作无学历者。

但是他见多识广，历经沧桑，最能体会到的似乎是“百年树人”大业之神圣。

作为商家，他决非一个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之流。

他热心支持教育，赞助文化，痴迷艺术……

这饱尝人生甘苦的“性情中人”，秉承着中国传统的儒风清骨。

他的高风与义举，赢得了澳门人士衷诚的爱戴和敬服……

1948年6月17日，何贤为澳门捐建平民小学校舍一座，南湾八角亭图书室一座。

何谓八角亭图书室呢？

原来，在澳门的水坑口至荷兰园一带，过去有个南湾花园。

那里面积较大，花园内曾设有音乐台、喷水池、假山、酒水部……是葡国人节日时欢聚跳舞的地方。

后来音乐台、喷水池、假山都没有了，只剩下作为酒水部的八角亭。

1948年，何贤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的副理事长期间，便把那八角亭买下来，送给商会作附设的书报阅览室。

接着没多久，他又拿出1.75万元，把八角亭修饰一新，并且购置了一批图书，供人们阅览。

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八角亭完全演变为澳门一处别具一格的“文化景点”了。

四十多年来，“八角亭”一直成为澳门最具规模的公众书报阅览室，每当人们走进这里看书抑或读报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已去的“故人”——那关心文化公益事业的“贤先生”了。

听到澳门一些旧世文人不习惯叫“贤哥”，而是叫“贤先生”，我觉得很有意味。

1948年，或许是“贤先生”的文化年度？

那一年，何贤又和澳门一些爱国人士，集资创办了《澳门商报》。

但这份报长时间没能获得澳葡当局许可，所以到1950年，他们便将《澳门商报》改为小报《新园地》出版。

这份小报正式注册时，由“贤先生”出任担保人，交纳了1万元保金。

到了1958年8月15日，在以何贤为首的爱国主义人士的努力下，新创办的《澳门日报》正式出版。

自始至终，该报都是以“来自澳门同胞，属于澳门同胞，为了澳门同胞”

为宗旨的；

其一贯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致力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报导祖国改革开放情况，成为澳门各界进步人士的喉舌。

所以，这份日报办得很活跃，而且向多元化发展着。在那块方寸之地上，它无疑是澳门最重要的文化和舆论阵地。

再说办学。

澳门一向以民间办学为主。

50年代初，澳门人口只有四十多万，而学生已达四万多人。

大部份学生都在私立学校就读，而私校的开设又有各种形式。

何族崇义堂联谊会开办的崇义学校，就是在1955年由何贤倡议创办的，他还兼任了该校校长。

崇义学校收费低廉，每学期会员子弟仅收10元，非会员子女也只收18元。

该校开办第一年学生有六百多人，1957年学生已增至一千多人，是澳门办得最好的学校之一。

该校还开办免费夜校，并设奖学金和助学金。学校所有支出不敷之数，全部由何贤倾囊捐助。

何贤还被推选为平民免费小学董事会主席。

继而他再以银业公会的名义创办免费义学，收容失学儿童五百余人。

再往后何贤又发起行动，将“免小”和“免义”两校合并为镜平学校，并为“镜平”新建了校舍，增收了学童。

再看，有着悠久历史的澳门濠江中学，是在1932年建校的，何贤曾较长时间担任校董会董事长。

在任期间，他积极捐资扩建校舍，并设有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部，每期招收学生四千多名。

何贤的努力和倾心管理，使得该校又发展成为港澳颇具规模的中学之一。

再说大学。

1981年前，澳门是没有大学的。

何贤便率先倡议组建东亚大学，曾任该大学校董会主席。

东亚大学的校舍矗立在澳门氹仔岛观音岩上，占地16公顷。

自1981年3月28日开办，便设立“四院一中心”，即本科学院、公开学院、预科学院、进修学院和管理研究中心。

“东亚大学”即今日之“澳门大学”，这座氹仔岛上的美丽学府，对为澳门培养知识型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澳门由于地方太小，教育之历史底蕴不够深厚，所以大多富贵豪门之子女，都会前往国外深造学业。

但是，也正因如此，何贤倾心鼎力办学，资助文教事业，其归根结底为的是广大平民，为他们更多的子女孩童能顺利且及时地得到良好教育，以拥有光辉的前程。

在此意义上说，何贤先生为普及和发展澳门的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 第二十七章 醉红孤品 日夜兼程送故宫

不少外国收藏家知道宋代的“紫锭洗”和清代的“醉红”两件珍品在何贤手里，便都千方百计想把它买到手，可何贤就是不卖，说这是中国的国宝，要送回祖国去。

何贤说到做到，他和夫人陈琼，在黄子雅的护卫下，搭乘火车，日夜兼程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

1958年春天，正值广州美术馆建馆的第二年。

关心祖国文化事业的何贤，又为广州美术馆馈赠了一批宝物。

那是什么呢？

原来，为了充实该馆西方油画的馆藏，何贤一次性从香港购买了英国菲尔氏复印西欧名画206幅，并通过当时广州市市长朱光，将这批名画复印品送给广州美术馆收藏。

现在已是广州美术馆副馆长的谢文勇，当时受单位委派接待何贤，并正式接受了何贤的赠送。

那批油画复制品，是自西欧14世纪开始，包括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优秀作品。其中有古典派、学院派、浪漫派、写实派、印象派、后期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以及现代各个流派等78位著名画家的作品；更有象意大利绘画大师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现实主义大师柯罗的《桥影流光》等经典画作。

这对研究西方之油画，无疑是一批极为可贵的资料。

而广州美术馆，也曾在1959年、1980年和1983年多次组织该批作品的展览活动，受到广州和各地许多动画爱好者的欢迎。

何贤的艺术品味，不仅是附庸风雅和乐善好施；

因为他本人就十分懂行，他热爱文化和艺术品，且一大特长与嗜好，便是喜欢收藏古董古画。

何贤在香港“昆泰集团”的办公室里，挂有许多名人字画。

80年代初香港艺人黄霑为何贤做的采访录中，说到“我一眼看到他办公室内黄独峰的山水画，忍不住就过去看……那是画家游七星岩写生送给何先生的作品，题了‘星湖烟霭’四字。”

黄霑叙说的这幅画之下角，还有个很精致的印章：“踏遍青山人未老”，于是黄霑感觉，那“恰好是眼前何贤先生的好写照。”

那时，黄霑“眼前的何贤”是72岁。

可是黄说何贤先生“头发乌黑得很，不细心看，根本看不出有半根白发；而即使是细心看，也只见他发边略有数根白头发而已。”

然而何贤却以一种玩笑口气告诉黄霑：“可能因为我的头发打蜡打太多啰！所以你看不到，其实我真是不少白头发的，我1908年就出世的呢。”

这就是真性情的何贤，这样的人与艺术文化结下深厚缘份，不足为怪。

也可能因为何贤在澳门的时间比较多些，所以“大丰银行”的办公室里的陈列，多了一些他心爱的古玩和名人字画。

在“大丰银行”办公室的一面壁橱里，有很精致的古玩。

而四周，都是大陆名画家佳作，有画家黎雄才的巨幅，也有叶剑英亲笔题字送给何贤的李可染佳作。

那批古玩中，最醒目是七个高矮相同、栩栩如生的清人坐像，单看其神态与衣褶，就知道不是工艺“行货”了。

这七个黑铜色的人像，是广东石湾陶塑手艺最好的一位清代名家师傅陈渭岩亲手塑造的光绪皇、洵贝勒、庆亲王、肃王、端方、张之洞与李鸿章的人像。

据说，何氏家族收藏的古董，有的价值连城，哪怕古董商曾出1000万港元买一件，何贤也不相让！

什么宝物如此稀罕呢？

这里有最值得一提的话题。

因为，有不少外国收藏家们，都知道宋代的“紫锭水洗”和清代的“醉红”两件珍品在何贤手里，便千方百计地想将它们买到手。

何贤不是最慷慨仗义之“哥”么？

唯独这两样东西，无论怎样打他的主意，他都死活不肯出手卖给人家。

“贤哥”也有吝啬的时候？

对。对这两样东西，他居然“吝啬到了家”。

何贤与人说：“这是中国的国宝，我要送，也得送回祖国去。”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给买主们候着磨着问来问去也不好。

何贤说到做到，心里一疼，送！

他终于松手割舍了宝物，将其送还“娘的怀中”。

后来，何贤和夫人陈琼一起，在黄子雅的护卫下，搭乘火车，日夜兼程地将宝物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馆展览。

博物馆负责文物的工作人员，睁大了双眼，喜出望外地说着：“这醉红花清代仅做了三只，一只烧坏了，一只被盗卖到日本，而今就只有这只了，真是无价之宝，无价之宝啊！”

后面的情景，自不待说，人人可作一番联想了。

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两件宝贝，何贤当初究竟又是怎样弄到手的呢？

何贤自己特意对人讲到过。这两样东西，本来是平地黄的收藏。据说陈济棠那阵子想买下，出价到20万银两，但是平地黄无论多少钱也还是不肯卖出。

平地黄的女婿见状，便揣测这两件东西定是比金子还贵重的宝物，也总惦记着算计着，他想将之拿到手。

后来抗战期间，这女婿做了汪精卫的部下，好像是当广东财政厅长吧，他凭此显赫身份就将两件宝贝拿过来了。

何贤又听人说当初这女婿爱这宝物如命，战事中一听到警报有什么不妥，就赶忙随身带上这两件宝贝一齐走……

到了抗战结束以后，这位效忠过汪伪政府的女婿潦倒了，银口太紧缺，度日维艰。

这时便找到何贤，叫何贤给出七万银两买过来了。

何贤又一脸苦笑地对人说：“买到手就麻烦啦！威士忌都去掉我几百箱呢！因为那些外国人听见我有这两件宝物，成日从早到晚都有人磨着要看要买。”

原来，事情是这样一番经过。

何贤实为忠厚之人。他后来又对人说，当初听见老外们讲得这两件宝玄而又玄，如此紧张，本来是想让出去的！

“贤哥”怎对美国佬们讲？

“如果有人肯捐十万元美金给澳门做善事，我就送给他。”

可是不料后来老朋友何柏就劝何贤，说这两件东西如此矜贵，是中国国宝呢，叫他不加捐给广东博物馆。

何贤想想也是，就同夫人托着两件宝送回广州。

哪知朱光市长一见，说这两件东西，应该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馆才对！

换了一般人早算了，干脆捧起宝贝打道回府吧！捐什么呀，不如自己留着！

而何贤却听从了朱光市长的建议。

猜他如何形容后来那番情景的？

“那阵子是五几年，没飞机上北京，我同我夫人就这样捧住它们，搭火车一路捧上北京，天天晚上睡又睡不得，真是惨过逃难呢！”

再后来，就是我们前述的那“大团圆认亲”结局——

唯有故宫博物馆，才是两件宝贝的“娘家”！

直到今日，它们始终摆在故宫博物馆里。

我看到何贤如此对人讲述，本以为他不识货，未必真心喜欢古玩，所以捐赠出去也不会心疼的，看他说得如此轻松，似乎很舍得放弃呀，不是吗？

但实情并非如此。

因为陈渭岩的七只人像，被何贤收藏后他都舍不得卖掉！他心中也大致有数，尽管并不像古董商们那样能准确地估价。

说到那七只人像，本是从朋友处得来的，“贤哥”也不知其确实价钱，但他说“我看两三百万都是至少值的！股票升七点那阵，有个古董经纪看过，说如果我肯让，他肯出上千万！但我也不太想卖，真的不想卖呀！”

好了，我们得以充分确信的是，“贤哥”之所以“惨过逃难”般搭着火车送出家藏的稀世珍宝，原因无他，只有他的仗义与爱国。

价值连城的东西，常常最后之结局唯有送捐，且无论值多高天文价，反倒没卖的，也没处买。

古董的世界与市场，原来，一向以来都是这般的奇妙吧？

我们深深体会“贤哥”之用心良苦。

我这里再叙一事，也与文化有关，不过非古董文化，是环境文化。

澳门地小人多，公园很少。

有一座卢九花园，原本是新会人卢华绍，在澳门的龙田村购置农田菜畦，大兴土木建成的大花园，具有着苏州园林的特色。

因为卢华绍在兄弟中排行第九，所以这片风景园林才有了“卢九花园”之称。

后来，何贤出资把这座花园买下，再将其半卖半送给澳门当局改作公园，来供所有之澳门居民们憩息享受。

于上述种种史实，人们足能想见，何氏“贤哥”不仅珍爱艺术瑰宝，而且以难能可贵的“大雅”之举，令艺术和艺术用品用得其所，归得其属，扬得其名。

## 第二十八章

### 艺苑知音 粤曲红伶吟伉俪

粤曲红伶、体坛球迷、电影名门……都刻骨铭心地记得，“贤哥”组过



足球队，搭过戏班，拍过电影，为着风雨炎凉中的艺人，撑开挚诚的心伞，垫起铺路的石阶，垒出一道厚实温暖的挡风墙……

贤哥爱球恋艺，呕心沥血，但他乐在其中，至死痴迷，无怨无悔。

何贤不是艺人，也没有从事过艺术工作，然而他从小就喜欢戏剧曲艺，酷爱粤剧和广东音乐。

他不但是顾曲周郎，发烧票友，常常去看、去听，其实自己也会哼几句粤曲，哼得还挺似模似样呢！

当然，这当中离不开“第五夫人”陈琼的熏染并得益于她的影响和“训练”。

何贤与陈琼结为夫妻后，因为陈琼的粤曲唱得字正腔圆，缠绵宛转，达到专业水准，故常常于春江花月之夜，伴着朗朗清风，在花园、阳台为“贤哥”高唱一曲，有时兴之所至，两人还常常你应我和地对唱开来……

陈琼虽不是职业演员，却可谓澳门一位资深唱家，她的粤曲唱得好听也是公认的。

陈琼曾道，她学唱粤曲虽未正经八百地拜过任何人为师，但亦有许多名家指点过。

她唱曲的心得，总结起来，“基本功是最重要的”，起码的要求是板稳、吐字清晰、运腔圆滑、收放自如等方面。

薛觉先、任剑辉的曲目，都是陈琼所喜爱的，同时也是她学习的对象。

陈琼谈艺谈得恳切又在行：“任何一位成功的伶人都有其长处。薛觉先唱二流、长句二王、反线中板、清歌都非常出色；任剑辉则以土工慢板、中板特佳。长句二王是薛觉先最先采用的，有领导潮流的作用，唱来也特别有韵味。清歌（包括龙舟、木鱼、长句滚花等）也是薛觉先的首本。近年罗家宝的唱腔也大行其道，但由于采用了大量的低音腔，不适合女性学唱。三位名伶基本同属桂（名扬）派，唱腔简洁爽朗，又成功地演绎了曲中人物的喜、怒、哀、乐。”

上述之见解，并非一般粤曲发烧友们能够从容道来的。

陈琼虽然没有刻意去学某一个人的唱法，但熟悉澳门曲坛的人士都知道，陈琼唱曲腔调简洁而深具韵味，正是薛、任的综合体。

虽然不是薛、任之弟子，但陈琼亦有与两位前辈接触，并获得他们的指点。李向荣、崔德祺也对陈琼时加指点。

书画家邓芬（徐柳仙唱的“梦觉红楼”的撰曲者）对陈琼演唱的“梁山伯归天”中那些乙反二王、反线中板等唱段，都提过他的意见。

学习、研究、实践……

这些过程的不断重复，令陈琼的唱功炉火纯青，让人刮目相看。

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名门太太有如此大的冲劲和痴迷去钻研粤曲艺术呢？

陈琼说，是她的丈夫何贤平生最喜爱粤曲所致。

换句话说，是陈琼对“贤哥”投其所好了。

何贤关注并参与了相当多的演艺活动。他不但组织过澳门著名的濠镜音乐会，而且组建了不少剧团，经常搞演出。

平时一回到家里，何贤就打开留声机听粤曲。

而陈琼，就是为了丈夫的喜爱和参加演出活动的声誉，才严格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尽力将自己这项特长，发挥到最佳效果，最棒水平。

一般人出台表演的首次经验，大概都是在一些较小规模或较不正规的演出场合吧？

但是，陈琼的首次演出，却是在广州的海珠戏院（今称人民戏院）！

日后回忆起来，陈琼在百感交集中流露出羞羞的怯意……噢，如梦如烟的往事，好似就发生在昨天；

昨天那观众热烈的掌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陈琼的眼底，湿润了。

那该是 1961 年……

丈夫何贤带领濠镜音乐会回国内交流，陈琼第一次登台，心情有点紧张。

何贤便安慰她：“第一站去石岐，唱过才去广州，应当没问题，不要怕呀！”

哪料到，当时的广州市长曾生，却要求第一场在广州演出！

陈琼更为紧张，几天下来竟瘦了三磅！

事实上第一场招待的是地方首长、文艺界和戏剧界，名伶马师曾等都是座上客，陈琼之心理压力当真不小，能轻松么？

不过，陈琼确实具有坚实的功底，加上同台演出的演员也都是颇具份量的名伶们，陈琼的表现丝毫不差，那一晚，她的平喉独唱《贾宝玉夜祭芙蓉神》，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那次巡回演出，奠定了她在澳门曲艺界的地位。

……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何贤。

也因夫人所长，也因情有独衷的何贤，对影剧艺人、名伶歌手们有一份情深如海般的关怀与体贴，跟他们一班人马接触起来更为平易亲切，其乐融融。

三十多年来，举凡来澳门演出的剧团、乐团、曲艺团、杂技团，以及到澳门访问的红伶们，何贤都会亲自出面接待。

其间有碰到困难问题的，比如上座率低，入不敷出；或囊中羞涩，脚钱短缺；或有天灾疾病，飞来横祸之遭遇……

何贤必定伸出救援之手，亲力亲为替大家排忧解难，有时就自己倾囊相助，反正务求使艺人们心情舒畅，开心而来，满意而归……

何贤每每到香港，抑或来广州，只要腾出时间，都会去看望这些粤剧艺人。

有时为了节省时间，他不便跑腿，就索性设席于酒店宾馆，邀约上一些相熟的艺人们来此聚会，把酒言欢，畅叙一番从艺之甘苦，人人欢颜笑语，落泪中也有着知己互相倾心的痛快。

如此，省港澳的粤剧艺人们，都称何贤君是“小孟尝”；还称陈琼作“三姑娘”。

总之，何贤夫妇是艺人们的知心人。

抗战期间及香港沦陷后，不少艺人辗转流落到澳门，

他们不能经常演出，又无固定薪水，处境令人怜惜。

在这困难时刻，为保证艺人正常演出，解决他们生活的困窘，何贤先后买下平安戏院和国华戏院，安排各剧团演出。

他还组建了一个新声粤剧团，自当班主，将流落澳门的粤剧名流任剑辉、白雪仙、欧阳俭、陈艳浓等吸收入团。

其间虽历经甘苦，却是从组建之日起，一直经营到抗战胜利，任剑辉和白雪仙重返香港才告解散的。

所以，30年后何贤病故香港时，任剑辉带病在灵堂守了三天灵；而白雪仙看着何贤的遗体泣不成声，一直陪送何贤之灵柩到澳门安葬。她哭道：“与贤哥生不能再相聚，就让我们多陪他一会吧！”

为何任、白两位名伶如此心痛感怀？

那是因为她们永远都没有忘记，在30年前那段战乱时期极其艰难的日子里，何贤曾给予过她们雪中送炭式的援助……

也是在抗战后期，粤剧大老倌（演员）马师曾和红线女从香港到澳门演出，何贤亲自款待他们，食的住的花的，全由何贤包了。当时红线女身体不好，何贤就叫镜湖医院派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病，使她能上台亮相。

年逾90高龄的著名粤剧老倌白玉堂，是与马师曾、薛觉先齐名，三足鼎立艺坛的粤剧泰斗。

白玉堂在战前和芳艳芬演出时，也是由何贤当班主的。

多年来，何贤始终惦念着老迈体衰住在香港粉岭的白玉堂，常常去香港看望他。

1983年当白玉堂从报纸上看到何贤逝世的消息后，不顾年老体弱，赶到灵堂守灵。他与人说：“贤哥手下助过不少人，有人求助于他，他必然会挺身而出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粤剧名伶红线女，90年代到澳门去，也曾由黄子雅陪同，专程到何贤坟墓致祭，表达哀思。

1955年初春的一天，在澳门利为旅酒店的地下餐厅（即今南通银行原址）里，马师曾就与“贤哥”面对面坐在一张餐桌两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着什么……

那几个月里的马师曾，正处于人生的岔道口，那或许就将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吧——他要告别香港，回祖国大陆工作。

中共港澳工作小组的吴狄舟已经就此事同他谈过许多次，回去后的工作安排，生活待遇，住房等等均已谈妥。而在这一系列计划的酝酿和决定过程中，马师曾的“每下一步棋”，都征询过何贤的意见。

他俩，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尤其是50年代初期，香港经济萧条，粤剧不景气，老马的叫座率明显下跌，收入锐减，手头也日渐紧缺。何贤每次到香港看望他，都少不了要问：“日子过得怎样？”

听到老马支吾以对，何贤握别时常常给他留下一笔生活费。

到了1954年，何贤想到祖国粤剧的发展前景，再想到老马的艺术前途，干脆毫不犹豫地劝他“不如回内地发展”。何贤坦率地同他分析形势，充当内参，说内地这些年很重视戏曲，广州的粤剧舞台热闹非凡，观众十分踊跃，如果你老马杀回去，无论资历还是表演艺术，都是执牛耳之大名角，一定会深得观众捧场和领导重视的……

最初老马对走这一步还有些犹豫不决，后来同吴狄舟谈过几次话，又跟何贤交换过多次意见，才决定离港返粤。

马师曾已应允为祖国粤剧艺术贡献自己的一臂之力了，可现在，还需“贤哥”先助他一臂之力。

怎么？打扫战场，清理债务，反正是些“擦屁股”的事，这不，两人坐

在地下餐厅里，嘀咕的就这番事。

老马呷完最后一口咖啡，坦言相告：“现在我已没什么留意，只想快点回去，只是还有些债务未了，欠的税款还未交清，我走不了。”

“总共欠多少？”这位“直性子”贤哥，比那位更痛快地追问着。

老马嗫嚅道：“超过两万”。

两万，在 50 年代中叶是笔不小的数目。

可贤哥为了鼓励马弟安心回大陆，一口就答应替他解决：“你不用愁，税款我来做担保人，欠的债即刻拿钱去还！”

老马心中压的巨石终于落了地。

1955 年初夏，马师曾如愿以偿，回了大陆。

临行时，何贤想到他回广州重新安家，一定需要花费不少款项，便又送上 1 万元给老马的伴侣王凤，让她用于安置新生活。

何贤对艺人们，就是如此关心，无微不至的啊！

粤剧艺人中，与何贤交情最深、最为知己的，当然要数新马师曾。新马与何贤在抗战爆发前，已在广州认识了。那时他们年轻气盛，风华正茂，常常在一起打乒乓球一起玩乐，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年轻的新马师曾那会儿染上赌瘾，天天离不开赌场。

何贤以一个大哥的身份劝他，叫他不要沉湎于赌博，否则误了自己的学业和前程，新马听不进去。

何贤气了，干脆把他的钱全部缴收，锁进抽屉里，为的是防止他再赌。

就这么捱了一阵子。可终天有一天，新马师曾赌瘾又上来了，他东翻西搜地把钥匙搜出，偷偷开了锁把钱拿出来又到赌场去搏杀，结果输个精光。

何贤得知却没有厉言疾色地骂他，也没有讽刺挖苦他，只是启发他：“往回想想，你赌了这多年，是赢了还是输了？就算给你赢过一两次，最后还不是又输光！还是正经做人实惠又安全。”

日后，新马师曾每每谈及这些往事，都感慨：“没有贤哥，也就没有今天的新马仔！”那次听了何贤的苦口婆劝，新马再也不好意思去赌了，从此戒了赌瘾。

由于他们两人友情深挚，所以过从甚密。

新马师曾每到澳门，都住在何贤家，两位老友常常谈心到深宵黎明，意兴也未尽；而何贤每到香港，也必去看新马。

何贤在澳门常常为筹款办善事而发动义演之举，每每邀请到新马，他必定慨然允诺，从不会摆架子，更不会计较报酬：“贤哥叫到，有什么好说的，去！”

而新马的夫人祥嫂，对“贤哥”确也是非常尊敬。

何贤过港时，每到新马家作客，祥嫂便要將一盒盒人参送给贤哥补身提气……

如今都是故人已去，死的死，离的离，不知祥嫂倘若望着亡夫祥哥，再联想到亡友贤哥，会对当年那些美好的时光作何感叹呢？

80 年代初，当何贤听到新马可能与红线女再度合作出演时非常兴奋，曾说过一定要在电视荧屏上看他们的演出……

可惜，何贤没能等到这一天。

而今，新马师曾也已成了故人。

往事如烟。

内地解放后，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当长一段时期同港澳隔断开来。也因此，三地间艺人们绝少交往，自然，更谈不到什么文化艺术交流了。

何贤觉得这不是正常现象，可以说太不正常了。

何贤十分清楚，省港澳的粤剧艺人们，关系是异常密切的，或师徒，或亲属，或姻亲。往日组班搭台演戏，亦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

如今大家“老死不相往来”，既不合人情，更妨碍粤剧艺术的发展，艺人之间也难以互相学习、促进和共同提高、发展。

为打破这个不合理的僵局，1958年新春，何贤率先行动，他特地邀请了广东粤剧院第一团来澳门演出。

有了这次突破性的“开门红”后，紧接着1960年春节期间，何贤又邀请这个团再来澳门访问演出。

这第二回的出场阵容非常整齐，著名的粤剧大老倌白驹荣、罗品超、楚岫云、罗家宝、少昆仑等都来了！

何贤兴奋地亲自驱车到拱北海关迎接，在盛大的招待会上致欢迎词。

而后安排他们在澳门最大的戏院“清平戏院”演出。

何贤与马万祺、傅德荫等社会名流们到场观看，热情捧场。

此次演员由于名伶云集，轰动了港澳。

许多香港戏迷每天下午特地坐船过澳门来看戏，结果演出欲罢不能，只得加演，一连演了十天，场场爆棚。

那是令今时艺人们无限感慨的盛荣场景……

演出结束打道回府之日，何贤又设宴饯别，依依不舍。

他对广东粤剧院这一次访问演出的成功感到由衷高兴，他说这是一次“大突破、大交流，大胜利”。

的的确确，从此以后，三地的艺术交流便逐渐频繁起来了。

交流都是双向的，理应有来有往，相互观摩呀。

为此，才有了我们前面说到的陈琼首次到广州海珠大戏院登台献艺之事。

那次是1961年10月初，何贤特地组织了一个业余音乐曲艺团赴广州公演，称之“濠镜音乐会”，何贤自任团长，崔德祺任副团长；团员包括何贤的夫人陈琼和著名曲艺演员何丽贞、李锐祖、冯樱，以及音乐名宿梁以忠、琼仙，音乐师冯华、廖森、薛汉英、叶剑雄等。

作为澳门之演出团体，这是一个强大阵容了。

由于那是建国后，港澳到内地的第一支文艺演出团，因此他们抵达广州后，受到了广东省、广州市文化局和文联，以及粤剧界曲艺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濠镜音乐会”被安排在海珠等戏院巡回公演，也是那时起，陈琼登上了粤剧大舞台。

广东省粤曲艺团的名伶李少芳、白燕仔、黄少梅、谭佩仪等也和他们同台演唱，真正呈现了艺术双向交流的感人场面。

广东省众多文化人、艺人，都盛赞何贤的这种努力，称之为“爱国爱乡有长远眼光、有胆识的壮举”。

实为可惜——那种渐入佳境、大有起色的艺术交流，好景不长，便被“文革”的腥风血雨腰斩，被一股粗暴的逆流冲断摧毁了……

十年浩劫中，内地的粤剧艺人十之有九成了“牛鬼蛇神”，或关入牛棚，或押进干校，或遣送回乡……昔日体面骄傲、神采飞扬的名伶红角，都成了一群旧世的“臭戏子”，唯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恐怖气氛笼罩中，忠厚义胆的“贤哥孟尝君”，在每年春秋两季回来广州参加商品交易会期间，仍旧惦念着艺人，且千方百计去探望他们。

当时岁月里，红线女的遭遇人人皆知，人家避她惟恐不及，谁还去探望她？

可何贤不怕。他径直去到她家，安慰鼓励她，“雪中送炭”地给予人生最珍贵的理解和友情。

知道红线女因挨斗争、受管制，身体很坏，疾病缠身，何贤回澳门后还不断给她寄药，帮她治病调理。

何贤去到香港，跟任剑辉、白雪仙又谈及红线女的境况。

任、白两名伶道出苦衷：“我们也很想去看看她，只是对内地的情况不熟悉，只怕犯了规矩，累人累己呀！”

何贤说：“不怕，只是探望朋友，犯了什么法？我带你们去。”

贤哥说到做到，他果真带着任剑辉、白雪仙看望红线女来了！

在那个六亲有如陌路，连夫妻也反目成仇的残酷岁月里，居然做梦一般，有朋自远方来，有故交从故地来，来看一个处境艰难、潦倒落魄之人，怎不叫红线女感动涕零……

“文革”当中，另一个处境很惨的艺人是罗家宝。

这位粤剧小生原先是在新加坡和港澳登台唱戏的。

1951年何贤在香港碰到他，见他年轻英俊潇洒，演艺事业正在蒸蒸日上，便对他说：“你不如回广州吧。祖国的粤剧艺术是会发展起来的，那边人才济济，你回去也好舒展拳脚，发挥自如，因为祖国的舞台天地更大更广阔呀！”

罗家宝在港澳徘徊了两年，愈来愈能体会出何贤劝慰他那番话有远见。

1954年1月，罗家宝毅然来到了广州。

罗家宝在广州一登台，便迅速走红，成为著名的小生。

他的唱腔独树一帜，被称作“虾腔”。

何贤每次来广州，碰到家宝登台必定去看；而每次邀请广东粤剧团到澳门演出，也都不会忘记他。

1960年新春，罗家宝到澳门访问演出时，就住在何贤的家里。

十年浩劫一开始，罗家宝就被“揪”了出来，以后不久被送到梅县管制劳动。

那十年中，何贤每次来广州都要打探罗家宝的消息，甚至直接向省里的领导部门问他何时才能释放，但都不得要领，无法明晰。

终于到了1978年，家宝从梅县回到广州，可他的问题还未澄清，依然被安排在一间工厂劳动，接受审查。

忽有一天，家宝风闻“贤哥”来了广州，请省市的粤剧界朋友吃饭。

家宝听说邀请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可他一直没接到通知，也没收到请柬。

罗家宝很想见一见久违的老朋友，他请示广东省粤剧院院长郑泽才：可不可以去见何贤？

郑泽才说要请示省文化厅领导；  
结果还是认为他的问题尚未弄清，不宜出席……

家宝心中遭一重棒，泪在眼里打着转儿，却没让它们落下来。家宝想法子打听到了，何贤住在爱群大厦 14 楼，便打电话到何贤的房间。

接电话的是陈琼。

她听说电话是罗家宝打来，马上叫何贤来听。

何贤已知晓家宝不能来参加宴会，关切地问：“你的身体怎样？”

“我很好”。家宝说；

“你的声带呢？”

“没有损害”。家宝心中又一阵酸……

“……”电话里沉默了片刻，

还是家宝先开口：“贤哥，你保重，不用惦记我！最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

何贤也道：“保重！你也要保重，我已同领导讲，希望加快解决问题，将来你还可以出来演戏。”

“……”这回，是家宝没出声，但他含泪默默地点头，放了电话……

那一回，咫尺天涯，人在一城，却未能相见。

第二年，何贤再到广州，知道罗家宝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并且正在沙河戏院演出《苏小妹三难新郎》；

何贤即刻跑到沙河去观看，尔后，又去看他的看家好戏《柳毅传书》。

看完家宝的戏，何贤真的吃惊不小，他感到无比欣慰。

归途中，何贤对陈琼说：“家宝虽然耽误了 10 多年，看来还未丢荒，声音还可以啊！”

从那以后，何贤几次邀请罗家宝到香港访问，让他跟港澳的粤剧界朋友见面。

1980 年，罗家宝与粤曲名伶李丹红结婚了。

那时日罗家宝只有一个 10 平方米的小房间，令他好不为难。

如何住下？向粤剧院要房吗？

剧院固然没房，即使有，也轮不到分给他。

向街坊租吗？

那时租金规定很低，谁愿意出租？

向亲友张口借？可又哪里找得到这样的亲友？

恰好何贤又到广州，请他到泮溪酒家饮茶，他便将这个最烦心的困难告知了何贤。

何贤一听，非常干脆道：“这事好办。我在西关有一间屋，空着没人住，可以借给你。等会儿我带你去看看。”

罗家宝没想到这个天大的困难，一眨眼，茶没饮完的功夫儿就搞掂了，简直喜从天降，不知对“贤哥”说什么才好……

喝完茶，何贤一把将罗家宝拉上车，车子径直驶到昌华街多宝南横 28 号门口。

天哪！说是一间，其实房子相当宽敞，三层共有七百多平方！

何贤说，这所房屋当年是用 343 万港元买下的。

他带罗家宝上二楼看过，共 5 房两厅，270 平方。

何贤问罗弟：“怎么样？可以吧？”

岂止可以，简直是天堂了！

罗家宝无言，只有闪着泪花点头感激。

但何贤又说：“这房屋因许久没住过人，得略为装修一下。”

说罢，掏出一千多元连同手上的钥匙，一并交给罗家宝。

看看，何贤同艺人的情谊，倘不是情深如海，亲同手足，怎会有如此真诚深挚、感动人心的事情发生呢？

像故事一般，像做梦一样；

然而，它确是真真实实、历历在目的。

倘若说，“文革”以前，何贤组织省港澳的艺术活动和演出交流还是带有冒险尝试的意味，那么，到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了开放政策之后，何贤就更可以大胆地组织内地和港澳间的艺术交流活动，也更能敞开心扉地和艺人们频繁交往了。

让我们回述例举一番：

1978年冬，中国艺术团访澳；

1979年春，东方歌舞团访澳；

1980年春，中央乐团独唱奏乐组访澳，何贤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他们。

而1980年6月，广东粤剧团一行59人赴澳门演出，更是轰动一时，此次活动从始至终，演出、宴会、游览，所有的节目何贤都亲自过问，安排妥贴。

如此看来，倘若“贤哥”活至今日，可谓一个出色的“演出经纪人”角色。

更令艺人们不能忘怀的是，1983年7月，何贤又邀请了罗家宝、卢秋萍等到香港演出。

可那时他已确诊患了肺癌，决定要到美国治疗了。

人们劝何贤：“你抱病在身，又不在家，谁来接待他们呢？不如取消这次邀请吧！”

何贤执意不肯，他说：“不可这样做，既然邀请信已发出，就不要改变计划。我不在家，由厚铎代我接待。”

临上飞机前，何贤仍放心不下，还反复叮嘱儿子厚铎和联艺公司经理霍强要做好接待工作，不要出岔子，尤其不可冷落怠慢了人家……

何贤啊何贤，对待工作竟是如此细腻；对待朋友，对待艺人竟是这般恩深似海，情重如山！

何贤，不但对粤剧界的“老字号”们怀有深情厚意，对待年轻的“小字辈”艺员，也是关怀备至。

他对龙剑笙，象对弟弟一样地呵护；对麦炳荣、凤凰女、谭倩、林家声、吴君丽、黄炎等，也都给予过得力支持。

卢秋萍，更是在何贤的葬礼上哭得死去活来……

无须再列举了，总之，何贤不仅深受粤剧艺人的百般尊敬和感怀，事实上，他对繁荣粤剧事业，更是功不可没。

何贤的义举，还体现在体育界和电影界。

先说体育吧，“贤哥”历任澳门乒乓球总会、篮球总会、排球联会、泳联总会及港澳各大体育会的名誉会长。

50年代，澳门举办的各种体育运动所需经费、奖品，多由何贤赞助，尤以乒乓球赛项最多。



1954年，澳门举办以工人为主的澳门游泳竞赛，何贤不仅赞助了全部费用，而且答应主持开幕式。

可开幕前夕，却发现国民党特务有意对此活动进行破坏，气氛十分紧张，大家都估计“贤哥”不会在运动会上露面了。

出乎人们所料，“贤哥”不仅准时到会主持开幕式，还声色俱厉地致出一番别具一格的开幕辞：

“这次游泳竞赛，澳门各界都踊跃参加，有人却要搞破坏，我们不怕！有胆的就放马过来，我何某奉陪到底……”

“贤哥”致完了“开幕辞”，便留在赛场，坚持看完第一场比赛才离去。

他的举动，深得澳门各界人士的敬佩。

老球迷应该记得，“贤哥”也是搞过足球队的。

多年以后，何贤与人开玩笑中，无意间泄露了他鼎力参与文体事业的辛苦与艰难。他对人开玩笑说：“若是你同哪个人有仇，想致他内伤，就叫他搞球队兼拍戏啦！最好搞上两队球队，再拍上两套戏，这样你就什么仇都报啦！”

这番话，怎么有点像前几年国内流行的一个电视剧开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对了，是《北京人在纽约》的男主角说的。

这同类的话语，“贤哥”在80年代初就倾吐出来了！

他边说此话边笑着摇头，颇有个中复杂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之神态。

然而，我们能体悟一个真实的何贤——他深爱着文体事业，又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然而他无怨无悔。

顺带再提一提电影。

已故著名电影小生十三哥张瑛，在香港开创华侨电影公司时，由何贤投资支持，拍了不少健康的影片。

改革开放以后，为密切港澳和内地的联系，何贤对电影业也倍加关注。

有一次，赴北京开会的何贤碰到了赴北京旅游的香港大导演李翰祥。

问及电影方面的信息，两人谈得热火朝天，非常投机。

何贤觉得李翰祥应当拍几部规模宏大的能反映中国气派的影片，便建议李导演说：“你为何不到故宫拍片呢？！”

“噢？到故宫拍片……”李翰祥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

“你如果愿意同内地合作拍片，我可以帮助你，尽我的力量支持你。”

回香港不久，李翰祥就自己成立了一间“新昆仑公司”。

公司与大陆合作拍摄《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

李翰祥拍片的大部分钱，都是先由何贤垫支的。据说何贤特地开了个帐户，借给李翰祥使用。

后来一度风传，说“李大导”拍片开支超出预算，令“垂帘”与“火烧”两剧陷于难产窘状，恐怕声势过大，反而没了下文，而胎死腹中。

于是，便有记者向何贤求证此事。

何贤笑答：“他是跟内地合作，国家这么大，怎么会没钱，真笑话！”

记者又追问不舍：“你借给李翰祥拍片的户头究竟有多少钱？”

“多少钱？”何贤答得多妙：“我的口袋有多少钱，我自己心中都没数，

不清楚噢。”

诚然，这两部影片没有难产，更没有胎死腹中，且都依照预定之计划诞生了。

只可惜，何贤未能看到，便离开了人间……

李翰祥谈及此事，总是带着浓浓的眷念和遗憾。

不过他又表白说：“两个影片上映后成绩不错，没有辜负贤哥的期望。贤哥泉下有知，可堪告慰。”

……

而今，李大导演也离开了人世。

他能与贤哥再在另一个世界重逢么？

茫茫天地间，倘果真灵魂相会，那么想必九泉之下的两个亡灵，又可以相互谋面侃侃交谈，彼此告慰共勉大笑了吧……

## 第二十九章 仲连出马 赌王干戈化玉帛

澳门赌业是一块肥肉，谁都想争。

承包了全澳赌业经营权历时 24 年之久的泰兴娱乐公司，到 1961 年签约期满后，澳门当局根据新法令公开招投赌业经营权。

何鸿燊、霍英东等“四大天王”矢志争夺，与傅老榕、高可宁两大家族的后代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龙虎争斗。

在双方相持中，何贤权充“中间人”，始终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澳门，这个巴掌大的弹丸之地，却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世界级赌城。

有人说，是赌博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澳门。

也有人说，博彩业历史悠久的澳门，其经济支柱还是赌博。

赌博渗透澳门的每一个角落。

自 1937 年起，由傅老榕、高可宁等人组成的泰兴娱乐公司，承包了全澳门的赌业经营权。

而到 1961 年签约期满后，澳门政府根据新的法令公开招投澳门赌博娱乐经营业务。

泰兴娱乐公司，对既得利益自然不肯撒手，表示绝不相让，在投标时志在必得，倚老卖老，霸气冲天。

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却也完全不能小瞧。

胆大包天，要问鼎傅家赌霸宝座的，是一个“四大天王”的精英组合：霍英东、何鸿燊、叶汉、叶德利。

这些都是能摆上台面的响当当的大人物。

霍英东和何鸿燊都是港澳屈指可数的富豪，又都堪称经营天才。

叶汉早已成一代赌王，他的赌技与赌场经营管理都精绝到登峰造极，且是自己绝密的一套看家本事。

而叶德利与何鸿燊是亲戚关系，（何是叶的小舅子）可以说是黑白两道全通之才。

在这样一个组合中，作为本世纪初雄霸香江的何东家族后人的何鸿燊，最是个焦点人物。虽说他刚入赌界，但可以说唯有他是带着一股先天的王者之气进入赌门的。

18 年前，因为战乱而逃离故园，为重整河山，出人头地，何鸿燊孤身闯荡澳门，那时他身上只有 10 块钱，历尽相当多的危险与艰辛。

8 年前，因为恶势力威逼，何鸿燊忍痛离开了澳门走水道回香港，但那会儿他已坐拥两百多万的家财。

再 8 年后的当时，何鸿燊成为名噪港澳的千万富豪，踌躇满志地重返澳门打天下。

他 40 岁了，到了“不惑之年”，一定要干一番大事业，干得轰轰烈烈，一鸣惊世。

何鸿燊涉足赌业竞争，完全出于偶然，据说是叶德利受了叶汉委托拉他入股合谋大业的。

虽然经营赌业不是何鸿燊长期谋划的投资选择，但富有商业头脑的何鸿燊一听就知道，这当然是发大财的最好时机。

有人总结过，香港超级富豪发迹不外乎有几种模式：

1. 先在制造业或贸易中掘得第一桶金，然后经营地产暴富；
2. 通过把公司上市，以小资金控制大资金，最后发展成为跨国公司；
3. 通过夺得某类商品或行业的专营权，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经营赌业，当属于第三种发迹模式。

而何鸿燊最大的心愿，就是要风风光光堂堂正正地回到澳门去，洗掉昔日受过的逼逃耻辱。

眼下，博彩业和黄金买卖，正是澳门的两大经济命脉。

何鸿燊深知，倘若他们这方能投得赌业的专营权，那么澳门的两大命脉之一就有了他的份额，这才是最能够消除耻辱重振雄威的大业。

所以，何鸿燊果断决策，拿定主意便义无反顾。

由于考虑到自己和叶德利是亲戚，这样与叶汉结成三人组合埋下的隐患太多，因此何鸿燊又力劝霍英东加盟。

霍英东呢，既不同于“职业赌桌”叶汉，也不同于花花公子叶德利，更不同于出身豪门望族的何鸿燊。他出身贫寒，能由一穷二白变成千万富豪，那完全是靠着个人奋斗，拼死拼活地赚钱，凭着血泪汗水累积成金的。

所以，他尽管被何鸿燊说动加盟了，却持小心审慎的态度，并不情愿冒大风险做这类偏门事。

但毕竟，在商言商，巨利是永恒的诱惑。

澳门赌业是一块肥肉，谁都想争。

加之何鸿燊诚邀力劝，霍英东也豁出去，答应一起干了。

由此不难想见，这四大天王凑到一起，矢志争夺澳门赌业的经营权，而他们的对手，是称雄澳门赌城长达24年的傅、高两大家族——

双方旗鼓相当，无疑是场你死我活的龙虎之斗。

当时，傅老榕与高可宁都已作古。而“泰兴娱乐总公司”的现任掌门人，是他们的儿子辈。

傅、高家族的第二代均未经过赌业训练，但他们坐吃肥山金海，岂肯将二十多年的家族霸业拱手相让？一旦斗起来，搭上数条人命也会在所不惜。

因此“四大天王”可谓身负压力，“敌手”的势力比之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鸿燊最雄心勃勃，但他身负的压力也最大。因他的对手，除了傅、高两大家族之外，还有当年把他从澳门逼走的那帮势力。

那帮势力目前不仅盘踞在澳门，而且实力比当年更加强大。

他们倘若知道何鸿燊踏足澳门，并志在夺取赌业经营权，那必将会极力破坏，甚至暗中与傅、高家族联手，进行疯狂的大反扑。

投标尚未开始，气氛已是大兵压境、兵临城下，“山雨欲来风满楼”，阴云笼罩、闷雷滚滚了。

1961年10月，对于澳门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月份。

因为在这个月，“四人集团”和原持牌人“泰兴公司”将决出赌业经营权的胜负。

竞投双方在投标时都严谨慎密，担心先交了投标书后，标出的价码被澳门政府内的人泄露给对手，因而都一拖再拖，想耗到最后截止时刻呈交。

那样，就算被泄露了机密，对手也措手不及。

这段故事很有传奇色彩。

据《澳门三大教父》一书详述，傅老榕和高可宁两人的儿子到澳门政府办公厅，呈交投标书的时间是当日下午4时50分；而叶汉等人是在他们离开之后才呈交的，时间是4时55分，比对手迟交5分钟。

投标截止时间是当日下午5时。

出乎众人所料，开标结果扭转了乾坤：傅、高家族出价315万元；叶汉一方“四大金刚”出价316.7万元，仅仅比对手多出1.7万元。

也有记载说叶汉一方比对手多投8万元。

总之，是叶汉这方赢了。

澳门政府遂将赌业专营权归了叶汉集团的“四大天王”。

澳督马济时宣布澳门博彩娱乐业专营权由叶汉集团投得。

一家欢喜一家愁，不光是愁，而且是恨，恨得咬牙切齿。

经营了24年的赌业江山，一朝轰然沦陷于敌手，傅、高家族后生们怎忍得下“败家仔”这个遗世臭名与恶气呢？

因此竞投结果刚一公布，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政府海外部，便收到发自澳门的匿名电报，电文称：“新集团得到博彩业专利的那天，就是澳门的末日。”

那段时日澳督府电话不停地响，许多是从葡国打来的，提醒澳督马济时不要发牌给新人，要保留给旧人做。

马济时压力沉重，因此，新集团10月投得赌业经营权，到12月还未收到政府的批文。

旧公司这帮公子，施展车轮战术，延请有势力有地位的各界人士替其游说，不甘失去利益，要千方百计夺回经营权。

找人，不可能不找到何贤。

何贤是澳门华人社团中的头号人物。

基于他的地位和侠义性情，当时澳门各帮派之间发生重大冲突，他便成为首选调解人。

何贤呢，既是何鸿燊、霍英东的老朋友，又是傅老榕的莫逆之交，与傅老榕的关系更早一些。

当年何贤从省港来澳门发展，受过傅老榕的提携，更救过傅氏父子两人的命，前书都提，此不详述。

现在要说的是，何贤对赌王之争持何见解？

没的说，何贤一开始便想劝止“泰兴”方面不要把事情搞大。

但是，“泰兴”方面不仅不听劝阻，还反扑得愈发猛烈。

这时，已不光是他们两家族绑在一起，另一帮更强大的势力也掺了进来，并成为围剿新集团的先锋激进派。

就是这伙子先锋，当年迫使得何鸿燊离开澳门。

显然，他们是冲着何鸿燊来的。

但此刻他们仍然藏在暗处，只找何贤为其传话，提出的竟是八项威胁！

何贤无奈，死说活劝行不通，还得两头奔波充中间人。

何贤约了何鸿燊到一个名为“康乐俱乐部”的地方碰头会面，向他转述对方的八项威胁：

1. 要取何鸿燊的性命；
2. 要让澳门所有酒店停业，使外来赌客站不住脚，露宿街头；
3. 要港、澳一切客船停航，使各路赌客无法飞到澳门；

4. 用金钱收买乞丐，天天坐在新赌场门口，让赌客望而生畏；
5. 要澳门私人楼宇不敢出租给新集团作赌场；
6. 要将原来的赌场伙计通通包养起来，让新公司无兵无将，无法开赌；
7. 一旦新赌场开张，就往里面扔掷手榴弹；
8. 要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关系，使澳门和里斯本当局阻碍新集团履行合约，将新合约扼杀在摇篮里。……

传达完对方的意思，何贤仁厚地恳请何鸿燊慎重考虑。

在何贤，听到“泰兴”的系列策划后，明白虽是恐吓性质，但也知道这些人都是善人君子，急红了眼很可能样样做得出。

于是他转而劝何鸿燊取回投票定金，放弃博彩专营权，消了灾源了事。

何鸿燊淡淡一笑，沉默不语。

他的性格是永不言败。

对方的威胁不仅没有吓倒他，反而更加激起他誓死干到底的决心。

何鸿燊自信在澳门有深厚的基础，便答何贤说：“贤哥，请你转告对方吧，如果换了别人，我还可能退，但对手若是他们，我绝无可能退，还要一斗到底。有多少招术，叫他们尽管使出来！我决不会做缩头乌龟！”

显然，何鸿燊也针锋相对地一拼到头，不留退路。真是两虎相斗，把何贤夹在中间啊。

说实在的，何贤与两边的交情都可以：一边有恩于傅家，与高可宁又是番禺老乡；另一边又唯恐好友霍英东和何鸿燊吃亏受难。

所以，何贤对两方面都做工作，慢慢使傅与何的矛盾冲突缓和下来。

日后相当一段时间，“四大金刚”既不畏缩，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傅高两家万般无奈下知难而退。

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何贤的地位、身份、正义和无私，使得交战双方都得给他留点面子，不能将事情做绝。折腾来折腾去，就是相互斗智斗气和拆台设障，打的是心理战。

何贤对此始终采取息事宁人的明智态度，一再给双方撤火消怒，好话说尽，丑话也反复提醒。

事后何鸿燊曾说：“何贤这辈子所以取得成功，为人处世最突出的是：他个人肯吃亏，肯认认真真帮助别人，分分钟愿意担保别人，而且为人十分和蔼。能排难解纷做和事佬的，非贤哥莫属了。”

认识何贤并跟他共事，还成为好朋友——这是何鸿燊的人生生涯中很重要的一页。

何贤是当时澳门商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50年代至80年代他逝世前，何贤一直是中、葡、澳三地政府一致公认的澳门华人代表和领袖。

何鸿燊那些年月颇多坎坷，何贤远不止一次两次为他撑腰，支持他并帮助他化解阻力。

再举一例为证。

约是1947年的光景，何鸿燊和傅老榕手下第一号人马钟子光及老友梁基浩等人合作，开煤油提炼厂。

当时有一派江湖势力看到何鸿燊发财，就企图介入他的生意，从他那里分一杯羹坐享其成。

这无赖想法显然遭到了何鸿燊的断然拒绝。

对方是在澳门独霸一方的地头蛇，要惩治何鸿燊，找了几名凶汉跑到煤油仓库去抛手榴弹，想把仓库炸毁。

却没料得：“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抛进仓库的四个手榴弹有两个没爆，其中一个又戏剧性地被反扔回来，正好打在扔弹恶汉自己的脖子上！

受伤的恶汉象暴怒的狼狗疯狂动粗，与工人们干起仗来，最后因人少逃之夭夭。

这事一下子闹大了。恶汉们随之找何鸿燊算帐，无赖地要他赔偿：“我们的兄弟被手榴弹砸伤了，这笔数怎么算？”

何鸿燊根本不吃对方那套，他据理力争，当仁不让。

然而对方便不时地就来点小破坏，打上了持久战，让何鸿燊不得安宁。长时间的滋扰令何鸿燊非常苦恼。

于是何鸿燊找来老朋友何贤，让何贤充当中间人向对方表态：他们那位被手榴弹砸伤的兄弟，何鸿燊愿意承担医疗费。

何贤整日里为何鸿燊忧心，一听此话当然愿意去化解这场纠纷。

看了出面谈和的人是何贤，对方当然也不会怠慢。

但他们嫌何鸿燊出价太低，不肯答应。

几经何贤讨价还价，最终对方被说服收下了何鸿燊的两万元。

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何贤，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润滑剂；

人心之恶之仇之恨，常因了何贤暖心之劝慰，而能变得稍稍理智，拳脚缩回，缓和纷争，化险为夷。

“好事多磨”。还是说回赌场竞投的事吧。

从1962年元月至3月，何鸿燊三飞葡京里斯本，到葡国政府疏通关系，才终将竞投之事圆满办妥。

1962年5月，继泰兴娱乐总公司之后，统管澳门赌业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霍英东任董事长；叶汉、叶德利任常务董事；何鸿燊作为股东代表人和持牌人，出任董事总经理。

这一切，都与何贤毫无关联。

但是，何贤，却着实为他们出了不小的力——

尤其是“曾经沧海之人”何鸿燊，他在命运遭遇坎坷时，何贤也帮了他最多。

## 第三十章 救多条命 恩德无以寄勋章

何贤拿出巨款，救了赌场会计；又亲自赴澳门警厅，从虎口营救了一批南越逃亡的华侨学生……

他平生帮助过多少人死里逃生？我们不得尽知。只知有传奇之人，曾在何贤葬礼上送了一个匿名花圈：

花圈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颂诗悲句，只有一个墨黑大字——“服”。我们可以说，何贤半辈子立足于澳门，算得上澳门华人的一位重要领袖。他热心社会文化教育，在澳门多个社会团体担任领导职务。他对事公正持平，对朋友的事乐于仗义出头，扶危济世，排忧解难。因而有人为何贤概括了几有：有头有面、有权有势、有情有义、有福有德、有胆有识……

起死回生的人们曾对着何贤的遗像哭泣：“贤哥对我，对我们全家有恩。”

更有那传奇之人，曾在何贤的葬礼上送了一个大大的花圈：

花圈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颂诗悲句哀词的挽联，  
只有一个饱蘸墨香的墨黑大字——

“服”。

因为这“服”字无出处，人们许多年中不懈不倦地猜测，到底是谁人，因为何事服了何贤，而如此钦佩敬仰他呢？

至今，这是个无人知的疑问。

因为何贤平生做过的大恩大德的善事太多太多了，救人于生死之间的事情也数不胜数了。

如此，又将怎么破谜呢？

那个“服”字，或许指的是一天一事；

也可能，包涵了何贤牵系着许多条人命的所有事……

我一直在想，倘若为何贤平生做戏立传，就把这个匿名花圈的大大“服”字立在舞台上收作剧尾，落下剧终之大幕……那一刻会收到感天动地泣鬼神的艺术效果吧！

最可贵的是，这绝妙之人生道具，不是我编造杜撰的。

这是真实存在过的。是何贤死后确凿拥有过的。

我真为他的生命，感到骄傲和激动。

在人间，能有这样的人生片断，也是一种光荣。

因为，它能令所有的人性，得到一次升华和净化……

何贤先生平生救过多少人命？

我们不能一一历数，也不得尽知。

此书只能举一二例，从数斑而窥全豹吧。

就说赌场会计之事。

何贤在澳门、西贡的赌场都有一点股份，平时高兴之时，也参加赌几手。

有一年，西贡赌博公司的会计要调职交接，在工作收尾结帐时却发现少了好大一笔钱，左查右找，寻不出漏洞在哪里。

这下子惨了！会计焦急万分，恨不能跳楼去……如果这笔帐交待不清，按规矩得自己填空，那么凭藉他一个小小人物，将身家财产及老婆子女拱手送出全部作押，也抵不了这冤枉债鬼的一根指头噢！



会计实在是万般无奈，走投无路，只有一个无法选择的选择——自杀，远离尘业，一洗债务了。

就在这时，会计的老朋友简坤力劝他说：“谁也没法救你，只有一个人或许可以帮你度过难关。”

“谁？”会计睁大绝望无神的双眼，露出一线希望的微光。

“何贤。恐怕只有求何贤帮你消灭了，你快去找他吧！他恰巧正在西贡呢！快去找吧！”

简坤说得不错，这时候，何贤刚好正在西贡。

这位会计找到何贤，二话不说便“扑通”一声双腿跪在何贤面前，死活不肯起来。

会计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何贤吓了一跳！

何贤摸不着头脑，只得本能地急忙扶拽会计起身。

会计硬是不肯起，泪流满脸、哭声哽咽地死死抱住何贤的腿说：“除非贤哥答应救我，不然我不起来了，反正我也没的活了，死就死在你脚下吧！”

“怎么说这种话？”何贤还在扶拽他。

会计又凄惨绝伦地哭求：“你是好人，我死了，求先生卷个席筒替我收尸吧，我不想暴尸街头……”

“好！我救你！请起来说吧！”何贤是个心软的人，见会计这般寻死觅活，只好点头答应。

会计这才实情诉说：“我临走时，清理业务，才知我把公司一大笔数额搞乱了，自己无法抵偿，恳求贤哥帮助……”

何贤一听这笔巨款数额，心头着实一惊，这块大石头要他扛鼎，也够掂量一阵的。

何贤一时间低头沉默，未作表示。

会计失神呆滞的双眼，缓缓游离开何贤的视线，不再哭泣，反倒清静了一瞬……

他麻木地嗫嚅了一句：“对……不起……”

给何贤弯了下腰，便晃晃荡荡欲回身走。

何贤见状顾不得再思忖了，一把拉住了会计……

为救会计一家大小性命，何贤不能不“放血”了，也就慨然答应帮其度过难关。

这是一件鲜为人知的何贤救人的轶事。

多年以后，还是从何贤左右的密友口中，将此事吐露出来的。

知情者曾动容地慨言：“贤哥这样不顾自己地帮助患难之人，丝毫不打折扣，难得，确实难得噢！”

是难得。

或许，何贤在内心也有一种得失账。

或许，他想到自己少的只是钱财，而那会计一家却可能丢尽数条性命吧！

帮人，也有几种境界：

有的帮人是“锦上添花”；

有的帮人是“雪中送炭”。

人们常道何贤都是雪中送炭地帮人，其实不知，何贤还有无数次“帮人”，是让人“死里逃生”。再看一例。

50年代初期，南越吴庭艳政府在本国内实行白色恐怖，对反对其反动统

治的华裔学生大肆捕杀。

万般危急情势下，有些华侨学生为了逃避南越当局的追捕，纷纷买张假护照逃到了澳门。

这些华侨学生到了澳门后，偷偷住在东亚酒店。

东亚酒店又岂能是久留之地？

没呆上两天，便给当地葡警发现了，并查明他们的护照是假的。

于是这些学生被拘捕了。

这真叫“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呀。

处在这个特殊时段，如果澳葡当局照章公办地将这批学生遣返押解回南越，无疑死路一条，必遭杀害。

都是些华侨的孩子啊！

有人于心不忍，向何贤反映了这件事情。

何贤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立即行动。

正巧那次碰上个星期天，不容易找当局，找官员们磨牙交涉，再者，时间紧迫，唯恐夜长梦多……

何贤想定主意，亲自直奔警察厅，自掏腰包，把这批学生全都担保出来，才使这些逃亡学生不致受害，逃出了魔掌。

有人说，何贤家族在澳门地位甚高，关系通达，却未能成为巨富，关键原因，在于何贤心太软，总要付出，有多少钱都不能累积成巨富……

何贤的朋友们，还会特别强调地对人说：“在澳门过春节的时候，不论红、白、黑哪路的人丁，都会收到贤哥送来的利是钱；如果哪个人有难，有危，却向贤哥伸手借不到钱，那原因无它，只能说这个人确实衰到贴地啦！”

这句话意思是说，倘若遇见一个连何贤都不予同情的人物，那么便可断定他是“坏透了”。

在人们眼中，何贤是最宽容的人，常常，连企图杀害他的人都能获得帮助和谅解，那么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贤哥不睬你，定是你衰到家”。……

由于何贤热心社会公益，关心体恤各界人士，屡屡扶危济困，也促进了澳门社会的稳定繁荣。

他不是救世主，但他救过不少人。

因而，何贤于1952年，获得葡国基利斯大勋章。

1953年，他又获葡国红十字会荣誉十字勋章。

勋章，对何贤是种激励，却不是对他善行的等值回报。

或许，对付出的真正回报，应是良知的安宁与做人的知足常乐吧；

还有，就是那个大大的“服”字，可送入天堂之门，令他的灵魂长安。

## 第三十一章 桑梓情深 历尽沧桑返故园

十年浩劫的惨淡风云荡过，何贤在煎熬盼望中，看到了光明的曙光……

1978年12月底，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等领导，在广州大三元酒家设宴招待一度被乡人定为“番禺最大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何贤——也算是从此为他“洗冤平反”……

十几年过后，故人风采依旧，何贤，历尽沧桑重返故园，并将一批批港澳同乡，带回番禺。

英国的诗人雪莱有一句浪漫的预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是的，梅花盛开的时节，离万物复苏，繁花争艳的暖春就为期不远了……

岭南也有梅花，粤北的南雄关下，有一片梅岭，冬天里满山遍野，盛放着纯洁净雅的白梅……

梅花俏，却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十年浩劫的惨淡风云，历史的曲折轨迹，并未曾改变过何贤爱国爱乡的初衷。祖国大地在浩劫中煎熬的年月，何贤的心，也和它一起祈盼春天。

在那些陈年旧月中，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何贤都回来参加。

他在商界的亲朋知己对此不甚理解，总是问他：“内地乱糟糟，你干吗还要亲自回去？去一次不行，还要次次都去，为的什么呢？”

何贤坦然回告：“我是中国人，不管怎么说都希望中国好。中国的事情中国人怎能不去捧场？”

他不但屡屡回广州，还悄悄地回番禺呢！

回想起来，那该是林彪驾机逃亡，摔死在温都尔汗，自取灭亡后的第二年暮秋时节……

一天，广东番禺县大石公社书记欧秋，接到中共广东省委六办的来电，说第二天叶道英等人会到大石社沙溪大队参观，希望他们做好接待工作。

欧秋知道，叶道英即是叶剑英元帅的胞弟。

第二天上午，欧秋赶到沙溪去等候。

不多时，叶道英、柯麟由省委珠海宾馆驻军所长梁祥久陪同，坐小轿车抵达沙溪。

再过了一会儿，又见到何贤和他的秘书韩松也到达了此地。

这，该是“文革”狂风烈焰横扫中国大陆后，何贤第一次重返故里，踏上家乡的土地。

欧秋愣住了，不敢相信眼前的人，真是何贤噢！

那时是70年代初，极左的毒雾还厚厚笼罩着中国苍生大地，一个澳门同胞怎么敢回来乡下呢？

为什么何贤此来，由叶道英、柯麟陪着呢？

又何以选择沙溪做落脚点呢？

一连串的疑问和不解在欧秋的脑海跳动，但凭直觉，他迅速在脑际中作一系列初步判断：

一来，中央和省里仍然可能把何贤视为爱国人士和团结对象，不然为何要通知接待他？

二来，由叶道英和柯麟作陪返乡，其实也就等于把这信息传递给基层，为何贤沟通了回番禺的渠道。

三来，沙溪当时有一大批来自北京、广州的插队知青。他们中有些是中央机关和省市领导的子女；有些是教授、学者等名人的后代，其中就有柯麟的第十个孩子和马万祺的儿子马有衡。

这些人都是何贤的世侄，他们来此恐怕也是为着探望一下知青……

欧秋的瞬间推测，基本上是符合实情的。

无论怎样，欧秋对何贤毫无仇怨，只有好感呢！

他和沙溪大队的干部热情地接待他们，午饭时特地为他们弄了一道家乡菜——狗肉煲。

席间，吃到兴致勃勃处，欧秋作为主人要向宾客们敬酒。

当欧秋起身高擎酒杯，正想临阵发挥，讲几句客套话的时候，叶道英把手一摆，未语先笑地说了一句话中有话的言语：“你敬酒可以，可什么都不要讲，谁也不代表谁呀！”

此话一出口，在场的许多人都笑起来。

怎么回事？有何好笑呢？

原来，叶道英的这句话里，包含着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典故”……

那是1962年秋天，广东粤剧团著名演员红线女、罗品超等，邀请北京一名大导演一起来番禺排练新剧《李香君》。

戏最后彩排时，何贤和太太陈琼也应邀回市桥观看。

《李香君》是部精品，编、导、演阵容俱佳，何贤也由衷地赞赏不已，过了一次戏瘾。

在一次宴会上，何贤觉得自己是番禺人，对于中央和省会到来的名艺人说来，他也该算是东道主的。

所以在祝酒的当口，何贤坦然笑说他代表本人和番禺人民、番禺政府，对导演、红线女等表示感谢！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就这么个极其普通的细节，就这么句极尽人情的贺词，在“文革”当中却成了批判番禺县长何木连的一大罪状，罪名是“让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代表全县人民和政府，却不起来阻止或纠正。”

当然，这些见诸大字报和批斗会的“罪行”，很快便传到澳门等地去，成为局外人士们百思不解的茶余笑谈。

唯有何贤，笑不起来……

而此时，叶道英半开玩笑地引用了这个“典故”。

“谁也不代表谁”，明显话中有刺有骨，带着讽刺意味。

柯麟大概确实是越想越滑稽，听罢率先呵呵笑出声来；何贤皱了皱眉头，撇撇嘴苦笑了一下……

欧秋擎着酒杯，讲也不是，不讲也不行，最后嘻嘻地陪着干笑了几声，凑合地说道：“好，好，不用说什么话了，我们欢迎大家，共饮一杯！”

1976年金秋十月，中共中央为民除害，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这是中国当代历史最最重要的转折关头，用共产党人的话说，叫“拨乱反正。”

1977年夏天，何贤回到广州，又邀约了岳溪乡的干部，到广州人民大厦

跟他见面，并一如既往地捐钱捐物，帮助家乡恢复生产。

何贤也想跟县里领导联系，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摆脱昔日的阴影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从而改变对他的看法。

你有情来我有义，心有灵犀一点通。

事实上，番禺县领导也很想与何贤重新建立联系。

特别是1978年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接着召开了全国侨务会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统战政策和“三胞”（侨胞、台胞、港澳同胞）政策之后，更加迫切地希望尽快接触何贤，并通过他与番禺籍的港澳同胞建立起骨肉亲情的联系……

1978年12月底，何贤因事回到广州。

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和市政协、市侨办、市外经委等领导，在广州大三元酒家设宴招待何贤。

番禺县统战部长卢开获此讯后，连忙拨电给广州市委统战部，希望他们同有关部门联络，安排番禺两位领导参加此次宴会，给番禺提供一个接触何贤的契机。结果得到省市领导的批准同意。

于是番禺县委副书记李志恩和统战部长卢开，出席了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大三元盛会。”

席间，两位干部向何贤汇报了家乡落实情况，他在番禺的亲属凡在“文革”中受过批判的，现在都予以平反。

卢开又告诉何贤，何氏家族的祖屋“文革”时给人占了，现在已收回，准备修理一番之后就交还给他。

临了，县委副书记还代表县委向何贤致以深深的歉意：“何贤先生，过去你对家乡建设出了大力，在‘文革’中的遭遇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希望何贤先生谅解。”

何贤听罢，轻轻摇了摇头，而后平静地说：“这些我能理解。中央那么多老领导、老革命尚且挨批挨斗，我这个资本家自然难免喽！”

他顿了顿又说：“批我骂我倒也罢了，只是连接待过我的同志也批斗就极不应该，极无道理的了。”

十年浩劫啊，最深重的灾难，恐怕还在于扭曲了人心与良知吧。

千疮百孔的故园可以迅速生产重建；

而千疮百孔的心灵遭际，能够得以迅速地复原么？

他们原以为何贤会有许多怨气，甚至从此不理睬家乡的事……没想到他心胸这般开阔，完全不计前嫌，念的却只是他人之不幸与不公！

此次会面后又一个月，也就是1979年春节前夕，何贤又回到了花城。

花市的摊子摆满了大街小巷，春意盎然的景象，预示了一个好兆头。

统战部长卢开，打听到何贤此次住在华侨大厦，就偕同副部长陈浩一起去拜访他。

他们见了面，就向何贤汇报了继续落实华侨政策的情况，并且叙述了团结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计划，希望何贤能够带头并帮助做好几位港澳知名人士的工作。

何贤听此一番话，坦然相告说：“这个工作是要做，只有消除坏影响，才能让人重新建立信心。我本人是没问题的，我对国内的情况知道得多些，容易理解。人家则不同，成见太深了，慢慢来吧，多做工作。”

何贤说罢从口袋里拿出信封，问卢开道：“你们搞统战工作，有没有车

子用呀？”

卢开答道：“县里的车子较少，用车还有些困难。”

何贤听罢，即刻写了“捐赠两台15座客车、两台9座豪华型小车”的字条递给卢开并说：“送几台车给你们，有时港澳同胞回来也好有部车子接送。”

卢开、陈浩等万般感激，感激的不止是几部汽车，更重要的是何贤赞成他们做好港澳同胞的工作，并且用实际行动“雪中送炭”地支持他们的工作。

——郑德，也就是前书中提到过的60年代调到番禺统战部任职的“德叔”，向我们提供了他本人对当时的记忆碎片。

德叔说：旧梦依稀，恍若隔世了……“文革”时把统战部的牌子砸烂了，我“靠边站”后在农场劳动改造了九年。1975年给我落实政策平了反，1979年组织上需要我重返岗位工作。那时因为亟待解决何贤问题，要把他重新争取回来……

看得出，德叔与何贤的私交很深，说话言谈的语气全然不是公事公说之口吻——“何贤呢，文革中家乡人把他搞得惨，文革后他就不回来，把人家定为‘番禺的最大资产阶级分子先锋’，他能不窝气么？！”

“唉！”德叔又深叹一口气，呷了口茶说：“我与他熟络，组织上就把我找回来，并恢复了我的工作。别的同志做过不少铺垫工作的，反正我回来后，何贤就回来多了，算是真正恢复了跟番禺县的来往。”

“您对后来重见的旧友何贤印象如何呢？”我问德叔。

德叔慨言：“十几年了，故人依旧，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忠直热情，我们的关系很好，不用多说，都能彼此在心底理解这十几年的处境不易，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也居然旧友重逢，又走到了一起……”

德叔告诉我，何贤对番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把霍英东引回到番禺来。

霍英东在80年代以前，跟番禺可以说基本没有任何联系。

郑德回忆起1962年时，何贤曾对他说：“我有个朋友，姓霍，他想找祖宗，寻根籍，你能否看看在咱们番禺有没有霍姓，查查他的祖籍。”

德叔笑对我说：“霍英东没有祖乡，他原是水上人家出身，但他自己愿意承认自己是番禺人。”

原来如此，很有意思。

德叔又说，论家财，霍英东比何贤多得多，何贤仗义疏财，比不得暴发之家，所以论出资，霍英东在番禺拿钱助建的数额自然比何贤多。

德叔又道：现在番禺的县委书记和主要领导，都感慨地说：“如果没有何贤，我们不会认识霍英东，也不会把霍英东引到番禺来。”

的的确确，在广东，何贤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充当了面向港澳同胞的第一个“传声筒”。

他不但自己带头回来看望家乡父老，支援家乡的建设，而且频频动员其他港澳同胞，回番禺来观光……从1978年冬开始，先后组织了5个港澳观光团回家乡参观，这中间，何贤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由香港知名人士张耀宗率领的第一个回乡观光团，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番禺时，张耀宗直率地对县委领导说：

“如果不是何贤先生叫我回来看看，我是不会回来的！”

这番直言，对一个人，一段历史，可谓是字字玑珠。

月跨沧桑，终有圆……

远离故园的游子，到底还是在何贤的感召下——走回乡土。

时代，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 第三十二章 支援家乡 慷慨倾囊不遗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何贤的“中国心”，沐浴着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春风，带动起爱国侨眷及港澳同胞，跨过大海高山与历史的阻隔，踏遍乡土，倾囊行善，为南粤大地的经济腾飞鼎力支援，不遗余力。

“珠江三角洲”的片片热土，留驻了何氏的寸寸耕耘，——而何贤，却早早地离开人世，未能等到收获的季节……

回来看看，好好看看，

这是港澳同胞爱国爱乡迈出的最艰难的一大步，

走过这一大步，便等于跨越了历史埋下的雷阵与心灵的鸿沟。

十年浩劫，内地留给港澳同胞的印象太坏了，那时代的记忆不仅于他们，于所有中国人也都无异于一场漫长的噩梦……野蛮，残暴，恐怖，把人往死里斗，往死里整……

而今，只有亲自回来看看，眼见为实，才能相信祖国的“气候”已雨过天晴。

回来看看，才能消除恐怖记忆的阴影。

回来看看，才能沟通许多隔膜疏离的思想感情……

何贤知道，就是要通过一批人回乡观光，才能增进港澳同胞对家乡的了解；另一方面，何贤又邀请番禺县县长黄伟宁，副县长何桃、刘檀添，人大副主任刘云程和统战部长欧秋到澳门、香港参观。

在何贤的召集下，番禺籍的全澳知名人士，参加了在葡京的宴会。席间大家兴奋不已，谈出一个好点子：为加强乡人联络，建议成立“澳门番禺同乡会”。后来同乡会成立时，人们又一致推举何贤为“永远会长”。

在香港，为了提高号召力，扩大影响，何贤建议用“三何”的名义，向香港番禺同乡的知名人士发出邀请。

这“三何”乃何贤本人，何贤的同父异母同岁兄长何添，还有何贤创业时的老友何善衡。

这一招儿真叫灵验！果不其然号召一出，八方响应，连建国后一直不敢接触新中国的人士，甚至那些一向都偏倾台湾当局的社团领袖，都出席了何贤举办的盛宴。

真有如过大节，庆解放，迎新春一般！

不是有句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么？

现在，人人的心都好似飞越了沧海高山，随着春天的风儿变暖、变软、变热……人们的心在融化，融化，为的只是一个热望——帮助重建家乡，赤子们走到一起来。

走到一起来，走出一个爱，走成崭新的未来……

在这次欢宴的基础上，“香港番禺工商联谊会”趁热打铁地诞生了，何贤，又被推举为荣誉会长。

为沟通港澳同胞与家乡关系而甘当“排头兵”和“吹号手”的何贤，这一番举动，可是对家乡的最大帮助。

从那时起，番禺籍的港澳同胞都很关心家乡的建设。

他们或投资，或捐赠，或独营，或合股，创办很多项有助于推动改革开



放、支援番禺县的建设项目。

何贤在这中间都起到了牵头、筹划、串连、促进的作用。

最先该说 1979 年，何贤与霍英东回县，加上张耀宗也回乡观光，三人碰头碰出了“火花”。

看到家乡还缺个优雅住处，香港知名人士张耀宗便提议，在番禺兴建一座高级宾馆，用来接待外商和回乡的港澳同胞，以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需求，并要何贤牵头行动。

何贤觉得张先生说得在理，大陆也开始讲究“投资环境”了；再说，给外商一个良好的印象，这也是个“粮草先行”的措施。

于是何贤找霍英东商量，霍英东也答应捐资建宾馆。

何贤与兄长何添首先为兴建宾馆捐资二百多万港元；而后霍英东又出资三百万，张耀宗先生和梁昌哲的儿子等又捐赠一百多万港元，建了一座占地面积 4 万 3 千多平方米、拥有 220 个床位的园林式现代化建筑，且命名为“番禺宾馆”，何贤为之兴致勃勃地题了四个大字。

番禺宾馆之兴建，为华侨和港澳同胞造福桑梓牵了头。日后它不仅成了华侨港澳人士回归欢叙的聚集地，又为外贸客商、中外旅游宾客提供了优雅的住地。

1980 年 12 月 14 日，宾馆剪彩开业时，广东省市的党政领导以及 200 名港澳同胞，都莅临庆祝，真是盛况空前。

何贤也兴奋得合不拢嘴，他觉得为家乡做成了一件初有成效，极具意义和影响力的好事，心里格外地高兴。

在剪彩仪式上，何贤讲了一番感人至深的话语：“乡土殷情如母子，乡亲厚谊胜手足。我们身在海外的赤子，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不论身在何方，对故乡万缕情思，愿为桑梓的建设，同胞的健康，贡献微末，聊表寸心。”

.....

这番肺腑之言，不仅表达了何贤的爱乡情怀，也表达了所有爱国游子的心声。

也就是这一次，何贤回乡参加番禺宾馆落成典礼的路途上，又酝酿出一个奇迹，一段佳话.....

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郑德叔最清楚从头至尾的经过。

何贤和旅居港澳的番禺籍“乡亲们”二百多人回来搞庆典了，然而路途并不顺畅。

从广州至番禺途中，最难过的一关是大石渡口，车子都塞在那里，蠕蠕爬行。

一开始，何贤没着急，他走下汽车，在路旁踱来踱去，浏览着路边小贩摆卖的一档档各式各样、香气扑鼻的小吃：烤番薯、炒田螺、焖牛腩、豆腐花.....一瞥见这些小吃摊档，便钩起了何贤对童年生活的回忆.....看着这些原汁原味的家乡小吃，何贤真羡慕老百姓们有滋有味的朴实日子。

何贤终于在一个卖豆腐花的摊档前停了下来。

小贩立即热情地招呼：“先生，买一碗试一下！新鲜香滑。”

“嗯，好！”何贤见那小贩的豆腐花嫩滑洁净，样子确实诱人，买了一碗蹲在地上便吃起来。

何贤边吃边与小贩攀谈：“你是哪个乡的？”

“我是大石公社的，我们村离这里很近。”

“香港有人到你们乡投资办厂吗？”

“谈是有人来谈过，只是一看路不好走，交通不行，都没谈成。”

这时负责接何贤回乡的县侨办主任郑德（德叔）刚好走到何贤的身边，便接话茬说道：“是呀，这几个渡口影响交通，受影响的不只是大石，而是整个番禺。以前呢经济不景气，车子少，来往的客流不多，渡口也不觉挤塞，有两艘渡船对开也就行了。现在开放改革一搞活，来往客人多了，车辆川流不息，渡口变得挤塞不堪，如果能修建一座桥就好了。”

“修桥？”听了德叔的话，何贤眼睛一亮：“对，修桥！”

对于修桥的重要性，何贤在澳门已深有体会。

我们前书中说过，澳门半岛只有5.4平方公里，幅员太小，但对面的氹仔、路环却有大片土地可以开发，只是中间隔着濠镜海，往来十分不便，才长期无法开发。

是何贤带头提出倡议，兴建一座氹仔大桥，将澳门半岛和氹仔、路环连接起来，并得到各界人士和澳门当局的支持。

梦想经过努力，十有八九都可成真。何贤有信心，因为正是他经营的澳门工程有限公司承接建造了氹仔大桥。经过四年多时间的努力，他们终于在辽阔的濠镜海上架起一座全长3449.1米，宽9.2米的雄伟壮观的大桥！

何贤兴奋极了！

如今他听郑德一番话，觉得十分在理。他平日总在想让家乡尽快改变面貌，富裕发达起来，却又不知家乡最急需的是什么。当然，刚刚落成的番禺宾馆是他和霍英东等人捐资兴建的，虽然也是为家乡出了点力，但建一座宾馆毕竟不如修一座大桥更有利于家乡的建设啊！

于是他对郑德说：“这大石渡口，还有洛溪那边，确实应当修建两座桥。请你和县里的领导说，你们做准备工作，我来负责筹集建桥资金。”

何贤又给自己身上添压了一筹重重的砝码。

番禺宾馆剪彩仪式结束后，何贤与兄长何添回老家岳溪乡。

途中，何贤向哥哥讲述了自己想集资为家乡修建大石、洛溪两座大桥的宏伟打算。

何添心里一咯瞪，听后直问：“修两座大桥要多少钱？我们两人付得起吗？”

何贤笑着对哥说：“我们俩力量不够，可以找多几个朋友嘛！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把钱集齐。”

说罢，何贤又转身问一路陪同的德叔：“现在政策是否允许免税进口汽车？”

德叔说：“如果是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赠的可以申请免税。”

何贤听了，回过头来对何添说：“有办法了，我去搞一些汽车，赠给县里，他们把这些车出售，就可以搞回一笔建桥资金了。”

何贤那商家之精明本色，这会儿显露出来了。

果真，他说到即做。

1980年11月上旬，番禺县委负责人收到何贤的一封信：

“番禺县委负责同志：我国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五中全会提出措施，全国人民一致（为）积极建设四化而努力。关于我县为改善交通建造大石公社渡海大桥，弟完全同意，捐赠‘万事得’牌旅行车贰佰台（另零件等），

请申请批免税进口，多劳谢谢。”

收到何贤的捐赠信，番禺县委、县政府立即着手办理了申请免税进口手续。

1981年暮春。

有天上午何贤带了一位葡萄牙的桥梁专家，从澳门专程回来察看大石河的水文资料，选定大石大桥的位置。

番禺县委书记苏栓柱、县长黄伟宁等亲自陪同何贤及葡国桥梁专家，乘船视察大石河两岸。

何贤认真地察看了每个位置的测量工作，不时向大石水利会的技术人员征询情况。

下午，县委、县府负责人与何贤及葡国专家讨论大石桥的选址和桥型等事宜。

会议开始前，县里领导对葡国专家表示谢意，他反倒热情诚恳地表白了一番：

“我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我是何贤先生的朋友。何贤先生出钱出力为家乡建桥，我也乐意义务为你们设计大桥。”

何贤的心，看来确实比金子贵重，能感动和融化所有人。

他热心家乡建设的精神，又岂止感动了一位葡国专家呢？霍英东在何贤的感召下再次加盟捐资兴建大石桥。

他也感动了中国有关部门的领导，感动了番禺县数十万人，为把大石、洛溪两座大桥得以顺利建成，各方面的能量和热情都在充分地释放……

1981年10月间，葡国专家已设计出大石大桥的图纸和文字资料，并请人翻译好，一并送到番禺。

没多久，番禺县就派出了县人大副主任刘云程和侨办主任郑德，到珠海拱北约见何贤。

见了面，刘云程对何贤说：“葡国专家的设计我们已认真研究过了。设计得很精美，但有好多地方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情。比如设计中要求采用的钢材，许多要靠进口，这一来加大了建桥成本不说，主要是办理进口手续也很难。再有，将来我们建桥要请内地施工队，按图纸设计，内地施工队需添置很多新的设备，遇到突然棘手的什么问题要找葡国专家来指导也不容易。因此，我们经过研究，准备请内地的专家重新设计，请何贤先生见谅。”

何贤听罢手一挥说：“什么见谅，我也是为了家乡建设，怎么做方便你们就怎么做，我总之全力支持。”

刘云程最后与何贤商定，大桥由番禺聘请铁道部大桥局设计，由省交通厅工程处包干施工。

整个工程费用600万元人民币。

刘云程从拱北回到番禺，县委、县政府便立即着手抽调人员，组成大石大桥建设指挥部，配合省交通厅工程处施工。

何贤呢，不但捐资赞助，而且亲力亲为，他多次回番禺了解建桥情况。

有一次，何贤与哥哥何添又一同回乡。

随行的番禺县领导干部告诉他们，番禺和广州的交通不便，主要是大石和洛溪两河阻隔的原因所致。而今，大石大桥正兴建，应当尽快再建起一座洛溪大桥。这两座桥都建成，番禺至广州就可以畅通无阻了。如此可以想见，今后外商来番禺投资办厂就会大大增多，番禺的繁荣也就指日可待了。

此话句句在理，何贤心知肚明。

只是洛溪河面宽阔，建桥费用比大石要多得多呀！何贤能不想建么？他做梦都想建好洛溪大桥，可他心有余力不足噢。

刘云程接着说：“我们想过办法，拟用大石大桥的办法集资，即自筹一部分，争取省交通厅投资一部分，再发动港澳同胞捐赠一部分，尽快把洛溪大桥也建起来。”

何贤听罢连连点头，对哥哥何添说：“洛溪大桥如果建了起来，番禺县的交通就会有根本的改善了！我看我们把霍英东也找来，合力筹一笔钱，支持洛溪大桥建设，你看怎么样？”

何添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1981年全国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何贤和霍英东都住在北京饭店。

有天夜晚，番禺县副县长刘橦添和县侨办主任郑德捧了一只大西瓜来探访何贤。

见到刘县长和德叔来，何贤觉得这正是个大好机会。

于是何贤便把邻房的霍英东请过来吃西瓜。

他们一边吃，一边商量兴建洛溪大桥的事情。

何贤首先讲出自己的设想，一面讲一面征求霍英东的意见。

霍英东素来就热心国事，关怀桑梓的呀！再说这位气宇非凡的富豪名流，又向来都是愿听“贤哥”的，尤其是牵涉内地的事情，他绝对信任“贤哥”。

当下，霍英东听完何贤说的筹款计划后，没作犹豫，便即刻应允：“贤哥怎说就怎办好了，我没意见。”

痛快！一槌拍板，事情就这样定了。

1983年5月28日，何贤正式向番禺县委、县政府送来捐款。

番禺县委、县政府立即向省市有关部门正式申报立项。

同年6月，何贤赴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六届一次全体会议。

为了进一步落实建桥资金，何贤不辞劳苦，向中央各部门主管及有关领导人陈述番禺交通困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表达港澳同胞支援家乡建设的心情，终于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再免税进口一批汽车用于建桥。

1983年10月，何贤等人以个人名义捐赠的300台日产五十铃1.75吨客货两用车运抵番禺。

至此，洛溪大桥建桥资金港澳同胞筹集部分得到落实（其中霍英东捐巨款立下汗马功劳），而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也批准了大桥立项。

梦想终于成真……

在何贤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段黄金岁月里，他为故乡尽了一切可尽之力：

他与何添“昆仲”，与霍英东等捐资500万港元建了一座长455米、宽12米半、主跨62.5米的大石大桥；接着，他们兄弟又和霍英东等捐资1700多万港元，兴建了番禺一座长1916米、宽15米、主跨180米（为东南亚首位、世界第6位）的洛溪大桥，只可惜这工程的一项项竣工他都没能看到……

洛溪大桥以它跨度之长和造型之美观，获得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奖和优秀工程奖。

1991年《中国人民》杂志总编张彦访问番禺后，就把番禺的经济飞跃原因概括为“侨”、“桥”二字，并写下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桥”“侨”与番禺巨变》，可见“桥”对番禺的命运有多重要！

然而，为了改变家乡的命运，谁又能够否认——何贤，才是最了不起的

一座“桥”呢！

……

1979年，何贤家乡岳溪和石楼公社侨办，动员修复退还何贤的祖居，遇到了些许困难。

何贤知道后，一再表示：“以大局为重，以乡情为重，不要考虑我的祖居。”

后来，县政府又决定修复莲花塔。

何贤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认为那是文物古迹应该修复，而且对开展旅游事业大有裨益，便即刻响应捐资修塔；并且将此次已运抵他家乡准备用于修祖居的青砖，全部捐给莲花塔修复工程！

乡亲们劝他把青砖留下修建何氏祖屋，何贤笑答：“祖屋当然修！不过先搞公家的项目，个人的以后再搞。”

到了80年代初，何贤准备修建祖屋了，却赶上县里刚好同意决定建大石大桥，前面已详述过，何贤为建桥捐资出力那么多，只得再次作罢，推迟修复祖居了。

就这样一推二推次次推，何贤没能赢过岁月，至死，他修复祖居的心愿也没能实现……

何氏家族的祖居，一直到1985年何贤去世两年以后，才得到修复。

这祖居，便是本书开篇第一章的场景。到此处，我们才可恍然醒觉，那神秘空悠的何氏家院中，原来隐藏了多少人间福荫和子孙圣贤之造化……

1982年10月25日，何贤昆仲捐资重修的被誉为“省会华表”的莲花塔落成。何贤何添为崭新的莲花塔题写了牌匾。

乡人为他们咏联：“赤子义修石砺塔，丹心情满莲花山”。

1984年10月，大石大桥落成通车之际，为了表达对霍英东、何添及已故何贤的爱国爱乡情怀的敬意，大桥南岸又建了一座别具风格的“怀乡亭”，大石桥通车典礼也就在“怀乡亭”举行。

故人已去，只有“怀乡亭”柱镶嵌的一对诗联，表达了乡人对何贤的深深眷恋：“怀梦欲归桥喜架，乡情无尽水长流”。

如今，洛溪大桥早也通车了。那么，何贤除了为故乡充任了一个特殊的“桥”的角色外，有谁，能不同意将他再次比喻为“铺路石”呢？

……

何贤一向爱国爱乡，关心乡亲，慈善为怀。早在50年代，他就家乡岳溪办了一间医疗站，免费为当地群众治病。

80年代以后，他更是注重发展家乡医疗，为造福桑梓频频再立丰碑。

何贤与哥哥何添共同捐资108万港元在县人民医院兴建一座“碧秋楼”，碧秋医务大楼于1982年5月1日举行了揭幕典礼，何贤又在揭幕礼上致词。

县人民医院碧秋大楼，建筑面积达2400多平方米，楼前有3200平方米园林设施，鸟语花香，环境幽雅，病人们每每散步休息，无不心情愉悦而感念何氏昆仲。

说到妇幼保健，则话题更长。

从1980年起，何贤就捐资扩建县妇幼保健院，同时还捐出42万港元的医疗器械来充实该院设备。

县人民医院“碧秋楼”落成后第二年初，何贤回乡期间，再次亲临妇幼保健院。

他听了关于医院的概况和发展规划介绍后，说：“这里地方太小，没有发展前途，另选地方重建一间吧。”

回香港时，何贤便又捐来 450 万人民币，让家乡用来重建妇幼保健院。

不仅捐资，何贤还要亲自回乡为新的妇幼保健院选址。他分别在市桥东涌路和南郊选过两个地方，都认为不合适，最后选定了在东城区清河路。

何贤看到那里地方开阔，空气清新，很满意地说：“医院建在这里好，大有发展前途。”

医院倘若建成该取什么名字？何贤也想好，说“就叫妇女儿童医院吧”。

不料，医院还没动工，何贤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1984 年 2 月，家乡人“化悲痛为动力”，开始动工兴建全新的县妇幼保健院。

该院建筑面积 12000 多平方米，是个富有亚热带园林景色的极其考究、设备先进的医院。

县委、县政府对该工程的建设十分重视，把它作为县里的重点工程来抓。

为了缅怀何贤的功德，新址落成的番禺妇幼保健院被定名为“何贤纪念医院”，以怀念何贤。

何贤逝世后，港澳爱国精英霍英东、张乔治，还有何贤的儿子何厚铨等，纷纷为“何贤纪念医院”再捐赠设备。

何贤生前，和兄长何添一道，为建设家乡的医疗保健事业，总共捐资 950 万港元，这当中尚不包含儿子何厚铨和何氏其它家人的无私奉献。

1986 年元月，何贤纪念医院终于落成，何贤生前的夙愿已偿。

医院专设了一间“何贤先生纪念馆”，在世人眼中，新的医院既是番禺妇孺的福音，又是何贤爱国爱乡长留桑梓的一座永久的丰碑。

番禺县人民政府所立的“何贤纪念医院碑记”中镌刻道：

“全国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港澳知名人士何贤先生，番禺岳溪乡人。历来爱国爱乡，关心祖国四化建设与统一大业，对家乡公益事业，贡献殊多。一九八三年，先生视察县妇幼保健院，感该院不适发展之需，遂慨捐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其造福桑梓之怀，泽荫妇幼之心，邑人共感，众口咸喜。讵料宏愿未竟，哲人先逝，亲友同恻，闾里为哀！方公楼宇落成，乃将本院命名为何贤纪念医院，于院内设何贤先生纪念馆，塑铸半身铜像，永留典范。苍松翠柏，萦绕其间，卜弦遣风，镌石铭志，以垂永远。

番禺县人民政府

公元一九八六年春吉日立”

这恐怕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又一实例吧！

本来，撰写这本书，一直想循着严密的时间顺序，来追述何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何贤平生之传奇。

可是太难了。因为何贤做的许多事业，都是在他过世之后才大功告成，所以我们说完“死后事宜”，又要续说“生前踪迹”。

何贤对家乡的厚报，乡人含泪诉说不完……

春天，悄悄地到来了。

岳溪，经历了自然灾害的大片禾田，如今绿油油的，吐穗扬花了……因为何贤特意送来了大批优质化肥；澄溪抽水站不断地把淡水倾注在田里，让饥渴的禾苗喝个心满意足。

何贤哪，又送来两万元发展生猪生产的资金，调动了一村子乡亲的积极

性：托“贤哥”的福，大步流星奔小康；

秋收了，两台“福森特”拖拉机驰骋在田野上；

夜晚，一个配有西德放映机的机队，四台 20 英寸的彩电也是何贤白送的，还不够娱乐百姓么？那好，1980 年，何贤拉上哥哥何添，又为故乡石楼计划兴建“石楼影剧院”，再赞助捐资 35 万元，另添置舞台布幕、风扇共值 12 万元；

再建造岳溪长岭桥，全长 20 米，方便乡民来往，尤其是孩子上学；

1982 年 5 月，为岳溪乡赠送汽车两台；次年 8 月，再继续赠送汽车五台；

1982 年 11 月，何贤主动为乡人送上了 20 万元捐款，用于岳溪建发电房、购买发电机组和低压网；

——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何贤兄弟所带来的。

难怪乡亲们说：“翻身不忘共产党，岳溪的建设离不开何添与何贤。”

是的，对于素念乡情，捐资赠物已达五十多年历史的何氏家族来说，真可谓积善成德，集腋成裘，义薄云天，情深似海。

何氏家族，在海外和港澳台所有的“龙子龙孙”中，最恋乡情，最恋故土。

都道何贤平生最富“人缘”，然而又是什么“缘”，最能打动何贤呢？

——“乡缘”，何贤对家乡，至死都怀着一种浓浓的依恋。

让我们将视野再呈“冲积扇”状散射开去，看看何贤曾经怎样为祖国的南粤大地，为珠三角地区，留下他的心血和汗迹……

在佛山：

早在 50 年代，何贤就常去佛山。

那时，他得知佛山要兴建一座“佛山华侨大厦”以方便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内地探亲旅游，即决定赠款折合人民币约五万多元的一些建筑材料。

1962 年华侨大厦落成典礼时，何贤夫妇来佛山剪彩，还特意从香港带来曲艺团为落成典礼增添欢乐的气氛。

后来由于“左”的影响彼此曾一度中断联系。

改革开放以后，佛山地区、市的领导同志又积极主动地与何贤取得了联系，何贤对中国特殊的一段历史深为理解，他对佛山的关注与支持也一如既往，义不容辞。此后，他多次来佛山探访老朋友，并参加佛山的一些民间传统活动，如秋色赛会等，他也一直关心着佛山的建设。

自 1980 年至 1983 年 5 月间，何贤先后捐赠给：

佛山市华侨大厦大、小冷气机 63 台，值 19 万港元。

佛山石湾美术陶瓷厂日立牌冷气机 25 台，值 22 万港元。

佛山市兴华商场新日产 1.25 吨客货两用车 3 辆，值 10 万港元。

佛山市果副公司、煤建公司日产 1.75 吨客货两用车 10 辆，值 35 万港元。

佛山市委农产品吹干机 1 台，喷药吸水机 1 台，值 9 万港元。

何贤不单自己慷慨解囊，还发动港澳同胞一起为国家繁荣效力。佛山目前最高层楼宇“旋宫酒店”，就是由何贤牵头、港澳知名人士马万祺、卢道和，与佛山市合资 4200 万港元兴建的。其中何贤出资 350 万港元，并任名誉董事。

更不能忽略的一件事，是兴建“广珠公路四座大桥”。虽然这不属佛山市的建设项目，但所经南海、顺德、中山都是佛山地区所属范围，也大大地促进了佛山市的经济发展。

常言道：桥路通，财路通，建桥筑路富国利民。何贤不光为自己的家乡番禺倡议并带头捐资建设了两座大桥，广东省也在他的倡议和策划组织下，建起了广珠公路4座大桥——这是一个气势磅礴的壮举，又是一项造福万代的工程！

珠江三角洲是个水网地带，广州至珠海的一条公路纵贯了大半个“珠三角”，从前由澳门来广州，要六七个钟头，交通运输很困难。现在一开放，想吸引外商到三角洲投资办厂，交通运输不过“大路关”是不行的。

何贤看在眼里计在心头。他把这个想法说给了霍英东，后来又找了柯正平、何善衡、何鸿燊、马万祺和陶开裕等人磋商，大家都表示赞同，并决定用贷款建桥、收费还债的办法解决资金问题。

于是成立了一个南光公司，推举柯正平为董事长，何贤、霍英东为副董事长，何善衡、何鸿燊、马万祺、陶开裕任董事，用澳门葡京酒店附近的一块地作押，向银行贷了1亿5千万港币作为投资。

这一倡议当然得到广东省领导的赞许。

1981年8月，由广东省公路建设与澳门南光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并成立了“广珠公路桥梁建设指挥小组”，开始动工兴建广珠公路的沙口、细濠、洪奇、容奇4座大桥。

历时三年的艰辛拼搏，到1984年11月4座大桥全部竣工，令全长137.6公里的广珠公路畅通无阻，大大方便了交通，加快了运输，促进了珠三角之经济腾飞与繁荣。

而何贤，又没能亲眼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这一举功德无量，已无须述说。这里只想录下一段霍英东在庆祝广珠公路4座大桥全部通车时的致词：

“何贤先生是建设广珠公路4座大桥的积极倡议者和赞助者之一，他生前十分关心和支持这4座大桥的建设，可惜在一年前他已离开我们了……我们十分怀念他，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精神，为进一步修建、扩宽、改善广珠公路而出钱出力，为祖国四化建设多作贡献。”

诚然，何贤先生，高风亮节，他毕生爱国，造福桑梓的赤子之心，长久地感动着后人。南粤之人说到何贤，无不动容无不哀憾……

在中山：

中山也叫“香山”。中山人爱称何贤做“何公”和“贤哥”。何贤仙逝之时，中山人有如失掉亲人，深感悲痛……

中山与澳门毗连，关系更为密切。中山市旅居港澳的同胞近30万，其中澳门约占三分之一。

而“何公”斐声港澳，澳门同胞对他深为尊重。

早在50年代，何贤每过石岐，中山人都以礼相待；而中山每有急需，何贤自会大力支持解决。

对中山的公益事业，何贤可谓不遗余力，他却谦逊地说：“稍尽手足情谊的小意思。”

中山人清晰地记得，1958年搞农业机械化时，何贤就捐款支持中山拖拉机站添购拖拉机。他通过澳门乡亲徐东海，又代购了一批价值1.6万港元的车、钻、刨床支持五城公社。

何贤的太太陈琼，1959年向该镇捐赠了发电机，解决了居民用电。神湾陆路交通不便，何贤夫妇就又捐款支持该镇修筑了公路，促进神湾的工农业



发展。

何贤支持中山发展旅游业，1980年，中山刚刚开办了长江旅游区，就得到他捐赠的20部彩色电视机。

在此之前，中山县（当时未改市）最想引进外资在温泉建一座宾馆。

于是中山县领导先找到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柯正平还是要找何贤商量，何贤当即表示：“这事好办。”

于是何贤出面，找了老朋友霍英东、何鸿燊和陶开裕，共同筹集了四千多万元，仅用一年时间就在中山建起了一座园林别墅式的温泉宾馆，令它成为广东的第一座旅游宾馆。

到了1980年中，何贤又得悉中山县想在石岐建一座纪念堂以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是他便跑前跑后地又忙忙碌碌，乐此不疲了。

这一回，何贤充当了什么角色？且听听中山市政协的领导们的忆述吧……

“80年代中山相继落成了县人民医院杨颖滨大楼、温泉宾馆和孙中山纪念馆，是由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杨志云、霍英东和郭德胜先生等捐款或投资兴建的，这点没错。但是我们要说，这三大建筑物的诞生，倘没有何贤助一臂之力，恐怕也不那么容易。

“拿孙中山纪念馆来说，本由旅港同胞郭德胜先生捐资1千万港元兴建。而它的建成，说到底又与何贤的支持分不开，道理何在呢？”

“1980年秋，杨颖滨大楼奠基后，以李耀祺书记为首的中山代表团，应邀到澳门访问。何贤设摆家宴，特以中菜西食（即中国菜式接西餐方式品尝）盛情款待大家。

“席间，何贤谈笑风生，从中菜西食扯到国内改革。他说吃饭也要改革，今晚请诸位品尝，征询意见，集思广益好不好？他的从善如流，虚怀若谷，使赴宴诸人钦敬。

“但更令人感动的是，当谈及中山的建设时，何贤坦率而又诚挚地问：‘人民医院杨颖滨大楼现已动工兴建，还有哪些项目要我出力？’

“我们都晓知，杨志云先生提出建杨颖滨大楼的意见后，曾经耽搁了一段时日，后来得到何贤鼎力支持，才使这个项目上马。代表团本想趁此次聚会，向何贤道谢的。岂料还未启齿，何贤却抢先表示，愿为中山继续效劳！他啊！坦诚磊落，赤子丹心，实在难能可贵……”

就在那次何贤盛请的家宴上，李耀祺书记代表中山人民，再三向何贤致谢。

而后他们把中山拟建孙中山纪念馆的设想提出：中山是孙中山的故乡，又是一个侨乡。建设孙中山纪念馆，让我国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先驱之英名伟迹永为后人怀念，让每年数以十万计来县探亲、旅游的侨胞及国际友人瞻仰，这一设想是否可行呢？

“好呀！我赞成。找谁捐建呢？”何贤非常爽快地单刀直问；

中山领导们将考虑的想法也和盘托出：“筹建县人民医院大楼初期，郭得胜先生也曾拟捐资，后来，杨志云先生独力捐建，命名为杨颖滨大楼。那么如今，我们可不可以让郭先生建设孙中山纪念馆，以遂其造福桑梓之夙愿呢？”

“好！胜哥（何贤爱称郭得胜为胜哥）热心公益，早有为家乡建设出力之意，必定乐意兴办此事。我同他情如手足，这件事，包在我身上，等我去

香港，立即同他商量。”

这就是何贤的作风！举凡公益事业，他一向当仁不让，眉头都不皱一下。

那一次“何氏家宴”极其轻松，主客之间，感情融融，言谈亲切而又愿望相同：举杯祝“孙中山纪念堂”筹资顺达，建设成功……

1980年底，何贤参加完广州花园酒店的奠基典礼后，赶赴中山温泉，他把郭得胜欣然许诺捐建孙中山纪念堂的喜讯，传递给中山县委统战部长林藻，并说郭先生在大良吃午饭，一会儿即可抵达温泉，拟同你们商谈此事。

说罢何贤便因急事返回了澳门。

翌日，何贤又来中山参加温泉宾馆开幕典礼。

进入拱北时，何贤遇到林藻部长，头一句话便问：“胜哥捐建孙中山纪念堂之事，谈得怎样？”

林藻告诉他，郭先生有此心意，但由于时间关系，谈得还不够具体。

一抵达温泉宾馆，何贤即来拜会“胜哥”。……（何贤如何对胜哥动用心舌，我们无人知晓）

喜炮长鸣中，温泉宾馆剪彩仪仗隆重开始了。欢腾喜悦的人群中，何贤更加喜挂眉梢，他象个孩子一样高兴地告诉林藻部长说：“当真的！胜哥的确打算慷慨捐资兴建纪念堂啊！”

可过了一段时间，还未见到捐赠书送来。

何贤得悉这一情形，沉思了一会儿，亲切而又审慎地说：“不用愁，我素知胜哥为人，他性豪爽，生意忙，时间紧。捐款容易，写捐赠书倒难！手续繁琐，恐才导致耽搁的！等我去搞掂（办妥）。”

结果呢，不用细述了。正是何贤公，自始至终，不辞劳苦，鼎力促成，以他“亲如手足”的深厚情面，动员了香港富豪郭得胜慨然捐赠了1千万港元——于1983年盖起了一座雄伟壮观的孙中山纪念堂！

这是郭先生的功德义举，也是何贤的大大的“面子人情”，才使得一个梦想成真，一个奇迹出现噢！

所以，中山市的领导人回味往事仍不忘加上一句：“我们能建成孙中山纪念堂，与何贤先生的支持丝毫也离不开……”

这是中山人的肺腑之言，何贤去世了，人们无法不时处处想到他——连我也不得不怀疑：今生今世，于茫茫人海中，我们，还寻得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这样的心么？……

在南海：

何贤生前，曾出任澳门南海县同乡会名誉会长。因其已故夫人郭绮文原籍是南海九江朝山乡。而其现在的夫人陈琼原籍也是南海盐步河西乡，所以何贤也应算是“南海的女婿”了，他因此也一直把南海看作自己的家乡。为南海的教育、旅游和经济建设，同样出力不少。

1959年，何贤曾偕同夫人陈琼回南海盐步河西乡探亲，与乡干部和群众一一见了面。那次他的谈笑风生毫无拘束，给纯朴的家乡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临别时，乡干部们拉着何贤的手，盼他今后经常回乡，何贤风趣地说道：“我是这里的姑爷，当然要经常回来！”

1960年，何贤到西樵山旅游，看到西樵旅行社设备陈旧的邯郸楼正在改装设备，他便主动提议既然改造，设备就要搞先进一点。而后便捐赠了浴缸、洗面盆等一批洁具，水管八吨，共值10万元港币。

这一次，何贤还赠送放映机一台给西樵林场，使林场职工在场内就可以

看到电影，以丰富文化生活。

1963年和1979年，何贤夫妇也曾先后率领澳门曲艺队到南海，与省港名伶罗品超、白雪仙等携手演出，交流了戏曲艺术。从前面我们已多次叙述到澳门曲艺的演出足踪——在广州和“珠三角”的许多城镇，都留驻了他们的音容歌艺和款款风姿。

1979年，何贤游览南海西樵山。他获悉旅行社正在装修三湖宾馆，便再次主动捐赠20万港元，添置宾馆设备及客房用具一批。

1981年，西樵山举办“锦龙赛”盛会时，“姑爷”何贤除了捐赠3万港元和奖品外，还大力协助邀请来一批港澳知名人士到西樵观赏龙舟竞渡，促进了南海县旅游业的发展。

1982年，何贤获悉南海发展教育事业有困难，即与马万祺等人商议，捐资筹建南海中学，这一下“姑爷”又倾囊75万港元。

为发展经济，何贤向南海捐赠农副产品干燥机、喷水喷药机各1台，价值9万元。

1983年，他又捐50万港元给里水区兴建侨联大厦。

同时，何贤仍旧发挥他的交际优势和感召魅力，为南海做了许多“穿针引线”的“统战”工作。比如我们前书中提到的大富豪傅德用（傅老榕），当年不就是西樵山下的贫家儿么？

傅老榕发达后很少与家乡联系，何贤与他是知交老朋友，便向他转达了南海县领导邀他回家乡观光的口信。何贤热情地告诉傅老榕南海家乡多么好，谈他自己回来观光的感受……傅老榕本来已接受了南海县领导的邀请，后因故又未成行。不久，傅老榕邀请南海的领导们赴澳门去，又是由身在澳门的何贤，亲自陪同南海县政府派出县华侨投资公司的经理郑拔和崔其伯二人前往拜访傅老榕。

傅老榕那一见面，十分高兴，捐赠了港币10万元、机动船两艘、碾米机两套给家乡作了“见面礼”，并从此与南海家乡恢复了联系。

就这样，不少多年没有回乡的港澳同胞，在何贤费尽心血的动员下，陆续都踏上乡土，为南海家园的现代化建设，使出自己的一份力，献上自己那一份浓浓的亲情……

在顺德：

何贤年轻时代，曾在顺德的陈村经过商，还当过学徒呢！（书中前章已述）

因而，他对顺德也怀有深厚的感情，那是他一生商旅的启蒙地。

每次经过陈村时，何贤都要叫司机停车，或开着车在镇上转一转……看看那里的变化，怀念着过去的时光，更憧憬着美丽无限的将来，他愿意为顺德县的建设需要再添一把柴，再助一把火。

50年代，顺德因建设缺乏钢材。何贤闻讯后，就送去了50吨钢，解决了县里燃眉之急。

1961年，为支持顺德发展农业，何贤又捐赠了3吨化肥和1500吨澳洲面粉作养鱼饲料。

1982年，何贤与何添昆仲，再捐资兴建了陈村镇中学校舍，共占地2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5500平方米，其中包括教学大楼及礼堂、音乐室、饭堂、师生宿舍等，颇具一番规模。

兄弟两人都是何家的孝儿，为了纪念他们的父亲何澄溪公，又将该校的

教学大楼命名为“澄溪堂”。

在珠海：

珠海与澳门仅一关之隔，何贤奔波于各地，最终还是在珠海留下的足迹最多最多吧……

据珠海市政协副主席、旅游公司总经理谭炜介绍说：

“何贤先生对珠海的建设很关心，特别对特区旅游事业的发展，何先生曾投资七千多万港元，同时联系港澳知名人士和我们合力建拱北宾馆、珠海宾馆和珠海游乐场。珠海经济特区的旅游事业能迅速发展，与何贤的鼎力支持分不开。”

谭炜又举例回述：“1983年9月，何先生赴美国治疗，自知身罹肺癌绝症。可是他对珠海的旅游业还是惦念在心，乃至从美国打来电话，向我询问这里的情况。1983年10月中旬，何先生从美国返回澳门，已是病入膏肓。11月中旬返番禺前夕，他对珠海旅游事业的建设，仍念念不忘：‘我没事的，待身体好转，再详尽地拟个发展计划，务把珠海的旅游业搞好……’”

拱北宾馆、珠海宾馆和珠海游乐场，而今都已落成开业，何贤仍旧留下一份遗憾，没能等到那一天……

无须再一一例举了，因本书篇幅有限。

更重要的，是我很难从有限的资料与访谈中，将何贤先生对国对乡对民所倾注的血汗全部实录下来。

然而仅看上述这些，便足已令中华儿女感叹一个人、一颗心的分量——一个叫何贤的人，和他的那颗“中国心”之分量。

### 第三十三章 病魔缠身 大丰危祸不单行

1983年秋天，何贤被确诊患了肺癌。于是赴美国纽约就医，而将大丰银行的家族业务，交给“五公子”——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工商管理系的年仅28岁的何厚铨。

天有不测风云。何贤赴美就医期间，一场由谣言引发的大丰银行“挤提”风波，掀动了人心惶惶的澳门市面。何氏家族的支柱大丰银行危在旦夕……

1983年，是何氏家族的多事之年。有什么不详的预兆，预示出何贤与何家……与往常有什么不一样么？

仿佛一切如常。

这是初夏的某天，跟往常一样，何贤饮过早茶后，照例到南光公司找总经理柯正平闲聊。

以往他们谈的都是很轻松的话题。或通信息，或谈社会新闻，或探讨问题，或拉家常，都是谈笑风生，兴致勃勃的劲头儿，“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何贤，永远气定神闲，悠哉游哉的模样，可这一回他的脸色不大好。

今天何贤显得心情沉重，落坐后沉声对柯正平说：“我的身体有问题……”

“是什么问题？”

“肺癌。”

柯正平觉得很突然，心里一沉……但他怕影响何贤的情绪，马上镇静下来，用平静的语气问道：“确诊了没呀？”

“确诊啦。”

柯正平沉思了片刻，问他：“你打算到哪里治疗？”

何贤如实相告：“我已打听过了，许多朋友也都劝我到美国就医，那里的医疗条件好。”

柯正平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道：“我劝你到北京治疗，因为北京的医生高明，医疗条件也好，还有一点最重要，是中央许多首长都熟悉你，知道你，到时可以调动最好的医生为你治疗。你看怎样？”

何贤听后默然良久，临走说道：“我再考虑一下吧。”

他考虑的结果，还是决定去美国。

何贤赴美就医，这一撒手生意事，家族中便惟能指望一个儿子——何厚铨了。

何贤先后有五位太太，六儿七女，再加一个养女。

何家长子叫何厚铿，是学音乐的出身，是何贤第二个太太谭佩贞所生。

何厚铨是儿子中的“老五”，在何贤所有的子女中排行十二。他的弟弟何厚泽最小，排行第十三。

陈琼是何贤最后一位太太，她为何家生下最后两个儿子：厚铨和厚泽。

不幸的是，厚泽如今已亡故。据说是在1992至1993年间，厚泽在美国跳楼自杀，原因不详。

郑德叔与何氏家人私交甚好，他说了一句情谊深长的话：“我是看着厚铨长大的”。

1955年在澳门本土出生的何厚铨，自少年时代起就被父亲送到加拿大读书。

从中学到大学，何厚铎的青春岁月都在异国度过。“他的英语比中文好得多呢”——凡叔父辈的长者，都熟知厚铎是喝洋墨水儿成长起来的。

仅这一点，他便比只读过三年私塾的家父何贤幸运得多！

何厚铎读的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会计专科，学的正是商家本行，因而才有可能真正在日后继承父愿，统管何氏家业。

与之相反的，何贤的大儿子厚铿虽在美国读大学，专攻的却是音乐。他是个音乐博士，很有作曲天才。何贤也曾骄傲地向人夸耀过大儿子，说“华南体育会”会歌就是厚铿创作的。

回过头来说何厚铎。

何厚铎在商业上富有才干，全无花花公子贵族少爷的吃喝玩乐性情。

厚铎在留学期间，何贤给他几万美金作生活费用，可是厚铎到了加拿大却半工半读，把做工所得用于读书食宿费用，而把父亲给的钱分文不少地带返家中。

何贤看在眼里，喜上心头，他默默有了准谱儿：“看阿铎这勤劳节俭的生活习性，将来定会有出息”。

1978年，何厚铎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

1981年，他经考试成为加拿大特许核数师、注册会计师。

1982年，学成归来的何厚铎返回香港，在毕马城会计师楼担任核数师。

这期间时日短促，本来一切刚刚安排好，何厚铎一心想在全新的事业生活天地中自食其力，自谋生路，故没有在庞大的家族生意中任职。

父亲病发后叫他回来，开始厚铎不肯回澳门，再后来父亲的病严重了，要到美国治疗，需要他回来。无奈中，厚铎显然已由不得自主选择生活的天地，他是何贤病危中的希冀与慰藉——所以他尽孝子之道，临危受命，代理家族的繁重业务。

80年代的澳门，经济正面临起飞。

然而国际经济的大气候却令这个小城也承担了动荡飘摇的风险……

何贤赴美治病后，在澳门的全部生意都交待给了他的宝贝儿子厚铎负责打理。

与父亲不同的是，何厚铎是新时代的生意人，他曾在加拿大攻读工商管理学位，现在回到澳门协助家父料理生意，可谓又有理论之箭又有施展拳脚的靶牌，这文武双全商衔披挂的年轻人，本可以在澳门商界一路“绿灯”地驰骋，施展作为了，不是吗？

然而事实，却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命运，常常最爱捉弄人。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便是这个道理吧——有时人一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儿……

父亲病危，大丰也危，且危在旦夕——这恐怕是年纪轻轻仅有二十来岁的贵族子弟、“乖乖仔”何厚铎，做梦也始料未及的“不顺”啊！

这天，何厚铎准时来到父亲在大丰银行的二楼办公室办公。

他的秘书将当天的日程安排及需要他批阅的文件放在他的大班桌面，何厚铎刚刚落坐开始批阅文件……

忽然，楼下营业部经理敲门疾入，神色慌张地对何厚铎说：

“今天形势有点不妙啊，许多人来提款，大厅都挤得满满的！”

何厚铎立即吩咐道：“去告诉你的手下，不管提多少，都要照付，态度要好，不要给存户以不良的错觉，那会引起更大的混乱和恐慌，得把事态稳

住，不能慌！另外，你到大厅去转上一转，听听存户们都有何意见，马上汇报我听。”

“好！”营业部经理匆匆答应，便转身离开，此时，接二连三的电话铃声，便像“催命鬼”一样刺耳地鸣响着，这种时刻里，听这铃声也预示着不详，令人心惊肉跳……

何厚铎镇静地接起一个个电话——不出所料啊，是大丰的好几家分行连续打电话来报告说，他们那里也排满长队，蓄户们纷纷吵闹着等提款呢！

为什么会这样？！上帝！

何厚铎脑子里迅疾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挤提”！

这对于银行来说，无疑是天灾人患。

但他还是努力想将脑中的这个可怕念头排除……不要让自己过于神经敏感吧！

何厚铎手心里已渗出了冷汗，但他得撑住，不能乱阵。

他照例指示各分行按常规给大丰存户提款。

到中午 11 点左右，营业部经理上门来郑重禀报说，现金快要告罄，但是排队等提款的存户人群仍旧有增无减啊！

“究竟出了什么差错？你有没有调查一下原因？”何厚铎急问。

营业部经理说：“我在存户队伍中转了一圈，听他们说，好像市面上谣传大丰负债累累，董事长身体又垮下了，存户们对大丰信心不足，都慌了阵脚，就纷纷找上门来提款了！”

见鬼。银行正是利用储户存取之差、贷款生息挣钱的，

傻子也明白，倘若所有的存户一齐来提款，银行的正常运作就会中断，那结果将不堪设想！

大丰银行——这个最具代表性的何氏家族企业，却因谣言蛊惑而引致不明原因的存户排队提款，一瞬间突降厄运，正象怒海中的孤舟，被狂风骤雨打击着，逆流浮沉，欲淹欲没……

当时，已有四十多年历史，且信誉卓著的大丰银行，由于别有用心者的推波助澜而极有可能毁于一旦。

何厚铎，此时心重如铅，脚底发麻，他遇到有生以来从未遭遇的挑战；

他在心底喊着老爸，又百般心疼着老爸……但他的面容静如止水，无人能目击他心底的世界与波澜……

## 第三十四章

### 中银注血 赶鸭上架担重任

1983年10月12日，为大丰风波困扰的何贤，以非凡的胆识和与命运抗争的勇气，重返澳门，为大丰的前途做出重大决策。

1983年11月30日，中国银行接受大丰建议，决定参股并接受大丰董事会的委托，于翌日派负责人管理。

何厚铨被任命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临危受命，接过了管理大丰银行的神圣重任。

想起来了，何厚铨“属羊”，人常说属羊的命中多苦难。

可是，他是出生在何氏家族，这么一个富足而又风光显赫的摇篮里，他并未历经多少凄风苦雨，只不过曾长年远离父母膝下，远渡重洋求学。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含着金钥匙出世的何厚铨，并非拿着金钥匙去开启自己的事业之门……他如今碰了壁，碰的可是个始料未及的天灾人祸。

躺在金银窝里的何厚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昨天还平静井然的大丰家业，今日突然间像给台风掀起了房顶金瓦——大丰，危在旦夕，会不会一夜之间破了产呢？

形势极其严峻，却再也无处逃避了。

何厚铨立即召集银行高层管理人员开会，大家共同商量对策。

会上有人提议：打长途电话到美国吧，向何贤汇报这个突发事件的实情，看看何大家长有什么妙计可摆脱困境。

人人也心知肚明，不到万不得已，谁能忍心去惊扰远离乡土重病缠身的何贤公呢！

而厚铨此时心里也正举棋不定。

他心想，父亲正在重病中，倘若他一知道这个消息，情绪一定会大受影响，说不定会加剧病情，导致恶化……

他万般不情愿打电话告诉父亲哪！

但这事太不寻常，关系到大丰银行的生死存亡。这么大的事不告诉父亲，也瞒不过数日，将来被他知晓的话，情形反而更难补救，父亲至死也不会原谅他。

怎么好呢？厚铨思量来考虑去，最后还是同意打电话去，将此事报告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家父何贤。

与此同时，何厚铨再向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求援，希望他们能给大丰借出一部分资金解燃眉之急……

再说何贤这边。由于时差的关系，当他得知这个晴天霹雳的坏消息时，正是午夜时分……

异国的夜晚，如此静寂与漫长，何贤的心却有如滚粥煎熬，他不顾大家的劝阻，执意要手下的人连夜去替他订购机票，飞返香港。

这可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生命的叶子即将凋落，难道说，连同大丰家业亦要随着生命的萎枯凋零么？

支走身边的人们去办各种手续后，何贤歪坐在一把躺椅上气喘吁吁，心绪难平……他恨不得马上飞回澳门，回到大丰，即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镇指挥！



他惦念着厚铎儿，他为儿子捏了一把汗。许是他对这位因鼻子酷肖其形又精乖伶俐的儿子情有独钟，何贤割肉一般心疼，舍不得让厚铎吃力地为之扛鼎，毕竟，他只有 28 岁啊！

何贤更心疼大丰——他在大丰干了大半辈子，大丰如日中天过，飞黄腾达过，蒸蒸兴旺过，也风雨坎坷过……这份支柱型何氏家业，曾凝结着他多少心血噢！

何贤左思右想，浮幻联翩，越琢磨越心急，为可能因为情绪激动的缘故，想到此时他竟感到一阵眩晕，只好按铃叫来护士。

在护士的紧急救护和料理下，何贤上床躺下，合上双眼，谛听着自己艰难的心跳，不知不觉，泪滴从他的眼角溢出，悄然滑落耳眼……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动情处……

常言道，商场如战场。

何贤拼搏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几十年，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什么灾难坎坷没体尝过？

可每一次，他都能化险为夷，平安闯过，亦曾因祸得福。

总之，他不惧挫败，屡历风险却屡建功业。

而这一次与往日大大不同！他远在异乡为病客，大丰却如此危难，他怎能不急？

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恐也是人生的刻骨悲哀吧……何贤满怀悲凉地想到，毕竟自己老了，又重病缠身，眼看着日落西山，气息奄奄，实已无力再去拼搏了……

但愿阿铎不辜负自己的厚嘱重托与殷殷期望吧。何贤平素决无纵宠子女，可此时他内心也还是难过极了……他甚至想到，是自己的病重拖累了厚铎自由美好的生活前景，这可真叫“赶鸭上架”——他成也得成，不行也得撑了！

人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何厚铎本是富家公子，但在危难关头，也实可谓“早当家”了。他日后的成就，或许就是从这个关口处，硬是给灾祸逼出来的！

“我走的这条路，本来实在是身不由己。”的确，世界上少有呱呱堕地的天才幸运儿，更没有天生平步青云的成功骄子。磨难是一种命运的食粮——举凡成功人士都不曾侥幸避开的“刺胃”口粮。何厚铎于今对人毫不讳言当年的他，是怎样硬着头皮被“命运的鞭子”推上这条路的……

就在何贤为大丰银行担忧的节骨眼上儿，大丰遇到危难的消息也迅速传到了北京。

中央领导同志给中国银行作了指示：何贤为国家办了这么多好事，且历经数十年，今天他的家族生意遇到困难，我们应该帮他一把！

指令很快下达到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澳门分行一面通知大丰，同意拆借资金，并向新闻媒介表示，大丰经营状况良好，中银有意向大丰参股。

在此时期，澳门社会中纷传着一个可恶的谣言，人们都在私底传说何贤在美国已死了，这无疑是在摇摇欲坠的大丰危业再推一把，雪上加霜的不吉音讯搅得人心浮动不安。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闻媒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 1983 年 10 月 4 日的报刊上大红条幅刊登报道：《昨在美接受记者长途电话访问：

何贤表示很快康复·大丰一切业务正常》。

《澳门日报》以此为大标题发布“本报消息”：正在美国纽约养病的本澳中华总商会会长、大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何贤，昨日下午五时曾与记者通长途电话。何氏声音响亮，一点不像病重之人……

“连日来，对何贤的健康情况谣传纷纷，昨日更引致前往大丰提款的人士比平时增加，需要排队提款。对于大丰所出现的情况，澳门政府经济协调政务司、发行机构及本澳银行界均一致表示，如大丰银行需要，将全力予以支持。”

“昨日下午五时，澳门银行公会（筹委会）曾就大丰银行的事件召开紧急会议，至晚上八时零五分始末。会后发出一项新闻公布：‘因大丰昨受无根据的谣传困扰，本澳银行公会于昨日下午为此事召开会议，出席会员一致认为，如大丰银行需要时将全力支持。并赞同根据银行法例，征得发行机构认可，所有定期存款，未到期不能支取。’”

“经济协调政务司高树培昨日表示：大丰银行在澳门一向作风稳健，同时有长远可靠的历史，我对之非常有信心。高同时透露，政府正密切注视大丰事件的发展。”

“大丰银行经理谭基昨日下午先后拜访了高树培及南海银行董事长柯正平。政府发行机构总裁陶锦裕、副总裁杜义斯、信贷监察部经理苏雅拔，亦先后视察了大丰银行的情况。据谭基透露，澳门政府经济协调政务局、澳门政府发行机构及南通银行均表示大力支持……”

事发当时，是由前一周开始，对何贤的健康情况已传说纷纷，人们以讹传讹，甚至传说他在美身故。

加上经过两日假期之后，到12月3日银行恢复营业，由于有众多的工厂、公司是在大丰银行出粮的，因此这个“黑色的星期一”上午，前往大丰提款的人就挤成了一团。

大丰银行总行及五间分行的情况差不多，越到当日下午人越多，尤其是新马路总行及红街市、黑沙环分行的人较多，其它几间情况还好些。

报载：“即使下午四时许，提款的人最多时，总行也只有二百多人在排队”——依照实情，这应当是保守数字，但由此可窥见政府新闻等社会舆论，对何氏家族的充分肯定和支持。

大丰银行无论怎样艰难，毕竟做到了君子风度，大气而从容，树立了一个令人尊重的企业形象。

对于存款人，大丰来者不拒，即使是未到期的定期存款亦照付，同时延长营业时间，令已进入银行轮候的人全部取款后才休息，因此存户的信心增加，前往提款的人已然递减。

大丰银行的经理谭基又发表声明说，根据突如其来的情况，大丰已将存在香港同业的存款调回澳门应付，而加之政府与银行界的大力支持，目前相信本身的实力亦足以应付。

谭基认为此次急变是谣言引起，他希望谣言止于智者，广大存户不要受谣言迷惑。或许，正因为居民的.心目中，何贤与大丰银行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所以谭基告知市民何贤希望能提前在本月七日回澳，但他的家人认为大丰有足够实力应付任何事件，因此劝他不要过份操劳，安心在美休养，迟些再回澳门。但无论如何，何贤将会在本月中旬返澳……

对于何贤的健康情况，是不可置疑的。因许多听众，已从电台听到了

何贤从大洋彼岸传回的声音——他老人家还活着！这无异于给惊恐不安的人们吃了颗定心丸。

电台实录了何贤病中接受记者采访的电话录音。何贤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目前他在美国纽约养病，先后经四次检查，情况均良好，将于短期内返澳。他说：在较早前已接到银行方面的长途电话，得知家中所发生的事情。他希望大家对大丰银行有信心。大丰的业务正常，不搞投机，基础稳固，大家是清清楚楚的，因此请大家放心，他说“本人活了75岁，一生均为澳门工作，深获政府和各界信任，对别有用心者，正所谓睬他都多余！”最后，他希望透过新闻传播媒介，向关心他的健康的各界人士致谢。

10月4日《澳门日报》头版头条登出的“新闻小语”更加意味深长——“昨日，本澳吹起了一小股金融风波，有投机者造谣生事，扰乱了安宁……谣言止于智者，只有庸人才会自扰。希望广大市民不要信谣，也不要传谣。当局有责任追谣，将滋事者绳诸于法。”

其时，临危遇难的并不仅仅是大丰一家。

像得了传染病一样，太平洋银行也受到冲击。当然个中自有原因，是与其香港联号之间的商业关系，引致太平洋银行发出的地票被退回，那期间太平洋银行暂停公开营业，又引起人们的纷纷猜疑和惶乱。澳门当局也一再呼吁：“太平洋银行并非倒闭，它本身无问题仅受港方牵连，存户应放心”等等。

由此可见澳门的1983年10月也是个多事之秋，何氏家族的危难景象不是孤立的。

而最终，令这危难命运得以摆脱困窘重现生机的根本因素，在于中国银行的注资参股。

中银在澳门是大银行之一，加之它是国家银行，在公众心目中的信用度自然较高。它愿意向大丰参股，大丰的前景自然不用担忧，挤提风波也就很快平息了。

尽管何贤知道挤提风波已平息，但这次风波还是给了他不小的打击和震撼，由此勾起的思家情绪怎样也平息不了。

何贤知道，即便美国这边的医疗条件再优越，自己这个病也是难以治愈的了，不如回去与亲人团聚。同时，趁还可以走动，他想回家乡看看……

就这样，1983年10月11日晚8时，何贤从美国乘飞机返回香港。

何贤搭了二十多小时的飞机，须在香港稍事休息，因此延至10月12日下午才回到澳门。

而头日下午在澳门第二届工业展览会开幕典礼上，马万祺便已向记者透露了何贤抵港赴澳的准确信息。

马万祺与何贤前日通过两次长途电话，何贤作为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委托马万祺副会长代表他主持展览会的开幕剪彩仪式和讲话，同时托马向澳门各界人士、亲朋好友致意，并祝澳门第二届工业展览会展出成功。

在10月11日的《澳门日报》上，也刊登了何贤的照片和书面献词。

10月12日下午五时，赴美疗病的何贤终于“康复”归来，回到澳门。

何贤病后新愈，略有消瘦，但精神甚好，说话声音响亮。他在12日黄昏5时，由商会副会长马万祺及“五公子”何厚铨、“长公子”何厚铿陪同，乘喷射水翼船返抵澳门。

登上码头，何贤看到众多的中外友好人士在码头欢迎时，非常高兴，面

露笑容，与欢迎者一一握手，然后乘车回家休息……

何贤在码头发表了书面谈话：

“本人月前赴美疗病，今天痊愈回澳，得到列位友好亲到码头迎接，我万分感谢。在美期间，承蒙国内外友好、澳门总督阁下、各机关首长、各社团代表，函电致意及亲到纽约问候，各方面对本人的亲切关怀和深厚情谊，使我无比感动及永远难忘！因时间匆匆，未能表达于万一。待日间再请新闻界容为致意。兹祝澳门繁荣安定，各界人士身体健康。”

次日的《澳门日报》，立即在头版头条刊登出红色的新闻条幅和多幅图片。

就在这一次，名不见经传的“五公子”何厚铨，才首次出现在何贤返澳的新闻和照片中。

今天看这张旧照，何厚铨实在是年轻腼腆，秀气而略显表情生涩，模样颇书生气，风度亦很似七八十年代港产电影中的文弱小生。

当时许多人，恐怕还不知道戴着鸭舌帽的何贤身后，那个俊俏腼腆的男儿小生是何许人！

而“长公子”何厚铨，则是头发梳得油光可鉴，戴着墨镜，略显神秘的那张脸，比起何厚铨老练许多。

何贤回来了，可他的身体，并没有“痊愈”，却是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他知道有生之日已不多了……

尽管，当时危难之际，以南海银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前身）为首的银行同业，曾对大丰银行给予了无限支持，令其度过了难关……但是，要把眼光放长放远，何贤仍要再做一次重大决断！

何贤先生临终前，仍将大丰银行正式托附给中国银行，要求中银参股。

何贤，要把最重大的事情办妥，才肯撒手尘寰。

1983年11月30日，中国银行接受大丰银行的建议，决定参加大丰银行股份，并接受大丰银行董事会的委托，于翌日派负责人参加该行管理。

何厚铨，被任命为该行代总经理，与其兄长、代董事长何厚铿，共同参与大丰银行的管理。

其后，何厚铨被任命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至今……

“当时可算临危受命？”有记者完全明白当年一个28岁的小伙子面临突变而又将肩负重任时的感受，便这样问他。

“在大丰银行这个问题上可以这样说。”

何厚铨语调平和，似乎当年那段令他刻骨铭心的记忆已不再令他悲伤惧怕。无论遥遥的将来如何任重道远，而他已经化悲痛为力量，轻松上路，沿着父亲的足迹，沿着何氏家族的血脉——继续拼搏、行走下去……

1983年12月6日，在中银“注血”何氏企业后不到一周时间，何贤就病逝了……

多么令人痛惜而伤感不已！那样一个大好人，却因为过度操劳，已无法延续他本应可以延续的生命。

28岁的何厚铨，和哥哥何厚铿抹干泪水，临危受命，接过了管理大丰银行的重担。

父亲走了，万般不舍地走了……他再也不能“拉儿子一把”，从容地将厚铨带徒出师，他只有狠心地闭上眼，随儿子自己去闯去拼，好自为之了。

他临终前做了最该做的事，像“托孤”一样给儿子的事业，寻找到一个

坚实可依的合作伙伴和强壮臂膀——他去世后，大丰银行由中国银行注资60%，40%是私方及外国组织的股业。

如此说来，1983年，确是共产党挽救了何氏家族。

最了解何厚铎的郑德老人说：“厚铎担当大丰银行总经理职，能力绰绰有余。再说股东方面主要有中方说话的权利，也就等于共产党替他撑硬了腰杆儿，到底是何贤眼光长远啊，他爱厚铎儿爱得深沉之极，方式独特，他知道这样的选择，最有益于何氏家族和儿子事业的光明未来。”

不错，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何厚铎，没有令爱他的父亲失望！

运用新时代的管理概念，何厚铎在管理大丰银行时得以顺应今日潮流，发挥得心应手。

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族式的封闭管理经营需要改进。西方现代许多大机构大集团公司都拥有一批管理精英，就算控股，也要有其他有益的股东加盟参与，大家互惠互利。

因为中银的参与，使大丰银行如虎添翼，重振旗鼓，从1983年至今，业务节节上升，又一次如日中天，呈现出兴旺的景象。

## 第三十五章 一息犹存 眷眷不离故乡土

诀别，于无声处进行……

1983年11月15日，何贤最后一次回到他的故乡广东番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光阴里，辞山辞水，辞别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心。

列车，为长辞不归的游子，迟了六分钟启动，叶选平等广东省市领导，为何贤作最后的送行。

我们回过头来，再把何贤的故事叙完。

由于中银介入，大丰不但渡过了挤提风波，业务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何贤抱病返回澳门不久，大丰银行又开设了一间分行。

何贤出席了这家分行的开幕仪式，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澳门公开露面。

诀别，于无声中进行……

1983年11月15日，这是一个沉闷阴郁，充满忧愁而令人难忘的日子——何贤最后一次也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回到了他的故乡番禺。

何贤心知肚明，此次他是专门来向家乡父老诀别的，丝毫不为游山玩水。

他极力掩饰住一串串无人知晓的离愁，一份份数不清的别恨，强自打起精神，偷偷咽泪落肚……

广深列车慢吞吞地开进了广州火车站。专程来迎接何贤还乡的番禺人民政府副县长刘檀添等人迎了上去……车门一开，他们全愣住了。而有些人，已在偷偷地掉泪了。

只见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的何贤，已全无昔日健步如飞的硬朗模样，这哪里是大家熟悉的“贤哥”呀！人人的心都沉重如铅，以致手足无措。

机敏的何贤当然留意到这无声的痛楚，连忙握着大家的手，反倒先宽慰大家：“去美国治疗，打了一些针，累了些，回家乡休息一下就会好，其他没不妥，不相干的！”他笑着，似一脸光辉。

来接车的人们连忙强打起笑脸，将话题引向其它方面。

何贤自然是下榻于他曾亲眼看着一砖一瓦兴建起来的番禺宾馆。这里有一套“小春园”，一座“贤英楼”。如今，他已别无所求，只感到特别的平静与安闲。他想凭轩眺望一下繁荣的市井，宾馆里的假山叠石，池里的游鱼，池边的绿柳……那一切的一切，他都要看一看，摸一摸，来日不多了，他多么留恋生活，留恋故乡和尘世风景！他要看个饱，看个足足够够。

吃晚饭了。

何贤对宾馆经理问道：“可有禾花雀么？”

对于一向不挑食的何贤来说，这一要求委实不寻常，无论如何，都要满足他！

于是经理连忙拨响电话：“喂！我叫三水！”“喂，我叫南海！”

终于，禾花雀送来了。

晚宴上，何贤美美地吃一两只，不住地称赞：“好鲜味呢！”仿佛他才第一次品尝家乡风味似的，让人听了心酸……

那一桌菜，并无特别的山珍海味，但都是何贤平时爱吃的家乡特产。刚刚接受过长时间化疗的何贤实在没有胃口下咽，但他乐得饱尝“眼福”，并对他堂妹十姑（何金音）说：“你代我多吃点，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一番心意。”

次晨，许是家乡的一切唤起了何贤生命的潜能，他很早就起了床，拄着拐杖在宾馆中散步，又让人用轮椅推他到街上逛逛。

家乡小镇的晨雾，混和着早点铺子的蒸腾热香，车水马龙的上班人流和街上过往的乡人……都令何贤倍感亲切与眷恋。他深深吸了口气，对家人说：“家乡好啊！空气真清新……”

18日，何添由香港返番禺来。何贤知道兄长也回乡，高兴得从下午三点钟就开始在宾馆的迎宾厅门口等候。不料何添的车误了点，直到傍晚六点才到达。

何贤在迎宾厅门口焦急等待，足足等候了哥哥三个小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他们兄弟之手足情谊感动万分。

当晚，何贤虽然疲倦不堪，仍坚持陪同兄长共进晚餐。何添和在场的人都不敢提他的健康状况，只是当没事似地与他谈笑。

何贤的夫人陈琼最谙熟丈夫的性情，此刻她也强颜欢笑，说了许多笑话，竭力调和着压抑的气氛。何贤珍惜在家乡与兄长亲人们最后团聚的宝贵光阴，也高兴地笑着喝汤吃菜，忘却他将不久于人世的悲哀，即使离去的那天，他也不想人间留驻太多的遗憾……

就在高兴之余，何贤忽然提出要去南海里水，会见佛山市长和南海县的领导人。

大家都极力劝阻，说为了避免路途劳累，请市长来一趟吧。何贤坚决不肯，他说，市长工作忙，我现在基本上是个闲人，应该我去会他！

何添等人劝说无效，次日只好和他一同出发，同行的还有番禺一些领导同志和何贤夫人、何添夫人等。

19日，何贤的到来，可忙坏了佛山与南海的领导们！佛山市长与何贤是老朋友了，被何贤这一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次老朋友相会，无异于生离死别，大家都在想，此次一别，恐怕这辈子再也见不上面了！

何贤由于身心交瘁，已食不知味了，吃着吃着便要到里水华侨旅行社楼上休息。

一直到下午4点，在众人一再催促下，何贤才依依不舍地告辞。送何贤上车，何贤欲坐进去，忽然又转过身来，紧紧拥抱，两个汉子都抑制不住，热泪流了下来。

一切尽在不言中。还是先收住泪，扶何贤上车。车队开动了，和南海县的领导们一直站在大路边，目送着何贤远去。在场的人见状无不动容，欢送变成了和故人的生离死别……

伤感加上旅途疲惫，何贤从南海回来后，身体顿感不适，晚饭都没吃就躺倒在床。他身体状况转差的消息传出，番禺县委县政府的人们，赶紧从县人民医院调来最好的医生和护士护理何贤。人们那关切、紧张、忧虑的心情全都溢于言表。

何贤的病情被电告到广东省委。次日一大早，省政协主席梁威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钟明、省委统战部长郑群……带着省里的医疗专家赶到番禺看望何贤。

中央首长叶剑英等也捎来口信向他问候致意。

何贤见自己的病情惊动了这么多人，心里顿感不安。他强支病体，与来看望他的领导们谈笑风生，中午还起床陪客吃饭。

何贤知道大家对他病体的忧虑，所以他要挺住，坚强地挺住。

何贤 24 日要在香港继续化疗。人们已预先购买了 22 日回港的飞机票。可到了 21 日，他忽然改变主意，要留在故乡多住两天，24 日才返香港。亲人和县委领导们万般无奈，只好顺他的意思，又退掉机票。

何贤多么珍惜这最后的两天时间！他用生命争夺回的两天！他想去在去世前多看看童年生活过的、这难舍的故乡……

在令番禺人民难忘的、何贤返乡的十天光阴中，何贤早已意识到他无论去到什么地方见什么人，都是“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呼吸故乡的空气，最后一次饮故乡的水……他坐着轮椅，抱病巡视了正在建设中的大石大桥和已落成的医院、学校。他还十分反常地去了一些他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每到一处，他都眷眷不舍地流下眼泪。

24 日逼到眼前，光阴无情，何贤不得不动身返港，番禺的领导们一齐出动，为他送行。

何贤这一去，将成永诀。离乡的一路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忽然，他对身边的县领导说：“这次回来，我未及去游览莲花山。”县领导哽咽地宽慰他说：“养好身体，下次回来我们陪你去！”

何贤沉默没有答话。

车过大石桥，他张望桥东，桥西，不觉泪下……车队开到洛溪渡口，何贤望着离渡口不远的洛溪大桥的桥墩，对人们说：“大桥能如期完工吗？”县领导告诉他，“只会提前，不会拖后”，请他放心。

何贤多么希望能亲眼看到横跨河面的大桥雄伟的身姿啊！他多么希望自己这个被河网阻隔的家乡能张开通衢大道啊！但自己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想到这里，何贤再禁不住，又一次潸然泪下。

何贤呀何贤，你这返朴归真的老人，还这么轻易掉泪么？是的，他爱家乡爱入骨髓了！人们又何曾懂得？

何贤到达广州火车站，省政协主席梁威林和广州市市长叶选平已等候在那里了。

最后的时刻——这是祖国对何贤的送别，也是何贤与故乡的永诀。

大家的心里都明白，可谁也都避免说感伤的话……东拉西扯中，送行者的行列慢慢拉长。

临上车时，何贤欲行又止，迟迟不动，他说自己又不想走了。

他的小女儿何桂盈急了，央求他说：“爸爸，我们先去香港复检一下身体，再回来好吗？”

“我不想走了……”何贤像个无助的孩子。

“爸爸！不走也必须走！证件都送给边检了，出境手续都办好了，还是走吧。”

何贤不相信似的，一再问女儿是不是真的把证件交出了？女儿强忍泪使劲点头……

在场的省市领导都劝促何贤早些回去治疗。何贤经不住众人之劝，这才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列车，为长辞不归的游子迟了六分钟启动。

何贤缓缓上了直通快车；他慢慢挥手，一步一回头，默默地……七十多年来，他曾在这块国土上洒下多少汗水，留下多少脚印，如今却将一去不复返了，这沉痛，就是最坚强的汉子又如何能受得了呢？

滔滔珠江水，载不动，许多愁。列车带走了何贤的躯体，却留下一颗永



远爱国怀乡的跳动不息的心。

火车到达罗湖之前，何贤问随员黄文德：“这是哪里？是内地还是香港？”黄文德说是深圳。

何贤忍不住频频回首，探头凝望窗外的祖国景色，一边看一边自语：“还是家乡好啊！家乡的水实在甜些！”言毕，又禁不住泪流满面。

何贤恐怕会将他一生流出的眼泪，都倒进珠江，融入家园，用以滋润浇灌祖国的新枝嫩芽。

## 第三十六章 巨星殒落 福寿全归备哀荣

1983年12月6日，一代人杰何贤，在香港伊利沙白医院与世长辞。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魂兮归天的“澳门王”，给后人留下极度的悲恸和永远的怀念。

12月9日上午，何贤逝世的公祭仪式在香港隆重举行。下午，澳门各界数万民众涌向新口岸码头，迎接何贤的灵柩返抵澳门，并为何贤举行壮观的致祭仪式。

澳门下半旗三天致哀。

1985年重阳节，澳门落成首座汉白玉何贤墓，标志着世人对他一生功勋的褒扬和怀念。

珠江水呜咽，无语向东流；

白云山垂首，披一身缟素。

回到香港后第12天，即1983年12月6日，一代人杰何贤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香港伊利沙白医院与世长辞。

临终前，何贤在世的三个妻子，十四个儿女都守候在病榻前。

噩耗，传到了地方、中央、家乡、海外……

1983年12月9日。

上午8点刚过，香港北角殡仪馆前的大街就开始繁忙起来。

各式各样的轿车汇聚在一条街上，其中不乏劳斯莱斯、奔驰等豪华车。

一辆接一辆的车中，纷纷走出不少路人们熟悉的名流。这些港澳叱咤风云的高官显宦、工商巨子、社会贤达、艺坛明星，这些人们经常在报刊、电视传媒中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都是赶来参加何贤的公祭仪式的。

当然，还有更多参加公祭仪式的人，是乘巴士和出租车赶来的普通市民百姓，这表明何贤一生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尊敬和爱戴。

香港人习惯夜生活，所以公祭仪式安排在上午10点举行。但许多人为了提前向这位待人如兄弟的“贤哥”致祭，表达自己的哀思，还是一大早便都来到这里。

整个祭奠仪式是佛教式的。

灵堂摆放着何贤遗像，遗像上方的挽幛写着“福寿全归”和“德高望重，典型尚在”。

遗像前的供点上摆放着各种供品和香烛。前来祭奠的客人们先在祭坛前为何贤上一炷香，而后向何贤遗像鞠躬行礼，礼毕，在一旁守灵的何氏亲属向客人们行礼致谢。所有这一切程序，与这个殡仪馆每日举行的祭奠仪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所不同之处，是何贤的灵堂内摆满了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由于花圈多达两千多个，灵堂里只能摆放何贤亲属们的和中国的领导、澳督等要人送的花圈，灵堂外摆放着地位较高的何贤生前友好及各大机构送的花圈。而更多的花圈海洋，只能分布摆放在殡仪馆外的人行道上……

10点正，公祭仪式开始。

司仪首先宣读了中国领导人李先念、叶剑英、彭真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的唁电。接着，是治丧委员会主任柯正平致悼词。

柯正平有些步履蹒跚地踱到麦克风前……自从得知何贤去讯，他老是睡

眠不足，有点精神恍惚。

柯正平与何贤几十年挚友，何贤在澳门时，几乎每天必到柯正平住处，两位好友聊上一阵，何贤才返回自己的写字楼，开始他一天的工作。柯正平是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数十年来都住在澳门，他长何贤几岁，何贤视他如兄长师长，什么事都愿对他倾诉，诸如澳门社会大事、商场动向、公众舆论、个人工作及至儿女家事无所不包。这种聊侃，在何贤固然是想从柯正平那里听到真知灼见，在柯正平，除了体味享受“贤弟”的友情外，又何尝没有从何贤身上获得教益呢！

此刻，这位比自己年轻的老朋友竟先自己而去了！虽然柯正平早知何贤身患不治绝症，但真的撒手尘寰，他在感情上又怎能泰然接受，平静处之呢！

柯正平几乎是机械地念着悼词：

“……何贤先生爱国爱乡，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待人热情，和蔼可亲，是一位忠厚长者……”

这些评价，对何贤决非溢美之辞。

何贤生前所担任的公职之多，简直不胜枚举。写悼词时，有人曾建议把何贤所任职务都一一列出，因为何贤每一个职务都不是徒有虚名，而是出钱捐物，出谋划策，尽心费力的。

柯正平从感情上讲，是赞同这种建议的。因为每一职务，都代表着何贤对社会的一份贡献。可如此一来，悼词就会变得很长很长，所以最后不得不忍痛割爱，择其要而举之。

就这么边想边念，最后竟走了神儿，找不到下一段要读的文字……柯正平连忙摄住心神，小顿片刻，继续往下读：

“……何贤先生和我们永别了，港澳工商界失去了一位长者，港澳各界同胞失去了一位知寒知暖的亲密朋友……”

柯正平费力读完最后一段悼词，踉跄回到原来站的位置，一阵晕眩。

接着，柯麟、王光英代表全国人大；柯正平、马万祺代表何贤治丧委员会，向何贤的灵位献花。

随后是各社团代表献花。

献花毕，公祭仪式即告结束，对何贤的遗体进行大殓。

香港殡仪馆派出它的首席化妆师郑美玲女士为何贤化妆。

大殓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各界人士列队瞻仰遗容……

11时正，司仪大声宣布“起灵”。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澳门南光总经理柯正平，光大集团（香港）总公司经理王光英，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马万祺、郑巩，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澳门东亚大学校长汤秉达，镜湖医院院长薛寿生等八人为何贤棺柩扶灵。

何贤的灵柩徐徐移出灵堂，运往港澳码头，再由汽垫船运返澳门。

澳门一万多群众拥在码头，迎接何贤遗体的归来……各界人士将以更隆重的仪式，祭奠这位为澳门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下午一时半左右，澳门新口岸码头和广场上，万头攒动，人们静候即将从香港乘船返澳的何贤灵柩。

新口岸码头的出口处，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祭坛。祭坛上方，挂着一幅长

达十米的横额，上书“澳门各界人士向何贤先生致祭”。

在狭小的澳门半岛，寸土尺金，难得有一个宽阔的广场。或许是天意安排，位于新填海发展区的汽垫船码头前，一块数十平方米面积的空地尚未被征用，便刚好为澳门各界人士的致祭仪式，提供了一个宽广的“灵堂”。

这个澳门开埠以来最大的致祭仪式，是在致祭的前一天深夜，即12月8日晚才确定举行的。

8日上午，澳督高斯达打电话给澳门中华总商会，询问祭奠何贤的计划。

中总的人回报，他们已派出由澳门各大社团21名代表组成的慰问团，由中总副会长马万祺率领，赴香港参加何贤的治丧活动，在澳门就不另行安排了。

高斯达一听急了，忙道：“何贤服务澳门社会数十年，为澳门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澳门没有致祭仪式怎么行？”

“可……不知澳督有什么计划？”

高斯达郑重强调说，澳门政府已为何贤准备了隆重的祭奠仪式：

1. 授予何贤“英勇金盾勋章”和“澳门荣誉市民”称号；
2. 为哀悼何贤先生，澳门政府机关下半旗三天；
3. 澳门政府机关停止工作一天，让政府官员及公务员有时间参加何贤的祭奠仪式；

4. 何贤的灵车入码头到大西洋坟场途中，澳门政府将封锁沿途交通，派水警的摩托车仪仗队为何贤的灵车开路。

哇！既然澳督都如此重视，那么华人组织当然更应重视！

于是总商会的几位负责人崔德祺、郑巩等马上开会研究，决定在何贤灵柩抵澳门后举行公祭，并通过长途电话转告何氏家人。

但何氏家人却不同意在澳门摆祭。因为何贤治丧委员会已定次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公祭，岂有搞两次公祭之理？

再说，何家已请风水先生择好了灵柩下葬的时辰，再搞一次公祭，怕耽误了时辰不吉利……

崔德祺、郑巩等人，见在电话里三言两语说不清，便告知当局，下午当局派彭彼得专程赶赴香港，向何氏家族说明澳督高斯达的意见，转达澳门各界人士的心愿。

马万祺、彭彼得等向何贤的亲属们一再保证：他们已精心计划好祭奠的全部过程，决不耽误灵柩下葬的时辰。

当晚，何家告知彭彼得，同意在澳门搞祭奠，但不称为“公祭”，而叫“致祭”，以示与香港的公祭仪式有所区别。

有关负责人接电话后，一方面打电话告知澳督府，高斯达当即表示，明天亲偕澳门政府各机构官员到码头接灵，并参加致祭仪式。另一方面，总商会又马上派人联系，连夜赶搭祭棚，并派人通知本澳传媒，将举行致祭仪式的决定告诉澳门公众。

——于是，才有了9日下午汽垫船码头前隆重的致祭仪式。

9日下午2点，庞大的广场已经挤满了参加致祭仪式的人群。由于澳门政府各机关和部分学校放假，参加致祭仪式的公务员和学生特别多，他们排着队来参加致祭。

据当时传媒估计，参加致祭仪式的约有一万人左右，这在小小的澳门，还从未有过，因为当时的澳门，总督虽是最高行政长官，但在中国人占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澳门社会，何贤先生在各界各阶层中无疑拥有绝对的影响力。

巨星殒落，澳门各阶层顿失重心，人们的目光一时间的确难以聚焦。因而澳门传媒舆论用“重心骤失”来形容何贤逝世带给全社会的震撼，是恰如其分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何贤生前乐呵呵讲出这句话，以表达他对人生的旷达态度。

然而今日澳门人，心如刀割般体味着这句深藏着无尽凄凉和忧伤的话：“我曾经以为生命还很漫长，也曾经以为你还和从前一样。其实我错了，一切全都变了……就在你转眼的一瞬间，一瞬间……我听见你说：多么值得留恋啊！”

何贤的昨天，还在感山叹人，眷眷难舍人间，可如今一转眼人亡物化，人们怎么能不悲痛万分！大家想起“贤哥”生前的好处，都感慨良多。

总商会常务理事、澳门厂商联合会理事彭彼得说：听到何贤会长去世的消息，仿如晴天霹雳！我跟随他工作四十多年，对我来说是失去一个良朋，失去一个导师。何贤一生爱国，热心社会公益，为澳门繁荣安定尽了最大力量。记得在本澳经济萧条时，许多行业生意都难做，为了地方的繁荣，许多亏本的生意何贤都一揽过来，使行业不致垮台，人们不致失业……

来了，他们来了，来送何贤。

那位青洲木屋区的老人，他脸上的皱纹记录着青洲贫民窟经历的一次次苦难，也镌刻着何贤帮助他们一次次度过难关的善举。1954年的大火烧毁了四百多间木屋，数千人无家可归，是何贤，大年三十晚派人送来过年钱，使户户灾民吃上团年饭；是何贤，主持救济筹募会，四方奔走呼吁，为民请命诉冤，并带头捐出55间铁屋作表率，终于筹足捐款，使老人的一家和所有灾民一道，搬进新居过寒冬……

来了，他们来了；那位阿婆带着全家儿孙三代都来了。老人中年得子，视之如掌上明珠。可七八岁的孩子突然大病一场，因交不出医药费呀，眼睁睁看着唯一的独苗要夭折！阿婆哭得死去活来，有人给她出主意：“去向贤哥求助吧！”不错，是“贤哥”，素昧平生却慷慨解囊，为阿婆支付了孩子全部的住院医药费，使孩子得救……阿婆视何贤为她全家的救命恩人。她预先不知今天在这里举行致祭仪式，只知何贤的灵柩要从码头上岸返澳门。所以老人千叮万嘱全家大小来此，为的是全家都来再见恩人一面。

来了，他们来了：那群当年曾就读于镜湖平民小学的孩子，如今都长大成人。他们永生难忘童年的困窘家境，交不起学费，而学校经费也困难，总是何贤校长倾囊补缺，使他们这些贫苦的孩儿不致失学。如今他们都已成家立业，但他们还记得校长当年的训导：“正因为你们家境贫寒，更应发愤做人……”

来了，他们是东亚大学的师生队伍，以“学界柱石”的挽辞来表达他们对何贤的景仰之情。先生一生只读过三年私塾，但他却鼎力支持创办了澳门历史上第一所大学，还亲任校董会主席！为澳门培养自己的高级人材——这梦想的实现，饱含着何贤的一份心血……

这边，是澳门体育界人士，澳门业余篮联理事长鲍马壮回忆道：“本澳球队多次出外或返回内地参赛，何贤先生都亲自协助办理，对运动员良好的体育精神，更是时加鼓励！他是我们的知音！”

是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贤的平生拥有多少知己？实在多过天

上的繁星，无法用数字统计……演艺界的无数名伶艺人，都哭作一团，呼天抢地！在他们艰难的艺术生涯中，多少次都得到何贤的扶持。特别是澳门影剧院和曲艺业，曾遇到过几次颓风，濒于歇业，都是何贤出资收购，挽救过来，才得以生存、复苏和发展……今天演艺界的所有人几乎无一缺席，他们望眼欲穿，灵柩未到，许多人已珠泪满腮。此真乃从今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知己天涯各一方，地久又天长……

可以说，澳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都有何贤留下的印记和心血。新口岸广场的各界人民，也正是怀着“重心骤失”的悲恸心情，等候着何贤的灵柩归来。

下午 2 时 30 分，何贤的灵柩返抵澳门，人们移升起嵌满鲜花的灵车，而后将之载往祭坛。

2 时 45 分，致祭仪式开始。

澳督高斯达率领政府众官员到场致祭。

望着何贤的遗像，高斯达表情沉痛。确实，何贤的逝世对澳门是一个重大损失！尤其是在澳门这个社会及政治如此复杂特殊的地方，多么需要何贤这样一个方方面面都结情铸盟的“高人”啊……高斯达随司仪的引领，向何贤的灵柩鞠躬，心情显得沉重如铅。

全部致祭仪式简约隆重，参加致祭的各界人士向何贤的灵柩三鞠躬，即礼成出殡。

何贤的灵车由驾驶摩托车的警员组成的仪仗队开路，在澳门，唯有澳督出行才能享受如此的待遇。

送殡的车辆跟在灵车尾部，结成长长的车龙，沿友谊大马路、铜马广场、约翰四世大马路、水坑尾、荷兰园马路、西坟马路……驶向何贤下葬的旧西洋坟场。

沿途的市民都驻足默哀。

何贤的墓地座落在旧西洋坟场的西边，编号 M 一五一，与他的父亲何澄溪之墓毗邻，属于一等永远墓地，由澳门市政厅赠予。

葬礼于下午 3 时 45 分举行，旧西洋坟场有特警专门护卫，警察银乐队到场奏哀乐，何贤那价值 18 万港元的柳州杉棺柩，按风水先生的指点徐徐放下，入土为安。

何贤这备极哀荣的隆重葬礼，体现了何贤在港澳，特别是在澳门的崇高地位。

全澳门，下半旗三天致哀。

澳门政府赠予何贤的英勇金盾勋章，供在灵前。

通常，这只是葡国总理以上的官员逝世才享有的礼遇，何贤的却成为澳门开埠数百年来享有这种礼遇的第一位中国人。

想当初，何贤父亲何澄溪老先生，曾于 1954 年 10 月 14 日，因患脑溢血病逝于西湾竹仔室私邸，积闰享寿 72 岁。何老先生的举殡行列也是隆重显赫，备极哀荣。

但与儿子何贤相比，何老先生若地下有灵，该感到无限的慰藉和骄傲……

两年以后，为缅怀何贤一生的功绩，何贤生前出任董事长的京澳公司，决定捐出北京汉白玉石 6 吨，雕砌何贤墓。

这个决定得到北京政府重视。汉白玉石为北京贵重的石材，向来不易出口，此次是由北京市长特许，才能运抵澳门。

整个何贤墓长 4 米，宽 1.8 米，全部以汉白玉石雕砌而成。仅墓碑石，就用了一块高达 2 米、重 2 吨的完整汉白玉石。

整座墓仿唐、宋设计，采用了多种传统精致的雕琢工艺，特别显眼处是墓志铭顶上的双龙争珠，采用全部通雕法，是极珍贵的艺术品。

墓志铭上刻着的铭文如下：

“何贤先生为人简朴谦逊纯良，是葡国人的良友和伟大的爱国者以及模范市民，具有领导才能，对加强中葡数世纪的友谊所作贡献，在最近数十年来无出其右，成为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的杰出典范。何先生是一位有动力和勇敢的企业家，为其所爱护的澳门发展和繁荣鞠躬尽瘁。因此，在其如此辛勤和典型地服务的社会中，早年便公平地获得大大的声誉和人们的尊敬。”

铭文摘自澳门市政厅“为何贤升像的议决书”。1983 年 12 月 9 日，市政厅决定追认何贤为“澳门荣誉市民”，并举行升像仪式。1985 年以前的七十多年来，荣获“澳门荣誉市民”称号者，只有 18 人。

何贤墓始建于 1985 年 3 月，9 月底竣工。

它不仅是旧西洋坟场、也是全澳门首座汉白玉石墓。

重阳节，向为孝子贤孙缅怀先辈的日子，而 1985 年的重阳节，澳门更是非常热闹，因为崭新的何贤汉白玉墓，就赶在节前落成，供人们瞻仰。

最先，是何贤家族及部分生前好友，前往墓地拜谒，而后来的人越来越多。

人称何贤为“澳门王”。

虽然何贤生前坚决不肯承认这个称谓，但从他的丧礼祭礼墓谒升像等事后所获得的一系列极特殊的礼遇和殊荣中，足可窥见他在澳门各界人士心目中的“王”者地位。

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声的评判，它标志着何贤一世的功绩，也标志着何氏家族在澳门的非凡影响。

所有到这位人杰墓前拜谒的人，都在沉思，久久不愿离去。

日后何厚铨对人追忆：从那一刻起，他立过誓，做个父亲那样的人杰，做个一世爱国怀乡的中华子孙。

## 第三十七章 柳暗花明 子承父业绽锋芒

何贤逝世后，被视为何氏家族企业管理主力的何厚铨，表面上好似承袭了家族的大批产业，而实际却是接管了父亲留给他的一堆烂摊子。

何厚铨是否缔造了一个挽救“大丰”的神话姑且不论，人们只是看到一个现实：今天的“大丰”已成为全澳门盈利最高的银行。

何贤生前拥有庞大的家族生意，包括公共事业与私人生意。

大丰银行饱经四十多年的风雨浮沉，已是满目沧桑。

由于何贤生前的侠义为怀，乐善好施，且对公司员工极具人情味，所以，何氏家族生意倒真没有几个赚大钱的项目。

不少公共事业，也由于何贤推己及人的慈善心肠，而最终导致尾大不掉、冗员与低效益，甚至成了亏损的“大包袱”。

何贤先生满载哀荣兮仙逝，他的儿子却刚刚披荆斩棘地踏上征程。

何贤逝世后，被视为何氏家族企业管理主力之一的何厚铨，表面上好似承袭了家族的大批产业，而实际上，却只是接管了父亲留给他的一堆烂摊子。

何厚铨，没有静坐闲游的悠悠福分，他必须放开手脚，重整河山，重振家业雄风——他除了拼搏，别无退路。

1984年，时任大丰银行副总经理的何厚铨，就关于香港中银集团加股大丰银行的问题接受采访时透露：大丰银行董事局将与中银集团负责人举行会议，详细商讨有关中银加股大丰，以及如何组织新董事局的细节问题。

澳门报载：“据何厚铨表示，中银集团已经接到北京总行方面的决定，加股大丰银行没有问题，中银加股的数目基本上达成协议，目前只是还需要研究有关加股的细节问题。”

又有消息报道：“何厚铨表示：中银集团委托了南通银行派出三名高级职员，在大丰银行了解该行的业务情况，以便能在双方讨论加股细节的时候提供资料，但他们并无参与大丰银行的日常业务。”

再有媒体刊出：“何厚铨强调，中银集团今次决定加股大丰，一方面是表示支持他们；另一方面亦是一项商业投资，对于大丰银行的客户是一件好事。他又透露，大丰银行将来的最高行政部门，将会由新董事局委任。”

……

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也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何氏家业自有后来人。

何厚铨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澳门各新闻报刊媒体中，显然，他已是举足轻重的何氏家族的“新闻发言人”，他一步步从幕后走向台前，走向社会和时代广阔的舞台。

何厚铨曾道：“人一有了名气，就会引起全社会的检测和分析”。

不错，他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尤其是父亲头上的光环和身后殊荣，好似更加反衬出何厚铨的年轻。

从相貌上看，他不像是那种驰骋江湖、立刀横马的侠义之士。但他骨子里，却融注了一股全新的现代气息和精英管理准则观念，他不擅于以一串串惊人的妙句哗众取宠，只企望少说多做，默默地耕耘，让事实的业绩替他作出“公众形象”的评判与回答。

大丰银行于1971年10月23日正式注册，当年的注册资金为500万元，



主要由何贤集团投资，已故赌商傅德荫家族也参与。至 1976 年初，业务发展顺畅的“大丰”存款额已逾亿元，仅次于南通银行。及后，又以其稳健作风，先后开设了六间分行。1981 年“大丰”将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至 2000 万元。

到 1982 年，其存款额已达数亿元。

当时，在一片经济不景气下，大丰银行业务仍得到平稳发展，存款、放款及盈利均有增长。据大丰银行 1982 年度公报，至 12 月 31 日为止，大丰的全部存款额，合计九亿二千八百多万元，放款七亿二千五百多万元，合计盈利（已除资产折旧准备金）二千一百多万元。

在澳门华资银行中，何贤德高望重。几十年前，曾任澳门银业公会理事长。银行公会筹委会成立，又一直由何贤任主席。

多少年来，何氏主理的大丰银行，以其一向稳健的作风和实力，业务发展畅顺。

古语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这古训印证了大丰银行的大起大落。80 年代初，正当澳门经济经过 70 年代的蓄热而面临起飞，大丰银行亦正待大展拳脚之际，却在国际经济动荡气候的影响下，澳门金融曾一度出现一连串的震荡波动。短短几天内，连续有数家银行出现挤提现象。

如本书前述，1983 年 10 月，在社会上谣言四起和“羊群心理”的盲从跟潮下所发生的挤提事件，使何氏支柱企业大丰银行岌岌可危，“四面楚歌”……

而今，又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十几年过去，大丰银行“我自岿然不动”地傲然挺立在澳门街市，惹人瞩目。

的确，你只要踏上澳门土地，走不远便会看到一间又一间的“大丰银行”，可为“触目便及，俯拾皆是”……

遥想当年，仍令不少人后怕，余悸未消。

而时代却不会回头，悲剧闹剧不会重演，历史只能大浪滚滚地奔腾入海，奔跃前行……

对于许多媒介称颂何厚铨当年挽救大丰银行，是“缔造了一个神话”的说法，何厚铨全然没有贪天之功的想法。

他对人们说，挽救大丰危业，“其功劳并不在自己，功劳应归于中国银行完善和有效的管理及良好的合作精神。而且，先父在澳门也有很多好朋友，澳门地小，人情味浓，朋友之间的帮助也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无论如何，人们亲眼所见的是，何厚铨确实实功不可没，因他以自己的能力去拼搏，把传奇的“神话”变成了今日之现实。

现实究竟怎样？

今天的大丰银行，已成为全澳门盈利最高的银行，并且列入亚洲五百家最大银行榜。

大丰银行，也是其总部在澳门地区注册的最大银行。

1985 年，澳门银行公会成立。

何厚铨，被推选为银行公会理事会主席。

——继父亲何贤之后，“大丰”掌门人何厚铨，再度锋芒绽露，脱颖而出，成为澳门银行业的翘楚。

## 第三十八章 枯木逢春 新福利再造神话

1988年7月，何厚铨与青年商人廖泽云、崔世昌、张伟基等合作，共同组创“新福利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他们决意重振江山，拾起旧福利公司的烂摊子，以无畏之勇气，塑造澳门公共汽车服务业的新气派、新形象。

种种改革开拓，“何厚铨们”将澳门人率先带进了享用高科技现代化公共服务的先进潮流。

何氏家族支撑的澳门公用事业，到了何厚铨之手又翻云覆雨，改头换面，枯木逢春，呈现出欣欣向荣之盛景。

所以有人说，这，或许又是一个“神话”。

澳门居民，恐怕无人不知，无谁不晓得澳门福利公共汽车公司。

这家澳门早期唯一的公共汽车公司，曾历经数十年，为澳门普通居民百姓提供市内公共运输服务，早已成为澳门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工具。

1952年，“澳门福利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创立。

人们仍记忆犹新，当年何贤组织该公司时取名为“福利”，望文生义，一听便知何老先生一心只想为当地居民们提供生活方便，压根儿没曾指望赚什么钱。

恐怕问题的症结，就在这“福利”二字上。

化营生为福利，是花钱做善举。加上何贤平生处世的温情厚道与豁达，福利公司支撑了40年，尤其到后期亏损严重，包袱沉重，举步维艰。

至1988年公司结束时止，“福利公汽”已亏蚀800万澳币。而这，还不包括应付给员工的退休金额。

由于旧公司经营不善，澳门政府于1986年12月，与该公司签订新的巴士专营合约时，条件之一，是该公司必须改组为不具名有限公司。

1988年7月，何厚铨与青年商人廖泽云、崔世昌、张伟基等合作，共同组创“新福利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他们决意重整江山，拾起旧福利公司这个烂摊子，改头换面并以无畏的勇气塑造澳门公共汽车运输服务业的新形象、新气派。

何厚铨在处理新旧福利公司交接改组时，仍旧保持了先父的温情与厚道。

在新福利公司成立的当天，何厚铨即表示旧巴士公司40年来与员工风雨同舟，合作愉快。而新巴士公司仍将秉承这种良好的关系和作风，新公司除了全部留用旧公司人员外，还将重新商讨员工薪金、福利条件、退休制度等各项事宜，争取得到改善。

如此一来，皆大欢喜。

何厚铨“新官上任”，先胜了一筹。

旧公司原有的282名员工，全部被纳入新福利公司继续工作。

而新的巴士公司已订立下为期五年的投资计划，即五年内陆续投资4000万澳门元，用于购买50部大巴，50部小巴，从而改善公交运输服务质量。

新巴士公司“粉墨”登场，呈豪华舒适之现代都市气派，令社会各界瞩目，投以不同的目光。

尽管，因为新巴士增加成本，而稍稍提高了乘车收费，但并未带来绝大

多数居民的反感。恰恰相反的，它因提高了效率和大大改善了服务质量，赢得了本地居民百姓的称赞。

“澳门居民在夏天，得以享用有空调的巴士服务了！”这是全澳门人值得骄傲的热点生活话题。

的确不错！这一点，就连生活质量高于澳门的香港人也语带艳羡：“哇！澳门人真有福气！香港可不知何时才有冷气巴士享受呢！”

1994年，澳门新福利公司，又把其投资的步子踏进广州。

它与广州市电车公司合作组成广州市新福利巴士服务有限公司，首期投资8000万元人民币，投入空调巴士100辆。

这一举措，完全配合了广州的市政建设发展，为广州市的居民百姓，同样提供了现代化的公共运输服务。

当时，任广州市长的黎子流，曾在“广州新福利”公司开业典礼上，盛赞此番合作，为广州通往中外合资兴办公共交通事业闯出了新路子，使广州公共交通事业发展获得了广阔的前景。

这个黎市长，当年有一句家喻户晓的格言在广州人中流传：“虽然困难多多，但我们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句格言，无疑印证并肯定了何厚铨对“新福利”事业的大胆开拓与探索精神。

“神话”，还远远不止于此，精彩的佳绩尚在后面。

1996年，新福利公司又宣布在澳门试行推出“聪明卡”服务。

什么叫“聪明卡”呢？

这是一种“智能卡”，却比智能卡更先进。

它是扩充功能后，用途更为广泛的“无接触式IC卡”。

该卡有钱币储值功能。使用者使用时无须掏卡，只须将装着智能卡的钱包或手袋在距离“阅读器”十厘米的地方轻轻一晃，便能得以完成验票及收票程序。

这一下子，可别小瞧，澳门眨巴眼之间，又变成了亚洲地区首个使用这种新科技的城市。

弹丸之地澳门，悄然渗透着现代化都市的气息。

是何厚铨与他的同仁们，勇敢潇洒地甩开步履，把澳门人率先带进了享用高科技公共服务的先进行列，把城市居民的生活，纳入一条“与国际接轨的高速公路”……

在处理新旧企业转型交替的问题上，尤其在人事与企管效率的圆与方、盾与矛之间，怎样寻找出一条协调和解、相得益彰之路——何厚铨从容不迫地显出了他的企业管理才能和过人智慧。

在继承先父的事业中，何厚铨不“照葫芦画瓢”，亦不“吃黄豆，捡黄豆”，更不是全盘原样不动，生搬硬套，强打精神，艰难地背负“大包袱”爬行……

他擅长打漂亮的“擦边球”，也擅长整旧为新，再造新业。他有勇气为家族企业“大换血”，注入新活力。他也有达观的管理观念，擅长与人合作，与人共创大业。

何厚铨，已确实实地显露出他出色的管理才华。

1993年10月，何厚铨被选为第七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这还是澳门当选此项职位的第一人！

谁道儿不如父？

何厚铨的锋芒，已直逼何贤当年的创业威势……

他亦是澳门管理专业协会名誉会长。

最不可忽略的，是他风华正茂，年轻有为。

## 第三十九章 业大家和 何氏族荫多贤达

何贤去世后，何氏家族的财产却至今没有分，何氏家人全权托付何厚铎来管理庞杂的家业。

何贤曾有五位夫人，六儿七女，却是一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

业大家和的何氏人，恪守中国传统与何贤遗愿，继续一如既往地爱国爱乡，继续代何贤为社会做善事，献爱心。

据熟悉何氏家族的人士透露，何贤去世后，何氏族业的财产至今没有分。

何贤生时在澳门、北京、广州和国外等地都有一些财产和家业，其中大丰银行是何氏家族的支柱企业。

何氏家人历经四代，气氛融洽，和睦共处，在何厚铎这一辈儿女中，只有他最充分地发挥施展了学业所长。他学的就是商家所能，做的也是企业管理，于是，何氏家人便在“何大家长”何贤先生去世后，全权托付厚铎来管理庞杂的家业。

何厚铎没有辜负家人的重托。

1986年6月4日下午6时，澳门管理专业协会于东方酒店举行了一个名为“家族企业管理”的讲座。邀请的主讲人，便是当时担任澳门大丰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的年仅三十出头的何厚铎。

此次讲演，出席的有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三十多人。

何厚铎主要就家族企业架构、继承问题、家族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执行、企业的发展和延续以及家族企业如何适应目前社会环境等问题，作了十分深入的探讨。

何厚铎认为，家族企业的延续和发展，最大程度取决于继承问题上，合理安排的接班人不仅要使家族企业得以生命的延续，更可以使它的潜力和活力得以长足发展，甚至是飞跃。

在何厚铎年轻、锐利又开阔的现代思维视野中，他认为家族式企业基本上没有一套圆满的制度。由于企业架构基础，是建立在家族的血缘关系之上，因此要达到公私分明，是族业主管者的最大困难。

但家族企业的好处，何厚铎亦毫不讳言：即在于半制度的管理方式在适当时更可有效地变通。

而最重要的是，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更有冲力和动力，因为各领导成员团结一致，目标一致，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事业的维系，全凭信任和依赖。

何厚铎放眼未来指出，为适应社会的日益发展和企业的发展，那种旧有的传统，那种纯粹的全家族式企业管理，将日渐由半家族式企业管理所取代——比如邀请法律顾问、核数师、专业管理人才等加入到家族企业的领导层。

那次座谈会上，何厚铎以现代年轻企管人的大胆思路和开拓性理论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

出席者纷纷就主讲题目向何厚铎提出问题进行讨论。

如吴荣恪认为，家族企业顶多到第三代之后便会出现种种的矛盾，暴露许多的问题，包括继承、管理、合作等等。

一代传一代，却由于家族血缘渐渐疏远，后裔数目裂变增多，亲属关系随之也会松弛下来，那么从前家族人中那种信任、依赖、合作关系等也难以继续维持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

可是也有一句话是往回推着说：“一个家族，没有三代，累积不成贵族”。

这就足够显现出一个家族兴衰的矛与盾：发达须积三代方能致富贵，可富贵了又往往经不起再三代的消耗便可能导致衰微。

可是人生最有意义和价值的行动，是挑战社会，自我蜕变。

何厚铨在这样的大事把握中，格外显出了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淡定与成熟。

事实上，从前的确是有不少较大的家族企业，在到达第三代时已经需要上市，若无起色的则直接面临破产的危机……

可在改善与发展何氏家业的“大手笔”中，何厚铨打了一个漂亮仗，为何氏家族的天空画好一张美丽梦想的蓝图。他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绝对悲观，他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之间，寻找着最有效益的成功途径。

在生意之道上，何厚铨比他的先父更加“兢兢业业，孜孜以求”。

他是属于今天的年轻人。

他要活出自己独特的一份价值，一番精彩。

他把何氏家族的经营策略，纳入到现代企业开放式经营管理的新轨道、新阶段。

至于说到何氏长子何厚铨，前文已述，他本在澳洲研习的是音乐，后来毕业回国亦没太大兴趣造就专业，也没专职做生意，但身为长子，在父亲去世后他理当继承财产，故多年来名誉挂职大丰银行，实际操作管理者还是弟弟何厚铨。何厚铨实际上多年生活在加拿大。

从整体观望何氏家族，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

当年何贤作为省港澳著名的风云人物，在国内外都享有较高声誉。他之所以取得一世功名，除却何贤本人的能力才干过人及广交朋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拥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

40年代，香港“大清律例”没有废除。何况，何贤是人在澳门。

所以，长期生活在港澳地区的何贤，由于历史原因，曾先后娶了五个妻子：（元配）郭绮文，（侧室）谭仙贞、胡燕娇、黄慧珍、陈琼。

据熟悉何贤亲人的老朋友们讲述，何贤的夫人们亲如姐妹，相处融洽。

何贤生前曾对朋友们坦言：“我的家庭没有吵吵闹闹的，几十年了，都没什么家庭问题，而且同住澳门，我始终无头痛过！”

元配郭绮文为人贤淑、谦厚，她因病不能生儿育女，却一心爱着何贤，处处照顾着何贤。

何贤曾风趣地追忆她说：“旧时我是出名的反斗星，非常好玩，喜与人交往。她就对我讲，‘你成日去玩，认识到喜欢的人没呀？你就不会留意些？识到中意的人就不怕认下，我霸夫绝子，怎对得住老人家呢！’后来就让我挑女人，挑中后她去替我讲！”

这样贤淑仁厚的旧世太太，到今日怕也很少有吧……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真的体会到何家夫人们相处得实在和睦难得。

何家夫人中，最晚进入何家的是陈琼，但最活跃最擅长交际的也是陈琼。陈琼是何厚铨的生母。

陈琼一则年纪轻，二是性情活跃，衷爱粤曲艺术，颇有造诣和演唱心得，所以与何贤在一起出外参加公众活动，最见相得益彰，默契合拍。

陈琼善于交际，喜做社会福利事业，是澳门曲艺界的组织者和台前演唱

的佳角儿。

何贤每每外出活动，多与陈琼同行，而其他四位太太比较内向，不仅不嫉妒，还始终给予陈琼鼓励和支持，使陈琼能无挂无虑地陪着丈夫。

因而，何贤在这温暖的家中，心情感到格外舒畅。

何贤有六个儿子，他们是：厚铿、厚镗、厚荣、厚炤、厚铎、厚泽（已故）。

还有七个女儿，她们是：楚盈、灼盈、棣盈、锦盈（已故）、恺盈、桂盈、钰盈。

何贤元配夫人郭绮文主管家务。何贤公务繁忙，很少顾家，郭绮文则对家中所有的儿女都细心管教，比何贤付出的心血更多。所有的孩子，郭绮文都当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而何家子女们，也都对她很尊重。

不过，郭绮文谢世早，50年代中她已过世。

还有第三位太太胡燕娇，也比何贤先逝。

何贤身后，留下何氏三位太太：谭佩贞、黄慧珍和陈琼。

当然，比之任何人，她们都对丈夫的去世承受更大的悲痛。事实正是，何贤的侧室谭佩贞和黄慧珍因悲痛过度，不久也相继去世了。

现在，只留下陈琼。

但陈琼是位见多识广的坚强女性，她曾与生时的何贤“比翼齐飞”，也可谓“恩爱患难夫妻”，她也最多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

亲人们撒手离世，陈琼忍着生离死别的创伤支撑着何氏家族，激励着儿女们继承父业，出人头地。

郑德叔了解何家人，他告知我们说，陈琼为人比较随和、热情，没有架子，所以跟她打工的人都是一干几十年，待这些仆工们退了休，陈琼还再给他们一笔钱回乡养老。这一点都似何贤，慷慨助人，乐善好施。经常捐款，建学校、医院或托儿所等，也最爱家乡，改革开放后，为造福桑梓做了许多好事。

的确，陈琼十分热心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她除了在澳门参加社团组织赈灾、扶贫筹款活动外，还十分关心番禺的公益建设。1986年10月，为庆贺番禺儿童福利会成立，陈琼与澳门番禺同乡会会长何家森一起，组织了省港澳曲艺界名伶共一百多人，赴番禺开展义演筹款。那一次，她亲自登台演唱了《马为良友剑为妻》，又与卢秋萍合唱了《陶醉烟波十四桥》，真乃余音绕梁，一曲抵万金，令乡人感动不已。演罢，将筹得的24万港元和25万元人民币，全部赠予儿童福利会。1989年8月，陈琼又应邀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名伶名曲大会串”盛会。

此次活动结束后，陈琼与儿子何厚铎又回番禺，参观了何贤纪念医院。她了解到这所由丈夫捐建且以他名字命名的医院业务不断扩大，深感欣慰，乃主动与儿子一道，又捐资59万港元为医院充实设备。

十几年来，陈琼或独自、或与何厚铎一起为番禺市捐资礼物总值达168万港元。

1993年8月，由番禺市人民政府提名，经番禺市第12届人大常委会第3次会议决定，授予陈琼女士“番禺市荣誉市民”称号。

荣获这一称号者中，仅何氏家族，便有陈琼、何厚铎、何贤的哥哥何添、及已故的何贤。

何氏族荫多贤达，不是一句美言，而是名符其实。

何贤的哥哥何添，在香港经多年拓展，事业有成，是香港太平绅士。现任香港恒生银行公司常务董事、美丽华酒店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德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旅港番禺工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等职务。

何添与弟弟一样，举凡家乡建设，无不鼎力支持。1990年，何添为家乡捐资助建占地一千八百多平方米的“何添颐养园”，使社会老人和华侨、港澳同胞有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颐养天年。

1992年，何添再斥资410万港元，在家乡兴建了石楼岳溪学校，造福子孙。

十几年来，何添为番禺的交通、医疗、文化和社会福利等建设项目作重大贡献，捐款累计二千五百多万元。内外乡亲对他甚为尊重。

何添有两位太太：陈淑芳和梁洁庭。

何添家庭中有四儿五女。

他的儿子有：厚煌、厚桑、厚熹、厚铨；其中厚煌曾在北京学习过，现在香港从事电脑业。小儿厚铨协助父亲做生意。

何添的儿女们绝大多数都生活在香港。女儿有：妙妙、妙琳、妙儿、妙馨、妙琦。

何添的儿女们也都爱国爱乡，尤其是何妙馨及其夫婿朱幼麟，与家乡联络得更密切。

1996年何添的女婿、香港议员朱幼麟将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引进岳溪村并兴办黑熊场，租地5160平方米。乡人以最优惠的地租支持朱幼麟此项具国际声誉的项目，而今有十多只黑熊在养尊处优，它们的伙食比普通人的消费还要昂贵。

再说何贤生前，待人虽宽，对儿女却决无放纵。他的儿女大部分都在国外读书或生活，何贤对六儿七女一视同仁：一不准他（她）们招惹是非，不以富贵公子小姐招摇过市；二不准他们到赌场或风花雪月之地；三是严格要求子女们勤奋读书。

四太太黄慧珍曾说：“贤哥对子女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求他们读好书就满足了。”

每个儿女出外留学，何贤都是给出一笔钱，让他们自己管理，一次挥霍也行，细水长流更好，任其自然，让他们自己学着处理钱财。何贤虽不曾说：“钱花光了别回来找我”，更不会许诺“你的钱用完再找我拿”。但是无论哪个孩子，每每学成回来，都攒下一笔钱交给父亲，这令得何贤无比宽慰，逢人便夸，何厚铨表现不错，何厚铨更不用说，他们都在学业上大有出息，没有使父亲失望。

厚铨事业最出色，但他很尊敬哥哥们，所以何家兄弟都相敬相亲。何贤的女儿在事业上也很很有成就，如女儿何楚盈就是香港的名医生，一向热心为病人服务。

在何家兄弟中，厚铨是唯一继承父业的。他的二哥、三哥厚镗与厚荣（均由谭佩贞所生）则在香港做生意。四哥厚焯（黄慧珍所生）也在澳门京澳公司搞陶瓷工艺品出口（由北京工艺品公司和澳门合作经营），且回故乡番禺的机会较多。

何贤对子女们的婚姻从不干涉，让他们找对象有充分的自由。到结婚时，也不肯大摆筵席。孩子们在国外读书，何贤就不肯出国探望，孩子们办喜事，



他连酒席乃至茶会都不赞成举行！个中缘由不是为了悭钱，而是何贤朋友太多，不愿给人添麻烦，又怕一时有疏忽怠慢别人。所以，他宁愿再给他们一笔钱旅行结婚，使自己和家人在平静中享受喜悦。

何家儿女们都谙熟父亲的脾性，也个个乐得这样做，不会给父亲增加麻烦。

何贤有一个多么温馨欢乐的大家族！他深感晚年幸福省心，只可惜他去世太早，团圆的家景在何贤去世后，也呈现出圆月残缺的凄凉。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何贤 1908 年出生，如活在世上已整整 90 岁了……

看着何厚铎长大的郑德叔说，由于受父亲的影响，厚铎很早就接触到祖国，加上回来后，更加相信祖国，了解祖国。刚开始回国时厚铎在内地做了点生意，但因他是行外人（学工商的不一定懂得生意贸易），曾在广东搞了点房地产，也不是很成功。“但铎仔头脑灵活，有智慧，对国家政策也比较了解，做起事来一步一步很稳，待接手大丰家业，算是事业上了道，也初有成就了。”

德叔叙述何厚铎的时候，满眼充溢着慈爱和欣赏。

何厚铎的妻子刘渭楨，是香港人，家里也是做生意的。嫁入何家后，刘渭楨基本是家庭全职太太，但自己也打理点小生意（花店和洗衣店等）。据说，何太人较腴腆清傲，不易令外人接触，但对待长辈老者，刘渭楨却十分尊敬。至于在公众社会活动中，则甚少露面。

何厚铎夫妇生有一子一女，都是小学毕业后才送去加拿大读书的，所以两个孩子现今都在国外。

何厚铎的家，座落在澳门主教山巔别墅。

何贤生前家住在山下，那时厚铎的小家在父亲家门马路对面。

两年前何厚铎搬上山顶别墅后，将原宅留给了母亲陈琼。

何厚铎孝敬母亲，母亲陈琼更是对这个儿子寄以殷殷的厚望。

据说，陈琼对儿子要求极高，因而何厚铎从小家教比较好。

陈琼爱护儿子，有她自己独特的方式：她“拜神”，就是拜观音和北地（水神），曾给厚铎“开观音”，也就是把儿子厚铎过契给观音做干儿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

长年生活在澳门的何氏家人，却恪守着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中国民俗。

德叔告知我们说，何贤去世后，每年过春节，何厚铎一家都会回乡。他们除夕夜在广东新会，为去看望何贤好友崔德祺老人（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大年初一中午何厚铎一家都回乡下番禺，初三才回澳门去。

我问德叔为何在港澳的华人们过年都要出远门儿？德叔说港澳有钱人家大都有这种习俗，叫“避年”，大概是避免去在当地过年时繁冗的人际应酬，所以有人回乡，有人出国游。

应当说，何氏家族，不是澳门最富有的家族，却是澳门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家族。

何氏家人恪守中国人之传统，爱国爱乡爱民，事业有成。

在何贤去世后九年，即 1992 年 12 月 18 日，何氏亲属郑重捐出 1000 万元在番禺市成立了“何贤社会福利基金会”。

何贤一生不知做了多少善事，死后他的家人还继续代他做善事。

何贤九泉有知，将含笑长眠。

## 第四十章

### 一国两制 澳门激涌回归潮

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近五百年的漂泊离散，归航中的澳门返回祖国怀抱指日可待。

19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草签仪式。它庄重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澳门历史揭开崭新的篇章，何厚铨也在这一时期登上回归大潮中的澳门政治舞台。

沧海桑田，是人们形容自然界久远变迁的成语。

然而，古老而美丽的澳门，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的，又岂止是自然风物的环境变迁呢？

殖民地的出现，是世界近代史上弱肉强食的历史见证。“南京条约”曾让英国人统治香港超过一个世纪，而葡人利用澳门拓展海外贸易已历经了漫长的四个多世纪！

尽管欧洲人利用通商口岸让闭关自守的大清朝廷认识了外面的世界，但奈何积弱难返，中国黎民百姓几世几代都曾苟活于帝国侵袭的烽火战乱当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龙的传人不再受列强欺凌。1979年中国大地实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使得国力强大，业绩骄人，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除了使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外，也令外国人为之瞩目和震撼。

泱泱古老而落后的东方大国，在20世纪有如苏醒的巨龙，冲霄腾飞。为了实现祖国领土完整不可分割的和平统一大业，完成这一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邓小平提出了英明务实的“一国两制”政策，用以顺利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港澳问题。再加上《中英联合声明》以及《中葡联合声明》等一系列具有政治约束力的文献，使得港澳地区在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的遥遥征程中，顺利过渡。

1997年7月1日，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

而澳门于1999年12月20日重回祖国怀抱的日子亦已指日可待。

回溯澳门的“归国之旅”，历史老人清晰地印刻下一段段“大事碑记”：

1972年3月，中英正式建交前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件中申明：“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港澳是被英葡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部分，解决港澳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据不属于所谓‘殖民化’范畴。我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这是一次极鲜明地表达中国对港澳问题严正立场的实录。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国内发生政变，其新政府随之宣布了“非殖民化政策”，公开承认澳门不是葡萄牙殖民地，而是中国的领土。

1975年1月，葡新政权宣布同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从而为中葡建交奠定了基础。

1975年底，葡撤走了驻扎澳门的军队，解散了陆军司令部和海防司令

部。

1976年，葡公布新宪法，同时颁布了《澳门组织章程》。章程规定：“澳门是中国领土，是葡萄牙管理的地区，具有内部公权及除葡共和国组织法与澳门组织章程的原则外，享有行政、经济、财政及立法自治权的法人地位。”

1977年，中葡两国开始进行建交谈判，澳门问题是其中一个主要问题。

1979年2月8日，中葡两国在巴黎签署了两国正式建交的联合公报。

中葡建交为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之后两国之间友好关系不断发展，澳门同内地之间的往来也日趋频密。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中规定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针，在香港建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树立了典范，也推动了解决澳门问题的进程。

1985年3月，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访问澳门时，明确指出中国对澳门的政策是“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

同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葡萄牙总统埃内亚斯时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埃内亚斯也说：澳门问题的主要方面在达成建交协议时已经解决了，葡人愿友好地解决该问题。

从1986年6月到1987年2月，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外交谈判共举行了四轮。第一轮至第三轮为第一阶段；第四轮为第二阶段，先后历经8个月又14天。

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周南曾用一系列古诗描绘谈判过程：

第一轮周南引唐朝孟浩然诗句“潮落江平未有风，兰舟共济与君同”，比喻中葡两国将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会谈。

第二轮引用晋代画家顾恺之的倒啖甘蔗“渐入佳境”的典故，形容谈判取得了可喜进展。

第三轮周又引用唐朝刘禹锡的名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预示此次会谈将取得突破。那次，正是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一阶段谈判宣告结束，只是在澳门归还中国的时间上双方还存在重大分歧，有待进一步协商。

1987年1月6日，葡萄牙国会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讨论之后，原则上同意于1999年将澳门交还给中国。至此，两国解决澳门问题的分歧已完全消除。

1987年3月26日——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澳门各界人士隆重纪念的日子。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草签仪式；中方代表周南和葡方代表梅迪纳大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文本上签字。

联合声明庄重地向全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以下将简称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联合声明》草签后，澳门同胞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从1557年算起，澳门在葡国统治下长达四百多年。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都没能够解决澳门问题。

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提出三大任

务之后，我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终于使这一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洗刷了民族耻辱，中国人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这一事件无疑将永垂史册。

《澳门日报》当天刊印了四万多份号外，全文刊表了《联合声明》及有关照片。

1987年4月13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葡关于澳门《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姬鹏飞、吴学谦和葡萄牙外长等出席签字仪式，两国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文本上签字。

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澳门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澳门历史揭开的新篇章中，何厚铨立足于回归“合唱团”的社会主流潮头，登上政治舞台，他唱的是“正剧”，担的更是引人瞩目的“主角”。而且，在“领衔主演”的澳门主人翁行列中，他最年轻，步入政坛时，年仅31岁。

## 第四十一章 急流勇进 参政议政担重任

80年代中期，何厚铨“三十而立”，令澳门各阶层人士重新找到了何贤的影子。

何厚铨成为各社团争聘的对象。

他接连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人大常委，还有澳门立法会副主席。

80年代，是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年代。

80年代初，邓小平率领国家和人民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

继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被美国《时代》评选为世界风云人物之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再次被评选为1985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他的形象成为该刊1986年第一期的封面。

80年代，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都在那个时候举行。面临重大历史转折的时刻，被认为是传统保守的澳门蕴含着巨大的潜力……

而对于风华正茂、年轻有为的何厚铨来说，“返得大丰，很自然地就参与各社团的工作。”

从会计师到何氏家业接班人再到一个锋芒渐露的澳门社会领袖——何厚铨原本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逐渐登上人生高峰的。

何贤的不幸逝世，令澳门各阶层的利益均衡顿失重心。

而何厚铨的“横空出世”，令长期惯于依赖领袖人物的各方利益者重新找到了何贤的影子。

何厚铨不负众望，急流勇进，他日渐成为各阶层社团争聘的对象。

80年代中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已达成协议，澳门回归问题却还迟迟没能提上议事日程。

那时候，澳门各界人士对于澳门之前途猜疑多多，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莫衷一是。问题是如何把这些看法向首都北京表达。

1985年，澳门一群年轻工商界人士应邀访京。当时，应邀访京的团体寥寥无几，而能够应邀访京又能直接与国务院港澳办对话的就更是凤毛麟角。

当年，询问团的团长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刘衍泉，何厚铨荣任副团长。

“如果没有记错，这是澳门第一批访京团，是第一个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谈及澳门回归祖国问题的访京团。”

何厚铨回忆当年曾引起社会颇大反响的一次难忘旅程。那时候，是他们首次带回了北京对澳门问题的信息，无疑是对澳门的回归订下了时刻表。

“那次印象深刻，由此亦使我们预计到后来的中葡谈判，乃至制订基本法。无论对我们的团员以至澳门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

何厚铨认为，当年那一群年轻气盛、肩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工商界人士，对后来的澳门社会都有积极深远的作用和影响。事实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般——在今天看来，这班人都已成为社会精英，也正在为澳门的顺利回归作着积极的贡献。

1986年6月30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终于在北京举行，由此拉开了澳门踏上回归祖国的序幕。

当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何厚铨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那是中国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前夕，常委会增补港澳5位知名人士为全国政协委员，其中香港占3名，澳门占2名。这样一来，港澳地区委员由原来49名增至54名。

在此次增补名额中，体现了北京对澳门地区的关注和重视。香港五百多万人口，只增3名；澳门人口不足50万，却增2名，比例相当高。

政协一向被人们称为“综合性人才库”。

澳门所增的2名是何厚铨和保利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行。

何厚铨当时只有31岁，除了继承父业任大丰银行董事总经理外，还在社会中担当要职：包括澳门银行公会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事、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等。

“何家铨儿续前贤”；何厚铨，正当“而立之年”，正是创业的好时候。

31年前，他在澳门呱呱坠地；18年前，他在澳门永援中学读完初中；8年前，他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而后在加拿大的翠马马域箴曹会计师事务所任核数师，随后又返回香港工作。1983年也就是仅仅三年前，因父病危他只好打道回府，从香港转回澳门大丰，承接父业……

从13岁出国到28岁回国，15年风风雨雨事多变幻，何厚铨长大成人，是个显赫人物了。

获悉当上政协委员，何厚铨非常高兴，他说今后又多了一个学习的机会，也多了一份社会责任。他认为在中葡两国政府即将举行澳门谈判的时刻荣获增补，更显得任重而道远。他希望能任期内，透过政协向北京多反映澳门居民的意愿，特别是在回归祖国前的特殊历史过渡时期之中，搞好团结工作，保持澳门的发展地位，多提建设性建议，对祖国的现代化大业多作奉献。

何厚铨对澳门的未来持十分乐观的态度。同时他也坦诚谦逊地说，他之所以能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有赖于世叔伯们的扶持和照顾。他估计他之所以能当选，除了是填补家父何贤的遗缺之外，还有可能是以青年工商界和银行公会理事会、主席之身份。

那时，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很多程序何厚铨是不知道的，但他诚实好学，经常向前辈们学习，与澳门青年工商界和金融界一道，为保持澳门的繁荣安定而共同努力。

向北京反映和转达市民的意见，澳门社会有几个渠道：南光公司是一个主要的渠道，舆论界也是一个渠道，再就是通过政协委员传达民意呼声。

而在澳门的全国政协委员，则是马万祺、梁雪予、邱成章、加上新增补的王孝行与何厚铨。

两年之后，到1988年，何厚铨再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已故的何贤生前也是全国人大代表。

在澳门的社会事务上，1988年，何厚铨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那年春天，何厚铨出席全国人大会议回澳后，就曾与记者促膝长谈。

那时候，耳聪目明的记者们已开始发觉他敢言的性格与稳健的气质。

1988年，澳门经济环境不算太好，但大量“中资”则视澳门为金矿。

中资（尤其是地下中资）在澳门的大量投入，无疑令小本经营的澳门本地资本面临困境，大部分澳门商人敢怒不敢言……

其实，那景象决不正常，无疑破坏了国家资本在澳门的形象，也影响了澳门经济的正常发展。

身为全国新当选的人大代表，何厚铨勇挑重担，直抒己见：“资本主义

社会，大鱼食小鱼天经地义。但中资作为国家资本，要了解港澳两地的经济体系，不能单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本地工商业者的发展机会。”他又说，澳门本身的经济条件还未成熟，尤其在过渡期内，难以承担这样的经济活动。“抢饭碗”是明摆的事实，这是在此次人大会议中，许多代表提出的共同意见。

何厚铨认为在会议中提出这样的意见，对于有关部门改善工作有积极意义：“既然‘一国两制’已定为国策，这些问题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有利于来自各省市的代表们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希望通过这个渠道，督促各级部门对外派机构进行监督。”

不愧是澳门的代言人！何厚铨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重视，也吐出了澳门工商界憋在心里的话，赢得广泛好评。

不多久，澳门的中资活动果然获得合理的调配，使之既发挥了中资的作用，也为澳门的经济缔造了较合理的发展环境，有利于澳门经济的发展。

一言一行之累积，使何厚铨在澳门社会逐渐赢得威望。

1993年，何厚铨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

当年，澳门政府举行第四届立法会选举，何厚铨被经济利益团体推举为候选人，并顺利胜出成为间接选举的立法议员。

由于何厚铨富有才干兼具社会威望，旋即又被选为立法会副主席（立法会主席由澳门总督委任的土生葡人出任）。

在这以前，他的父亲何贤曾历任第一、二、三届立法议员，也曾任立法会副主席。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何厚铨不仅承袭了以大丰为支柱的何氏家业，更基本继承了他父亲的社会要职。

难怪人们把他视为“何贤的影子”！

然而，尽管不少人仍以“影子”观点检测何厚铨，但何厚铨却是何厚铨，他不仅只站在父亲的肩膀上，他更有着他自己生命价值的独特内涵，甚至有不少方面可以说他超越了父亲的才干。

## 第四十二章 融入社会 广结善缘解纷争

才多不压身，义胆不负望。

何厚铨秉承了父亲的德行——融入社会，不辞辛劳，排难息纷争。

1989年和1993年，澳门汽车运输交通业曾因罢驶一度造成社会混乱，何厚铨为此不辱使命，排难息纷争，他那仗义疏财的品格和化解事端的能力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与钦佩。

在继承父亲的事业中，何厚铨显露出他的管理才华。

1993年10月，何厚铨被选为第七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他成为澳门地区当选此职位的第一人。

他亦是澳门管理事业协会名誉会长。

才多不压身，义胆不负望。

何厚铨还秉承了父亲的德行——融入社会，不辞辛劳，排难息纷争。

1989年的一个晚上，计程车司机因不满意电召计程车只能在港澳码头候客的规定，在大批香港旅客抵澳时进行罢驶行动（根据电召计程车专营规章规定：电召计程车不能在公共场合停车候客）。

如此一来，近千名旅客滞留码头，而澳葡官员又都已下班，对罢驶事件置之不理。

一下子，群情激愤，鼓噪起来……

事后，记者陆波这样描述：当时，一位身穿西服、手持“大哥大”的魁梧男子与几位随行人员悄悄抵达码头，打量过四周环境后，这位神通广大的男子用“大哥大”调度了澳门新福利公共汽车公司的多辆小型巴士，通宵营业，将所有旅客疏散至市区各处，迅速平息了一场风波。

不用猜，这神通广大的男子汉，就是何厚铨。

在小小澳门，因当局政府管理不善而引发的社会矛盾纷争屡见不鲜。

1993年，澳葡政府颁布实施管制市面交通的新法例《道路法典》。由于法律条文不完善，引致有关行业难以在新法律的执行下进行正常运作。

而后，由澳门八个交通运输建筑业社会团体联合组成的“《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曾多次向总督、立法会递交了意见书，并知会澳门中华总商会，要求政府暂缓执行有关条例，但均不得要领。

1993年7月20日凌晨，“《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属下团体决定采取停工行动。

积极响应的全澳计程车、码头货车、往返中国内地的货车、泥头车、混凝土车、吊车等交通行业全部停工罢驶。

教车业也同时暂停为新学习驾驶者办理申请手续。

在那非常时刻，除公共汽车外，全澳门的交通运输几乎全部陷于瘫痪之中。居民生活不便，游客望而却步，市面一片萧条，各行业都骤然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澳葡政府坚持己见，停工团体也不甘罢休，双方争执不下，澳门的整体经济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打击。

情况如此紧急，若不及时解决，澳门将全面瘫痪，经济也将呈危势滑落低谷。

这已经是1993年了。难道说，经过漫长岁月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澳门，



就让它葡人当局政府的“殖民末日”灰懒心态下毁于一旦么？

澳门各界人士都焦灼而惶惑地注视着事态发展。

这时，中华总商会以平乱为己任，适时地起了积极协调的作用。

何厚铨迅速接受中华总商会的委托，以商会副会长的身份直接参与事件的调解协商。

他向有关的停工团体晓以大义，陈抒利弊，讲明危害，呼吁各方克制，以社会大局为重，并承诺安排与政府磋商。

在中华总商会调停下，“《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属下各团体，决定暂时停止停工行动，并令部分计程车提前复工。“《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结束停工行动是本着坚持对话而非对抗的宗旨，也是顾全本地民生及从大局着想。该“关注委员会”本着对中华总商会的信任，经过议决，接受中华总商会的调解，并希望有关问题能够获得合理解决。

在中华总商会安排下，“《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于7月23日在中华总商会及澳门街坊总会负责人陪同下，与澳葡保安司有关负责官员进行会谈。

双方经过四小时的坦诚会谈，政府官员同意向最高当局反映民间意见，以便作出改善。

事件终于暂时获得平息和解决。

在整个事件当中，何厚铨不辱商会重托和使命，始终以理智、协商的精神，以他的社会关系和应变能力，完满解决了矛盾纷争造成的尴尬混乱僵局，从而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

在屡屡轰动社会、得以诉诸报章的众多社会事件中，何厚铨越来越呈现出“主角”形象，他的面孔越来越被大众谙熟，他的言论也越来越频繁地涉及到澳门前景和使命。

但人们又怎知，还有更多鲜为传媒报道的纠葛事端，在小小的澳门层出不穷，难以绝迹；尤其在回归前的过渡期内，纷争时常有恶化的态势。而何厚铨次次都不厌其烦，不辞劳苦，且都能令争执双方获得满意的结局而和气收场。

从无数次调解并使之获得合理解决的事件中，何厚铨显出了令人折服的才智。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何厚铨办公室最抢眼处的一幅书法墨迹，平实无欺而又意味深长，这不正是他那坦荡的内心世界真实的写照么？

## 第四十三章 父子情浓 形影相随血脉承

爱国之人，首先是爱父辈，爱家族，爱祖先。唯有如此，才能谈及爱我们整个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

何厚铨以他的奋斗和才干，信念和追求“读懂”了他的祖先，他的父亲。

从承袭何氏家业，到融入社会参政议政，再到仗义疏财、进退有度，何厚铨广结善缘，其声望也日渐高涨。

“他许多地方简直太像何贤了！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呢！”澳门人总喜欢这般感叹。也难怪，人们屡屡从他身上找到了当年何贤的影子。

从参与国政的视角看，何氏父子都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56年，何贤由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带着回大陆参观时，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了何。

不久，何贤又见到了周总理。周总理希望他能参加全国政协。他当时还不大了解全国的情况，便与他的老朋友柯麟商量。

柯麟觉得他先参加政协比较合适，于是通过协商他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从此每年何贤都到北京开会，他认识了叶剑英、廖承志等中共领导人，并且成为好朋友。每次到北京开会，中央都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归途经过广州时便常常顺道回家乡会见亲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何贤逐渐对祖国的建设状况有所了解，更热心支援家乡建设。70年代后，何贤历任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被选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

身为港澳地区知名度极高的爱国人士，何贤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何贤以他最平实无华的话评说共产党：“你们看，过去三十年，如果没有人才，中国早就没命了，恐怕能源都给人整吞瓜分完毕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石油不但够用，还可以出口呢！……我看中国国运，一定好。天穿，就地补吧！待我们国运家运一起来时，更了不起呢！”

何贤曾这样憧憬：“如果中国真是做得到人均收入一千美金，那真是不错了！因为它有矿藏，大把材料，大把资源，与其它国家不同。所以发展前景一定会好的！”

这就是何贤。他的爱国爱乡，最可贵的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源于对祖国命运前程的乐观信念。

他不但爱国，而且更加依赖自己的祖国。

何厚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比之父辈，他这一代现代华裔贵族名门之子，更有条件到国外享受舒适安稳优厚的人生，做一个“高等华人”了。可他却执意扎根澳门，在这个洒遍父辈辛劳血汗的祖国土地上，趁年轻气盛，风华正茂，立志有所作为，大干一场。

对祖国的前程，对澳门的回归，何厚铨充满信心。“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澳门进入了12年的过渡期，这是年轻人发挥作用的最好时机。澳门的希望和整个国家一样，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澳门中华总商会有多位副会长，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就是前任会长何贤的儿子何厚铨。在众多社会要职中，何厚铨都属最年轻的一位参政议政者。

十几年来，不少熟悉他的人看到，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

爱国之人，首先是爱家，爱父辈，爱家族，爱祖先。唯有如此，才能谈及爱我们整个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

何厚铨以他的奋斗和才干，“读懂”了他的祖先，他的父亲。他曾用这样的文字描述自己的父亲：“他给我们兄弟姐妹留下了物业之外，还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他的子女、家属和后辈，我觉得父亲有几点长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支持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家乡建设，为繁荣祖国经济作过微薄贡献。

“二、他一贯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关心澳门社会的稳定发展，甚至不计较个人的安危得失，乐为鲁仲连，促进各界人士的团结。

“三、他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举凡澳门的爱国活动，以及社会福利、体育、文化等各种活动，他都出钱出力，极力支持。”

“四、他待人热情，和蔼可亲，不记私怨，乐于助人。

“我怀念我的父亲……我与兄弟姐妹一道要继承他的爱国遗愿，加倍努力地祖国的繁荣昌盛，澳门的安定发展作出贡献……”

我记得何厚铨还说过：“人一有了名气，就会引起全社会的检测和分析。”

如此看来，人们正可以依照何厚铨学习先父的几条心得，来“检测”他，“分析”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吧。因为不难想见，何厚铨最欣赏父亲的地方，也就是自己愿亲力亲为加以弘扬的地方，不是么？

何贤值得自己的儿孙学习，更值得今世所有年轻的一代学习，学习他的忠直正义和爱国爱民。

日本三船敏郎曾在黑泽明的名片“用心棒”下写过一句对白，意在描述自己：“我们只是露鞘的剑。真正的宝剑，是藏在鞘里的！”

于是，启发世人深思的正是：何贤是真正的强人，手中有把永不露鞘的宝剑。

黄霑曾说何贤，仁厚的心地，使他完全不必拔剑，但人人都拜服在他的高尚道德之下，称他为大英雄，奉他作贤哥。

现在，我走访的许多何厚铨的同辈人，又在张口闭口说“铨哥”了！

番禺乡人骄傲地说，“铨哥”在澳门任要职，与家乡也亲不可分，他是澳门、广州地区同乡联谊会副会长，澳门番禺同乡会会长，1993年2月他又被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不错，何厚铨与父亲“形影相随血脉承”，尽管他年轻，却承袭着传统中国人慈善为怀、济世为本之高尚品格和热爱桑梓的深厚情谊。多年以来，他为支援家乡旅游、经济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等福利事业陆续解囊，捐赠总额达人民币1170万元。1993年8月，何厚铨与自己的父母和伯父何添一道，同时被家乡人民政府授予“番禺市荣誉市民”称号。

## 第四十四章 濠江精英 信心十足唱凯旋

在1998年5月成立的特区筹委会澳方5位获任副主任委员中,何厚铨代表了澳门最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名门望族,位居“主流派”阵容中,声名显赫。他能否成为本世纪末最为瞩目的传奇骄子,人们将满怀希冀,拭目以待。

无论怎样,“何厚铨家族”的史话至此,已掀开全新的篇章。或许,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1987年4月13日上午11时半,中国总理赵紫阳、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澳译施华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姬鹏飞、吴学谦等出席仪式。北京中央电视台通过人造卫星向全球转播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由澳门各界社团和知名人士组成的观光团,亦在场观看了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仪式。

何厚铨,无疑是出席签署仪式的澳门各界人士观礼团中较引人注目的一个人物,他不仅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更是一个参与者。

根据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澳门将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怀抱,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澳门——这个位于珠江口,由澳门半岛及氹仔、路环两岛组成,总面积共2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1万,由葡萄牙政府管辖四百余年的“迷你”城市,在本世纪末,将跨越数百年沧桑,回归中国政府,回归祖国怀抱。

为了具体落实“一国两制”,为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准备基本法律,1988年10月,由国务院港澳办有关官员、内地法律专家和澳门各阶层人士联合组成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何厚铨以其对澳门社会的卓越贡献,被委任为草委会副主任。

草委会起草基本法期间,何厚铨和其他委员一样,风尘仆仆奔波于京、澳等地,为制订这部未来特区的基本大法废寝忘食。

“这是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何厚铨回忆这段与全国著名法律专家和澳门委员共事的难忘日子时,不无感慨。

“我自己身为一个澳门人,能参与制订这个关于澳门的历史性文件,具有重大的意义,且为今后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这是一种阅历的升华和见识的增长,更是一笔精神的财富。从核数师到澳门宪法性法律的制订者——这确实是一个奇妙的转化过程,其中自然而然也包含了何厚铨人生内涵的升华,这令他更加富有责任感和“当家作主”的荣誉感。

经过半年的艰苦劳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订完成。

为了令这部基本法更能适合澳门的实际和更具生命力,澳门各阶层人士又组成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对这部历史性、宪法性的法律文件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广泛听取澳门各阶层包括土生葡人的意见。

何厚铨又以其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获选为咨委会副主任委员。

基本法咨委会为了收集意见和反映意见,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正式会议到深入民间社团,委员们都为完善这部特区法律而尽心尽力。何厚铨曾乐此不疲地对记者说:“当时我工作量很大,有苦有乐,但却很充实。”,因为这是一项多么有意义而富有建设性和挑战性的工作啊!

何厚铨毕竟年轻，他要在这特殊历史时期从事的大量社会政坛工作中，迅疾地攫取并积累经验，丰富见识，日后方能厚积薄发，举重若轻……

对于这段以艰苦劳动换来的成果，何厚铨自认为有两点满意之处：

1. 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澳门委员的确尽心尽力反映了实际问题；
2. 他个人深切体会到中央政府确实十分关切澳门未来，在一些实际问题上，只要不违反中央的政策，都尽量照顾到澳门的实际情况。

例如，澳门存在土生葡人问题，这是香港基本法没有遇到过的。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内，这个问题就有了较好的体现。

未来澳门特区立法会中，就没有香港特区基本法中非中国公民议员不得超过 20% 的规定。这是照顾到澳门存在一定数量的土生葡人的实际。

对将来立法会议员的选出，仍保留了现今使用的直选、间选和委任方式，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架构，这对澳门的平稳过渡是有利的。

还比如，对于将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主席的甄选条件，都较之香港宽松。……

“事后看来，基本法的这些条文对于澳门的稳定有特别的意义。”何厚铨的感受恐怕比任何人都深刻。虽说澳门特区基本法在制订和咨询过程中都还比较顺利，但何厚铨和其他草委、咨委们都遭逢了一次今生难忘的严峻考验。

原因不言而喻。用何厚铨的话说：“那时候，适逢北京那场政治风波，大家都要花很大力气保持澳门的稳定。一批又一批内地草委来澳门参加会议，我们既要保持咨询工作在开放和活跃的气氛中进行，又要提防挑拨和破坏，难啊！”

多数国人未必知晓的情形，是那期间有人在会议上撕毁发言稿，在会场外焚烧基本法，可咨询工作仍然在民主、开放的主流气氛中顺利进行，并且赢得了广大澳门同胞包括土生葡人的认同。不知这凝聚了何厚铨和草委、咨委们的多少心血！

“澳门的传统爱国社团显示了无比的凝聚力，令别有用心者难以形成反叛气候，也给了首都北京以强大的信心，向中央政府证明澳门也能顺利完成制订基本法和咨询工作。”何厚铨带着一种充实的底气，一种十足的信心，一种乐观的信念，一种复杂的慨叹，不无骄傲地诉说当年，那番景象，实可谓“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1993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完成了制订和咨询工作，基本法正式颁布，草委会和咨委会完成了历史重任亦随之解散。但后面的事情，何厚铨丝毫没有懈怠。

为了顺利过渡，也为了进一步推广基本法，让基本法深入人心，已经完成历史任务的前草委和前咨委，再次组织起来，组成澳门基本法协进会，继续发起宣传攻势。

何厚铨获推为理事长。

在推广基本法活动中，基协会以、多姿多彩的推广方式，在澳门居民中广获好评，深得人心。它或以提纲契领、深入浅出的研习班方式培养管理阶层人才，或以斑斓多彩的展览、竞技、游园会、问答游戏等方式，将枯燥无味的法律条文化成具体问题，引起各阶层人士之兴趣。

基协还会把宣传攻势由澳门办到内地，在广州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举办活动；它不只让将来有切身关系的澳门居民关心基本法，也让全国各地都知

道有澳门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基本法。

宣传的效应立竿见影，观众的回应和信件遍及了全国各地。小小的澳门地，开始日渐升温，从而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热门话题。

为了让基协会到 1999 年的后过渡期继续推广基本法在经费上无后顾之忧，1996 年底，基协会兴办大型晚会筹募经费。

何厚铨和基协会委员们身体力行，带头认捐，获得广泛的社会回应，筹募活动获得巨大成功。他们出钱出力，为推广基本法绞尽脑汁，也为澳门回归祖国谱写着凯旋序曲，并紧锣密鼓地开展繁琐复杂又细致入微的工作。

1998 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全国人大会议关于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审议通过了以钱其琛为主任委员，谢非、马万祺等九人为副主任委员共 100 名澳门特区筹委会组成人员名单。宣布了筹委会正式成立，当筹委们齐集北京人民大会堂从人大委员长李鹏手中接过了任命书的时刻起，已标志着澳门回归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在特区筹委会首次全体会议上，钱其琛重申了人大为筹委会规定的九项任务，并且强调说，筹委会面临的工作是大量的、紧迫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核心的任务是要根据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组建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全部由澳门永久性居民组成的二百人的推选委员会。推委会组成后，将以协商或协商后提名选举的方式，产生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之后，行政长官将依照基本法的规定，着手筹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包括提名主要官员人选，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此外，还要制定一系列重要司法章程、机构政策等关系平稳过渡的许多问题，甚至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庆典活动等，都在筹委会的研究范围之内……

五月的澳门，正是治安不好，经济萧条，市民忧心忡忡之时。

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成立，犹如在密厚的乌云层中绽出了一道阳光，给人们带来了憧憬和希望。

以国务院副总理为主任委员的澳门特区筹委会共一百人，其中国内委员四十人，澳门委员六十人。

而九位副主任委员排名依次为：

谢非、马万祺、廖晖、王启人、王英凡、何厚铨、吴福、曹其真、何鸿燊。其中何厚铨以“澳门银行公会主席”为主要职务排在第 6 位，而在五位澳方人中则排第 2 位（首位人物是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

资深社会问题研究者谈论说，对筹委会澳方名单基本上可以接受，而且比预期理想。

首先，名单显示出两种相对的平衡，一是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平衡，一是工商界与非工商界的平衡。

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平衡，除了总人数之外，更突出地体现在副主任委员的名单上。其中马万祺、何厚铨是澳门最有政治地位的名门望族，而何鸿燊、曹其真则分别是独树一帜的博彩业和工业大亨。位于主流派的马、何，同非主流派的何、曹之间的吴福，则相对于前一组是非主流，而相对于后一组又算是主流派……总而言之，这份名单可说既肯定主流派和工商界的重大价值，又适当地将参与的大门，进一步向非主流派和非工商界打开。因此，名单实事求是地照顾到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在维持稳定中又带出开放的讯息。

任何人事安排，往往包含显性和隐性两部分。隐性的部分，由于可观察性不强，只能留待有关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方得作出较有把握的认知。

仅从显性部分看，何厚铨位居显赫，代表政治主流派，和年事已高的马万祺同处一个阵营，也同样都是澳门人心目中早已熟悉的“权威面孔”。

何厚铨虽年轻，但资历非浅，他既是澳门银行公会主席，执掌地区经济实权主脉，又是全国人大常委，政治资历在澳方人士中算得顶呱呱“稳阵”了。

那么，至于他的政治前景究竟如何？人们将满怀希冀，拭目以待。

.....

1998年5月5日上午11点半，澳门回归倒计时纪念碑揭幕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前举行，在京全体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全体委员出席了这次仪式活动。

当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北京市市长贾庆林，为澳门回归倒计时纪念碑的揭幕按下电钮的时刻，随着红色帷幕徐徐落下，倒计时牌慢慢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澳门回归倒计时牌整体是以大红色为基调，代表了祖国人民盼望澳门回归的喜悦心情。牌的中间是“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政主权”十三个金色大字，在倒计时钟下，还有一个白色莲花为主体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徽，形象地表现了澳门即将回归祖国的主题。

马万祺在仪式上作了题为“翘望伟大的历史时刻”讲话，他说：“当1999年12月20日零点钟声敲响之时，便是澳门回归祖国的伟大历史时刻。澳门回归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宿愿；”他还表示“委员们将努力工作，不负历史重托。”

此时此刻，直至日后的五百多天内，筹委们要完成大量的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事。

更加严峻的考验，更加富有挑战性的艰巨工作，在等待着全体筹委们，更等待着信心十足、风华正茂、踏实力行的何厚铨。

而他，亦十分理智清醒地认识到时代赋予他和他的同仁们的神圣使命：大家齐心协力，坚守信念，乐观持重，同舟共渡，回到祖国怀抱。

身为澳门未来之主人翁，大家既要乘凉，也要种树，还要赶路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任重道远的何厚铨，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或许，有关“何厚铨家族”的下一部当代史话，就将从此处扬帆起航高歌一曲，继而掀开崭新的篇章，拉开更加精彩也更加辉煌的人生“序幕”.....附录一

## 基本法的关键成果：维持现行制度

何厚铨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虽然是一个小地区的宪制性法律，但于其瓜熟蒂落之前，经历了一个反覆咨询、不断推敲、逐字琢磨、数易其稿的四年多的待产期。以一个法律的创制所需要的开放、严谨及广泛的民主讨论来衡量，除了香港之外，澳门基本法对澳门乃至世界而言，其历史性及开创性均属巨大无匹。

基本法的产生，带出一个具争论性的问题：备受吸纳的意见和建议，毕

竟是一部分，不可能包括百分之百所有不同的意见，这对基本法的价值将有何影响？我们认为，那不但是基本法的缺点，反而可能是它的优点。一个法律文件，咨询的层面越广泛，所得的反应越活跃，则意见的信息量越大于文件本身相对受到限制的信息量。如果所有纷陈互异的意见都被采纳，毫无疑问，我们拥有的将只是一部内容互不协调，甚至自相矛盾、不知所云的基本法。

大量意见比小量意见能提供更加全面多样的选择。意见是否适当，是否正确，任何一个起草者都会有自己的判断。然而，作为意见总体的一部分，每一个意见都并非可有可无，都有不可分割的价值，否则无以深思熟虑，提取其中精华，广泛、持久的咨询，其重大意义即在于此。尽管这样，它同基本法所决定的另一个方面之间，也是不可互相代替的。

基本法具有特定的政治规范性，它取决于一个既成的契约，即中葡两国政府共同缔结的联合声明。它构成一个指引，用以选择最适当为基本法采纳的意见。不仅如此，它还是基本法的价值和成果最具原则性的判别标准。

它正是基本法的核心——人所共知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它是中葡两国取得共识并透过联合声明作出表达的基础，也是用基本法对联合声明给予法律规范的基础，无论起草者和咨询者，均受其制约。

对我们澳门居民来说，维持澳门现行制度不变，亦即保障联合声明演绎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和法律诸方面的延续，是“一国两制”生命之所系。早在澳门问题出现之初，很多人就担心现行制度将来是否改变，这一忧虑事实上构成后来澳门人对基本法发表意见的整个心理背景，一些较为激进的意见，出发点仍是对此惴惴不安。

我们谨慎考虑过要求大幅改变现行制度的意见，不讳言，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改变一个现行制度，并使之在一段长时间之后才付诸实行，只能将改变的前提放在一系列遥远的预测之上，如此便面临不可知的巨大风险。假使我们一意孤行，这些风险带来的可能恶果，就不能不由这一代和下一代千千万万的澳门居民来承受。这一责任，谁也担当不起。

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到来之前，澳门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澳门发展的祸福，对其未来影响深远。若果基本法待到接近九九年之时才告问世，则过渡期不能不留下一片吉凶未卜的前景。唯有透过基本法及时把“一国两制”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才能巩固人们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这个信心，必然联结着“一国两制”给予澳门的唯一内涵：现行制度。信心如果不是源于生活中的真实历程，不是源于人们凭自己的经验所能接受的事物，那末，这种信心就是虚幻的，它缺乏内在的精神力量，对提高生活的勇气毫无帮助。

世界上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现行制度，但如果它为我们所认识及作为一个整体获得我们正面的评价，而联合声明又对它给予保障，我们就应当在基本法中，把这个可以争取得到的实在成果稳稳地拿在手中。事实上，这一目标已经成功达到。

如果现行制度和基本法规定的制度属于同一性质，推进两者之间的过渡期的制度，就不可能是异质的，这里显现出衔接的意义。可以说，基本法不但保证现行制度在将来不变，它还根据这个保证让现行制度在过渡期也维持不变，使居民放下心头大石，确保社会稳定。透过照顾将来的澳门，基本法也间接兼顾了现在的澳门，使人们的信心由现在起不动摇地持续至未来。



因此，藉着一个轴心——现行制度，基本法揭示出一个人人们能够理解和把握的未来，与此同时，这个未来又成为澳门过去的一个自然伸延，这对介乎两者之间的时间环节——当前，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我们在当前学习、作息、娱乐、交往、谋生、经营、奋斗，当前的一切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基本法让身在当前的我们把过去的生活成果发扬光大，也让我们把丰富这个成果的目标同一个值得信赖的未来紧扣在一起。基本法超乎寻常的意义在于，它选择了一个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方向，填补了澳门的历史跟其未来之间的一段空白，使这个城市的生命越过可能的障碍，得到健康的成长。

## 附录二

### 港澳经济合作的关键方向

何厚铨

港澳经济合作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是一个梦想，在一定的层次上，它早已是一个事实。

首先，香港是澳门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尤其在对澳门的进口方面，长期以来处于领先的位置。例如我们这个研讨可以见到的场所的建筑、装修材料，在座各位朋友所穿的衣服，乃至现场可见到的所有设备和物价，相信不少都是由香港运来澳门的。

在金融方面，很大程度上，澳门是香港的一个延伸。澳门币与港币挂钩，大笔的买卖和交易，往往以港币结算。澳门很多外资银行金融机构的总部或管理中心，都设在香港。澳门的黄金、外汇和股票等投资活动，都主要通过香港市场来进行。

在旅游方面，澳门的游客之中，一百个人里面，就有将近八十个是香港人，数十年来，“香港客”这个名称，成为在澳门通行的专用语。来澳门探亲、游玩，早已是香港人业余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有多香港人长期在澳门工作和居住，早已融入本地社会，成为澳门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

在各种工商行业的投资方面，港商在澳门是一支中坚的力量。由于需要处理香港的业务，很多商人风尘仆仆，经常在两地的港澳码头之间来回穿梭。他们是“澳商”还是“港商”呢？两者都不是。港澳港澳，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港澳商人”。

在文化方面，港澳两地都是华人聚居的社会，在粤语、英语、葡语和其他语言中，粤语是两地最普遍使用的共同语言。在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上，尤其是近二十多年内，透过电子传媒、电影、报纸的影响，我们也不容易将一个澳门人同一个香港人区分开。与此同时两地又具有东方和西方互补，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文化特色，在制度和习惯上都有宽广的包容性、多元性，这也为彼此的交往提供了自由无碍的有利条件。

一直以来，透过两地之间密切的经济交往，澳门成为香港的一个边缘市场，澳门的部分投资所得被运用于香港，成为与香港起飞步一分子；而高度发展的香港经济，则带动澳门走向现代化，提高了澳门的生活水平。在澳门，“香港化”的事物和现象，在家中，在街上，在工作场所，都随处可见。澳门从两地的联系中深深受益，早已有目共睹，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

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出一个初步的想法：既然澳门从两地的经济合作中

得益，早已是一个现成步的果实，如果我们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乃至将之发展成一种主动的意识、明确的方向和有规划的协作，就不但有可能加速澳门经济的复兴进程，还有助于顺利地、健康地发展澳门的未来。

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的今天，未来港澳的经济联系，确实存在着跨出一大步的可行性与可能性。根据两地的基本法，澳门九九年回归之后，与香港同样实行一国两制。经济方面，两地都保持财政独立，都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两地都可以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都不实行外泄管制；两地都保持自由港地位，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都属于单独的关税地区。这些极其有利的宪制条件，对深化两地的经济交往，提供了高度的合法性与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

加强港澳的经济合作，对澳门尚有一个有利之处，就是这种合作本身已经具备长期的、行之有效的基础，其积累的经验也非常深厚和丰富，可以大大减少种种探索方面的代价，能迅速地加以落实及产生有益的效果，这对于过渡期只剩下两年半，而很多方面的进一步改善却十分迫切的澳门来说，尤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以上，我们列举了加强港澳经济合作的各种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冷静地看到，这种合作要对澳门产生实质的效益，唯一的不二法门就是让港商乐意来澳投资，如果不能突破这个关键，那么，一切有利的条件都是纸上谈兵，只能丰富我们的幻想，使我们永远拥有期待，却不能拥有期待的东西。

在自由经济社会，赚取利润是投资的原动力，也是任何经济合作的基础。追求利润的热望，会难以理解地化为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超越我们能够想像得到的任何限制。我们环视全球，凡是有盈利机会的地方，哪怕是万里之外的一片不毛之地，都有投资者愿意冒险一试。我们经常强调宣传推广、投资优惠、行政效率、法律保障和社会治安等因素对吸引外资的重要性，这没有错，但这些因素不管如何改善，如果不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都不着边际。反之，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使那些因素一时未能充分加以配合，也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益。当然，一旦那些因素终于迎头赶上，就能产生巧夺天工、登峰造极的成就。香港的今天，正是一个经典的榜样。

然则，我们所讲的那个关键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答案就是市场。

由于有市场，即使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有别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港商向北前进步伐，依然绝无反顾，势不可挡。由于有市场，即使香港楼价的昂贵程度，但无数的跨国企业，就算赶搭尾班车也要来香港投资。市场的威力，真是无法估计，市场的光芒，真是盖尽一切。

回到香港经济合作的主题上，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商业利益，谁愿意与我们合作？如果没有市场，港商来澳尽管仅需一个小时的航程，实际上也是没有尽头的漫漫长夜。合作不是施舍，交往不是救济，如果我们想分享别人作出的贡献，首先要考虑如何对别人有所贡献。因此澳门从港澳使命中得益，首先需要调整出基本的方向感，只有从市场的方向入手，才能真正锁定我们的目标。

通往成功的港澳经济合作之路，也许首先是一条观念上的探索之路。所谓市场，一般理想为综合消费能力。进一步亦可理解为通往别的市场的桥梁。无论理解如何，我个人认识只有将澳门创造成为一个具吸引力的市场才可以真正进一步提升港澳经济合作的层次。

多谢各位！

### 附录三

#### 何贤大事记

1908 年

12 月 1 日出生在广东番禺岳溪乡。

1915 年

进农村私塾读书三年。

1922 年

离乡由亲友介绍到广州沙基一间由上海人开办的穗兴祥店做杂工。

1924 年

到顺德县陈村镇福源商店当掌柜。

1930 年

转往广州，在上九路开设鸿记银号，出任经理，事业开始有成。

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前夕，与何善衡、马子登三人转往香港经商，继续从事金融买卖活动。

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沦陷前（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逃难至澳门立足，再度投身金融界，为大丰银号司理。

1943 年

日本陆、海军特务机关封锁澳门，何贤与高可宁、傅老榕等人前往关闸与日军谈判，平息矛盾，今日军解除对澳封锁。

不久，因日特机关黄公杰手下殴打了葡警，再掀风波。火并即发之势，何贤再次不顾个人安危，赶到东亚酒店平息风波。

1945 年

斥巨资先后收购新亚、澳门、国际三间酒店，稳定抗战后萧条的澳门经济。

1949 年

以高价收购流入市面的私藏武器，以保社会治安。

1950 年

10 月 1 日在国庆周年大会上，向澳门三千民众发表演说，致电新中国，祝贺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

1950 年

协助地下党将两航起义中藏在仓库的数千箱器材，用四艘木船及时抢运回祖国大陆。

1952 年

不辞劳苦奔波调解中澳边境士兵间发生的“关闸事件”。  
同年，获葡国基利斯大勋章。

1953 年

获葡国红十字会荣誉十字勋章。

1954 年

12 月光荣地当选为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期间，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5 年

成立了福利公共汽车公司，与澳门市政厅签约，获得澳门市区公共交通的专营权。

1961 年

10 月，和崔德祺率领“澳门业余曲艺团”到广州海珠大戏院献艺。这是建国后澳门的第一支文艺演出队在广州正式演出，备受各方面的关注。

1966 年

澳门发生“12·3”事件。澳门当局在何贤的斡旋下释放被拘捕之人，事件得到解决。

同年 6 月，在逸园狗场被国民党特务的炸弹炸伤腿脚，引起社会巨大轰动。

（从 50 年代至 60 年代，何贤业务向多元化发展，并积极支援乡建，同时为澳门社会做了大量福利慈善工作，此不一一例举）

1971 年

10 月正式注册为大丰银行，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3 年

发现自己患了肺癌，先到美国诊治，后又转回香港治疗。

10 月 12 日，为力挽大丰危业，抱病从美国重返澳门。

11 月 15 日，最后一次回到家乡番禺，度过了难以忘怀的 10 天，与世永别前痛苦而又宝贵的 10 天。

11 月 24 日，永离故乡，回香港继续治疗。

12 月 6 日下午 3 时 23 分，在香港九龙伊丽莎白医院逝世。

何贤任职一览：

1947年，任澳门商会值理会副主席，该会改组为中华总商会后，历任理事长、会长。在澳门政府中，从1955年起，被委任为政务委员会的华人代表，后该会改组为立法委员会，他继续被委任为华人代表、立法会议员和立法会副主席。从1956年起，他被连选为全国人大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协常务委员。1979年，任全国工商联常委和中国国际信托公司董事。他曾任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主席、主席，银行公会、金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建筑置业商会、戏院同业公会会长，中国教育会长，东亚大学校董会主席，暨南大学校董会副董事长、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岭南中学等校董事会主席，教业中学、商训夜中校、镜平子学、青洲子学等校董会；亚洲象棋联合会、武术总会及象棋总会等会长。

1983年6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在澳门，他任大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福利公共汽车公司等董事长，直至1983年去世，可谓终生辛苦为社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附录四

### 何厚铨大事记

1955年3月

生于澳门，是父亲何贤与最后一位夫人陈琼之子，兄弟姐妹共13人，他排行第12位。

1969年

在澳门永援中学结束初中学业，赴加拿大继续学业。

1978年

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

1981年

经考试成为加拿大特许核数师、注册会计师。

1982年初

从加拿大大学毕业归来，返回香港，在毕马域会计师楼任核数师。

1983年

因父何贤病重，返回澳门代理大丰银行家业，10月，在“挤提”风波中经历了大丰银行之危难困阻。

10月12日，陪父亲从美国就医归返澳门，在码头欢迎仪式中，第一次以公众人物脸孔及名字出现于各大报刊。

11月30日，中国银行参入大丰银行股份，并接受大丰董事会的委托，于翌日派负责人参加该行管理。何厚铨被任命为该行代总经理，与其兄代董事长何厚铿共同参与大丰银行的管理。

12月6日，何贤病逝。之后一直由何厚铨承袭父业，掌管何氏家业。

1985 年

澳门银行公会成立，何厚铨被推选为理事会主席。继父亲何贤之后，何厚铨再度成为澳门银行业翘楚。

同年，作为澳门第一批访京团副团长，率一群年轻工商界人士应邀访京。该团是第一个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谈及澳门回归祖国问题的访京团。

1986 年

3 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中，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6 月，在澳门管理专业协会举行的“家族企业管理”讲座会谈中担任主讲人。

1987 年

4 月 13 日，作为光荣的“历史见证人”，出席并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的澳门各界人士观礼团。

1988 年

当选为澳门政府第四届立法会议员，旋即又升任为立法会副主席。

同年，再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7 月，与青年商人廖译云、崔世昌、张伟基等组成“新福利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决意收整旧公司，重塑公共汽车运输服务的新形象。

10 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何厚铨被委任草委会副主任。

1989 年

在澳门计程车司机罢驶行动中，主动调度运输，疏散码头旅客，迅速平服了一场社会风波。

1993 年

2 月，被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同年 3 月，澳门特区基本法正式颁布。在进一步宣传推广基本法而组成的“澳门基本法协进会”中，何厚铨被推为理事长。

7 月，因《道路法典》条文不完善引致的有关行业停工行动，在澳门引起一场更大的混乱和纷争；何厚铨接受中华总商会委托，以他的社会关系和应变能力，不辱使命，平息了激荡的社会动乱事件。

8 月，出任“澳门支持中国减灾扶贫行动委员会”考察团团长，到粤北清远等贫困地区考察慰问，出钱出力。

同年 10 月，他再次被选为第七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这是澳门当选此职位的第一人。

8 月，被家乡授予“番禺市荣誉市民”称号。

同年，再次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

同年，主动向国家地震局赠送了价值 300 万元人民币的五套美国便携式卫星电话系统。该种设备填补了中国在便携式通讯设备上的空白，便于地震现场的信息传递。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家地震局局长方樟顺

在捐赠仪式上对何厚铨的义举给予高度评价。

1994 年

新福利公司与广州市电车公司合作组成广州市新福利巴士服务有限公司。何厚铨等首期投资八千万元人民币，投入空调巴士一百辆配合广州市政建设发展，为市民提供优良的公共运输服务。

1995 年

出任澳门知名人士参观考察团团长，应中央统战部邀请到湖南访问，考审团捐助当地失学儿童接受六年小学教育，支持当地搞好教育事业。

1996 年

新福利公司宣布在澳门试行推出“聪明卡”即“无接触式 IC 卡”服务，何厚铨等同仁们把澳门人带进享用高科技公共服务的先进行列。

1998 年

5 月，澳门特区筹委会正式成立。

何厚铨光荣当选为澳门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何厚铨任职一览：

澳门立法会副主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委员。

现任澳门大丰银行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澳门新福利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澳门联丰享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副董事长；南湾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澳门水泥厂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董事；联生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志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澳门银行公会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澳门管理专业协会副会长；澳门同善堂副主席；澳门镜湖慈善会常务董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澳门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 后 记

“中华自古多豪杰”。

在澳门即将回归之际，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渗入澳门民生、影响社会演变、地位举足轻重、声望显赫久远的何厚铨家族，亦逐渐在世人关注的焦点中，缓缓撩开了颇具神秘传奇色彩的面纱……

这是一个澳门民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家族。

这是一个阅历丰厚，积极参与并能够见证澳门现当代社会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家族。

这是一个最典型秉承着中华民族古老文化传统、家大业大、祖辈杰出、子孙贤达、爱国爱乡爱民的家族。

这是一个无须动用想象编织杜撰、本身内里即包含了功业磨难、悲喜哀荣、比拼奋斗和爱心奉献的感人故事的家族……

——尝试为这样一个非凡又平凡的何氏家族写一本传记，旨在缅怀昔日的中华豪贤，弘扬渊远流长的爱国血脉，并为澳门回归母亲怀抱这世纪之交的神圣时刻、为感人至深的何氏家族——献呈一份写作者的美好祝愿和微薄贺礼。

感谢番禺侨办的离休老干部郑德叔和有着“番禺通”美名的梁谋先生；感谢众多的番禺“乡亲们”。没有他们为作者提供大量细致的素材和图片史料，没有他们无私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完成这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

感谢澳门所有支持本书写作并提供了丰富资料和接受访谈的老朋友新朋友们——尤其感谢你们不约而同地认可：“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家族，尤其是何贤，你把他写到十全十美，我们都没意见！”我相信，这也呈现出澳门人士对何贤和何氏家族的一种由衷评价：“服！”

这一切，便构筑起我在匆促短暂的时日里，得以完成本书的充足动因和写作激情。

再次感谢所有为本书默默出力的合作者们，谢谢大家并听候你们的批评指教！

作者 1998.10.广州



主要参考资料：

- 《中山文史》第 19 辑“何贤生平”（赵荣芬撰）
- 《番禺文史资料》第 3 辑（梁栋等述访）
- 《数风流人物》“何贤”（黄霑）
- 《世界华人企业家传略》“澳门之星”（陆波）
- 《澳门总览》（澳门基金会出版）
- 《我们见证历史》（澳门历史学会出版）
- 《台港澳大辞典》（“何贤”条文）

